



旅苏纪事

马员生 著



群众出版社



2 034 5996 1

9

旅 苏 纪 事

马 员 生

1987/6/27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北 京

出 版 说 明

《旅苏纪事》是马员生同志在动乱期间撰写的回忆录。第一部分，概述家庭和童年、少年的生活，青年时期参加革命活动的经历。第二部分，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他在苏联三十年（1926—1955）的曲折遭遇和广泛的社会见闻，内容包括：在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的学生生活；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因肃反扩大化三次被捕、判刑，长期过着牢狱、流放、劳改和工人生活；平反、归国的经过等情况。这些回忆是在缺乏资料的逆境中凭记忆整理成的，对于反对派的错误观点有待深入批判，在事实情节的叙述以至观点上的不当之处，作者未及修改便不幸与世长辞。为了及早向有关单位提供内部研究参考资料，本书完全照《旅苏纪事》原稿排印，内部发行。《旅苏纪事》除个别重复之处稍有删节及校注、统一若干人名、地名外，均保持遗稿的原貌，仅供领导同志和研究机关、史学教育及政法、公安有关人员内部参考。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1
代 序	1
我的家庭和革命经历 (1906年10月—1927年初)	1
我的家庭	1
我的父亲和《新中州报》	4
我的童、少年	8
青年时代	17
一、创办墙报《试刊》始末 (20)	
二、从青年学社到河南青年协社 (24)	
三、参加国民党的经过及活动 (31)	
四、从中大学生会到河南省学联 (36)	
五、参加中国共产党前后 (42)	
六、从开封到上海的巧遇 (53)	
七、在上海逗留的两周 (56)	
八、从上海到海参崴五昼夜 (59)	
九、在海参崴停留 (61)	
十、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63)	
莫斯科阶段	67
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2月——同年末)	67
东方大学概况 (67)	
中山大学和几件事 (70)	
东大暑假野营军训 (71)	
1927年秋季开学以后 (72)	
东大学潮始末 (1927年——1928年3月)	75
学潮的远因 (75)	
学潮的近因 (76)	
墙报事件 (77)	
工作组进入学校 (77)	
第一次中国学生大会 (78)	
第二次全	

体中国学生大会 (79)	最后一次分别召开的中国学生大会
(80)	离开东大及转学经过 (81)
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28年3月——1930年3月) ……82	
列宁学院简况 (82)	中国学员的情况 (83)
第二个“五一”	节 (86)
生产实习 (87)	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 (88)
列宁学院第一届学员结业 (89)	到黑海边自找“别墅”休假
(8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90)
中国代表团 (92)	布哈林的右倾及下台 (93)
见到鲍罗廷 (93)	家庭的消息
(93)	
我的反对派观点形成的经过 (1928年秋——1929年初) 94	
阅看反对派的一个主要文件 (94)	刘仁静对我的谈话 (97)
黎光剂、张景曾从河南到莫斯科 (100)	中大的改组及东大与
中大的合并 (105)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及农民问题的看法 (105)
到红军中进行国际主义宣传 (106)	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
和工业考察 (107)	列宁格勒简况 (107)
州经济委员会及实	习参观安排 (108)
到军事政治学院去 (109)	第一次到休息
所，第二次到黑海边 (110)	三位朋友的别离 (111)
中大内	部的斗争和十天大会 (112)
准备结业论文 (114)	中东路事
件 (115)	
和反对派的关系及其他情况 ……•116	
刘仁静回国 (116)	与中大学生反对派的初步联系 (117)
中大	大学生反对派的改组 (118)
中大反对派三人领导小	组会 (119)
和其他人的谈话 (120)	列宁学院开始清党 (121)
被捕、监狱生活及释放 (1930年3月——9月) ……•124	
被捕的第一天 (124)	小牢房的一段生活 (127)
莫斯科大牢	内的生活 (129)
宣布审查结束 (134)	转到另一间牢房 (136)
释放以后 (140)	第一次受处分：流放 (141)
离开莫斯科到	伊万诺夫去 (142)

伊万诺夫阶段（1930年9月—1937年5月）	145
到达伊万诺夫(145) 到区党部去(145) 入第四金工厂 (146)	
伊万诺夫城(147) 我们的工厂(147)第一个冬天(148) 解决	
了住房大问题(149) 由学徒工转为二级车工(149) 这一年	
的几件事(150) 又来了一批大学生(153) 全面开展各项社	
会工作(154) 成为生产突击队员(156) 生活供应的改善	
(156) 学习德文的尝试(157)	
一度解决党籍问题	157
党委来了新书记(157) 解决党籍问题的基础(158) 厂内基	
层党组织的决定(158) 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159) 见到王	
明(161) 遇到原列宁学院院长(161) 留克斯旅馆(161)	
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162) 我所知道的王明(163) 归来	
(165) 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通知(165) 加入苏联国籍(166)	
有些人走了(167) 一封未发的信(168) 江一牟到伊万诺夫	
(169) 苏联政府的法令 (169) 供给改善, 取消配给制	
(170)	
进入动力学院前后	171
转学技术的动机(171) 考学的准备(171) 两处报名(172)	
侥幸的第一门物理考试(173) 数学考试(174) 化学考试	
(174) 进入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175) 第一学年学习及	
生活 (176) 回到工厂短时期工作(177) 到休养所去(178)	
季诺维也夫等人事件(178) 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180)	
在伊万诺夫第二次被捕及以后	182
高尔基的来信(182) 我们突然被捕(182) 宣布被捕的理由	
及条款(183) 初入内牢的情况(184) 内牢见闻及特别会议	
(oco) 的传说(185) 我的问题的审问内容(187) 转入伊	
万诺夫大牢(188) 第一次被押送(190) 弗拉基米尔大牢	
(191) 我们的大牢房间(192)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的案件	

(193) 特别会议 (oco) 的判决(194)	集中等待发送(196)
到达第一发送站 (197)	不平常的一段押送 (198)
科特拉斯转运点(200)	绍尔站 (202)
乌斯特——威耳马 (204)	
在苏联极北地区	207
沃尔库特 (207)	见到从高尔基来的中国人 (209)
短期的衣食住及工作 (210)	劳动营中的怪闻 (210)
东方人可占便宜 (211)	从沃尔库特被发送 (211)
大战虱子 (214)	
考其莫斯农场阶段 (1937年11月—1941年12月)	215
劳动营管理 (216)	犯人组成 (217)
四年的农场劳动 (218)	农场的生产情况(230)
农场生活点滴(233)	有关人员的一些事(2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及其在劳动营的反映(245)	开始释放人及返回 (246)
自杀念头及谈话 (246)	在农场见到的自然地理现象 (248)
离开考其莫斯农场 (251)	
印塔阶段 (1942年 1 月—1947年 5 月)	252
印塔概况(252)	劳动营情况(252)
可怕的1942年上半年 (253)	我的初期劳动(256)
不幸中的幸运(256)	自由居民区的洗衣房(260)
我的工作(261)	印塔的建设(263)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塔的反应(263)	来了一大批新犯人(264)
从美国来的东西 (264)	来了一批军事犯人(265)
莫斯科附近的大战 (265)	列宁格勒被围的困难 (266)
乌克兰叛变事件 (267)	乡间男人的缺乏 (267)
大歌唱家的遭遇 (267)	劳动营中的几件事(268)
科米人的一些情况(27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270)
第一批犯人的释放(271)	第一批政治犯的“提前”释放(271)
我的释放及任命等(272)	到机电修配厂当技术检查工长(275)
和莉沙结婚(277)	一个朋友及其家庭(279)
北方的供应及待遇(280)	第一次参加选举(280)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281)	在机电修配厂的工作及见闻(282)
离开印塔到内地哪里? (284)	到乌拉尔路上的

见闻(285) 到达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86) 第一次试探工作的失败(287) 到第一个区去(287) 找到工作前后(288) 从单身宿舍到租房(290)	
在乌拉尔阶段 (1947年5月—1949年10月)	293
这里的环境、工作、生活情况(293) 第三次被捕经过(317) 州内务部内牢及受审情况(319)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牢情况(327) 所谓“判决”(331) 流放被押送出发(332) 到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32) 久别重逢见到鲁也参(333) 内务部门的人两次找我谈话(333) 离开大牢去流放(335)	
在西伯利亚阶段 (1949年—1955年8月)	336
几年的生活情况(336) 西伯利亚中国人的情况及见闻点滴(358) 机电修配厂及工作(366) 这时听到的新闻点滴(380) 我和莉沙的平反(389) 回国前后(390) 归国途中(412)	
在北京停留期间 (1955年10月—1956年1月)	421
新华饭店, 组织部招待所(421) 见到了一些熟人及董老等情况(422) 参加工作及重机厂技术设计审查(428) 回到家乡及接家经过(429)	
到达富拉尔基	436
到达富拉尔基(436) 回国后和苏联相识人的一些联系(436) 恢复党籍的经过(437) 第二次见到董老(438) 关于恢复党籍的通知(439) 国籍问题的解决(440)	
代 跋	442

我的家庭和革命经历

(1906年10月—1927年初)

我的家庭

我家住在河南省辉县小赵固镇。从曾祖父以上的几代，据说是大地主。曾祖父生了七个儿子，分家后，成为较小的地主，只靠地租生活没房产，但尚保留了地主的生活方式，而已经日趋衰落。我的祖父排行第三，中年中了秀才，善书写、绘画，是一个乡间绅士，比他的几个兄弟还多少有点学问。生子二人，长子即我的父亲。由于五门祖父早死，五门祖母早寡无子，按宗法社会习惯，有权挑本族的子弟过继。由于父亲当时读书，品性好，还是秀才，所以五门祖母即选定父亲作为过继子。父亲后来结婚，生了我们弟兄三个，待我记事时，家中只有十亩地，六口人生活只靠地租是很困难的。父亲继续读书，不自己耕地。地租是粮食五五对分，佃户和我们各一半。因此，祖母和母亲还经常替别人裁缝衣服，母亲还会绣花，扎花，也赚点粮食为家中糊口。连住的房子，也是叔父家的，只有三间。我们小时，也比较刻苦，我还经常到地里拾些柴草和树叶作为家中做饭的燃料。这种破落地主家庭的困难生活，一直到我父亲从高等学堂毕业及

有了事以后，即民国成立后，才有所转变，赎回了原来典当出去的住房及田地，为以后较为稳定的家庭生活奠定了基础。这时我们随父亲离开乡村到开封，进了学校。

祖母的娘家是离我们村三里地的板桥姓高的自耕农，由于家中人力壮，所以过着中农的生活。祖母选择我父亲做过继的儿子后，管些家务。照应我们弟兄的成长，特别是我母亲早死，父亲娶了继母后，祖母已处于无权地位，只是照顾小孩们了。

我的亲生母亲姓邓，离我村二十五里陈村人，其父为不第秀才，在乡间教私塾。生母处在两个矛盾重重的婆婆之下，家庭生活困难，还常受不少无名冤气，各方面都很不顺心。她在我家受了十几年的苦，在三十多岁，家庭情况刚有好转时，便因操劳过度，得肺病死了。母亲除生我们弟兄三个以外，下边还生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因乡间医疗条件不好，再加家庭经济困难，都夭亡了。

母亲死后，父亲已干起工作，家庭情况好转，所以很快就娶了继母。继母姓郭，是山边石乡洼一个富裕中农的女儿，曾和我们是老亲，父亲读书困难时，曾帮助过我们。她到我家后，即随父亲到开封，但因病不久死去，未生儿女。

继母郭氏死后，父亲又经舅爷介绍，和他的远门本家辉县城内王家的女儿结婚，那时父亲已将四十岁，继母才二十岁。王家系地地道道的地主家庭。继母王氏过来后，掌握了家里的大权，父亲对她也有所放纵。同时由于家庭生活好转，在她的主持下，家里吃穿大不同前了。她对我们虽然有所限制，由于我们年纪已较大，都在学校读书，无法施展其全部威风。继母生了四个孩子，死了两个，现在都长成参加

工作了。

我们弟兄三人，大哥先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以后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我出国后，当过中学教员和校长。解放后，在武汉师范学校当职员，1962年死去，一生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及政治活动。大哥名马云，原字翼龙，后又化名固生，在学习期间，因叔父无子，又返过继回去，实际上和三弟已分居了。

三弟在中学时，于1925年参加了革命青年组织——河南青年学社，并当过组长。1927年参加了秘密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捕，在监中得病，后被保出，脱离了组织，回乡间休养，后又继续读书，毕业于河南中州大学，一直在开封、新乡、本县的乡间当中学教员，最后几年到汲县师范学校当教员，1970年6月死于汲县。有子女四人，长女马瑞，中共党员，毕业于开封师专，在郑州工作。二女马瑞梅，团员，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分配到四川钢厂工作。三女瑞兰，汲县纱厂工人。子瑞成在宁夏当小学教员。三弟原名马雯，后化名卓生。

继母王氏有二子，大名马雷，中共党员，是解放军干部。次子马洪，在郑州纱厂当技术员。他们和父母在一起，自己分居。

我的妻子郭志清，其父为破落地主，后当乡私塾教师糊口养家。

我出国后，由父亲养活我的妻子及全家。父亲死后，祖母当家，三弟在外当教员在一起生活。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改为新中农参加合作社。我回国后，将我的妻子接出，祖父及其他都随我三弟到汲县。其他人参加了工作，从

而完全脱离了家乡，同时和其他近门亲属也没有接触。现在是东西南北，分处几地，都有各自的小家庭，而独立生活。

我的父亲和《新中州报》

我的父亲名马和赓，原名马鸣銮。生于1881年，自幼跟着三祖父读书，学习不错。十五岁时中了秀才，取得了清科举制度第一级功名。后来曾到当时的省城开封贡院去乡试，两次考举人未中。清朝废科举建学堂后，到当时的卫辉府（即汲县）进修。经过一段刻苦的学习，考进了省里新办的高等学堂。高等学堂是四年制，除国文外，已经学习数、理、化及其他课程，相当于以后的大专水平。

当时清朝为了鼓励人们进学堂，采取了几种措施：一是进学堂的，以秀才为主，同等学历的也可，入学要求不太严；二是完全官费，而且课本、用具都是免费，还给伙食费，每年发制服一次。学生只要自筹来往路费就可以了；三是为了照顾社会习惯势力，克服人们对社会改革的偏见，学堂毕业后，还按科举时代的功名等级，授于“举人”。

在父亲上学这段时间，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即使有官费，筹措少数的钱不是易事。因此每年得向亲戚、乡邻乞求，而在困难时，乞求是最不容易的。记得有一年暑天，为了上学，父亲到亲戚家求助，回家时路逢大雨，淋得浑身衣服全湿透了，冻得打战，回家架火才把衣服烘干。有一次家中过年，因为没有钱买肉，只得买豆腐，做了豆腐丸子来当肉丸子吃。有一次祖母到邻家的菜园里去，请让她拣些青菜，主人

婉言拒绝说不劳她动手，他们将自己拣的给我们送来。

1911年夏初，父亲从高等学堂毕业了，由省政府发下报单，到家里报喜，中了“举人”。从此，成了有名望的人。在三祖父的主持下，由各家捐助及乡亲帮助，为我父亲这个洋“举人”举行了贺礼，门口竖立了两个旗杆，父亲开贺后，到北京去，被清朝给了个“小京官”，据说比县知事还要低两、三级。这年十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帝很快退位。他只当了三个月的“小京官”。这三个月很空闲，同学介绍他兼做报馆工作。

辛亥革命后，父亲回到新乡县当教员。一年后，各省都成立省议会，北京成立国会。省议会是由各县推选的省议员组成。名义上是人民选举，实际上是本县各乡推选。第一次的省议员，谁也摸不清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好处，所以也没有多少人争着干。我父亲以高等学堂毕业生、洋举人的资格，被推选为第一届河南省议会的我县代表、省议员。从此我父亲就到开封工作，当省议员。由于省议员在议会开会期间每天参加会，晚上没事，而休会期间整天没事，所以又经同学介绍，到当时开封的《河南日报》曾任编辑并兼薪。1913年，我们弟兄三人和母亲也随父亲到了开封。母亲管理家务，坚持节约，以便攒钱赎回当出去的房和地。1914年我们搬到赎回来的住宅后，我生母秋天即逝世。后父亲续娶继母，1915年再次带继母到开封。1916年《河南日报》停刊，但又创办了《新中州报》，父亲担任了总编辑，这年第一届省议员任期已满，开始选第二届，争当的大有人在，甚至拉拢、请客、花钱，父亲不愿参与这些活动，所以未能连任。从此专门当该报总编辑，一直到1927年，前后当了十二年。1917年我们弟

兄三人，也开始在开封进了学校。

《新中州报》是民办的，与河南省政府及历届军阀无直接关系。主办人为胡汝麟及王搏沙，均系河南地主。胡在清朝有功名，河南高等学堂开办时，胡是校长，王也在那里。以后，胡、王二人经营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公司，成了资本家。胡、王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由于商学堂的毕业生在河南各部门担任工作，无形中形成了一派势力。因此想在政治上活动，以自治名义扩展政治实力，才主办了《新中州报》。由原高等学堂工作人员，巩县的王某任经理，我父亲因学习成绩好，有中文写作能力，又当过几年报馆编辑，被选为总编辑。经费一部分由胡、王出，一部分经常由中原煤矿公司出。开始规模较大，出八版，印数也多。1918年后和当时河南督军赵倜因争省长发生矛盾，胡被软禁。后出国游历，不再参与政治。这时《新中州报》减为六版，印数也减少了，工作人员也压缩了。为了维持经费，除了中原煤矿公司的补贴外，还兼营印刷所业务。《新中州报》由于是无党派的，不象其他地方报纸，因军阀更替而忽起忽落。它却维持了十几年。父亲主要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这和他的“君子不党”的一贯主张是符合的，和他的不参与官场政治活动也是符合的。

父亲还“自命清高”，经常称赞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在生活上量入为出，常说：“不求于人，才能不受制于人”，对于子女有点“自由主义”味道，常说对子女靠身教，靠子女的自觉与自爱。从来不骂、不打，即使看到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也只事后劝解说服。1924年由于继母王氏花钱多了，主要用在生活费用上，对我们的上学费用就抠得

紧，有一次我想多要几元钱买《辞海》，父亲说没有钱。我写信给当时在上海读书的大哥，说家中不给我钱买书，大哥生了气，给父亲写了一封粗暴的信，攻击继母王氏。父亲当时很生气，原想罚我和三弟，但过了几天，他却和我们心平气和而又带点感情地进行了长谈，讲到了家中过去的困难，他未继承任何东西，是个艰难创业的人。他说和我们约法三章，对我们承担三个义务：（1）保证供我们到大学毕业，如考不上大学，供到我们能独立生活为止。（2）大哥和我都已订婚，是父母作主。结婚后愿意分居时，自己带出去；愿意留在家里他负责养活。三弟婚姻，将来要事先征得本人同意。（3）家里有几亩地，有自己的住房，父亲老时，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及继母，不要我们担负责任。养活子女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将来要养活自己的子女，不要让子女养活老人。

他对我们有三个要求：（1）安心读书，准备将来干事，不要担心及过问家中事务。（2）对于继母，不要求我们以亲母相待，但要尊重她，当作父亲的妻子相待。（3）对继母的子子女当弟、妹相待，不要歧视，他们的生活费用，我们不负责，由父亲负责。

我们觉得这是开明的“约法三章”，同意了，以后便消除了意见，虽然继母还常责备我们。

1925年初我加入国民党后，父亲是不赞成的，不符合他的“君子不党”的主张，但也未责备我，只是说，不要完全相信那些宣传品上的东西。以后，他怀疑我参加了共产党，并看到我“五卅”后积极地参加运动，心里可能高兴，说：

“青年时候，一个人如果不露点头角，长大也不会干什么

事。”但又警告我：“革命不要先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27年，北伐军到河南，冯玉祥也从陕西到河南会师，开封变成了冯玉祥统治下的国民党世界。《新中州报》停刊。父亲也停止了报馆的编辑工作。在开封呆了两年，于1930年带着家回到了本县，组织了几个人，在县政府领导之下，筹捐了些钱，进行了辉县县志的修改补充续编工作。一直到1938年大体完成，但未能完全刊印。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内地，1938年到了河南，父亲拒绝在日本人下边服务，惊恐成病，回到乡间，1939年逝世。享年58岁。

我的童、少年

我生于1906年，农历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约在阳历十月初。1911年辛亥革命时我才五岁，记得那时我才留小辫。清帝退位的消息，很快传到我们镇上，祖父思想比较进步，为了响应革命和庆祝汉族的“解放”和清朝统治的被推翻，把我和大哥的小辫子都剪去了，他自己也剪了，是我们镇上最先剪辫子的人。父亲从北京回来，也是剪了辫子。从此镇上有少数较后觉悟的人，自觉地或被迫地也剪去了辫子。

但是不久就传出了反动谣言：“推倒五色旗，遍地杀秃驴”。五色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秃驴是指剪子辫子的人，是属于该杀的人。我那时还小，实际上等于尚未留辫子，所以也不怕。有些胆小的，还留着剪下来的辫子，以防万一。但五色旗究竟未被推倒，秃驴也未被杀。

从1912年起，我开始跟着祖父认字，每天两、三个，认识了以后，如果会读、会写、会解释，祖父就按字数给我两、三个大铜钱，一方面是物质奖励，一方面便于记着识字的多少。这些钱不能花，而要装在一个小口袋内存着，这样居然识了几百字。后来教我读些小短文，那时已出版了些较为通俗易懂的文言语文课本了。有时练习作些几十个字的小说明文，也对些对子，对对是对联的开始，为以后的作文，作诗词，灌输了最初步的基本知识。据说，我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还不错。

1913年我们弟兄三人和母亲第一次到了开封。住在游梁祠街，此街因孟子游梁词而得名。祠里还有孟子的泥塑像，我常在那里玩，一个看祠堂的老头领着我玩，还问我读不读“孟子见梁惠王”，向我讲了孟子游梁的故事，并说，几千年了，大家还修祠堂敬他，使我敬佩。

在开封我和大哥一起去上学，由大哥的岳父冯里联教，也学些美术。在开封呆了一年，生活还是很俭朴的，馒头是黑白面渗和在一起的杂面卷，早起吃廉价的红薯。很少到街上去，也没买过什么玩具。一年后，又都回到家乡。母亲是为帮助父亲积攒些钱，才这样做的。

1914年父亲和本村的蔺家商量，我们弟兄二人及他家的三、四个孩子，还有本村的其他两、三个，共约十人，合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在本乡后街成立了私塾。这年学的全是《论语》、《孟子》等旧学。

1914年秋，母亲逝世，父亲赶回家乡时，母亲已经不省人事了。父亲想到她的早死，过去的困难生活，又留下我们兄弟们，不免伤心落泪。奇怪的是，三祖母却劝父亲说：“媳妇

是墙上的泥皮，掉了旧的换新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也激起了我对外祖母的强烈不满，和她吵了一架。

1915年初，即阴历年前，父亲第二次结婚，以后带着继母及大哥到开封去了。我继续在私塾读书。但几个月后，私塾老师辞职回家，我也停止了学习。由于我身体不好，夏天竟得了重伤寒，半个月米水未进，瘦得只有皮包骨头了。据祖母说，这是我第二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第一次是我三岁的时候，因出疹子十八天未吃东西。母亲已准备将我包裹扔出去。由于祖母及外祖母坚决不让，后来又活过来了。这次又是她俩人轮流看护我，后来渐有好转。当我一时失去了知觉，祖母到院外烧香求神，半夜未睡，并许下了“朝山拜神”的愿。两次病后，我由一个很胖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瘦孩子了。这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少年多病，一直到以后成年，还是一个发育不足的人。

这年秋冬之交，继母领着我到几十里外，太行山脚下的“后门”去还愿。那是建立在山坡上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庙。风景也不错，地势很险要。开始可坐马车，最后几里，只能步行上去，而来往的香客却络绎不绝。这次还愿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是：在崎岖的山道之上，建立那样大的庙宇，说明了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花去的精力和血汗确实是很大的。

1916年，大哥、继母、父亲都在开封，外祖母领着我到外曾祖母家——高村去住，以便治病、养病。我的大表舅在那里是比较好的中医，他家中还开了个小药房，所以具有较好的物质条件。此外，外曾祖母也很喜欢她的唯一女儿——我的外祖母，更喜欢她的外孙女，即是我的母亲。现在母亲

死了，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对我特别喜欢。大表舅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小珠，比我大两岁，简直是她老人家的掌上珠。我去后，她和外祖母两个老人，我和小珠两个小的，更是一家中待遇最好的了。她家在前清早些时，曾做过官，如道台之类，但那时也是走向衰落的地主了。大表舅自己学会了中医，又有二表舅主持药铺，更是多少务点正业了。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吃药、看病、玩，和他们家的雇农到地里跑，帮助干些轻活，实际还是玩，呼吸新鲜空气。晚上是听两位老人说不完的故事，《西游记》、《水浒》、《三国志》，还有什么“公子探亲”。有时也写几个仿，读一点书，甚至和小珠姐在一起学针线。我对于农作物有一点知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跑菜园得来的。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身体大为好转，各种知识也增加不少，也是有点童年之乐的时候。

1917年过了春节以后，全家又到了开封，还带了一个家庭教师王乾元。他是个老秀才，教我四书、作文，但也有点新思想，常看报，也教我点新东西。

1917年夏，我们都分别考进了学校。大哥进了留美预备学校，我进了高小，王乾元很高兴，这也是他的成绩。秋后他没有了事，就回乡间了。从此我从旧学转到新的学校。

进高小时只考美术及作文，不仅有些课程对我是陌生的，如地理、历史、音乐、体育等，使我有点吃力，因为我是插班生。原来的学生都是从初小毕业转来的。我的作文经常在丙等之列。那时作的还是文言“之乎者也矣焉哉，然而就是一转”之类的东西，题目是以“论”为主，记、

序次之。我们当时的主任教员叫张伯英，是第一师范的优等生，各方面学习都好，不仅各科目好，而且是多才多艺的，诗、词、音韵、音乐、体育、古乐等都是好样的。但他对我的作文总是改得很多，第一学期考试发榜，我列在丙等十几名，是班中倒数十名左右的学生。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张伯英病了，请一个“代庖”的姓娄。说也怪，姓娄的来了后，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进了乙等，第二次就进了甲等，以后很快就被选为前几名，并当着学习的样品贴出，让大家看，那是最荣誉的。两个月左右，张伯英回来了，对我的进步大为惊讶，父亲也说大有进步。从此，我的作文进入甲等，其他课程也跟上了。

1918年我转入高小二年级时，已是优等生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中国虽未直接参战，但究竟曾对德国宣过战，是协约国之一，也大为庆祝。开封也不例外，从省政府到学校都庆祝，白天游行，晚上还举行提灯大会，我们班学生扎了一个竹马灯，让我骑坐。大家唱着专门编的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的歌：

“伸我公理，抑彼强权，而今一旦豁然……。”仿佛强权的德国被打败了，坚持公理的协约国胜利了，世界就和平了，公理就占了上风。

但是，未过多久，巴黎和会召开了，青岛及山东的问题出来了，中国失败了，卖国贼出来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以打倒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亲日派卖国贼为口号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各地学生、包括开封的，也群起响应。我们的母校第一师范是开封各校带头的，我所在的附属高小，也跟着积极参加。当时比我们高一年级

的高小三年级，已在准备毕业考试，对运动兴趣不大。我们是高小二年级，成了带头人，参加了罢课、参加校内外各种会议，直到暑假为止。暑假后，爱国运动的浪潮逐渐低了下去，当然“五四”运动的影响在逐渐向深广发展，而不只是抵制日货而已。

1919年下半年，北洋军阀的直系，以曹锟为首，吴佩孚为主将的一些人，乘“五四”运动的风潮，掀起了反段祺瑞为首的亲日安福系，屡次通电，支持学生的反卖国贼及抗日运动。特别是吴佩孚，当时是陆军第三师师长，于1920年春，从驻地湖南撤兵北上讨段。当时河南督军赵倜也加入了直系。吴佩孚及其部队到了河南开封，各地都开会欢迎，学生们积极参加，当时看到这位吴子玉将军，精神焕发，慷慨陈词，声讨卖国贼，扬言“以武力为国民后盾”，一些人们把国家复兴，寄托于这位将军身上了。对他的讨段的通电，四六骈体文，指斥安福系是“盗恶夜雪，鬼忌朝阳”，痛快淋漓，简直可以当文章读。夏天，发生直皖战争，徐树铮借口参战反德而训练的边防军，从外蒙调来也很快溃败了。战争结束了，直系在北方取得了统治地位，吴佩孚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大本营设在河南洛阳，广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洛阳一时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间，我开始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由于父亲在报馆工作，家里每天送一份报纸，我还可以到报馆里看外地的各种报纸。

1920年夏天，我从高小毕业，遇到了升学问题。我先试考一师，以为是优等生有把握。想不到优等生中的韩沅波、李岭等都考上了，而我却落第了。我虽然是试考，因为父亲

不让我考一师，让我考中学，原因是师范毕业后得当小学教员，不能升大学。我未考上而不高兴时，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个人在科举时代多次“名落孙山”尔后一举成名的故事。过去，父亲只给我讲历史故事，而以讲故事开导我这还是第一次。

我后来考入了二中。那时“五四”运动已一年多了，但国文还是讲文言文，不过已经可以作白话文了。国文教学仍以文言文、古文为主。其他的课程，则是一般中学的教材，仍用文言。外国语是英文。

在第一个学期时，由于吴佩孚的反日及反亲日派，河南学生的反日及抵制日货运动又有发展。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学生们有组织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绑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兄弟——赵三麻子（他是开封警备司令）的大编绸缎庄掌柜。他屡次抗拒学生们在他的商店进行日货检查，触怒了学生会。这个掌柜被绑后，翻戴小帽，背上插着小旗，上写“贩卖日货奸商大编掌柜”，游街示众。等警备司令部派警察来时，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游街已完。赵三麻子发火要人，也迟了。这些事是高年级学生干的，我们只是看热闹而已。

1921年夏，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生，我当时因向往留学生，该校在河南享有盛名，我大哥也在那里，所以决定投考该校，父亲、大哥也赞成，虽然在年级上吃了一年中学的亏。但在一千五百名考生中只取五十名，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幸而顺利地通过了。

留美预备学校的有名，主要是校规严，学生刻苦学习，成绩好，教学水平高，特别是数理化及外文，是准备直接用外文学习、阅读、听讲和会话的。有外国人及留学生教，教

育制度，考试，记分方法，是采用欧美式的淘汰选才。功课紧，考试频繁、严格，所以有些学生跟不上，考取了等戊等而被退学，有的转学，甚至有的病死了。国文是主要的课程之一，但比重不如数理化及外文。该校招生以外文语种分班，当时已毕业的有一届英文科，在校的还有第二届、第三届英文科、第一届法文科。我们进入时已是第四届英文科了。招生不是每年有，而是根据教学安排而定。

由于我在二中读过一年，对英文、数学有点基础，所以第一年甄别考试顺利过去，国文成绩还可以。

1922年夏天，大哥从第二届英文科毕业。由于省政府不拨经费，所以未能选拔留美生。当时的校长张鸣烈，原是我父亲曾就读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因为学习较好，被派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这个职务。由于当时留美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学校就失去了意义。但经过张鸿烈的奔走，经省议会通过改为省内河南中州大学及附属中学。我们改为初中二年级，新招的第五届英文科改为初中一年级，已有的三届英文科、法文科，按原计划到时毕业。以后又招收了预科，这样就逐渐转成了一般的带附中的大学了。

1922年四、五月直奉战争发生。河南督军赵倜在1920年参加了直系反段战争，以后成了附庸，吴佩孚盘据洛阳后，向河南要钱、要粮，成为霸主。赵倜不堪忍受，乘直奉战争吴佩孚开往前方时，进行了反直军事行动。但吴佩孚先前发觉已有准备，派冯玉祥占了郑州，打到开封，赵倜及赵三麻子原有河南陆军溃退，开封有被败兵抢劫的危险。我们学校组成了红十字收容所，昼夜带刀、棒巡逻，进行防卫。我也参加过巡逻队，最紧张的一夜，是在教学楼上听到非常

清晰的枪声，原来是有人神经过敏，把卧狗当作坏人乱打一阵，而且见到军队到学校来，以为要抢劫，几乎发生冲突。

冯玉祥当时有模范军人之称，到河南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及团结等方面的政策。如军队的整顿、训练、管理，撤除衙门，使用新人物，加强教育工作，禁烟、赌，取缔相国寺内的各种坏事，禁娼，财政公开，整理税收，提倡女子放足，剿匪，到各学校、机关巡视等等，颇得人民的称赞。同时大肆扩军，他原驻河南信阳，是一个混成旅旅长，到开封后已成为师长，当督军后，几个月内就成立了几个师，原来的团长，旅长都成了师长。此外，他信奉基督教，星期日在南关演武厅带着军官、士兵做祷告，所以又称“基督将军”。他还招集学生训话，宣传爱国思想，甚至痛哭流涕，悲愤中华民族之不振。冯玉祥在河南只呆了一年多，由于不很听吴佩孚的话，不能满足他扩军的要求而想独树一帜，被吴佩孚调离河南，到北京当军事总监，实际上是夺取他的地盘，而以自己的嫡系军官，二十三师师长张福来当了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下很不愿意离开河南，想抗拒吴佩孚，几乎打了一仗，终因冯玉祥的主张离开了。

1923年发生了吴佩孚在郑州屠杀铁路工人，镇压“二七”罢工事件。从此，他的军阀反动面目，才逐渐暴露。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二七”事件的消息，从杂志上看到这次事件的性质，但还未能了解到它的意义。

关于我的学习情况，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连续是优等生。因为在主要科目如英文、国文（主要是作文）、数学我的成绩都不错，其余的历史、地理等课程也就跟着进入优等，有一年还成了免费生。为此家中将我应缴的六元学费，

给我做了衣服，也算是鼓励吧，因为作弟兄们的老二，我一直穿我大哥的旧衣服的。

学校的教员，一小部分是留学回来的，一部分是国内各大学毕业的，由于学校的声誉好，一般的教员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一个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员、后授予教授学位的瞿文琳。他年纪轻，但学问、教学能力都很好，使我对数理化各科一直有很大的兴趣。第二个是国文教员李静祥，对我的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学校由留美改为中学及大学，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原来那种闭塞守旧的思想以及沉静的学生生活，也有所转变。从1922年起，我和几个学生组织了学生商店和新剧团，也参加体育活动、乐队，我原来板滞不爱活动的性格，也变得活跃好动，和高等小学及二中时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我变得活跃，又参加体育活动，身体虽然还很瘦，但已显著地好转。第一年进校，由于身体不好、神经衰弱，有一次上体操时，头晕眼花得不能站立，第二年后，虽然还有困难，但已无类似情况。

所以，从幼年到少年结束即17岁时，特别是后两、三年，我在身体、精神、思想、性格、知识各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改变和前进，可以说，对今后的一生有了决定性的影响。

青年时代

从少年进到青年时，我的思想在形成，各方面变化较大。

第一，思想方面，由不自觉的一般爱国思想变成革命的，为祖国的解放、独立、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及社会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的国文教员李静祥对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李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了同盟会，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追随者，上国文课时，经常讲述国民党的斗争史，从同盟会开始讲起，还介绍我们读一些新文化方面的文章和书籍，选一些陈独秀的作品，如《文学革命论》等。从这时期起，我对于许多种杂志、报纸，几乎什么都阅读。有些新书刊，一个人买不起，几个人分摊买来轮流看。主要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书刊，《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及以后的《政治周报》。还有胡适派的《努力周报》，后来的《现代评论》，郭沫若等的《创造》、《洪水》，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小说月报》，国家主义派的《孤军》、《醒狮》等。但比较喜欢的是鲁迅等办的《语丝》、《莽原》。报纸是《晨报》及其副刊，《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及《学灯》、《民国日报》及《觉悟》。书籍中有中共出版的多种的社会科学宣传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及其他许多种文艺作品。这些几乎遇见了就读，开封当时新办了个文化书店，我几乎每周都去。

第二，对艺术作品产生了兴趣。包括新的及古典的，除李静祥向我们宣传外，学校图书馆也购买了一些，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自己还买了《西游记》、《西厢记》、《儒林外史》以及一批二流小说，如《说岳》、《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由汪原放新式标点的《红楼梦》、《水浒传》，在推广古典小说方面也起了不小作用。有些我还

读了好几遍。

诗词方面，除了新诗如康白情、伍敬之的新作品外，唐诗也对我颇有启发。学校曾请来一个姓李的老翰林，河南长葛县人，已六十多岁了，胡髯垂胸、白发苍苍，但红光满面、神气十足，上到我们的三层楼教室，也不大发喘。他曾作过清朝的京官，两任县知事，因不愿在宦海中担风波，早期还乡，当时到开封办事，校长聘他给我们讲唐诗，属于自选课性质，自愿听讲。他给我们只上了几次课，每次一小时，只讲唐诗七言绝句一首或两首。如第一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讲得真是句句生动，字字精辟，真是绝句。也讲了音韵，最后给我们朗诵一次，声音洪亮、清脆，好象比音乐还好。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并引起我对唐诗的兴趣，几十年都未减退。可惜时间太少，他只讲了十几首。

第三，积极参加群众及社会活动。我由一个沉默、板滞、好生气，甚至在公开场合口吃，不大会讲话的少年变成了积极、活跃、好动、勇于发表意见、对各方面都有兴趣的青年。在这两、三年内，一开始我就和几个人搞了个学生商店。大哥毕业后，我当了学生饭堂管伙食的头，以后曾和学校管理员为厨工的事闹过一次不小的冲突。曾筹建新剧团，试演了几个话剧，这个团以后成了代表学校全体学生的正式新剧团，较大规模地进行公演。为了练习演说，克服在公开场合时口吃，曾组织了业余学生讲演会，我和同学杨放之曾有两、三个月时间，常到学校操场后的乱坟中练习演说，还参加了乐队。1924年在学生演说比赛中，我居然得了一等奖。1923年后，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新文化及革命思想方面的系统活动。

第四，在身体体质方面大有好转。由于性格变了，又参加多种活动及体育活动，如足球、篮球及网球等各种球类活动。由一个体弱多病的病夫，变成了不常害病而且精神饱满的人。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及革命活动，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进入留美预备学校，特别是改为中大附中后，新文化运动冲进了闭关自守、保守崇外、管理森严的学校，而我从少年时代转入了精神饱满的青年时代——对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时代，来迎接中国大革命的到来。

下边按先后次序，专门对几件较大活动进行叙述。

一、创办墙报《试刊》始末

1923年秋，我转入中学三年级。河南在“二七”事件后，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更为厉害。另一方面，青年学生中由于“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广发展，新文化运动继续高涨。我和其他同学听说有“墙报”的事，不花钱而可以宣传新文化，发表意见。当时有一位新学监，姓邱，很年轻，是南开大学的新毕业生，在宿舍中常同我们谈到“五四”运动。一次邀请本班上一位外号“哲学家”会作文的徐庆余参加，即刻买了几张宣纸办墙报。

墙报定名为“试刊”，顾名思义是试办、试验的意思，并仿效当时国内杂志、周刊的样子，在标题上加注英文“Try, Try again”（一试再试），打上外栏，用手抄写，是四开报纸大小。第一期的创刊号，照例有一个发刊词，说明墙报《试刊》的意思是宣传新文化，打破沉闷空气，并欢迎人参加。出版者是“试刊社”，通信地址是宿舍几排几号。我们当时的分工是李汉杰搞漫画及美术、杨放之出诗词文艺、我作论文，短评是按各自的兴趣、爱好来选定的。第一期内容有发

刊词、小论文、小评论、几首新诗、一幅漫画。抄写后，找了一块小黑板，一天早起，挂到从宿舍到操场路过的墙头上。

当时我们有几种顾虑，一是怕学校当局干涉，二是怕同学们嘲笑，三是怕引起人家的反对，指责我们攻击人。这也是新事物发生时常有的现象，因为这在学校是破天荒第一次，特别是当时河南的政治情况，以及那样的学校。结果还好，没有引起风波，还有不少人看。

于是，我们继续干下去。由于人手少，无经验、水平低，所以暂定为不定期，但我们努力争取做到每两周能出一次。偶尔有人送几首新诗，但主要靠我们自己三、四个人，后来漫画取消了，增加了论文及短评。论文很少涉及到学校的具体事和人物。短评是暗指学校的事及人，但留有余地。

出了几期后，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姓李的，爱好文学，给我们投了稿，并建议我们将墙报挂在数学大楼内的图书馆前，又向学校提出为《试刊》作了玻璃框，从此《试刊》得到了学校的正式批准，而且进入了公众观览的地方，看的人也多了，教职员也来看了。

1924年秋，我们转入高中一年级，一个新插班进来的曾昭聪（即曾鉴泉）很爱好文学，且能写作小品、杂文，很快加入了《试刊》社，并成为积极拟稿人。《试刊》在逐步提高。

大概在10月间，为了提高《试刊》的地位及作用，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决定出《试刊周年纪念刊》，发出征文通知，约人写稿，自己准备稿，并找三个国文教员给我们写东西，增加漫图。结果不错，三个国文教员都给了祝词，李静祥写了

一篇文章，王志刚写了文言祝词，称赞手抄墙报的好处，不必“灾及李枣”。我从此才知道这个典故，并知道古来刻书是用李木枣木。张筱台（国文）教员兼学校秘书长，写来了一篇“古文”。我们忙了将近一个月，出了好几张，大张旗鼓地干了一场。

1924年秋，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国民军成立，以胡景翼为首的国民二军到了河南，再加全国革命形势的兴起，《试刊》也转而从新文化宣传变成了国民革命思想的宣传刊物了。由于我其他事多了，不能全力以赴搞《试刊》，三弟马卓生被吸收进来，作为拟稿人之一。

1925年夏，“五卅”运动发生，革命形势，学生运动到了高潮，学生中除学生会外，各种思潮及小组织纷纷建立，学生办的墙报多到十来个，布满了教学大楼的前墙。但《试刊》始终占据着首位。

秋天，在学校内不仅国民党的势力及宣传大为普遍，而且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宣传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国家主义派，不仅学生中有，而且教员中有一个张仲和，更是到处讲话，矛头对着青年革命思想，特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张仲和是北大毕业生，在学校任中学及预科班的历史教员，能说会道，满面笑容，在学生中颇有威信，被学校誉为好教员之一，所以他的宣传影响就很大，特别是有很多反对革命的话是讽刺性的暗中表示意的，有些还带点滑稽性，令人易于接受。因此我们决定必须给予打击和揭露，现出他老奸巨滑，阴险恶毒的丑恶嘴脸。经过我们商定由曾鉴泉执笔，写了一篇《呜呼！张仲和先生》，完全引用张仲和在各种会议上的话，加以连贯，给他作了画像，成为自我暴露式

的尖锐批评式的杂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张仲和先生说，“什么主义我都赞成，因为各个主义有各个主义的好处，我又不都完全赞成，因为它们又都有各自的缺点。如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张仲和先生没有明白地说帝国主义他也赞成，因为也有它的好处。

他又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跑到前面，要考虑实际效果，个人得失。比如教员去省政府索薪请愿，冻了一夜，我就不去，因为如果不给钱，我去也没有用，如果给了，我不去也有我的份，何必去冻那一夜呢？”这是张仲和先生的人生哲学，享受有他的份，吃亏却不在内，不跑到前面去。

他还说“什么运动都不要领头干，要参加却不要太参加。不参加，人家会说你落后，太参加就会有危险。‘五四’运动时我在北京，‘五卅’运动时我也到过北京，但我却并没有被打落牙齿。”^①说这话时，张仲和先生还故意露出牙齿给大家看，证明他的门牙确实安然无恙。他说后，嘿嘿地得意地笑了几声，证明他的哲学思想的胜利。

我们辑录他诸如此类的话，然后“戴上帽”，“穿上靴”，张仲和的面貌就勾画出来了。

这篇文章一发表，马上哄动了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从早到晚，不断围着这篇文章看的人简直成堆，也开创了大家看墙报热闹的纪录。《试刊》周年纪念时也没有这样哄动人，连从来不看墙报的学生及教职员以至校长、教务长也专门跑去看了，真是放了一颗炸弹。但风波却由此起来了。

两、三天后，教务长李鹤、秘书长张筱台出面找我们谈

^① “打落牙齿”指1925年10月报纸上曾登载鲁迅因参加群众游行被打落牙齿的传说。

话，大概说张仲和很生气，要求辞职，要么我们向他道歉，并取下墙报。我们坚决拒绝说：“言论自由，载在宪法，张仲和可写文章辩护或反驳，我们同样登载。”“谈判”陷于僵局。教职员中分成两派，一派站在自身利益，一派不满张仲和，同情我们，特别是有些了解我们的教员，认为我们是好学生，后来张仲和在全校教务会议上提出，要他就不能留我们，留我们，他就走。因为他感到他在学校中有地位，有威信，学校不会放他。这时我校的另一位更有地位的也是我班的教员，已有教授衔的数理化教员瞿文琳，自报奋勇，愿作调停人。他是我们喜爱的教员，他也喜爱我们。他和我们谈话后说，他将代表我们在教务会上向张仲和道歉，以挽回他的面子，又不干扰我们的事。我们表示，不必道歉，不要为我们向张仲和赔礼，我们不怕。瞿文琳说，他将处理这个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以前怎样干，以后还照常干。以后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不了了之了，也不知道在教务会议上是怎样解决的。总之，张仲和以后再不演说了。

1925年末，河南青年协社成立了，出了铅印的刊物《河南青年》，我们还将这篇文章加以补充，送去再次发表了。张仲和束手无策，没有作声了。

1926年春以后，河南又陷于北洋军阀吴佩孚之手，青年运动趋向低落，很多墙报先后停刊，可《试刊》还坚持下去，直到1926年下半年才停刊，先后继续了将近三年。《试刊》是中大学生三年中的第一个墙报，也是最后一个墙报。它起了带头作用，也起了收尾作用。

二、从青年学社到河南青年协社

1924年1月，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改

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新的篇章，民主革命的宣传及思潮普及全国，河南也受到了影响。有些爱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后曾幻想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办法，这时改为革命救国。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组织志同道合的人，开始行动起来。1924年春，由河南第一师范的学生，韩源波（即韩绍湘）、刘英、霍树昌、裴光等创办了“青年学社”，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为口号，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自主而斗争。这是河南第一个革命青年组织，开始时只有少数学生参加，是半公开、无社址的小团体。以“学社”为名，是为了避免外人的注目，挂了新文化学习的招牌，这个学生组织在学校中得到了个别进步教员的支持，如冯品毅、稽文甫。青年学社虽然是以国民党党纲及中共最低纲领为行动指南的，但它和任何党派还没有关系。

1924年夏，我遇到了韩源波，他是我在高小时的好同学。我们见面后一谈，思想上就完全吻合。暑假时，我到第一师范见到了他及其他几个留校生，他们介绍了“青年学社”的情况，并约定由我在暑假后在中大附中建立同样的组织。当时开封什么组织都没有，“青年学社”就是唯一的革命组织了。暑假后，我同本班的同学李汉杰、孟丙昌谈到了这件事，原来他们的同乡霍树昌——“青年学社”积极组织者之一，已经同他们谈过了，所以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小组，作为基础，以后又吸收了两、三个人，成立了中大附中分社和原来第一师范的合并在一起。这是“青年学社”创建的经过。

“青年学社”成立后，我从几方面开始工作：一方面积极收集材料，学习研究，开会讨论，对外宣传，发展组织，

成立杂志出售店。这都是文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武”的方面，认为革命需要有好的身体，所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了解军事知识，星期日到城上、城外作野外行动。我幼时多病，更感到有必要。但无论在哪个学校，还都没有以“青年学社”的名义作过什么公开活动，但在组织上却有了发展。

1924年秋，中国北方发生了重大事件。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倒戈后，成立的国民第二军到了河南。冯玉祥从北京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河南国民党也露面了，组织了由各界代表参加的河南国民议会促成会（各地都有）。河南“青年学社”第一次公开于社会，以革命青年组织名义派了我和韩沉波二人参加了这个促成会。我被选为促成会中外文版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我的国文教员李静祥，他是河南教职员联合会代表的资格参加的。在几个月工作期间，在李静祥的带领下，我却学会了公文来往、电报、宣言等一些写作方法，为以后学会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5年春，孙中山逝世，接着“五卅”运动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青年运动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年学社”在“五卅”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了五个分社，除原有一师、中大附中外，在二中、一中及女师也都有分社，而人数已增加到一百以上。

这时，由于学社已在社会上公开露面，为了扩大宣传及影响，决定筹备出版一个铅印刊物，定名为《雷火》，意思是声如响雷，打破社会上的沉寂及旧社会的恶习，其势如烈火，以烧掉社会上的一切旧东西，点起革命的火焰。大小为三十二开，每期十六页，和当时的《中国青年》差不多。选

稿由社员分担，组织了编辑小组，我是其中成员之一。经费，自己交社费，每人一月一角，还自动捐款，并向教职员募捐一点。由我和印刷所交涉，尽量少花些钱。出了几期以后，因为人力、经济都接不上，所以未能继续下去，余下不多的钱，出了一个纪念孙中山逝世的专刊，名为《三月十二日》，有一百来页，委托上海一个书店印刷的。

1925年秋季开学后，在“五卅”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青年学社”又有了显著发展，很多青年学生宁愿加入“青年学社”而不愿加入国民党，所以社员增加到二百多人，分社又扩大到女中、工专共七个学校。在宣传工作上将国民革命思想和新文化工作及社会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大大扩充了范围。为了在社会上和青年中继续开展和普及社员内部的教育工作，出版新的刊物更为必要。因而决定筹集较多的款项，作为出版基金。筹款方法采用了在社会上公开演剧。举办演剧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同时也想为提高“青年学社”在社会上和学生中的地位。参加演出的是几个大的分社，中大附中、一师、二中、女师，还邀请了一师附小。附中、一师、二中是各自排演话剧，女师跳舞，一师附小演儿童化装歌舞剧。积极地开展了筹备工作。

由于我兼任我校新剧团的副团长，部分团员又是青年社员，经过团长和其他团员商量，结果同意由全团整个演出，并带各种道具。我们决定排演四个剧，一是“可怜闺里月”，是反军阀战争的；一是“山河泪”，借朝鲜亡国后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故事，宣传爱国思想的；一是“维持风化”，是反政客及恶事的；还有一个反旧风俗习惯的。经过一个多月，各校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于是组成了一个演出组，全面筹备

演出事宜。我是演出组的负责人之一，也担任了角色。

我和其他人都未组织过公演，真没想到有那样多的事，特别是有些是很难办的。因为没有钱，遇有要花钱购置东西时，可真是不容易啊！如买一师附小歌舞用的各种衣服，需要近百元，真是费尽了力气，其他如借演出场地（省教育会大厅），布置舞台，安灯照明、印刷广告、票证，组织剧场服务，售票，定点心，准备开水，借各种服装，买化装用品、用具，向警察厅、警备司令部申请、联系派出军警，防止士兵、警察捣乱等等。在演出的两天中，更是内内外外，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夜间还得值班看东西、守会场。售票开始有困难，因为票价比一般戏院的高，而新剧在一般人中尚无声望。虽然广告大吹特吹，说明男女中学六校演出等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对教职员的强迫推销，才卖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票。头一天基本满座，但由于演出成功，特别是一师附小的歌舞剧，一般都未看过，第二天人却多得很，全部售完余票，还印了一些临时票。

演出两天，每天自下午一时到晚上八时。会场中组织了食品、点心贩卖及茶水供应。附小演出的歌舞剧是当时刚出现的“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全部古装，哄动了会场。女师的舞蹈，在演出前夕，被女师当局婉言但坚决地拒绝，借口社会舆论压力太大，后允许派出女生（青年学社社员）当两天招待员，维持秩序才得以演出。由于售票情况好，点心供应也赚了点钱，所以除去一切费用后，还净余了三、四百元钱，大家都很满意。

不做事，不知办事难。演出结束后，我一口气睡了二十几个小时，以补三天未睡的缺觉。

结束这次演剧后，我才喘了口气。正要着手出版刊物的时候，在青年运动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尽管“五卅”运动后，“青年学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未能包括开封的全部青年，也由于青年学生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立山头、独树一帜的倾向当时还是很重的。所以以二中为基础又成立了“青年社”（那里也有“青年学社”的分社），并在一中、一师、女中也成立了分社，共约有一百多人。中大附中也出现了两个较小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团”和“青年干社”这些组织均各自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互相竞争。由于“青年学社”最大，筹款演出后这三个团体都千方百计和“青年学社”争社员。当时开封的革命青年虽然有着共同的目的，组织形式及口号也都大同小异，但却会分成好几派。当时在开封的中共省委负责人李求实（即李伟森）看到了这种情况，为预防青年运动的分裂危险，提出了统一合并的意见，首先在各团体内的中共党员及团员中进行工作，谈思想，统一认识，摸情况以后，由他主持，在西大厅他的秘密住所内，召开了几次党团员联席会议，讨论四个青年组织合并问题。几个组织主要是“青年学社”及“青年社”两个较大团体的负责人，在统一认识之后，决定合并。由“青年学社”发起邀请其他三个团体负责人，组成合并筹备委员会，具体负责合并工作。李求实同志从始至终一直主持这项工作，并帮助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以及确定了领导人。

经过协商，新组织合并后的名称，定名为河南“青年协社”，是以协作为目的而团结起来的统一青年的革命组织，起草了成立宣言，及告河南青年书，“青年协社”章程，青年运动纲领，确定了总社委员会名额及候选人、开封分社委员会

名额及候选人。为了显示青年运动统一的胜利及克服有些社员中不愿合并自立山头的思想情绪，决定召开一个比较隆重，规模很大的成立大会。

“青年协会”成立大会于1925年12月末在中大大礼堂召开，参加人员除四个团体的全部社员四百多人，还邀请了一些非社员的青年学生列席。经过党内动员，铁路工会，其它工会，妇女联合会都送了红旗，派了代表，可容几百来人的礼堂，楼上下都坐满了人。大会由筹委会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宣言、章程、运动纲领，选出了总社委员五人，其中有我（中大）、刘英、冯树筠（一师）、高光殿（二中）、张静（工专）。总社还准备发展到外县。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也是开封分社成立大会，会上也选出了由总社委员刘英兼书记的分社领导机构。大会结束时还有文艺小节目及女生跳舞。这是一个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的大会。

总社委员会作了分工，由我担任书记，刘英任开封分社委员会书记，高光殿任组织委员，冯树筠任宣传委员，张静任工农委员。将大会通过的文件，铅印成小册子，题名为“河南青年协社”，并印了正式的社员登记表，进行了组织整顿，各学校成立了支社，人员多的学校，按年级班次设立小组，支社有委员会，小组有组长。外县有党员及团员的地方，也成立了该县分社，计有信阳、杞县、孟县、郑州等。这样河南青年协社就联合了革命青年约六百人，成为党的外围青年组织。

青年协社成立后，于1926年初出版了铅印的《河南青年》不定期刊物，三十二开本，每期三十二页。但只出了一期，由于反动直系军阀吴佩孚返回河南，革命运动受到了严

重打击，未能再续出。

1926年内青年协社的活动只限于各学校内部，仍以宣传民主革命为内容，但偏重于新文化了，因为要适应反动环境，并扩大影响范围，同时也让社员们学习些社会科学知识。

青年学社总社设委员五人，都是共产党员，开封分社委员也是五人，中大支社书记李步英，也是党员。其他各级也多数是党、团员，组长则有许多是一般群众。所以省、市委领导这个组织很方便。

“青年学社”初期有社员二、三十人，实际上多数成了党、团员，也有成了国民党员，学生会的负责人都是当时1925—1926年间开封革命组织的中坚分子。

1926年上半年，“青年协社”还吸收了很少数的新社员，后来基本上未再接收新成员，而个别人还有退社的，我们也未制止。这时和两个女校分社的联系也少了，因为学校当局对女生行动限制得很严。有时用学生会的名义，还可以偶尔见到她们。

但总的情况，直到1926年末我离开开封时，青年协社没有大规模的活动，各县的分社也没有大的活动，和总社只有些通信关系。

三、参加国民党的经过及活动

我在1924年上半年已初步有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但当时河南开封还没有出现任何党派。1924年11月以胡景翼为首的国民二军，在联合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倒了吴佩孚的戈以后，到了河南，胡原为陕军头目，曾留日，参加过同盟会。他来到河南后，国民党的一些头目，如于右任、熊克武、白懋辛等先后也来了，所以国民党在河南，首先在开封发展组

织。我校国民党组织发展也早。第一个人物即我们的国文教员李静祥，第二个是社会学教员宋英仇（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国民党），第三个是教务长李鹤，不知他是和谁联系的，这时也显露出参加国民党活动。他们三人都知道我，并在1925年初介绍我和杨放之填表参加了国民党，并在中大组织成了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当时参加的人还有秘书长张筱台及其他几个学生，约十来个人。以后青年学社的其他社员有部分学生及教员也参加了国民党。先时，李静祥等为区分部委员，以后市党部成立，李静祥、宋英仇到市党部去，李鹤到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去了，学校的国民党人员增加了，由一个区分部分成三个，委员也由其他人担任了。

很快学校放寒假了。这时国民党在社会上，各机关都活跃起来，很多官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了。为了响应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由市党部发起，组成了河南国民会议促成会，各社会团体都参加了，如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律师联合会、商会及官方和非群众性的省工会、省农会。我和韩源波以青年学社代表的名义也参加了促成会，并任中外文版组副组长，当时的活动只限于对外联系，发号召、宣言、通电、公文来往，没有开展群众性的活动。

寒假期间我们几个青年曾见到一些老国民党员，如于右任等，并曾到1913年被杀害的国民党员的墓上，举行瞻仰烈士仪式的活动。有两个老党员谈了当时曾在河南目睹袁世凯派的河南督军张振云镇压国民党的情况。这时我才回忆起我随父亲第一次在开封听到的杀国民党的事。

1925年2月下半月，学校开学了，国民党在学校里开展

的活动更为活跃。我们的学生商店大量出售国民党的书籍，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案》、《建国大纲》等，以及其他书籍，其中有一个日本人作的（作者是孙中山在日本的好朋友）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系回忆性质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天下最快事，莫如雪夜闭门读禁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国民党市党部成立后，主要负责人有宋英仇、冯品毅（一师教员）、江梦侠（中学教员）。我和杨放之由宋英仇推荐，当了市党部宣传员，从此开始了较广泛的校外接触，而在本校活动反而少了。其他校如一师、二中的青年社员，也都参加了国民党，成为积极分子。宣传员的工作，包括发传单、印刷品，大会记录员等临时工作，我和杨放之还和街道上的讲演会联系，作过几次通俗讲演，宣传革命及“三民主义”。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全国各地（开封也在内）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悼纪念活动，同时宣传“三民主义”，征收党员，国民党党旗及国旗到处飘扬。在全市的追悼大会上，军政各机关都送了挽联。我们学校的国民党组织也送了一个挽联：

是国父，是人师，是平民领袖，只可叹四壁旁观，
都让他赤手空拳革命；

有军阀，有官僚，有帝国主义，打不倒三重孽障，
且莫向青天白日招魂。

这个挽联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思想情况及认识水平。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了5月。

5月间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到河南公开招生，录取对象是

中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由开封市党部协助办理，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报名考入，可能是以人数最多的班为单位，挑选水平合适，思想进步的。我班党员多，去的有姚开瀛、介景知、万元清、欧阳秉瓚等，我们曾为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

很快，“五卅”运动兴起，于是我全力投入了学生群众运动，国民党的工作、活动便放在第二位了。

但在“五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国民党内发生了左、中、右派的分化，并趋于表面化。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小册子出版后，以孙文主义的名义，不仅右派有所借口进行反共，中派亦找到理论根据而与共产党抗衡，中大学生中原有右倾思想的国民党员如刘正统不必说了，有些中派及中左的人如张珍华、陈缉轩等，也以捍卫“孙文主义”自称，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共产党划分界线。虽然总的说来，共产党员、团员与国民党左派还是占统治地位，但派别斗争有时在党员会议上及学生会议上也有公开的表现，有一次几乎打起架来。

1925年“双十节”时，以国民党右派林森为首的广东政府代表团，在去北京途经开封时，访问了国民二军。我以开封学生会的名义去参加欢迎会及座谈会。这个代表团中的一个学生代表，不知道我的身份，突然问河南学生会中有没有CP及CY（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他以为我不是CP或CY，就向我大讲孙文主义，要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说广东已有，他就是团员。因此，我没有向他介绍其他人，就把他送走了，免得他向别人宣传或找人挂钩，搞孙文主义组织。

此后发生了公开矛盾，“双十节”后，开封市党部根据上

级通知，要向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留学生。宋英仇向我们宣布要派十来名，后来王若飞经过北京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于树德（当时系共产党员）以特派员名义负责选派。结果，我们学校只给了三个名额，其目的是尽量想派一些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而不让右派混进去。为此，宋英仇大为不满，发表了些怨气的话。他提出由原来的十名中进行推选的办法，推选三人。我和张玲华、屠庆祺三人当选。我当时已入党，担任学联、青年社工作离不开，而且中山大学表面上是为国民党培养人材，所以根据我的志愿和情况，与党支部商量，自己放弃了当时去莫斯科的权利。经和党支部研究，由我提出让杨放之去。大家都同意了。那次河南共派了九名，我校是屠庆祺（中共党员）、张玲华（左派）、杨放之（左派），一师三名：韩振波（党员）、裴光（团员）、李翔梧（团员），二中一名刘国章（后改为刘绍文，党员），郑州一名李沛泽（党员，王若飞的爱人），其他还有一名。他们在1925年11月间离开开封前往。

1925年冬，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继续分化，由省委决定，在开封市国民党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的党团负责小组，由地委书记范易，市党部委员冯品毅及我三人组成，开了几次会，都是晚上在青云街路西冯品毅的家中开的，有时还邀请其他人参加。目的是分析市党部国民党各负责人的情况。如宋英仇、郑震宇等及各学校的情况，决定对策。这个工作在党内称为民运工作，与青运工作同等看待，是在非党群众组织中作工作的。

1926年初，吴佩孚从湖北进攻河南国民二军，由市党部组织了宣传队，以共产党员为主力，也有少数国民党左派参

加，帮助二军作宣传工作，但由于二军是陕军，以陕西人为主，与河南地方人有矛盾，二军很快失败了，宣传队也受到了损失，我校孟丙昌受了重伤，几乎死去。

1926年春季开学时，国民二军已败退，国民党的组织也偃旗息鼓，招牌也摘了，各机关的党组织也散了，国民党员也自行取消了，因为吴佩孚到河南，他的大将之一寇英杰又当了督军，只有一小部分党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及各学校的国民党组织）还未消失，继续半公开地存在。我们学校的国民党员，也减少了，但还保持着组织。

1926年春，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共了，3月20日事变后，一方面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一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提出整理党务案，要共产党员进行登记。大概在5月末或6月初，由北京执行部派了两个“官员”到河南去整理党务，由于开封市党部基本上只有几个共产党员，所以只进行了表面的周旋应付，由这两个“官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在一个较大的馆子里，约了十来个人参加，他们说明了整理党务的意义、目的、方法，大家吃了一顿，算是了事。

1926年，在秘密条件下，召开了省党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是秘密组织，由共产党主持了。

四、从中大学生会到河南省学联

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还在高小学习，曾随着母校第一师范学生们参加过一段学生运动，参加过学生会。到二中时参加过学生示威游行，对学生会及学生运动有了概念和印象。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地掀起了反帝革命运动高潮。河南开封各校的学生也自发地组织起学生会，举行罢

课，这是从1924年就已开始的新民主革命进入高潮的一个爆发点。经过不几天后，各校学生会相互串联，以中大、一师、二中为主力，很快即成立了有二十几个学校学生参加的，包括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在内的开封学生联合会。

我和杨放之由本班选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校学生会，并作为干事，担任点社会工作，但主要是带领本班学生，按学生会的布置安排参加游行，组织讲演团，抵制日货、英货，到街上去，及开封城郊附近的乡间去宣传。这是6月间，天气正热时，白天外边跑，晚间学生会开会，准备宣传品，确实相当累。

我们学校学生会的头头是原第三届英文科学生，时为大学预科学生的尚芳。他当时是国民党员，能说会道，很活跃，“五卅”后到处奔走，可以说是本校学生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以后作为本校的代表又是开封市学联的头头。7月初，由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了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封市学联代表河南省选了三个人去，尚芳是个头，另一个是中大预科生周进贤（非党员），在“五卅”运动中很积极，满腔热忱，到处呼吁，因而被选上。第三个是二中学生刘国章（共产党员）。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各不相同。刘国章事后曾向我谈到在上海开会的情况时说，上海当时在学生代表中有两个党团，一是共产党的，一是国民党的，主持人都是恽代英。刘国章必须和尚芳在一起躲开周进贤去开国民党团会议，但他自己躲开尚去参加共产党团会议就很困难，因为尚芳知道党团会的情况。在选举全国学联执委时，尚芳以为他一定会选上，因为他很活跃、能说，又参加国民党团会议，但未被选上，因此发了不少牢骚，说某某什么都不行，意思是不如

他也当选了。他却不知道名单是在共产党团会议上定的，当选的都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决议，会议布置也是这样定的。他们从上海回来后即回家，当时河南省学联代表大会正在准备，他们未参加。尚芳以后因向女生求爱关系而被排斥出开封市学联。周进贤在政治上比较糊涂。他们二人成了学生运动中昙花一现的人物，以后落伍了，在学校内部，也作为“遗老”而销声匿迹了。

7月初学校放了假，开封市学联进行了补选，我和徐唤生被选入，便转到市学联办公的一师去，因为那里是市中心。学校放假后，虽然群众性示威、游行没有了，但市学联的工作还很多，根据全国学联的要求，为了统一学生运动，并向纵深发展，决定由开封市学联发起召开河南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并即刻开始筹备工作。

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五十几个县，将近一百人，约占河南全省县数的一半，总算不错，是空前的事，在文化比较落后的河南，有这样的的发展总算很可观了。代表几个大的市、县的，很多是国民党员，少数是共产党员，如郑州、信阳、杞县。开封市学联出席的人多些，在代表大会期间，组织了共产党党团会议及国民党党团会议，两个党团会议都是由国民党开封市党部委员兼共产党员的冯品毅主持，很方便，同上海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时一样。国民党会议即在市党部办公处旗纛街开，每天晚上要到十点、十一点，为准备次日代表大会会议的工作安排。大会在8月中旬开始，历时五、六天，通过了多种决议，如对政局、时事、学生运动等问题，学生会组织，省学联章程，对河南学生宣言等等。最后成立了河南省学生联合总会，选举了五个常委，都是开封市学联的，有

刘英、冯树筠（一师）、高光殿（二中）、徐唤生和我（中大附中）。这样我就参加了河南学总的常委工作。河南学总的办事处，就设在中大，由我和徐唤生向学校交涉，给了我们一座三间单独房子，而且地方很安静。这个地方同时也成了共产党及青年团活动、开会的很方便的地方，这是后话了。

七、八月旬，学生会为留在开封的学生组织了不定期的学术讲演会，每周一次或两次，讲演内容是关于反帝、反军阀、民主革命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政治、唯物史观等，约请进步教员冯品毅、嵇文甫、郑震宇、宋英仇等，还请过当时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效果还不错，听的人也颇不少。有一个唯心论哲学家、留美生、博士头衔的冯友兰，常自动去讲演。他的思想落后，反对学生运动，说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回头是岸”。以后我们再不敢请他了，但他仍然“有会必到，到会必讲”。我们只得选了我校初中一个年纪较小，但有讲话口才的学生马兆钧，在会场外专门等他，拦着他和他辩论，以不给他讲话机会。《中国青年》著名拟稿人，中共党员萧楚女，也曾到开封作过讲演，反对、批驳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

7月间，河南国民二军当局举行了一次欢迎苏飞机第一次飞抵开封的盛大招待会。苏联飞机是由戈洛莫夫等驾驶，第一次经过蒙古飞到北京，然后到了河南，对于我及很多人都是从未见过的。我和徐唤生以开封学联代表的名义参加了欢迎仪式及在龙亭上举行的宴会。二军的首领岳维峻是主人，各军政机关及社会组织代表作陪。

8月中旬学联成立后，我即积极准备出版《河南学生》。忙了一阵，才于9月初出版了第一期，铅印三十二开本，每

期十六页。内容有论文、学术论文转载、大事记、政治时事介绍、学生运动消息等。

8月下旬，发生了影响我的思想大转变的事件，即发生了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及袭击京汉铁路工人惨案的事件。河南学总派我作代表到郑州声援罢工，并慰问死伤工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开封到外地单独工作。到那里后，住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据说“二七”事件时，总工会也在那里，相距时间只有两年半，而情况变化却太大了。在那里我见到了王若飞，过去虽认识，但未谈过什么问题。王若飞的爱人李沛泽，当时在纱厂工会工作。他们两个人都住在京汉铁路工会。在参加工会大会和罢工纠察委员会人员的谈话及慰问受伤工人时，使我得出了结论，工人阶级、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的反帝是不可靠的，只有在对他们有利时才干一下，表示一下，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相矛盾时，他们是以阶级利益为主而宁可牺牲民族利益及其他别的利益的。关于这次罢工的详情及经过，我于1960年即三十五年后写过一篇《郑州豫丰纱厂大罢工的回忆》，刊登在1960年或1961年五一节的《河南日报》上。罢工于8月下旬结束，我只呆了三天。

回来时，在郑州车站等车期间，又遇见王若飞也去开封。他向我说，国民党的派别斗争很激烈，左派首领、广州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廖仲恺遇刺身死。报纸过后才发表，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

9月开学后，还举行了纪念国际青年节的示威游行及支援外地学生被压迫的运动。

“双十节”事件。国民二军到河南后将近一年来，还是

比较自由的，对各种运动还是不反对或支持的。我们还去见过岳维峻（胡景翼死后的二军头目、河南督军）、李纪才（开封警备司令），请他们捐款及出席学生大会。但在1925年“双十节”前夕，由于国民二军和奉鲁系军阀的矛盾，二军转而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抑制态度。为了“双十节”游行，我和徐唤生在警察厅和当时的厅长、政学系政客张群，大吵了一阵，结果他还是不准学生到街上去。以后我们在双十纪念会前夕向学生们说明情况后，决定提前两小时出发，但次日早上五点钟，张群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即派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及警备陆军几百人包围了学校，并看守着大门。六点多钟起床，开大门后，即刻进来了一个警官，宣布不能上街，只能在学校里内部开会庆祝。七点多钟，我们召集了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开会讨论是向外冲，准备武斗，还是不出去？学校校长、教务长，都到会场劝学生不要冲，避免无谓牺牲。大会由学校学生会负责人杨放之主持，正在讨论不休时，张群身穿军服带着全副武装的十来个卫兵进入会场，向学生们挑战。学生们哄他，以后他将卫兵赶下楼，自己脱了军服，要求说明来意。最后谈通了，学生们可以成群出去，但不要结队、喊口号、打反对奉鲁系军阀的旗子。

学生会宣布提前出发游行的事，怎样被张群知道了，一直是个谜。我们当时曾怀疑国家主义派。

11月，国民军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终于发生了战事。当时我们认为国民军是进步的，曾以学联的名义，派了几个人（共产党员）到前敌战线作慰问宣传。幸而战事未扩大，只限于边界冲突。

11月，由于全国反动势力抬头，对学生运动有不少镇

压事件，全国学总在北京召开了临时会议，河南学总决定派徐唤生去参加。这样主持学联日常事务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三人只是定期地到中大来，当然，学生运动低落，没有那么多事。12月，全国学联临时会议结束，徐唤生和其他几个人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绕道天津、上海，搭船经过南京、九江到武汉去，声援被军阀萧耀南镇压的湖北学生，但在那里被军阀逮捕了，长期未能回来。

1926年2月，吴佩孚从河南反攻河南，国民二军败退陕西，蒋介石也开始反共，冯玉祥也受奉军攻击，全国革命暂时低落，学生运动也趋于低落，特别是北方及河南。春天，张霄帆以全国学联特派员名义到河南视察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整顿党的工作而来的。

1926年7月，我们接到通知，全国学总将在广东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和开封地委研究决定派以下三人出席：刘英（学总常委、一师）、马景山（中大附中），前二人均中共党员，蒋舜华（女师），三人均为青年协社社员。

蒋舜华是青年协社开封分社委员，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在学生运动及以后青年学社的组织中曾积极工作。学生运动也没有因为全国学总的会议而有所转变。

五、参加中国共产党前后

1924年我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形成，组织了青年学社，参加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接触了很多事和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事变都是充满了政治意义的。后来又和工人，特别是作为学总代表支援了郑州豫丰纱厂的罢工。因为从投身于民主革命，争取祖国的自由、独立、平等，进而初步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目标，共产主义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应成为自己的理想。于是我的思想由民主革命的要求提高到世界革命的认识，并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了，认为它不能继续革命下去。所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25年9月初开学时，政治上已经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的思想可归纳如下：

1.在思想体系上认为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是彻底的革命；

2.作为一个政党，国民党员是不能继续革命的；

3.从党员看，国民党员很复杂，有革命的、也有不革命的、做官的、投机的，共产党员是革命的；

4.从组织上看，国民党是涣散的，纪律不强的，共产党是严格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

5.在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上，工人阶级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的；

6.工人阶级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是和阶级利益不一致的，两者发生矛盾时，民族利益是服从于阶级利益的，宁可牺牲前者而要保后者。

问题在于：第一，怎样加入？第二，去找谁？因为当时共产党员都处于地下，是相当秘密的。

当时我从感觉及谈话中猜想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是冯品毅，特别是他曾向我较为公开地谈过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进行比较；第二个是韩沅波，从青年学社后期的接触及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但这两个人是在一师。在本校中，我感到和我在一起担任学联工作的徐唤生也可能是。另一个是孟丙昌，他和我相处很密切，一起组织青年学社、学生商店，又是同班，住在一个宿舍，所以和他们曾谈过共产党，并表示

了想加入的意思。原来相约互通消息，找共产党。当然以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介绍人入党的方法，因为谁也不敢贸然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去介绍别人。如果弄不好，就是很大的危险。后来在9月底，孟丙昌向我讲，他找到了共产党，如果我决心参加，可以找他来同我谈。我答应了，并约定一个下午在学生总会办公室谈。

和我谈话的是张景曾，自称张和尚，当时的开封中共地委书记。他开始谈到，他知道我的情况，也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关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谈话大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中国共产党是彻底革命的，为中国的解放、独立、自主而奋斗，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2. 共产党是秘密的，参加共产党必须严格保守秘密，遵守各种保密原则，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家庭、父母兄弟都不能讲参加党及党的事；

3. 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牺牲，不能怕死、怕坐牢、被捕、受刑；

4. 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命令、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离开家就离开家。

5. 共产党有各级组织，党员要参加组织生活，随时汇报情况。党员互相监督，互相批评。

他问我能不能这样做，有无这样的决心。我说：“能”，“有这样的决心”。以后他说，能这样，就可以参加共产党。他将给我中国共产党党章看一下，当时这是个秘密文件。以后由孟丙昌通知我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议。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谈话，并宣布我参加了党。

当然，参加党以前，在党内对一个人的全面情况，做各种分析、考察，事先讨论、通过，然后再通知本人、谈话等一系列手续，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因党处于秘密状态，不填表，不开会通过，无宣誓仪式，也无正式介绍人。这和以后入党情况不同，和国民党入党情况也不同。

第一次党组织生活会议，是在9月底或10月初进行，是孟丙昌通知我参加的。当时参加的还有李汉杰、屠庆祺、徐焕生、马景山、马兆钧。这些人我都认识。张景曾也在，是在一个晚上开的，地点在学生总会办公室隔墙的一间破小屋内，大小有四、五平方米，是放破烂家具的地方。我第一次参加的会，是对我提意见的批评会性质。他们都知道我，所以提了不少意见，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自己受到了很大启发。开会时，中间摆个破小桌，开始点一支小蜡烛，大家围坐在木板上，以后连蜡烛也熄了，黑洞洞的，大家还小声说话。这个地方很僻静，这时我才体会到选择这里开会是有特别便利条件的。我参加党以后，学总办公室也可作为党团活动的地方了。

从开始，直到我入党时，党团员都在一起，那时不超过十个人，因为党团所处的情况是一样的。党团员的划分，大概是以年龄为标准的。二十岁及以上的为党员，十九岁及以下的为团员。孟丙昌、李汉杰、屠庆祺是党员，我才十九岁，本应划为团员。但10月后期，开封地委书记范易来了，张景曾到省委做宣传工作。范易对我宣布说，学生会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归党领导，因此，我和徐焕生应转为党员。以后人数发展多了，又来了一个专搞团的工作，任团市委书记的马沛毅。因此，党团员就分别开会了，但有时也在一起

开，称为党团联合会议。

1925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纪念的时候，开封政局情况较好，国民二军和奉鲁军有了暂时的妥协，开封地委在南门外一个大院内的一个类似仓库的大房间内，召开了一次全市党团员大会，参加的将及百人，有各学校的，工会的，二军学兵营的都去了。接替王若飞工作的李求实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及组织发展任务，工作安排，还作了苏联十月革命纪念的报告，最后大家低声地不是唱而是吟了国际歌。开会时有人看门，有进门口令及暗号。当时在开封就只开过这样一次大会。

从1925年11月起，王若飞离开河南，李求实接替，仍以豫陕区书记身份领导工作，开始准备统一河南青年运动的工作。李求实当时住在开封西大街路南的一个染布坊的楼上。那里地方热闹，生意较好，来往人多。我们晚上到那里开会，进进出出参加人数多到十几个人，张景曾、范昌、马沛毅也去参加。经过一段时间说服工作及具体组织筹备，于12月末，召开了青年协社的成立大会，才完成了这个使命。1926年1月积极地开展了建社工作，包括总社及开封分社各方面的组织及宣传、文件印刷等。

阴历年即将来临，学校放假了，我回乡间结婚，在家的短期时间内，曾访问了乡间的农民组织“红枪会”，并于年节前的几天每天晚间，作了通俗性宣传，讲演关于反帝、反军阀、反内战的问题，每晚约有三、四十人参加。同时也解答了农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的婚礼于阴历12月27日举行，还是按旧式操办的。刚过年，收到了李求实用“俞山”署名的信，说“开封天气不

太好，学校事情多，要早日回校。”这意思是说：“政局不稳，可能有大变化，党内事情多，要速回”。我接信后，和家里商量早走，即过了所谓“破五节”，阴历初六，便离家回开封。结婚后未过十天即和我的新妇离别了。一路上见到挤满了兵车，原来国民二军在河南南部连战败北，乱得很。在郑州车站，谁也弄不清哪辆车到哪里去。我在乱跑间，见到一辆客车插着“中国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队”的红旗，我立去打听，见到了孟丙昌，说是随国民二军西去的。他说，情况很不好。我勉强找到了一辆货车，好不容易才到了开封，还在南关小店里住了一夜，因为城门早关了。这个宣传队，在豫西受到农民武装的袭击，孟丙昌和另一个京汉路工人，几乎送了命。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却在国民党名义下工作，因为国民党不得人心而受到牺牲。

3月初，吴佩孚军队占领了河南，战事一结束，学校也开学了。国民党瓦解了，共产党逐渐恢复了组织生活。李求实调回中央工作，张霄帆到开封，恢复和各县的联系，以全国学生总会特派员的身份驻在开封，以防万一。以后他又以河南学总特派员的名义到过几个县。这时张景曾仍主持日常工作。

开封地委书记范易继续留在开封，做党的工作，马沛毅做团的工作，但更为秘密了。河南书店是党的文化宣传的联络机关，有时也不能住人了；到各学校去，也有危险，怕碰到坏人，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因为这两派是坚持反共的，他们在青年学生中，实际上是被排挤出去的。

4月间，范易召集了一次地委扩大会议，是借春游的名义，在东门外的一个花园内进行的，参加的有十来个人，我

和李步英去了。会议讨论和布置、安排了在新的反动的环境下怎样进行党的及青年学生的工作。

5月间，我去找张景曾，在他的秘密住所里碰到孟丙昌，看见他脸部及左手受了重伤。他谈了几乎牺牲的经过，这真是死里逃生，相当惊险的遭遇。孟丙昌一直养病到8月底，9月初带着伤痕回到了学校。

在6月间，共产党召开了一次民运工作会议，即关于恢复国民党组织的会议，可怜国民党这时需要由共产党主持来进行工作。因为，这时开封和几个县的共产党工作已经恢复了。会议决定恢复国民党在各学校的组织，在开封市内有几个公共团体内的国民党组织，以后成立了由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部分中派结合成的国民党市党部，并在暑假内召开国民党第二次省代表大会，成立新的省委员会。因为国民党政府将从广东出发北伐，河南应该有准备。

6月间，由于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由河南几个学校中抽出几个学生到各县去做工作，当时的重点是杞县、长葛、信阳、孟县等。一师派了霍树昌，我校派了马兆钧，还有其他人。这是第二批了。第一批是1925年冬派了几个人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以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司令的杨靖宇将军。他当时二十岁左右，是开封纺织工业学校的学生，原姓马，名尚德，河南确山县人。

马兆钧走后，几乎出了个大岔子。原来是他的继母，曾到学校传达室内痛哭流涕地让我交出或告诉她马兆钧的去处，并说她曾听说他常在西大街某地，她曾在那条街上来往寻找，等了他两天。我当时确有些担心，因为那时马兆钧还未离开开封，而确实在西大街。在好言劝她走后，我即刻到

西大街去，告诉了党组织，并让马兆钧写了封信，派人到外县去投邮，告诉他家里。

在6月间，还忽然接到了以上海学生杂志社的编辑杨贤江的名义邮寄给我的稿费五十元大洋。这件事幸而是传达室工人悄悄地交给我的，我设法将钱取出后，转给范易。这是中央寄给他们的生活费，但事前未通知我，而且这样的数目不可能是稿费的。

还有一次，突然有个学生打扮的自称杞县人，姓赵名成之的来找我，让我介绍他入党。他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在上海大学读书，是共产党员，告诉他让他来找我的。确实在他来我校前几天，我曾收到了从上海来的信。信中说，将有一个这样的人，很好，愿意入党。我接到信后，认为这是违反党的秘密组织原则的，曾告诉范易，让他去信给上海批评制止。赵成之来后，我婉言拒绝了，说我不是CP或CY（党员或团员）。如果有人这样说，那是误会。如果赵愿革命，只要回到本地积极参加群众工作就行了。他当时有点失望，我说确实无能为力。他走了，以后曾由范易通知杞县党组织，注意考察他。

7月中旬学校放了假，我请假回到乡间，以后得了重感冒，勉强住了一个月多一点，8月半回到开封。国民党省代表大会秘密地由共产党组织，小规模召开了，选出了临时委员会，由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少数几个人组成。这是符合在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的。

9月初学校开学了。这时国内局势发生了有利变化，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到了湖北，吴佩孚在湖北的根据地已失去，退到了河南。北伐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就是河南了。所以河

南的党组织必须加强工作。除我们积极地工作外，各县的农民运动及军事工作也必须积极开展。

新的河南中共省委书记汪泽凯，于9月间由中央派来。那时，因为陕西、河南无甚关系，所以撤销了原豫陕区委，而单独成立了河南省委。为了布置全省工作，需要召开省会扩大会议，要各县派代表参加，但二、三十人的开会地点、住所都无法解决。后来，汪泽凯以候补县知事的身份，张景曾以差人的身份，在开封山货店路西一个中等旅馆里开了一个大房间，作为会场，外县来的人都分别住在小店里，“热闹”了几天。会上传达了中央的任务，作了形势报告。我作为青年运动负责人，也去拜访了“汪大人”，列席了他的“宴会”。张景曾内外跑招待、送客，“汪大人”也颇有点架子。这样才终于顺利地结束了会议，只是花去了一笔钱。

10月，吴佩孚部下大将、困守在武昌的刘玉春投降了，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吴佩孚在河南感到末日来临，更加大索军费，压榨人民，增加的捐税很多，对开封商界压榨得更为厉害。总商会不敢抗拒，只好对中小商人增加负担。党决定以“商界联合会”名义散发传单，号召商人罢市、罢业抗捐抗税。我们分批于晚上将传单丢到各商店门口，使商店次日开门很迟、互相观望。这在商人中引起一些议论。十一月税捐更重，党就用原名义及方式散发了传单，引起了波动。

11月末，担任党河南省委军事工作的胡伦，因为和河南杂牌军队的代表接洽谈判时被捕了。他原住在河南书店内，是从北京来开封，准备以开照像馆的名义在各地走动的。胡伦被捕后，受了很重的肉刑，但仍未招供。河南书店也因此被封。在那里当老板的“张老头”也被捕了。但因事

先准备了口供，两个人说的都一样，“张老头”被关了几天，便放回来了，河南书店又启封了。由于事前有准备，革命书籍收藏起来了。住的人没有了，并及时向各支部下了紧急通知。这次虽然空气很紧张，但组织未受破坏，没有更多的人被捕。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学校里将各种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清理，本来就没有党的文件，而只是学生会和青年协社的，一共装了两个箱子，于夜里攀屋登高，放在教学大楼的房顶下。结果任何人都未觉察到。

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打到浙江、安徽，原来的五省巡阅使孙传芳连战失利；奉鲁军南下，河南也很紧张，学校准备提前放假，这是1926年12月的时候。

12月中旬，汪泽凯找我和孟丙昌到他的住所，告诉我们，接到中央通知要派两个人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省委决定要我们两人去。当时还有张景曾在。他说，东大是苏联的党校，也是为中国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将来我们要作为职业革命家，一生以革命为职业，献身于革命。汪泽凯询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并表示到了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地为党工作。他和张景曾还谈了一些东大的情况。以后谈了具体走的问题说，一、现在时局很紧张，几天内就得走，不能回老家；二、党组织没有钱，路费及到上海买点防寒衣服用的钱，得自己想办法，孟丙昌只有几元钱，要我向家里要钱，不能少于六十元。我征得父亲同意后，汪泽凯告诉我们上海秘密联络站后，再搬行李，到上海要小心，一路上兵荒马乱，还要我们携带河南省委给中

央的报告，我们又没有出过远门，更要特别注意等。

由于时局紧张，开封城内谣传要抓人，我有几天不敢回家，也不敢在宿舍中睡觉，当我突然于晚上回家时，父亲和继母有点惊讶。我向父亲叙述了要到苏联去的情况，并说需要八十元钱，包括路费，购买衣服及在上海一段时间的費用，说这是最后一次向家里要钱，希望父亲给我，并说，开封局势也紧张，不如走了好些，将来怎样，以后再说。我走后，家里还有三弟在老人家面前。我的妻子，根据原来父亲的意见，暂由父亲养活，以后我能回来时，再作考虑，学习时间是两年，但政局变化很大，两年以后怎样，我也很难说。父亲说，他不愿意我离开家，但也不愿阻止我到苏联去，只是要小心谨慎，将来能回来见见他，就是好的。关于钱的事，他尽力准备，于两天内凑足，但由于上海很紧张，让我只带一半，其余一半将寄给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的我大哥。并告诉我，他徐州有个朋友，如果从开封到徐州这一段路上出了什么事，可以去找他。父亲提到我的妻子，说未能让她到开封来，这次要走了，又不能回家和她见面，有点不好。要我放心家里，但要给她及我的祖母写封信，告诉她们。

我同意了父亲的安排，和孟丙昌商定了即刻走的事，省委的报告也写好了，我们放在箱子的底层下面，以防万一搜查时不至于被发现。我给妻子写了封信，并托三弟寒假回家后向我的妻子及祖母详细地说明情况。

这样，我于12月下旬初的一天早晨，辞别了我的父亲、继母、三弟，离开了家，登上了出国的第一段路程，和孟丙昌到上海去。我们两人各带了一个箱子。

六、从开封到上海的巧遇

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相当特出地反映在交通运输上。我和孟丙昌到了开封南关车站，那里简直乱得很。火车过半小时就要到了，而售票口前却挤得水泄不通。孟丙昌的手有伤不能去买票，我去挤了一阵，已经浑身大汗，可离窗口还有两米远，没有办法，只好又回来了。这时，有一个衣服整齐、身穿大氅、头带皮帽的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有两张免票，可送我们到徐州。因为正处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立即同意了。他提了一个柳条箱，我们三个人便一起出站。火车到站，上上下下的忙乱得很，我们连车也上不去。最后，还是亏了这位“先生”从窗口跳进去，接了我们三个人的箱子，我们才空手挤上去。他还替我们占了位置。快开车时，我们心稳定下来了，才看出这是一列兵车。我不由心中大惊，他说是军用免票，所以才坐兵车。我们要下车，被邻坐人劝住。我当时准备了各种说法，万一有事，好为自己开脱。未想到查票时，他的军用免票却顺利通过了。他一路上给我们买东西吃，又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两套军衣军裤让我们穿，以免我们受冷。他在车上和我们谈起话，说：“根据我们的口音，不象是徐州一带的人，可能不是放假回家”。我说：“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想到南京考东南大学”。他说愿送我们到南京，说津浦路正在运兵，情况更乱，徐州也很乱，转车不容易。我们同意了。火车走得很慢，本来下午七、八点钟就该到，但夜里十一点了，才到离徐州尚有一站的地方停下来，说车不能进徐州。这位“先生”下车，半夜里雇了三辆人力车，领着我们进了徐州，半用武力，半用讹诈手段找了一个已被军队包下来的旅店。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

我看到他拿出毛笔、朱砂，填了一张空白护照，说“本院×××随带弁兵两名赴南京公干……”。我才恍然大悟他护送我们是做一笔生意，同时我也放心了，他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恶意了。他也向我们介绍了沿路情况，谈了些走路困难和该留心的地方，倒对我们有不少启发。我们夜里总算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他开了店钱，领我们到了车站，吃过饭，上了南下的兵车，比较顺利地到了浦口，进车站时，正是夜里，浦口在宵禁戒严，乘客不能下车，都得呆到天亮。他以军人身份，领着我们，在威严的军队刺刀下，通过了警戒线，出了站，又用在徐州用过的方法，找到了一个旅店，让我们住下了。

我向他谈到我们要到上海去投考，因为从报纸上看到东南大学不招生，上海招生，而且我大哥在那里。他说，他的护照已用完，不能送我们到上海，但幸而这条路好走，上海也不象徐州、浦口。后来我问他，要多少钱以感谢他对我们的护送。他非常“义气”地说，让我们自己考虑量力给他钱，说车费、店费、路上买吃的都在内。又说他在南京以前曾当过皮袄，能够帮助他赎出来就好了。我算了一下，我们两人这些费用得二十多元，因而决定给他二十元大洋。他表示谢意，而且说：“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相遇都是朋友了”。我说：“古人说‘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面，便是‘患难之交’了。”他自我介绍他自己，并将他的名片“李文若”给了我们。这时，我才知道他的一些情况。他说，空白护照是“河南陕州红十字军医院”的，是他的朋友给的。他要我们的名片，以留作纪念。我说，我们是学生，没有名片，只得在他的另外一张名片上签名留念。第

二天早晨，他将我们领到长江码头，坐船过江到下关，替我们买了到上海的车票，我们请他在饭馆里好好地吃了一顿，他一直送我们上车，然后握手作别。我一方面感到这样才使我们在险途中顺利地无忧无虑地到达了目的地，另一方面这也确实是一件巧遇的事。如果将途中的详细情况，心理变化，交谈的问题，看到的多种态度、手段，江湖上朋友的表面义气及沿途见闻加以描绘，真可写出一篇奇遇小说哩！当然，他对我们是为了钱，二十元大洋在当时是一个中学教员的半月薪水，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工人两、三个月工资。他只费了三天时间，回去时还可以再找其他的“客人”。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总算是在各方面都不吃亏，我们自己走时，还不知要受多少罪，出多少事，花多少钱呢。真是：

萍水相逢路遇险，提心吊胆遇同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沪宁车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干净，舒适，车上的男女旅客，都很文明，衣服整齐，秩序也好，天也不太冷，车走得很平稳。车窗外树木还绿，田间麦子青青的。还有青菜，不时看到溪水缓流，小船荡漾，农民住宅，几家成一小村子。看到这些心里也安静了，感受到今天的江南风景，确实很愉快。和两天来从开封到浦口的冒风险，不论在自己的心理上，或车内情况和车外自然风景方面，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沿路几个大站，也完全和前两天所见不同。江南风光真是名不虚传。如果在春夏时节，可能会更好看。这风景吸引我凝目而视，忘其所以，于是联想起古诗描述风景、名胜的佳句，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想着

想着，不禁胡乱吟了一首《沪宁道上》：

昨日彤云冒雪寒，侵面刺骨心未安。
恰如夜催腊冬去，赢得柳唤春光还。
大地青山托茅屋，小溪潺潺傍渔船。
江南风景四时好，犹似徐娘披罗衫。

冬天天短，四点钟天已黑了，我们平安到了上海。下车后，我们雇了车子，车夫在夜色笼罩中，通过十里洋场，繁华热闹的上街，把我们拉到大东旅馆去。

我们在大东旅馆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不久给我们送来了按规定算在房价中的饭和菜。从学生来说，这样的房间和饭食，已经是很不错了。从此，我便开始了短时间的上海生活。

七、在上海逗留的两周

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就去找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按我们认真记住的地址——“北四川路，底期威路增余里2号”，去找。费了不少劲，走了一些弯路，总算找到了。我们进门就用暗号问：“这里是买茶的吗？”一个联络员即和我们答话，问从哪里来。我们说明了情况。他说：

“可稍等一下，今天中央有人来。”过了些时，来了一个人，我们一看原来是老熟人王若飞。我们将河南省委的报告交给了他，并说明了来意。他问了我们一些河南的情况，来时路途是否困难等。以后，王若飞让联络员安排我住在增余里，让孟丙昌住到闸北联络站。联络员让我们第二天带着行李来，我将行李留下，然后和孟丙昌由联络员带领到了闸北一个地方。那里租的一个亭子间似的小楼，里边也只有几张床、桌椅，有个看门的住在下边，也是个联络员，完全是暂时的住

所。

中央联络站的地点很好，属于华界，但离公共租界和日租界很近，只隔一条马路，遇有紧急情况，三步即可进入另一“小王国”，增余里是华界的一条小街，底期威路是日租界的边街。联络站是一座上海很普通的二层小楼，只有两小间宽。下边为客房及卧房，还有一个小厨房，无厕所，只有马桶。楼上两间，有三、四张床，桌椅等。联络员姓张，陕西人，曾在东大呆过不长时间。据他说：王若飞是中央秘书长，每隔两、三天来一次，接待到这里来的人，处理信件、报告等事务。王若飞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他也不知道。为保密起见，他只知道另一个联络站，除闸北的以外，遇有特殊情况才可以去，一般不接待人。站里有一个本地女人作保姆，每天早晨来，做三次饭、收拾屋子等。晚饭后回去。她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对来往人员从来不问，只管做服务工作。早饭只做大米粥、小菜，烧饼是买现成的，午饭和晚饭是大米饭，做个菜和汤，吃的还不错。我一般只吃早饭，有时也吃晚饭，中饭一般在外面吃。联络员向我交代了保密注意事项，以及怎样回答外人及警察的询问，每天在下午六点前，最好是三、四点钟回来。只让我知道这个地方，其他任何人不能到这里来。我严格遵守这些要求，因为除了保密要求外，我很清楚，王若飞让我住在这里，也是对我的特殊照顾。

只是有一次，下午三、四点钟从南京路坐电车回来时，坐错了车，因没注意是几路车，也不敢随便下车，只好坐到头，再往回坐，然后坐一路车，回北四川路尽头，已经六点左右了，下车时天已经很黑了。待我刚走进华界时，几个枪

上带刺刀的警察喝住我，问我哪里去，干什么，夹的什么书？我那时身穿北方大棉袍，头戴小毡帽，“江北佬口音”，“土包子”模样。我说夹的是《唐诗三百首》和《论语》。这个警察也是北方口音，大概看我不象他眼中的坏人，所以才放我过去。那时上海还是比较紧张的，不久前，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失败后，共产党人的头，还在华界挂着示众呢。但幸亏我只遇着这一次盘问。我回到联络站时，那个联络员张同志正在屋内踱来踱去，焦急万分。

当我住在那里时，曾遇到一个路过上海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他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即北方执行局的负责人于树德。他在1925年到过河南，我还认得他，他已不大记得我了。另一个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①，曾参加过东征。他说，在一次退却中，曾背着蒋介石过河救了蒋的命。他大骂蒋忘恩负义，反对共产党。晚上大家回来后，四个人就在楼上装作打麻将的样子，交谈一些广东的情况。

到联络站三、四天后，我和孟丙昌到复旦大学找我大哥。那时他已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和信，说我将到上海求学。他有点惊异，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告诉我上海常有骗人的事，要我们注意。可我还是受了几次小骗和讹诈。如初到大东旅馆，晚上强迫我化钱听唱；洗澡时买的雪花膏是假的；坐人力车被多要了钱等，好在都是几角钱的小事。

我在那里不敢乱跑，更不敢逛花花世界，如“大世界”、“新世界”、公园、戏院等地方，只是跑跑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还有几个书局。这些都是在北四川路到南京路

^①据考证，此人即陈赓同志，其救蒋情况见宋希濂的回忆录《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

的一条电车路线上。

呆了几天，联络员告诉我们船快有了，不让到外边去。后来另一个联络员领我们到了一个码头，乘天将黑的时候上了船，不久便开船。和我们两人一起去苏联的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叫沈观澜，为负责人，但他们三人是到孙中山大学的，我们两个到东大。天很快全黑了，船慢慢地启航了，我躺在底舱里，思潮起伏，心情无比激动，船出了吴淞口，幸好没有遇到意外，算是顺利地登上了出国求经的旅程。当时曾想到古人写过的“去国词”，虽然情景大不相同了，但去国则是一样的。因用原韵改填词一首，作为出国留念。

九十年来家园，几千万里山河。欧风美雨皆虎狼，
天南地北尽阎罗，几曾息干戈。

神州破碎离拆，黎民倒悬折磨。十月革命炮声响，
世界大奏解放歌。举首望苏俄。

八、从上海到海参崴五昼夜

我们坐的是一只三千吨的小海轮，据说是苏联政府租赁挪威的，在海参崴—上海—广州之间航行。我们坐的是最便宜的舱位—底舱。两边是通舱，中间本来是放货的，但因无货，实际是空船，除我们五个人外，还有几十个客人，妇女、大小孩居多，只有少数几个男人，多数是宁波口音，少数是山东人，都是到海参崴找自己家属的。当时上船不要护照等手续，可能是来往人走的多，国界还是公开或开放的。我们看到的船员都是中国山东籍的人，他们也略懂一些宁波话和几句俄语。

由于船是空的，而且小（在大海中三千吨算不了什么），第一天晚上初出吴淞口时还好些，后半夜就感到不舒服了，

天亮时便大吐起来，不能起床，直到没有东西可吐还在干呕，使人觉得几乎连五脏都要吐出来似的。这次晕船使我发誓以后再不坐海船了。三天后，进了日本海，经过朝鲜海峡时，船已平稳得多了，海员们劝我们到甲板上去换换空气。我勉强地扶住梯子出去，才看到了雄伟的海阔天空，别有一番美丽的景色。在船的右边，隐约地可以看见一个大岛，大概是对马岛。那是日俄战争时，俄国海军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的地方。这时北风劲吹，寒气逼人。但那“白鸥与雪花齐飞，长天共沧海一色”的壮丽图景，却使我留连不舍。我想，常在海边及海上工作旅行的人，心胸应该是特别宽阔的吧！又想到在茫茫大海没有太阳或星月时，没有罗盘针，就根本无法辨别方向，这时我才真正了解罗盘的伟大作用。我还想到自己出国的任务，将来回国的工作、奋斗目标、斗争的前途，想得可多了，不禁吟出一首《海上》：

汪洋大海无边际，乘风破浪奔向前，
取得真经回祖国，唤起民众创新天。

第五天早，吃了点面条。海员说很快就要到“崴子”（即海参崴）了，可以准备下船了。我再次出去，到了外边一看，雪下得更大了，甲板已有积雪，漫天雪花，连茫茫大海也象全由雪花布满似的，这景色确实好看。将午时，船停了，我们下船登上码头，便踏上了苏联的国土。这里的码头、城市、海岸，都是一片白茫茫，布满了积雪，乘客们都各自下船走了。这时有一个说英语的俄国人来接我们，沈观澜向他说明情况后，他便领着我们，坐上雇好的雪橇，飞快地在大雪覆盖的大街上跑着。不久来到了一个挂着“北京旅馆”招牌的建筑物前。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九、在海参崴停留

“海参崴”是中国名称，俄文名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东”或“平定东方”的意思。十月革命后，这座城曾被美、日军队占领过，是国内战争后期1922年才解放的。此城解放才四年，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和秩序，确实成为苏联远东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的中心了。当时听说这里的人口主要是俄罗斯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其次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俄、中、朝三个民族的人口比例大概是4：3：3。

北京旅馆是个不大的三层楼建筑，据说原是沙俄时代的私人旅馆。现在住的人也不多，旅馆内供应膳食，可以在那里吃饭，但早晚的饭食比较简单。我们一般只在旅馆用午饭，其余按饭馆里一位中国老头建议，到外边中国饭馆吃。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开的食品店，质量不错，价钱也不贵。我们从到海参崴起，每天生活费两个卢布（当时物价不贵，一天还吃不完），由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发给。他的名字叫瓦特玛（wadman），讲不大流利的英语，不大象是俄罗斯人。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这里专门管送往迎来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中国人，间或也有其他国家到东大的学生和别的人。我遇见一个法国人，大概是进步的吧，也许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的记者，他说是为了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专门到中国的，曾到过广东、武汉和西安等地，见到了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要人。他说南北革命势力发展很顺利，但各派头头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在进一步取得胜利之后，可能有分化。他通晓法、英、德语，这次专程路过苏联回国，想亲眼看看苏联的情况，也想趁机学会俄文。

和我同房的是一位安南（今称越南）共产党人，姓李，

会讲法语。他只会一点中文，能讲一些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只能勉强作一些交谈。

旅馆里有一位给客人洗衣服的老头，是一个老华侨了，山东人，俄语讲得很流利，可惜我不懂。他问我们有没有带中国大洋，可以多换卢布。据说中国人在那里挣的卢布不能带回国，宁愿多出钱换银元。

我们在中国饭馆里吃饭，听到那里做生意的山东人把共产党叫做“穷党。”

海参崴的中国人确实不少，在一个区域内相当集中。我在那里看到有中国戏院。如果人数少，是办不起戏院的。还有中国澡堂，商店就更不用说了。我看到了在卖灶爷及门神爷的画，知道快过阴历年关了。那里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中国人，时常出入“五一工人俱乐部”。还有一个为中国青年人办的学校及工人干校，实际是基层的初级党校。

据瓦特玛说，东方大学一直没有回电，所以我们还得等些时，但据那位安南人讲，可能瓦特玛为了捞到好处而故意借口拖延。正在这时，又从中国来了一小批学生，都是到孙中山大学的。其中有从河南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嵇文甫，刚入党不久，是河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一个叫马景山，是郑州中大附中学生，一是杞县的段家骧。他们虽是后来的，但却比我们早离开海参崴先到莫斯科去了。

在这期间，我们还见到了从莫斯科东大学习结业回国的一批学生，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有向警予。她是蔡和森的爱人，过去曾听说过。她听说我从中国来，向我介绍了一些东大的情况，并打听中国的情况。我告诉她，目前上海很紧张，这样一批人去太不安全了，最好是到广东去。她说，她

也是这样想的。不久，他们就走了。

一月下旬，瓦特玛告诉我们，快要走了，可买些路上的食物。旅馆对过有一个中国人的商店老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西伯利亚大铁道旅途该带的物品以及带足到赤塔的食品。过了两天，瓦特玛给我们买了车票，送我们上了车。就这样离开了海参崴，开始了从亚洲到欧洲的长途旅行。

十、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我们上车后，瓦特玛又带来了两个去东大的同志，他们住在较高级的旅馆，比我们到海参崴的时间稍晚一些。大概因为是“官”，高级一点，穿着西装，每人一个大皮箱。由于我们四个人都不懂俄语，瓦特玛在我们铺位附近，找到了一个也是到莫斯科去的老红军，介绍给我们认识，让他路上关照我们，并在到莫斯科时通知东方大学派人接我们。

和我们一起去东大的，一个叫朱代杰，四川人，南洋大学毕业，是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到广东，在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是仅次于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的第三号人物。另一个叫孟振寰，是宣传科下面的一个股长，奉天人。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工作人员，比起我们两个学生来，当然“高级”多了。

西伯利亚大铁道上的列车都是卧铺，因为是长途车，也可能是和经济比较发展有关。铺位很朴素，只是一条长板，三层，我们便把带来的一条被子铺在上边。当时是一月下旬，正是冷的时候，列车绕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走。夜间足有零下40℃，白天也是零下30℃，而车厢里面却是零上20℃，相当暖和，只穿一件衬衣和毛衣就够了，就是空气不好。车厢内外温差在六、七十度之间。但走出车厢，也不是如想象

的那样冷得可怕。沿途的车站都很小，数量也很少，看到的只是雪和树林。白天每到大站，下去打壶开水，就可吃东西了。我们带的食品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一般俄国人只有面包、糖和开水而已。我们拿出食物请那位红军老战士吃，他点头称谢。

由于语言不通，和俄国人彼此很难说话，后来车上出现一个会说俄语的朝鲜人，孟振寰是奉天人，稍懂一点朝鲜语，这样通过两个人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到一些俄国人的生活习惯。

沿途站少，相当荒凉，车子走得较慢，经过四、五个昼夜，才到达赤塔。我在车站上向东瞭望，看到了另一条通向中国的铁路。过了赤塔，两边还是比较荒凉。但从那里起，我们常下车买东西吃，除冷食外，也可买到热的肉丸子等。中国人开的食品小店，沿途到处都有，而且价廉物美。

过了赤塔的次日，火车到了贝加尔湖。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说的北海，即苏武牧羊的地方。从上午开始火车绕贝加尔湖，一直走了几个钟头，才绕过它南半部的一小半。这天正在下着雪，真是上下远近都是雪，湖面一片宁静，完全为冰雪所覆盖。在湖边蜿蜒爬行的火车，犹如一条黑龙，是对大自然很好的点缀。我们站在车厢外面，欣赏西伯利亚的特有景色，想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国内国际的形势，真是别有一番风趣。我们唱着《苏武牧羊歌》，浮想联翩，还试着填了两首词。

其一 浪淘沙

鹅毛舞翩跹，一望无边。上下皆白地连天。皎洁玉宇真奇景，黑龙蜿蜒。

往事已千年，汉使吞毡。牧羊北海如铁坚。跋涉万里吊英杰，既赞且叹。

其二 北海感怀

北海似往年，冰雪如前。沧桑变迁殊非先。革命圣地群仰念，望眼欲穿。

汉武早归天，旧梦已残。众民甦醒创新篇。欧亚联姻翻巨浪，乾坤改观。

当天晚上，很晚才到伊尔库次克，那是当时西伯利亚一个最大的车站。我们事先得到预告，要在这里转车。我们收拾了东西下车，由那个老军人带领，按顺序排着队，在车站内等候上车，这时也不觉得很冷。不久，就上了车，车内情况和前一段差不多。我们很快安置好铺位就入睡了。这次转车如果没人带领，可能会有些麻烦。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一路上依然是白雪、树林，和前一段没有什么大区别，只是居民点稍多一点，也略大了些。我们每到一个大站，除下去打开水，还在站台来回踱步，活动一下身体，换换空气。我上次坐船，吃了晕船的苦头，但坐车没有活动余地，更使人感到疲倦。在站台上，常看见穿着滑冰鞋的小孩子们在跑来跑去，满有意思的。沿途食品小店的東西不少，一个鸡蛋只卖两个戈比，一个卢布可以买35个。这说明新经济政策对恢复农村经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又过了几天，才到了乌拉尔，这是欧亚分界的大山，看来并不很高。中心城市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已经是很大的欧洲城市了。想起小时候唱的歌中有一句“策马乌拉山”，唱着容易，当真正干起来可就很难了。我们坐火车跑了这么多天，才到了乌拉尔，“策马”该多少天才到呢？

过了乌拉尔便进入欧洲大陆，虽然铁路两旁仍然是树木、白雪，但居民点、城市逐渐多起来，不象西伯利亚那样荒凉了。

在离开海参崴的第十三天下午，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从而结束了这次长途旅行。单调的大地，树木和白雪，冷酷的天气，车内外极大的温差，咫尺的卧铺，闷塞的车厢空气，干燥的饭食，语言不通等辛苦的旅途环境，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眼看快要下车了，旅客看到了莫斯科周围的建筑物，不禁同声叫着“莫斯科”！

下车后，车站里并不冷，红军老战士带领我们暂时找了个地方休息，他便去打电话帮我们和东方大学联系。他还要办手续转车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还得往西走。他口虽如此说，但还是一直陪着我们。

直到来了两位中国同志，他便向来人交代几句才和我们告别，我们都很感谢他。来的这俩位同志，一个是罗世文，四川人，即《红岩》小说中的四川省委书记，后来牺牲了。朱代杰和他谈了几句话，才知道是同乡。另一个姓徐，也是南方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他们两人都能说俄语了，即刻带着我们坐电车，经过莫斯科的大街，我们观看了热闹的市容，亲眼见到心中向往的红色都城，真有说不尽的兴奋。

他们二人领我们到学校办事处，帮助办了手续。从此开始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生活。从离开开封到莫斯科，路途包括停留的时间，前后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到东大时间是1927年2月6日，因为次日我参加了印象很深的“二七”纪念日大会。

莫斯科阶段

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2月—同年末)

东方大学概况 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是联共中央为培训苏联东部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干部而建立的党校。这称之为本班。此外校内还附设外国班，兼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革命干部。其中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中国班的人数较多，其党组织原有一个独立支部，直属中共中央，称之为旅莫支部。1926年起，改由东大党委领导，和其它外国班的组织一样了。东方大学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尚在幼年而且处于极端秘密条件下的中国党，无法自己训练干部，东大却起了这样的作用。中共中央及各地区的负责干部，有不少都是在东大学习过的。在河南工作过的，如王若飞、张景曾、范易、李求实和汪泽凯等都是。进东大学习的一般都是党员，只有极少数是团员。

中国同志进校后，一律都要起一个俄国姓，作为代号。原因有二，一是让学校工作人员方便，因为俄国人不习惯用中国人的姓名，如同中国人不习惯用俄国人的姓名一样不便；二是为了保密，因为在莫斯科有中国反动派政府的大使

馆。但学生相互之间，还是都知道中文姓名的。我到后，给我起了个毕托贺夫的俄国姓，其他三个人也都由教务处人员随手给起了姓。

当我们到校时，同年级的学员已到齐了，我们最后来的几个人，是插班进去的。一年级有四十几个人，分为两班。此外还有早期到达留下来作翻译和工作的十来个人，以及几个工人同志。另外，我在海参崴见到的1926年届学业结束的人中，也有因程度低而继续留下来学习的。我们年级的学习人员，大概有以下几种人：

1. 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包括党代表，较高级的如朱代杰、李侠公（原一军党代表，和何应钦在一起的，其兄李仲公曾是蒋介石秘书）。李侠公资格较老，是1926年冬和谭平山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后留在苏联的。鲁易、卢汉、徐坚等，都是师党代表，还有较低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如孟振寰。

2. 国民革命军军官，如张际春和独立团叶挺下边三个营长中的两个，都是湖南人，屡立战功，参加北伐一直到打下武昌。

3. 党的组织工作人员，如彭桂生（曾在中央北方局内工作）、江常师、王平一、邹进贤、杨子烈等。

4. 教职员，如童庸生（是吴玉章的学生，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张安仁等。

5. 较多的是中学生，除我、孟丙昌外，有李杰生、陈聚奎、谢德盘、某女生、陈郁、李露仙、谭某某等。

6. 还有一个内蒙古人，叫福鼎，以及少数从法国来的原勤工俭学的学生：一个广东工人梁鹏万；还有一个非党员，

系张景曾的亲兄，叫张振亚。他是冯玉祥的副官，国民党党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也是李德全当时在莫斯科的服务员，他对李的思想帮助颇多。

东大的中共党员，不办理转联共的手续，有自己的党支部，由五人组成支部局，实际上还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大事向东大党委汇报，关于教育、学习方面的问题，则按全苏大学党委的安排进行。还设有两个俄国人，作专职指导员，其中一人曾以茶商名义到过中国。另外，还有小型的团组织，有三个委员。我曾在1927年上半年以兼团员资格，担任团支部委员，其余二人是陈聚奎、李直生。下半年便取消了。

学生课程是社会科学，原定二年。其科目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国际革命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还有俄文，由俄国人直接教课；其余都是由俄国人任教员，中国人作翻译。教学方式是口授，经过翻译，我们记笔记，因此学得并不多。学员有能力学俄文的，就加紧学俄文，争取看报纸、读马列主义的原著。懂得英文的，还可到国际书店买些英文的马、恩原著，我也积极地学俄文。

在物质生活方面，食堂的供应还不错，管饱，不限量，初到时有有些吃得不大习惯，但都能吃。我们的宿舍是一个二层楼的房子，规模不小，几个外文班的学员都住在那里。衣服也给我们做一点，洗澡、理发、洗换衬衣都免费。每月净发五个卢布的零用钱，抽烟的就抽没了，而我用来买些日用品和书籍。但比中山大学学生的零用钱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我们是“无产阶级”。房里冬天通暖，不象传说的那样冷得可怕。我们用冷水洗脸，已逐渐成了习惯。

节日里或星期天还有电影。

第一次革命纪念日——“二七”纪念会。到达的次日，我便参加了东大主办并有中大学生参加的“二七”纪念会。第一次看到革命成功后公开的革命纪念集会，男女青年，西装短发，自由地活动，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会上除联共中央派人作报告、学校负责人讲话外，当时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代表鹿钟麟以漂亮辞句高喊：“国民军的失败，使我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我在河南中学读书时，曾认得他，他是冯玉祥在河南的警察厅长。

中山大学和几件事 俄文实际上叫孙逸仙大学，是联共中央在孙中山死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材，因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学校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兼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和团员，有些原是国民党员，到学校后才加入党和团的。那里还有蒋介石、冯玉祥、邵子力等人的儿女，成分比较复杂，待遇高于东大学生，学习科目和东大基本相同，只是多了社会形态发展史，及校长拉狄克自编自讲的中国革命史或近代史。我到莫斯科不久，有一个星期日去中大，见到了早期来的刘国章、屠庆祺、杨放之、韩沅波。杨放之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学会了俄文，能作翻译。他和黄励（湖南人）结了婚，也加入了共产党。有些学生始终保持国民党观点，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还有些国民党员，原来就是右派，观点始终没有变，还暗地里或半公开的反共。

还有些中国同志被分配到莫斯科步兵学校专门学军事，从河南来的学生中有张珍华、裴光。

莫斯科还有一些华侨，曾在俄国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

军，受到苏联政府的优越待遇。但由于文化较低，有的以后在政治生活中走了下坡路，有作小生意的、开洗衣房的。还有个中国饭馆。中国学生有时想念故乡的饭菜，就到那里去光顾一下。

其他几件事是：（1）上海工人三月二十日第三次暴动胜利是中国革命的高潮，《真理报》上满篇都是上海电讯，在莫斯科各单位、工厂和工人群众中引起一阵“中国热”。但当时《真理报》上的漫画，画了一个中国工人，伸着大拇指说：“上海是我们的！”而这个工人居然还有辫子！经过我们提议，再版时才改去。此外还登了蒋介石的像片，说他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这说明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没有思想准备。

（2）莫斯科的复活节，这一天竟连学校食堂也不开饭了，可见其宗教影响之深。

（3）1927年“五一”节，有规模宏大的游行。我第一次参加。队伍一停止，俄国人就唱起歌跳起舞来了。

（4）晋谒了列宁墓，瞻仰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值班人员严肃地站在那里。

（5）李大钊等同志被杀害，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我们曾开了追悼会，彭桂生作了对李大钊、陈乔年等的回忆。

（6）蒋介石终于叛变了，正是布哈林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报告的时候。

东大暑假野营军训 五月间，已经有工人从中国来莫斯科，参加即将开办的军事训练班，为中国党培训军事工作人员。我们将利用暑假期间参加军事野营训练。

野营地点在离莫斯科有几站路的一个乡村附近，叫北口

注。在一个不大的树林中，旁边有小河，风景还不错。我们过了真正的野营生活，身穿军装，班排编制，住帐篷，带真枪实弹。我们加上新到的上海工人，分为两个连，由俄国军官任连长，张际春任副连长，还有冯玉祥部队的几个在苏联学习的军官任排长。我们当小兵，军服、军帽、裹腿、皮鞋、武装带、水壶、短把锹等一应俱全。除了上必要的军事课程外，主要是操典、野外行军、编队侦察、搜索、射击、实弹打靶、战斗、夜战实习、掷手榴弹等。实弹打靶时，步枪、手枪、机关枪都有，卧射、跪射、立射都练习过。开始大家对一切都没意见，就是对长途行军不满意，全副武装，一出去就是三、四十里，硬是走大半天，弄得筋疲力竭，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几位中国军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军事上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打不了仗，而且他们的年纪和我们一样，行军时也和我们一样走。以后习惯了，觉得打仗只凭一点勇气和愿望是不行的，必须锻炼。

在那里还参观了莫斯科高级步兵射击学校的野营和该校高级射手的打靶演习，都很好。此外，还看了坦克打靶演习，这些都使我们增加了不少军事知识。

初到野营时，对天气不大习惯。晚上十点天还不黑，早晨一点钟天已大亮，小鸟吱喳地叫。有时夜里站岗，看到黑天只有那末一会儿。也到乡村去过，了解苏联农民的生活。

八月中旬，野营结束了，回到了莫斯科，又开始了1927年秋季的学习。

1927年秋季开学以后 九月一日学校开学，我们升入了

二年级。一年级新生陆续到达，主要成员是从武汉来的，因为蒋介石、继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叛变后，在武汉的一些人，无法呆下去，便送到莫斯科来了。一部分人入东大，作为一年级新生，约有四、五十人；一部分入中大；还有一部分和以前到达的上海工人，进了专门开设的一年为期的军事训练班。这个班一律按军事学校编制，衣服等和我们在野营时一样，由俄国军官担任全部教职员，由东大党委直接领导，但也和东大中国班有密切关系，人数将近及二百人。这个班是吸取过去抓军事少而遭到失败的教训才创办的。

当时到达的新生中，有一些河南人。他们有的是在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时加入共产党的；有的是比较早就参加党的，其中有我的同班同学，曾共同工作过的曾鉴泉，他进入了军事班，他的爱人严君育则进入中山大学。还有其他几个河南人，包括女同志，也分到了各个班。他们比较详细地谈了二次北伐的情况。

学习开始后，直到年底，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1）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月间在武昌召开，虽然对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错误有了批评，但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当时党员有五万多人。

（2）共产国际在武汉政府叛变后，派了罗明纳兹到中国召开了紧急政治局会议，发表了告全国党员书，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瞿秋白上了台，并提出提拔工人同志到领导岗位上来，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以后曾在东大作过关于“八七会议”的报告。

（3）“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叶挺、贺龙率领的军队，集结在南昌起义，脱离了国

民党，实行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起义后，向广东汕头进军，所谓“叶贺南征”，进入汕头后，在军事上失败了。当时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到了莫斯科，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报告。

（4）九月，在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及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到达莫斯科，东大、中大学生中有不少人到车站欢迎他们，莫斯科大照像馆门前还挂了放大的宋庆龄像，莫斯科称之为“中国美人”。我在火车站看到宋、陈，也从他们的一行人中看到我过去读中学时的社会教员、留法学生吴之椿。我和杨放之曾到他们下榻的莫斯科大旅馆去访问吴之椿。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只讲英语不会讲中国话的中国外交部长陈友仁及其女儿。他向我们谈了一些旧事和武汉政府叛变前后的情况。

（5）中国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八七”会议后，提拔了工人当党领导人，中国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二人到达莫斯科，并曾向我们作过报告。向忠发那时成了党中央负责人，原来系武汉码头工人，武汉政府时为湖北省工会委员长。李震瀛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当时是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之一。

（6）联共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联共党内的反对派不同意中央的国内外政策，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在十五大前，曾进行党内大讨论，《真理报》上除发表很多文章批判反对派外，也发表过反对派的意见提纲。东大党组织也曾举行过讨论会。后来，在十五大前，联共中央开除了反对派的一些头头，各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十五大是在排除了反对派的情况下举行的。

(7) 十二月的广州暴动。1927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真理报》在谈到中国革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遭到了挫折，但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很快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发生了武装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任委员长，还有军事、外交等人民委员。但仅只两、三天，就失败了，张太雷战死，很多人遭惨杀，在广州的苏联领事也被害。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由共产国际派往广东参与组织这次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奈曼回到了莫斯科，并在东大作过较详细的报告，还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有关这次起义的文章。

(8) 白色恐怖猖獗。自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在中国便开始了白色恐怖。接着湖南长沙马日事变之后，杀戮共产党人及革命工农群众的事，已经愈来愈多。汪精卫叛变后，更公然提出了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极端反动凶恶的口号，白色恐怖更笼罩了全国。当时对一些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种种恐怖事件如残酷拷打等，报纸上时有连篇登载。我们即使远在莫斯科学习，但对这些情况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这也促使广大党员在思想上注意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对中国党的领导路线及中国班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东大学潮始末

(1927年—1928年3月)

学潮的远因 1927年末，东大学生有两个年级，合计约八、九十人，其中有一三分之一是1926年下半年来，大部分

是1927年来的。只有原来留在那里的十来个工人及工作人员和翻译是1926年以前来的，还有十几个人是从法国来的。这些早来的人中，有支部负责人吴胡景（1925年来）、黄士嘉、刘明严（从法国来）；翻译刘崑、曾涌泉、施益生（从法国来）。还有几个和他们关系较密切的人。军事班约二百人，都是1927年六、七月间来的。新到的人，对早来的人学到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很不习惯，而且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情况记忆犹新，战斗性也比较强。因而这两部分人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对立状态，此其一。

第二，中国革命由于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连续遭到了失败，引起了党员对中国党的领导人以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产生怀疑和不满，这也牵涉到中国班党支部局的领导方法和原旅莫支部的领导作风。

第三，在军事班，俄国人领导的官僚主义及不切实际的军事教学，使学生甚为不满，开学才两、三个月，就发展到学生集体去共产国际请愿，表示了对学校领导的不满。

学潮的近因 1927年末，东大中国班党支部照例向学生作了党务工作及教务工作的年度总结报告。学生们提了不少关于党的工作、教务工作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意见，党支部领导不仅不作检查和承认错误，以改正缺点，而且反过来大扣帽子，说这些意见是小资产阶级情绪、不相信党的领导、革命失败后的动摇心情、自由主义、失去革命信心、害怕白色恐怖等等。而党支部的领导人及支持他们的一些人，却恰正是根本没见过中国革命斗争而且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人。中国班党支部局为了对群众进行压制，除扣大帽子外，还借口一个青年工人发了几句牢骚而大肆批评，又拿我的墙报投稿借题

大作文章。

墙报事件 广州起义失败后，党支部领导的墙报要我投稿。我当即写了一篇题目是《中国革命失败怎么办？》的短文，主导思想是说革命失败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应该好好总结经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按照列宁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去做。当时，墙报没有发表这篇稿，理由是有失败主义和取消派的情绪。对此我曾作了口头反驳。后来，群众开始对党支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时，党支部却让墙报上出了一期扩大号，将我的短文发表出来，作为典型批判的对象，还写了几篇批判文章，专门由我的指导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引经据典，说这是代表失败主义的取消派意见等。他说中国只是暂时遭受了挫折或暂时失败，而不能说“失败了”。指导员傅雷叶还专门找我谈话。这种小题大作的做法，目的在于转移群众的视线，并以我为代表进行政治上的打击。我和班上的人曾作文反驳，但学潮已起，没有发表。

工作组进入学校 由于中国班党支部及东大党委不能平息群众的意见，而且矛盾愈演愈烈。每次开会以至上课和课余时间，大家都在议论。支部委员李侠公，退出了支委会和群众一起揭发问题，支部负责人吴胡景、黄士嘉也无法在群众中露面进行工作，完全失去了威信。这时学潮已成事实。上述情况反映到联共中央宣传部，于是派负责人员施坦为组长，及其他大学工作人员和区委委员，组成工作组，到东大负责解决学潮问题。

工作组到东大后，当即向群众宣布，将听取群众意见，可以个人谈，也可以写书面意见。于是我们纷纷给工作组写

了意见书，也有个人去谈的。写去意见书，有个人的，也有少数是集体写的，我和朱代杰去中大找人帮助翻译成俄文，班里也有能翻的就自己译。军事班也积极地提出意见。综合当时的意见，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中国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其根子有一部分在旅莫支部，中国班党支部还是那一套；

（2）家长式的压制民主的工作作风，乱给人扣帽子，没有批评及自我批评；

（3）教务工作、党的工作脱离实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不让看报纸和谈中国革命问题；

（4）蒙蔽上级东大党委，不反映群众意见和实际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5）党支部领导成员，从未接触过中国实际革命斗争，在此养尊处优，应该回国参加斗争。

第一次中国学生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后，工作组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决定召开东大中国学生全体大会，并通知可以自由发言，表达不同意见，看来他们是想亲眼看一下群众的情绪。我们就商量积极准备发言，经过我们几个人研究，由我第一个发言，揭露支部借我的短文想打击群众的阴谋，还决定由李侠公、童庸生分别就几个重点问题讲一讲，军事班和一年级也都有人准备发言。

大会由联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组组长施坦主持，设立了主席团并安排了翻译。我首先报名发言，当时心情比较激动，颇受群众的欢迎。我只讲了由于我的短文而引起的波折。以后发言的愈来愈多，报名的也不断，群众都很兴奋。这个会一直开了一个下午。在发言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支持党支部或者

为支部辩护的。后来施坦宣布，没有机会发言的人，还可以继续找工作组谈，工作组经过一些了解，根据大家的反映意见，将在一段时间以后，作适当的结论和采取必要的措施，让大家多等待几天。第一次大会就此宣告结束。

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中国学生，包括各个班和军事班，以及工作人员、支部负责人、翻译等，一共有三百多人，把俱乐部的会场坐得满满的，会议自始至终都很紧张，这是过去的一切集会所没有过的。

第二次全体中国学生大会 过了几天，工作组召开了东大第二次全体中国学生大会，由施坦主持。他开始作了一些说明，以后便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决议性的解决东大学潮方案及措施。他态度严肃，并附带作了一些解释，大概意思是中国班党支部在东大党委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而会后应当改进。但没有提到是否撤换支部领导的问题。他的宣读经过翻译以后，施坦宣布等待两三分钟，让大家考虑一下，然后再予以表决。大家听了以后，全场哗然，大为不满。主席团看到会场情况，也感到不妙，便让大家安静一下，准备表决。这时李侠公从座位上站起来，即席向大家讲了几句话，说大家不同意工作组的方案，表决时可以表示，但由于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对中央。因此，不赞成时，只能投怀疑或不同意票。大家静下来了，施坦开始宣布表决。先问，赞成的，会场上举手的寥寥无几，东一个，西一个的，不过二、三十人。次问反对的，有几个人举手，但马上放了下来。后问怀疑的，全场哗的一声，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当时施坦和主席团的成员，顿时神色大变，便说不用数票，并宣布，

既然大家对工作组方案不同意，工作组将重新研究，提出新方案。大会终于以否决了工作组的方案而宣告结束。

最后一次分别召开的**中国学生大会** 又过了几天，大概在二月中旬，工作组第三次召开了大会。但这次是分别召开的。一部分是东大本班的两个年级及其他人员约有一百多人参加，仍由工作组长施坦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工作组解决学潮的修改方案，精神仍然是那样，只是在有关中国班支部的缺点和错误方面多说了一些。宣读时又作了解释，宣读后不再讨论和表决，而是通知性质的。以后即宣布学潮的处理，即按这个方案以结束这件事。我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以后听说，次日又召开了军事班的全体会议，只是在宣读方案中，多了一条，即宣布开除本班学生五人，我、朱代杰、李侠公、童庸生、鲁易和军事班的一个上海工人。他们也未听清开除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知道以后，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们既不通知，也不在会上宣布呢？是不是因为怕会引起公愤呢？过了两天，也不见什么动静。于是我们主动去问支部负责人，他们说决议中有这样的事，但也没说明原因，也没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五个人商量一下，决定找中国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

被开除的五个人的情况是，李侠公的资历较老、地位也高，是支部委员。起先支部负责人吴胡景、黄士嘉很拉拢他，很快就让他参加了支部局。但在风潮前夕，他脱离了支部局，站在群众一边，支部局认为不能再让他在东大了。朱代杰的情况和李侠公差差不多，但他不愿作支部工作，被认为是不合作的人，在这次学潮中又是出谋划策的。鲁易地位虽不如前两人，但还是资历较老，也是出谋划策的。所以，支

部不能容许这两个人。童庸生党龄较老，这次是出头露面的人。我年纪最小，但由于墙报事件，又在大会上首先出面，而且和军事班通过曾鉴泉的联系，成为两方面的挂钩人，所以也为支部所不能容。因此在支部看来，我们五个人不能继续留在学校，否则中国班党支部就难以继续工作。尽管找不到公开原因，也只有通过工作组设法让我们走开。另一个军事班的工人，据说是过去在班里经常闹事，耍脾气，所以也被“消除”。

离开东大及转学经过 我们中的朱代杰、李侠公，在国内就和向忠发熟识。于是由他俩带领，我们五个一起去见中国党代表团。我们说明来意，主要是，既然学校不能容我们，请代表团给我们办回国手续，我们将回国在白色恐怖中参加革命斗争工作。向忠发说，他完全了解学潮的前后情况，我们必须离开东大，过错不在我们，工作组没有办法才这样干，目前不能让我们回国。他让我们等一下，他将和东方部商量，让我们转学，在苏联再学习一段时间。并让我们暂回学校，不会有什么事。

又过了几天，中大翻译郭少棠来东大，带我和朱代杰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去说，米夫找我们俩谈话。米夫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兼东方部远东部长。郭少棠是中大翻译，是米夫让他来的。他和朱代杰原来相识。见到米夫后，由郭少棠作翻译。米夫说，经过和中国党代表团商量，并和有关部门联系，我们五个人将继续留在苏联学习，我和朱代杰到列宁学院，李侠公等三人将到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学院，已和该学校领导谈好。我和朱代杰现在由郭少棠带领可直接到列宁学院去，其他三人，过两天即可到列宁格勒去。米夫询问我们的

意见，希望我们继续好好学习。

我们两人由郭少棠带领到了列宁学院，见到校长基尔山诺娃。她说，她已知道我们的情况，和米夫谈过了，可以即刻办理入学手续。学校中还有几个中国同志，以后会认识并了解情况的。校内有英、俄、法、德四个班。朱代杰入英文班，我虽然还有点困难，也只好入俄文班了。她说，问题不大，年纪轻，补习一下就可以了。郭少棠帮助我们办了入学手续，次日便带着数量不多的全部行李，进了列宁学院。东大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认为学潮并未失败，只是工作组不愿使联共基层党组织受影响，而中国班支部今后必须改组。以后李侠公等三人，也离开东大到列宁格勒，从此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莫斯科东大生活，转入了列宁学院。这已是1928年3月了。

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28年3月—1930年3月)

列宁学院简况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的党校性质，为提高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理论水平的二年训练班。它的全名为共产国际直属国际列宁主义学习班。学校的校长名义上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实际上管理学校的是副校长基尔山诺娃。她是当时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妻子，是个老党员，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都有密切的关系，学校配备的几个主要教员，都是比较有名并有著作的，如讲政治经济学的达尔，史学家西喀

尔，讲哲学、唯物史观的鲁达什，都是共产国际运动中的名人，能用英、法、俄、德四国语言讲课。

列宁学院创办于1926年，第一届学生人数较少，1927年届学生较多，我和朱代杰是插班进去的。学期预定二年。每届分四个班，用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直接教授，不用翻译。各国党员基本上可以分别用这四种语文学习，有些党员文字水平差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补习，也就跟上了。该校的学员都是各国党的教育干部，有的是中央委员一级的。朱代杰入的英文班，学员包括英、美、加拿大，英联邦及殖民地各国党派来的，还有中国人。我入的俄文班，学员有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芬兰等国的，也有中国人。德文班，是德国、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法文班，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

学习课程是社会科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党的建设等。以自学为主，辅导及讨论为附。有很好的读书室、图书馆。宿舍很不错，每室三、四人，桌椅、台灯都齐全，学习和休息条件还是很好的。此外，食堂吃的也不错，生活条件比苏联的党校、东大和中大都高，学习水平、要求和条件也强得多。因为是以一般西欧人的水平为标准的。我到校后，感到很满意，决心认真把学习搞好。

中国学员的情况 我是第二届的学生，那时第一届学生尚未毕业，以后第三届（即1928年届）学生又到了，所以，从1926年末到的至1928年后半年到的，三届共十几个人，大家都见到了，其成员有：

1.董必武 1928年夏从日本到莫斯科，入第三届英文班，直到1931年结业后才回国。和他同时到达莫斯科的还有钱介盘。与董老同时在莫斯科的还有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但他们都入中大学习，没有进列宁学院，可能是由于外文没有过关。他们曾到列宁学院来过好几次。

2.刘仁静 1926年或1927年初到莫斯科。可能也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在1927年联共党内讨论时，形成反对派观点，后成为中国学生中反对派的头头。他和董必武都是中国党最早的党员，和王若飞、张国焘观点不一致，但都有来往。他是第一届英文班的学员，1927年回国。

3.朱代杰 和我同时到达莫斯科，曾同入东大又同入列宁学院，政治观点接近我，曾和袁傅之结婚。袁于1929年先回国，朱代杰于1930年回国。在东大时，刘伯承、邓演达到莫斯科时都和他见过面。在中大的学生中，他也有不少相识，除袁傅之外，和沈联春等人关系密切。

4.阮仲一 原北大学生，和刘仁静相识，在中国时曾一度当过鲍罗廷的翻译。他是第二届英文班学员，1927年到莫斯科，以老党员自居，政治观点不很清楚，但总的还是“在野派”观点，和我也接近。他和中国党内一些老党员比较熟识，但关系并不密切。

5.彭泽湘 湖南人，曾任唐生智军队的党代表。在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北伐时唐生智为总司令，彭为政治部主任。他颇象一个官僚。1927年秋，国民党第二次叛变后，他到莫斯科才入了俄文班，和王若飞很接近，和其他中国党领导人也熟识，当时也是处于“在野派”的观点。

6.王若飞 1928年9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由于被

认为和陈独秀的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不同估价而留在莫斯科，才到列宁学院学习。他在1925年前曾在东大学习过一段。现在对**中国党的新领导及共产国际**有些意见，处于“在野派”不得意的状态。政治上接近于反对派的观点。他不住在学校内，另外给他安排了住所。

7.黄平 1928年下半年到莫斯科，1927年末广州起义时曾当了三天的外交人民委员，到校后，很能自吹，入第三届英文班，政治观点和瞿秋白接近，关系也密切。

8.杨善坤 1928年下半年到莫斯科，原北大学生，中华全国学生会负责人。入第三届英文班。政治观点及关系，和瞿秋白很密切。

9.周达民 1925年到莫，入中大，系当权派之一，因在国内即通俄文，到后即作翻译。斯大林到中大讲有关中国革命问题时，就是由他翻译的。后来在1927年，他被陈绍禹（王明）等排挤，加以“江浙同乡会”名义，被迫离开中大。他们和王明之间系派别斗争，同是标榜拥护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的，在列宁学院是积极分子。

10.俞秀松 是入党较早的党员，浙江人，1925年到莫斯科，和周达民情况基本相同，于1927年被排挤出中大，进第二届俄文班。但因俄文不好，未能赶上周达民；却以老党员自居。政治观点也是积极拥护联共及共产国际的。和中大学生有联系，但和中国党领导没什么关系。

11.董庆湘 1925年到莫斯科入中大，和周、俞关系密切，浙江人，于1928年被排挤，入列宁学院第三届俄文班。在国内时，曾好文学，投过一些稿，颇有点自命不凡；以拥护共产国际自居。

12—13. 潘家震、庄东晓 夫妇俩，原为学生，任翻译，1928年下半年到列宁学院，入第三届俄文班，各方面都很幼稚，很支持瞿秋白，是由瞿秋白介绍到列宁学院的。拥护共产国际，支持瞿秋白颇积极。

连我在内，前后共十四人。这些人当时的政治观点是各有不同的。

三位朋友的重逢，在离开东大之前，我的心有一段时间非常忧郁。在“三八”妇女节的晚上，我到杨放之家中聊天解闷，当时有杨的爱人莫励、曾鉴泉及其爱人严君育在场。我和杨、曾三个人在国内上中学时，是办墙报《试刊》的战友，想不到竟在莫斯科重逢，大家的遭遇、处境各不相同，于是各自谈论过去，但对将来，特别是祖国的前途，却难以预料，因填一首“点绛唇”为记：

题为《赤都重逢》

赤都重逢，“三八”妇女节。
漫天大雪，往事从头说。
挥舞秃笔，疾呼干唇舌，战鱼鳖。
满腔热血，何时把敌灭。

黄励、严君育也颇爱好文学，也积极地参加我们的高谈阔论。

第二个“五一”节 1928年的“五一”节，经学校当局向有关方面申请，列宁学院的全体学生被允许到红场参加“五一”节观礼，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我们一早就吃饭、整队，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站在列宁墓的一边，可以看

到在另一边的各国的驻苏使节，其中还有中国的。开始是红军的阅兵仪式，大队走过时，很有点气派，各兵种都有，各军事学校也参加了，中国学生的军事班也参加了。其中最好看的是骑兵。当时骑兵还占重要地位，特别是国内战争刚结束不久。

十点钟左右，阅兵式完结，群众游行开始。这与往年基本一样。

晚上，学校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来了几个艺术家表演了几个节目。听说，艺术家在节日里可以大挣其钱。

生产实习 从六月起，根据列宁学院的规定，学生都要分批分组到各地工厂去实习。1928年夏末，我和英、美班学生到离莫斯科不远的每提施的一个车辆制造厂去。组长是个保加利亚人，年纪较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由一个懂俄文的英国人作翻译。该厂原来是旧厂，革命后加以扩建，它和乡村的联系比较密切。因此我有机会了解苏联工人的生活，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农村的生活和一般居民的生活。看来在衣食、住方面都还是不太好的，当然比起革命前已有所进步。因为是夏天，晚上人们还是颇能利用一些时间进行娱乐活动。外国人曾说俄国民族是乐观主义占优势，可能有些根据。可我，由于怀念祖国的前途，革命失败后的时局，有时在别人欢乐歌唱的时候，反倒有点孤独莫名的愁闷。有一天晚上，他们都出去玩了，我在宿舍外面的野地里散步，明月高照，微风徐来，听到远方的歌乐声，不禁想起了家乡：

月夜更阑传歌声，忽触离人思乡情。
迢迢万里深闺梦，知否两地皆孤零？

这也算是一首短短的《咏怀》吧！

生产实习，使我第一次对工厂生产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和认识。7月中旬，接到学校通知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即将召开，让我们提前两个星期回莫斯科参加大会。于是我们就地作了个生产实习的总结，随即回莫斯科去。

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在莫斯科中心的工会大厦召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各国党的地位排列顺序上，联共占第一位，德国党占第二位，中国虽然革命失败了，人数也不如有些国家的党员多，但仍居第三位。以下才是法国、意大利、英国……中国党在国际大会上第一次特别受到各国党的重视。列宁学院的学员中，有少数以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大多数以列席资格经常都有票参加大会。此外，还有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

国际六大的开幕式很隆重。因为有莫斯科各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会场挤满了人。布哈林主持开幕式，并在第一天作了国际形势及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以后是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台尔曼。中国党代表瞿秋白、张国焘也发了言。但是，对一般发言，听的人并不多，也不那么注意，在会场外闲坐、行走和看展览的夫有人在。

我除了在会场上听到一些情况外，在会场外也可以听到一些，如当时马恩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谈到他曾去找考茨基要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准备出书，以及其各国党的一些情况，等等。

以后，大会还作了殖民地问题报告和组织工作报告。最

后选出了第六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党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当选为委员。会议于1928年8月中旬结束。

在国际六大会上，我见到了中国党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有十几名。除了瞿秋白、张国焘，还有邓中夏、蔡畅、王若飞、于飞及杨之华、杨子烈等。这时我才知道不久之前，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列宁学院第一届学员结业 11月中旬，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列宁学院1926年开始学习的学员，经过约二年的时间，宣布结业。学校举行了一个结业典礼，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人，我们也参加了。学校的名誉校长布哈林到会，发表了校长的讲话，祝贺第一届学生毕业，并向他们提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务。

布哈林很少到学校来，这次门房开始不让他进。布哈林在会上讲话只带了一个纸条，似乎是发言提纲，按提纲讲得很有条理，相当清楚，的确象一个有学问的人。以外，还有其他人讲话。

第一届学员中，中国人只有一个刘仁静。其他都是各国兄弟党的人。第一届的人数比第二届少。

到黑海边自找“别墅”休假 列宁学院学员有权休假，可到休养所去。彭泽湘约我到黑海边自行找个别墅度假，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坐上火车，用了两夜一天的时间，来到黑海边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路上经过乌克兰时正是白天，我们看到这个苏联的天然粮仓，是一个广袤的平原，农田无边，而居民点稀稀落落，比起中国的内地少得多了。还路过哈尔科夫，虽然没进城去逛，但从车站和铁道周围也可看出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的规模。塞瓦斯托波尔是苏联克里米亚

半岛边的一个商业中心，又是海军基地，俄国时代的军事堡垒。十九世纪英法联军战败俄国的战争中心，马克思、恩格斯专门论述过的克里米亚战争就在这个地方。在城的最高点，还修建了一个闻名世界的绘有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全景的油画馆，确实相当宏伟壮丽，那里还保持着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遗迹。我们在那里看到海军士兵、空军的水上飞机和各种船只。我们在别墅的旁边，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据他说，他曾同伏罗希洛夫在海港上一起当过工人。这个城市和海参崴相似，中部为小山，整个城市就错落在这座山的周围。

我们租了一间房子，是一个离了婚的年青女人让出来的。据她说因她男人酗酒而将他赶出去了。我在那里负责采买，彭泽湘负责做饭。他不仅会做饭，而且很有耐性，做菜和肉食颇为讲究。天气好时，我们就去游玩或洗海水澡，倒也很悠然自在。徐泽湘也对我谈了一些中国党内的情况，以及第二次北伐的经过，冯玉祥到河南及汪精卫叛变等。

克里米亚半岛住的是鞑靼人，大部分人务农。在山上及岛的周围长着很多葡萄，也不知是人种的，还是野生的，或者两者都有。人们除作食用外，还拿来酿酒，可以出副产品天然醋，这是当地的两种特产。人们的生活，一般还是比较困难的。

九月上旬，下了一场大雨。真是一雨便成秋，我们也该收拾东西回莫斯科了。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1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召开。

七月下旬，我们从实习地回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六

大时，就听说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了，并且陆续见到了一些留下的代表。先时，听说从中大调出几个翻译，又叫走了几个国内有爱人系作党内领导工作的几个女同志，如李沛泽、王兰英等，已经引起了一些猜测，以后事实证明了。

1928年秋季开学，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留下来的中国党代表，常到列宁学院来作报告，还带着中共六大的决议，和中国同志在一起开会讨论。从这时起，我们不仅学习、讨论了大会的决议和报告，也听到了一些文件所没有的大会花絮。

中共六大是在六、七月间召开的，是第一次在中国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国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代表们由国内各地选派，极秘密地到哈尔滨，然后转车到满州里，在那里先由联络站接待，再安排马车走一条私运商客的秘密道路，以躲避中国边防人员。当时东北还在奉军张学良统治之下，国界防卫不是很紧张，所以过境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即使如此也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参加会议的代表并不太多，有些人则由于工作及环境不许可而未能到会。开会的原因和为什么在莫斯科开，当时曾推测可能是由于：

1. 中国党连续犯了错误，革命失败了，必须总结过去，统一认识，确定今后工作的方向。

2. 中国国内的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特别是南方，开会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大会。人数比较多、时间较长的会议，在国内是无法举行的，莫斯科虽然远，但除了交通条件外，其他条件都比较方便。

3. 中国党领导人都犯了错误，无法也无人主持会议，共

产国际需要加强领导，以贯彻它的政治路线。

布哈林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米夫，东方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大个别教员，也参加了会议，并积极参加各种决议的起草工作。陈绍禹等是以作翻译工作的名义参加会议的，他们都很积极，不仅起了翻译作用。陈绍禹为米夫所欣赏，米夫曾提出让他参加新中央，但没被大会代表接受。

参加大会的代表，除少数人在莫斯科露过面，有几个人留下来，其余都在会后按原路回国去了。

中国代表团 留在莫斯科常到列宁学院的代表有瞿秋白、张国焘，还有邓中夏、于飞。邓中夏过了不久也回国去了。当时他和于飞都是接近瞿秋白的。和瞿、张住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旅馆里，还有他们的爱人杨之华和杨子烈。瞿秋白是积极宣传、支持六大决议的，他很强调中国党内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性，但对盲动主义的危害，却不那么强调。他在莫斯科时也很积极，对中国学生的事，也很关心并插手了。

张国焘在莫斯科是不太积极的，对于中国学生的事情也不太关心，没有插手。他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有一些联系，但并不密切。他对下棋颇有嗜好，在那里学会了国际象棋，以后有围棋时，更是常到列宁学院来观阵。在晚上他和朱代杰和我玩得很热闹。董老也是积极参加，只看不下，为我当参谋。

在政治观点上，张国焘曾谈到他的大西北主义；认为革命失败了，今后应该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其优点是：(1) 距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占优势的统治地区较远，在建立根据

地初期有利；(2)地广人稀，易于立足和发展；(3)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统一，从来都是由北向南的；(4)靠苏联近，易于得到国际及物资援助。

布哈林的右倾及下台 1928年秋天，共产国际六大召开不久，身兼《真理报》总编辑的布哈林曾在报上发表了《经济学家的纪事》的文章，被认为是右倾，当时在联共内部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右倾了，是首先从莫斯科的省市组织负责人开始的。以后在列宁学院内首先作为内部消息作了传达，并宣布了布哈林已不到共产国际工作了，《真理报》也改由编委会负责了。

见到鲍罗廷 1928年秋天的一天晚上，阮仲一、朱代杰和我曾到鲍罗廷的住宅，见到了这位曾赫赫有名、号称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当时只是一个住在莫斯科的平民，任英文《莫斯科工人》报的编辑。阮仲一和朱代杰在国内原来就认识他，我和他则是第一次见面。

他在谈到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除了中国党和反动派之间的力量悬殊外，政策错误也是主要原因。他个人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是有责任的，但主要问题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做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摸不透中国人的情况，国民党一些领导人都是口是心非的，讲的和干的不一样。这些人的政客作风，一个外国人是难以捉摸的。回到莫斯科后，他认为把责任归咎于他是过多了。

家庭的消息 我到莫斯科后，曾和乡间的妻子通过信，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猖狂的时候，不敢再往城市寄信了；听说南方很厉害，北方没有搞过革命运动的地方反而松一些。我在来信中可以看到妻子留在信纸上的泪

痕。只是在1928年夏天，带来三弟的一封信中说，他曾被捕过。在冯玉祥到河南和蒋介石联合后，他在狱中生病经父亲奔走才保了出来，回到家乡养病。信中提到廖妹已和娄村许家订婚，许是一个进步的青年。

我的反对派观点形成的经过

（1928年秋—1929年初）

在整个1927年，即从二月初到莫斯科直至十二月，即苏共清除反对派时止，我也曾听到党组织关于反对派各种情况的传达，及中大学生中有反对派的事。虽然，在后来清除反对派时，我有点想不通，觉得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形成的派别斗争，纯属“兄弟阋于墙”的性质，不应该采取全部清除的办法。但是，我始终是站在拥护联共中央的观点，即使对中国革命问题，也没有不同的看法。在东大学潮后，我到了列宁学院，曾有一段时间后悔不该在东大闹学潮，并下决心以后要好好学习。但1928年秋，在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以后，思想上却有了波动，终于在1928年底1929年初形成了反对派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说。

阅看反对派的一个主要文件 共产国际六大期间，大会秘书处印发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批评》作为参考文件。那时托洛茨基已经流放到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他在那里写出这个文件以申明其反对派的观点，是借批评1928年春发表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而诉诸共产国际六大。印发这个文件，并未组织讨论，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

回事而已。可它却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文说“纲领草案”象个共产主义常识课本，而未提出战斗性任务及总结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就三个问题结合共产国际及联共中央的主要分析以反对派的观点作了系统叙述。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派认为是不可能的。为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中心，而不是只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第二个问题，就是对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了解，也不注意；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这是我非常关心而密切注意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我记得的大概内容是，首先是关于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他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一个政党只能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内某个集团，而不能代表几个阶级或是几个阶级的联盟。一个政党的性质决定于它的政纲、斗争目标和领导成员代表谁，为哪个阶级利益服务，而不决定于参加这个政党的成员。国民党从成立起，在政纲、发展、斗争目标、代表人物方面，都是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或共产党的参加，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国共产党内的成员，小资产阶级不少，农民很多，工人却较少。但它不是三个阶级的联盟，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以产业工人为主，很多领导成员也是工人，而列宁从来没有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政党。

他说，他认为国民党纪律松散，因而是革命联盟也是不对的。纪律严密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的政党虽有

纪律，但都是松散的。在组成机构上，它们如同宝塔一样，上边的少数领导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愈往下层，人员愈复杂，包括成份面愈广，成员包括各个阶级。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保持独立的工作和性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究竟是一个政党，有政纲、纪律和口号，加入了国民党后，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都得按它的政纲、口号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也得打着国民党招牌。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而实际上却被国民党利用了。而且给蒋介石以清党名义，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搞阴谋。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是应该的。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合作，但合作是一件事，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而参加国民党又是另一件事，两者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中国革命的失败由于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右倾，不仅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党的领导，而是由于共产国际错误地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性质，在策略及政策上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中国党领导有责任，共产国际也有责任，不能只责怪中国党。

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应该是根据革命失败后形势低落及力量损失的情况，整顿革命队伍，积蓄力量，在作秘密工作的同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利用合法斗争的机会作长期打算。

我看了以后，脑海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不断地回忆了过去曾经遇到和考虑过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估价，政党的组织及其性质的分析，策略及政策等。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听说过。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认

真地分析错误，总结经验，确定新的策略和政策。总之，经过反复考虑，确实使我在考虑中国问题上产生了一个转折点。

刘仁静对我的谈话 我原来不认识刘仁静。从东大转到列宁学院后，才间或和他闲谈一下。有一次在谈到东大学潮及我们受排挤的情况，他说，东大中国领导人及俄国人那种官僚主义和不接受意见的作风是联共党内一些基层组织的普遍现象。他们对人的看法，凡是听从他们的，不管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信任、提拔和重用，如果向他们提些意见，他们就排挤、打击。你们被排挤出东大，幸亏有中国党代表向忠发帮助转学，不然还不知道他们怎样对付你们呢！我说，只不过回国而已。他说，那可不一定，他们是能做出我们想不到的事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坏事。

秋天开学以后，刘仁静到莫斯科的工厂实习去了，有时也见面。我曾问及反对派的观点和中国党、中国革命以及第三国际的政策等有关问题。他先后向我谈了他的一些观点和有关情况，大致有：关于国民党的性质，他过去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因此，早期关于共产党应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一直就有不同意见。共产国际第一次到中国去的代表，大概在1922年，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没有谈通，原因是共产国际坚持了原则。1923年共产国际第二次派代表去才谈通了，于是进行了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参加以后口头上也说要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但实际上“被国民党利用了”。

对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共产国际作了错误的估计，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支持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把蒋

介石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三二〇”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面目已相当露骨地表现出来了，但对他仍不提防，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反而更加吹捧蒋介石，还说蒋介石是能革命的。反对派预言蒋介石要叛变，他们认为可笑，结果布哈林的报告正想发表，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就传来了。在蒋介石叛变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的身上。在北方则寄望于冯玉祥。对他两个人都给很多物资、军事上的支持。结果证明这一步也是错了。

布哈林不久前还是对中国革命策略的决策人之一，还在共产国际作报告，现在说他右倾，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不是一天之间出现的，也不只是在某一个问题上出现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有其根本原因的，那就是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估价及策略上的错误。

关于责任问题，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失败后，把责任都推给中国党的领导。实际上，中国党是错了，共产国际更是错误的。中国党领导没有经验，是幼年的党，主要策略的决定都在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共产国际及联共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他们的权力作用都不小。中国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先后派过马林、越飞去和国民党谈判，以后又派维经斯基作为常驻中国党内的代表。他就是常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的魏琴。国民政府有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有加伦（布留赫尔将军），还有整个顾问团，能说他们都不知道，都不负责任，而只应该怪中国党领导人不执行或执行错误吗？

中国革命在蒋、汪叛变后，共产国际说中国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了罗明纳兹，带着指令到中国召开了“八

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瞿秋白上来了。发表了“八七”宣言，根据这个指令，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即盲动主义的错误。以后又派了奈曼到广州组织起义，说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结果又失败了。使中国党又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这不都是具体事实吗？主要决策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难道只有瞿秋白才应该负责吗？

李立三上台后，仍然是继续犯错误，继续推行中国革命高涨的理论。

关于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争论，刘仁静说，在联共历史上，托洛茨基曾反对过列宁，有过意见分歧，对俄国革命策略有不同的看法，但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及1917年十月革命中都起过积极作用的。他们之间有过分歧，但也有过合作，1917年的十月革命就是在积极合作之下进行的。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恢复工业生产过程中，托洛茨基都受到列宁的重用，并起了主要的作用。列宁曾说过，革命以后，他和托洛茨基没有原则分歧。而联共党史写了好几次，愈写反托洛茨基的内 愈浓。关于这一点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一个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叫约翰·理德（John Rid），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是十月革命的写实报导，列宁曾推荐过这本书。记不得是列宁还是列宁夫人曾为此书作过序。但翻译成俄文后，只出了一版就不让出了，因为里边谈到有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情况，虽然此书的作者约翰·理德死后，曾葬在红场。另一个是支持反对派观点的，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因此列宁夫人也不受欢迎了。

关于苏联国内的政策问题，反对派也主张反对富农、反

右及工业化。他认为这是没有错误的。

刘仁静还说，联共党内没有民主，不准提任何不同的意见，官僚主义是自上而下的，下边只能说好话，有的办法行不通，上面就把责任往下推。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和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这样。

关于派别活动，刘仁静说，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是不应该的，但组织服从于政治，政治观点不同，而又没有民主，派别就必然产生。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眼看着政治策略和政策错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无动于衷地听之任之，这样是不应该的。列宁如果不组织自己的派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斗争，俄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关键还在于政治。

刘仁静还说，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知名人士，原是波兰籍犹太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后，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国革命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反对派和联共中央发生有关中国问题争论时，拉狄克参加了反对派，曾作为中国问题的发言人，因而被撤去了校长职务。拉狄克曾预言蒋介石不可靠，要叛变。拉狄克对中大学生有影响，在学生中也有反对派。

总之，刘仁静这些谈话，对我的反对派观点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黎光剂、张景曾从河南到莫斯科 这是促成我的观点形成的另一原因。1929年春，在国内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环境下，有一批新生来到莫斯科学习。

从河南省委来的有黎光剂及张景曾。张景曾是我入党时的谈话人，后在省委做宣传工作，从1925年起，和我就很熟。

黎光剂于1927年到河南，是在我离开之后。他在省委做组织工作，常到各县去，正是在革命将失败及失败后的这段时间。他不认识我，但经张景曾和曾鉴泉的介绍，很快就熟识了。

张景曾除谈到我三弟被捕、《新中州报》停刊和其他情况外，关于政治及革命失败情况，曾谈到冯玉祥到河南后怎样很快和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虽然冯没有象蒋、汪那样大肆杀人。但是许多同志还是牺牲了，而且死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由于党的政策的错误，使共产党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处于措手不及、到处被动的状况。他谈到，原开封市委书记范易，于1927年末被派到河南南部搞农民运动。他是以国民党特派员的名义去的，反而被我们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武装人员杀了，死了以后，才知道是自己人。张景曾说，旧日192⁵年时的一批同志好几十个人，活下来的很少了。他到了莫斯科才看到我们这几个留下来的人，不禁眼泪汪汪，大哭了一场。

黎光剂谈了很多国内的具体情况，除了冯玉祥的反共活动，还有盲动主义时的一些错误事例。“八七”会议后，为了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到处组织武装暴动，不管党组织力量怎样，群众基础怎样，到处下令，派人干。在河南南部有一次到县郊去搞暴动，既无群众，也无武器，刀枪也没有，就派人带火柴把地主场上的草堆烧着，后来叫做“火柴暴动”。结果，人被杀了，原有的一点基础也垮了。

他谈到，到处派人，上边限期、限地方去发展组织，原有的地方党员，随便派到新地方去，人生地不熟，有的甚至

还没有接上头就牺牲了，结果新的地方组织没建立起来，原有的也垮了。派到各地去的人，既不调查研究，也不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只拿着上级指示，说一不二，乱干蛮干。有些政策，常常变动，规定也不具体，不易执行，出了问题，总是下边执行人的错误，使地方工作的人，到处为难。

他们谈到这些情况，使我回想起并联想到同过去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看到的有关中国党1927、1928年的报告材料上的内容基本上一致，更使我相信有些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

黎光剂还谈到这次来的人，都是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多少经历过严重的斗争。他们在革命形势动荡的情况下，带着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中共六大文件，对有些问题也找不到答案。但来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提的一些问题，根本没有人感兴趣，问得多了，学校还有意见。他们对学习的前途，有点信心不足。有的人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被指责为有情绪、态度不对头等。

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使我形成了与当时共产国际的看法相对立的反对派观点。虽然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主要问题上是同意的。我对派别活动这个问题始终持有保留意见和消极态度。

当时对政治问题的观点，综合起来，按我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可以归纳比较如下：

我当时的认识和看法	我所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观点
1. 国民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就其政纲、领导成员的代表性、所代表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四个

的利益,都是资产阶级的。它的性质,不决定于参加国民党的成员,特别是下级群众。

2.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和国民党合作,实现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不应参加国民党。

3.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后,就要受国民党的党纲、政策、决议、纪律等方面的约束,就得为国民党工作,可能为国民党利用,实际上也被利用了。

4.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错误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性质,及对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上策略和政策的错误。

5.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责任,不只在于中国党领导,也在于共产国际。

6.盲动主义错误的原因和责任,是共产国际不承认策略上的错误,革命失败后

阶级的革命联盟。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因而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组成了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半殖民地国家是特有形式。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后,可以而且不受国民党的约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工作,同时可以利用国民党,接近群众,发展自己的组织。

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党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资产阶级及国民党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没有独立性,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责任,在于中国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

盲动主义错误的原因及责任在于中国党的新领导没有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错

又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而引起的。

7. 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要重新组织群众，积蓄力量，但却不能再进行武装暴动。

8.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成为中国革命的统治者，今后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打倒国民党。

9. 由于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虽然中国的民主革命并未完成，而今后的革命任务除反帝、反封建外，还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革命的性质已转入社会主义的，即两个革命要同时进行。

10. 组织路线服从于政治路线，因为共产国际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同时又不容许批评，而进行压制，因此只得进行派别活动，以实现政治主张。所以不存在服从不服从问题。

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

革命暂时失败了，新高潮很快即将到来，现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取得了政权，暂时胜利了，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取得了妥协。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胜利后，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妥协了，所以这个任务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派别组织活动是不合法的，组织上是不允许的，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派别活动是不容许的，是反党的，所以应作组织处理，开除出党。

从1929年起，我同接触过的人所谈的政治观点，就是这些。

中大的改组及东大与中大的合并 1928年，中大内原来的国民党员，即思想较右又未入党及团的人，由于国民党已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结束，所以都先后送回国，那里只有共产党员和团员了。因此学校进行了改组，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仍简称为中大。1928年夏，东大原军事班参加夏季野营训练之后，大部分已回国，少数转入军事学校。原来1927年下半年到东大的一年级学生，及几个军事班学生，也转入中大，因为在莫斯科当然不应该有两个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不论在经济上、组织上、培养人材以及防止中国党内可能形成派别起见，都应该合并。而在当时东大与中大的学生中已有分派的苗头了。

留在中大内的，原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1925年到莫斯科后，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春年蒋介石叛变后，他曾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开信声讨蒋介石的叛变。但这是个别情况，以后蒋经国转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及农民问题的看法 1929年春，在莫斯科组织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参加人员有中大的几个教员和几个学生，东方部的几个俄国工作人员，苏联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有著名的马加儿。他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一书的作者。列宁学院有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确定会议分两、三个组，各自报名，方法是看参考资料、开座谈会和报告会，由各人准备中心发言提纲。我选了农民问题，还有工人运动，革命史。我选农民问题的

原因，认为中国革命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在俄国革命中，列宁也曾说过农民是关键，托洛茨基过去谈论革命问题未曾充分注意到农民。我看了一些资料，如上边提的马加的书，特别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部重要著作，以及他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后我写了农民问题的提纲，大意是：

中国过去是一个封建社会，俄国也是封建社会，但两者的农村经验、土地所有制及农民情况不完全一样，所以“土地国有”的口号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过去有过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倒是比较合适的。不能生搬硬套“土地国有”这样的口号。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质，即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历代的历史，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虽然和俄国的地主有所不同，但作为土地革命对象则是一样的，当然对大中小地主可以有不同的对待。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应采取中立政策，开始时不要树敌过多。中农应该是联合的对象，贫农、雇农及农村工人是依靠对象。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住在城市，但和农村及土地有密切关系，应按城市阶级来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前者应该反对，后者应该联合。

这个提纲我曾译作俄文，交给了研究会。准备作中心发言。但从来未实现，因为报告会只举行了二、三次。以后马加曾作了一次报告，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也参加了会议并谈了一些看法。

到红军中进行国际主义宣传 1929年巴黎公社纪念日，亦即国际红色救活会日，列宁学院曾派了一些外国学生到各工厂、各地区去进行国际主义宣传。我曾到莫斯科附近的一

个红军军营中去，因为夜间坐马车、雪橇，几乎把耳朵冻掉了，幸亏他们发现教我用雪揉好了。这时我才知道预防及处理手足或脸面耳朵受冻的方法。在宣传中，一般俄国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还是很浓的。

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和工业考察 从1929年6月初起，根据学校的安排，二年级是分成小组到各地去作专题考察、参观和实习。我和朱代杰决定到列宁格勒去作工业考察，这是主要目的，因为想对苏联革命后工业发展的情况作一个全面了解。另外还有两个附带的目的，一是参观一下列宁格勒的风景名胜及革命圣地，二是会见转学到列宁格勒的曾和我们一起被从东大排挤出去的三个同志。

学校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给我们写了一封联共中央宣传部给所到地区党组织的介绍信，其中除简单地说明了列宁学院的任务、学员的情况和考察的目的外，就是要地区党组织积极帮助我们，创造条件。这封介绍信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使列宁格勒州委重视我们，安排了全面的参观、考察、看资料，到各个轻、重工业部门，在生活方面也很照顾，并对有些保密部门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

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只要坐一夜火车就到了。据说这是最直的交通线。在第一次建造铁路时，还在旧俄时代，请沙皇提意见，他用红笔划了一条直线。在修路时，只是有个别地方因地理情况略有偏差，其余部分都是遵从皇帝的“御笔”修建的。

列宁格勒简况 列宁格勒当时是苏联第二首都，是旧俄彼得大帝开始修建的新城市，所谓俄国观看欧洲的窗户。它地处涅瓦河入波罗的海和波的尼亚湾的河口，地基是由无数

个桩柱构成的。原名彼得堡，是德国城市的名称，因为那时从大彼得起都是效法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俄国是反对德国的，所以改名为彼得格勒，格勒是俄国城市的古名。十月革命后仍沿用此名，1924年列宁逝世后，才改成现名以纪念列宁。现在是第一个工业城市，全市河流纵横交错，因此有大小桥八百多座。建筑很整齐，名胜也很多。我们参观时，正是西方未暗而东方已象白昼一般的“白夜”，这就是几无黑夜的季节。

我们到达后，先到苏共州委及市委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那里是革命圣地，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当时列宁的办公室还一直留作纪念馆。那是一个大楼房，原来是一个女子学校。我们在那里见到州委宣传部长乌喀洛夫，他看了苏共中央介绍信，便积极地给我们进行了各种安排：为我们联络了工作的单位——列宁格勒经济委员会；让我们住在季诺维也夫大学的宿舍以及解决有关供应问题。

州经济委员会及实习参观安排 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们派了一名女经济工程师，陪同我们参观、实习，并负责同各企业单位联系，遇到市公共汽车电车交通不方便时，还派小汽车送我们去。各种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谈话、介绍也在这里进行。

经过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安排，我们参观了很多企业，其中属于重工业的有“十月革命”热电站、远离列宁格勒百余里的、列宁直接关怀倡议兴建的沃尔霍夫水电站、列宁格勒电气中心站，最大的金工厂（出过很多有名人物，如加里宁就是这个厂的工人）、波罗的海造船厂。在造船厂参加了两只

三千吨船的下水典礼，在船上看来相当大，下水后，在岸上一看并不大。参观列宁格勒的海港时，让我们坐着小汽艇里外看了一遍。还参观了一个化工厂。在轻工业方面，参观了完全现代化的面包厂、造纸厂，属于国家机密的纸币制造厂，苏联合作社，以及几个较小的工厂。还到达列宁格勒各区及私人商店经营区去参观。当时由于新经济政策尚未完全取消，所以还允许私人开商店，虽然绝大部分的货物都是国家工厂制造的。

此外，还经州委介绍参观了列宁格勒及附近的名胜、纪念馆等，其中有沙俄的皇宫及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俄皇避暑地夏宫（虽然列宁格勒在夏天并不太“暑”），原名俄皇村，已改名普希金村，以纪念俄国大诗人；红军野营集中地的红村；海军根据地；十月革命放信号的喀朗施塔得村，在这里可以看到芬兰的波的尼亚湾；据说是世界第二大教堂的建筑；其它如各种雕刻、塑像、特别是大彼得骑马的塑像；大戏院，我们还在那里看了一次名剧《钦差大臣》。

到军事政治学院去 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校，学员是军队的军事、政治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国内战争有过功绩的人，所以学习、待遇条件都不错。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李侠公、鲁易及童庸生。我们带了中共六大文件，向他们谈了我们听到的有关大会情况和代表团的情况，也同他们谈了我们对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和他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他们当时还是按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的精神一字一句地说的。我们先后去了几次，他们的生活、学习条件，也都是很好的，穿着军装，在有些方面比我们的条件还要好一些。

在那里见到了从中山大学转去的我的老友韩沅波。我向他谈了些情况后，他谈到了当时在军事政治学校中有争论的问题，即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问题，这是联共中央提出的，引起了部分政治工作人员的反对。原来国内战争时期，党代表的权大于军事长官，现在军事长官，特别是高一级的大部分是党员了，所以为了统一指挥，要实行一长制。当时正在酝酿，但是以后还是实行了。

我们在那里还遇到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也是和韩沅波一起转到那里去的。

七月末，我们结束了在列宁格勒的生产实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才回到莫斯科。

第一次到休养所，第二次到黑海边 八月初，我和彭泽湘、阮仲一三人在学校领了到休养所去休假的证明，时间是四个星期。我到苏联已是第三年了，去休养所还是第一次。休养所在黑海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边最南部即最有名的雅尔塔之间，据说是俄皇时代一个大贵族的休养别墅，以后加以改建和扩建而成。这样的休养所及疗养院，在沿海一带颇不少，革命后又修建了一些。到达休养所之前，我们坐汽车走了两、三个钟头，其中有四、五十分钟的下坡路，相当曲折险峻，急转弯一个接着一个，颇为惊险。我们走不惯这种路，真有点“惊心动魄”，但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回来时，虽然上坡更危险，但不那么害怕了。

这是一个教育工作人员的休养所，以知识分子为主，教员很多。吃得不错，休息环境也很好，比起我们去年的“别墅”自做自食，那是好得多了。在休息期间，除了下棋、看小说、洗海水澡、晒太阳、游玩外，还组织了一个沿海边旅行

的活动，一直走到雅尔塔。在那里参观了东方博物馆，看到了中国艺术制品，一个用象牙雕刻的十层套球，各层都能活动。据说这是几个艺人花了二十年的作品，价值旧卢布二万元。还参观了俄国大文学家契诃夫的旧居。在雅尔塔植物园中第一次见到竹子的俄国人，让我们作了十来分钟的解释，结果也没有使他们了解竹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休养所中的一个特点，是有些人在那里搞些“及时行乐”的活动，临时配偶。

经过四个星期的休息，于八月底回到了莫斯科，准备最后一年的学习。

三位朋友的别离 我和曾鉴泉，杨放之三个人在莫斯科聚会，见面谈心的时间，先后只有一年多。1928年下半年，我在中大杨放之家中谈到布哈林右倾时，曾发生过误会，以后谈话、见面的时间少了。1928年八、九月间，我在南俄休养时，曾鉴泉夫妇被中大学校当局排斥异己或对待不听话的人的方法，派到远东去做华侨工作，所以连相互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到达远东后，曾来过信，谈了他们的情况，及当地的工作，言外之意，很有点牢骚。杨放之也于1929年上半年被派到海参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所属的太平洋职工会的工作。从此，三个朋友又分别了。当时我感觉到中大当局，主要是中国人，在以俄国人及领导为后盾，搞自己的派别，和东大那些人作风和方法是一样的。我感到同志们背井离乡，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参加了革命，而现在却被这些人利用职权以公报私，随便将中国党积蓄的一点力量，留在苏联乱派到远不可及的地方，仅1929年内就有好几起。当时，我想这些人将处于无人过问、呼天不应的境地而被人抛弃；将来

再汇到一起，共同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机会，恐怕不容易了。因此，作了《忆友》两首：

其 一

离乡万里输忠诚，献身祖国为众生；
谁料邪人偏当道，强把战士作屯兵。

其 二

人生不见如参商，山水遥隔雨茫茫；
逐客远道多风浪，能否重逢话同窗。

中大内部的斗争和十天大会 1929年7月，中大结束上半年教学工作召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时，由于学校的党务和教育工作的缺点、错误，及工作作风不好，引起了绝大多数学生的不满，会场变成了批评大会，其批评内容及东大学潮的原因大致差不多，如不民主，教学不切合实际，乱给学生扣帽子，派性，排斥不同意见的人，借着俄国人压中国人，对中国革命问题不让认真学习、讨论等。过去两、三年来的问题都一起冒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大的当权派搞派别活动，排除异己，所以原来的多种派别也都起来了，反对学校当局，这样持续了十天，一直吵吵闹闹的，但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成见。这称之为“十天大会”。据我了解，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不积极、不关心，认为提意见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如不提的好。参与这次活动的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人：

1. 当权派，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卜士奇等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配合俄国人对学生们进行压制，为绝大多数学生所反对。他们说当时中共只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拥护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自封为绝对正确。他

们都是1925年到莫斯科的第一批学生，懂得俄文，是学校当局俄国人所信任依靠的，也受到中大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远东部长米夫的欣赏。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极少数关系密切的人。

2.原“江浙同乡会”派，江浙人为主，即周达民、俞秀松所影响的一些人，1927年他两人被陈绍禹、张闻天排挤出东大，而原来那些人，和他们仍是对立的。过去以“派”名受过打击，现在积极反对。

3.原中大旧生的一部分，长期不满意学校当局，知道的事情较多，不属于什么派，但不是跟着陈绍禹走的人，也积极反对，但这样的人数不多。

4.1928年下半年从东大转过去的，他们对东大校当局不满意，学潮未解决问题，过来后，看到中大的情况不比东大好，所以在情绪上也是反对的，这时趁着机会也反对学校当局，几乎是一致的。

5.1929年从中国来的新生，他们从国内残酷阶级斗争、白色恐怖中来，疑难问题很多，又看不惯学校当局那样的养尊处优，官僚习气，又受了不少气，所以几乎是一致反对学校当局。

6.反对派，不分年级是一致反对学校当局的。

这样几百人中，除了当权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及极少数追随者外，数大多数是反对学校的。十天大会的结果，是无结果而结束，意见仍是意见，工作作风仍然照旧，以后还是去休假了。但却起两种后果，学校当局以后利用机会进行报复了，一是借故派人到远东去，如曾鉴泉、严育君夫妇就是这样走的。裴光也是这样走的（裴是从河南去的第

一批学生)。第二是在1930年初进行了逮捕。那时，我才回想起东大学潮结束后，刘仁静说的，如果不是中国党代表团在，东大当局中国班领导人可能会对我们作出意想不到的事，大概就是指这类报复吧！

准备结业论文 1928年下半年，学校当局宣布二年级学生可自行选择题目，准备写结业论文。我当时对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感兴趣，认为列宁在这本著作中对俄国的国民经济、各阶级状况及发展前途都作了具体分析。因此我选的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不是准备写什么书，而只是写一篇结业论文。我积极地搜集一些资料，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语。当时我的主导思想及观点，大致如下：

1. 中国商业资本有较早的发展，战国时就有“商人犒师”的事。以后，汉朝时商业资本也有相当发展，在封建社会及经济中，商业资本有不小的作用及影响。

2. 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包括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生产力落后，所以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都未能推翻及改变封建的统治，而只是改朝换代，变换统治者。

3. 按照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国虽然发展很慢，即使完全没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也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可能不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如日本、德国或俄国那样的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畸形发展方式，地主也转变成成为资产阶级或者合为一体，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合为一体。

4. 帝国主义的侵入，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加速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5.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畸形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

于帝国主义的，而又与帝国主义相对峙的。而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目的，既希望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又反对独立性的发展。

6. 畸形发展的表现，轻工业多，重工业极少，商业多于工业，交通业多而制造业少。马克思论述关于印度社会的破坏及其工业、经济情况，和中国很有共同点。

7. 因此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的特点，并有专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

8. 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急剧恶化，导致农民运动的兴起。

9. 如果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不可能成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

10. 只有完成民主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济才有发展前途，但这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前途。

以后，由于未能结业，这样的论文也未能写出，收集的资料也散失了。

中东路事件 1929年秋，张学良在蒋介石及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用武力占领了当时由苏联管理的中东路，并接管了该路的营业，从此中断了和苏联的交通，扣下了俄国工作人员，并开始了边界冲突，这就成为中东路事件。

事件发生后，张学良调了一些兵，到中苏边界站，特别是满洲里。这时留居在东北及哈尔滨的白军军官，也乘机纠集了原来国内战争被打败的俄国白军，组成军队，到满洲里向苏联挑衅。为此苏联组成了远东红军，并任命了远东军总司令希留赫尔。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希留赫尔的照片后，朱代杰和我及彭泽湘都说有点面熟。后来我们在英国《泰晤

士报》上看到英国记者的报导，说希留赫尔就是原来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并介绍了他的过去，说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还是个不大的军官。革命后，国内战争时，他曾在远东打游击，后组成正式军队，在战胜白党，解放远东战争中立过大功。以后到中国作军事顾问，他很熟悉中国军队情况，又熟悉远东，所以被任命为远东红军总司令。

红军很快对满洲里进行了包抄，进入中国境内，大败张学良军队，俘虏了不少俄国白党组织的军官，其中有国内战争失败后，逃到中国去的苏维埃死敌谢米诺夫(大军官)，以后这些军官被苏联政府枪决，中东路又归还给苏联管理，恢复其管制。

和反对派的关系及其他情况

刘仁静的回国 1929年4月，刘仁静经过几个月的生产实习后，要回国了。回国不是从东方，而是经过学校同意，通过共产国际交通机关，用合法的护照及外汇经过西欧回国。一切手续都是专门机关办的。

在走前，由于我的反对派观点已形成，刘仁静对我说，他想介绍中大的反对派同我认识，以便他走后，有文件时我可以从那里看到，也可以了解一些中大的情况。他说中大的几个反对派政治水平不太高，让我也可以和他們谈一谈，交换点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我说可以。于是有一天，在他的宿舍内，向我介绍了中大三个常到他那里去的反对派，范文惠、李平和安福。我们彼此认识后，刘仁静向他们说，他和你们

认识了，以后有文件给他看，有些问题也可以谈一谈。从此我和中大反对派开始发生了关系。

五月间，刘仁静曾从法国来了一封信，写在归国途中离开苏联、经德国到法国的沿途见闻，很平淡，只是说明他顺利地经过外交公文手续，眼看即要搭船回国了。信中无地址。也不能给他回信，他也不要求回信，而且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与中大反对派的初步联系 刘仁静走后的五月间，中大学生反对派那三个人曾到列宁学院来过两、三次。经过一些谈话，我对这三个人初步有了一些印象，其中安福只来过一次。安福是上海工人，是负责和俄国人联系取得文件的，但近些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文件。范文惠是浙江人，忠实、直爽、热情，能吃苦耐劳，只是性格急，暴躁。李平为人不如范，我感到他不太老实，个人主义。两人的共同缺点是政治水平低。在谈话中没有听他们谈过任何政治问题，我曾向他们提过一些问题，他们都不大感兴趣。这使我有失望。

有一次范文惠谈到他收到从上海来的一封信，是早些时候从中大回国的学生反对派写的，说生活很困难，希望莫斯科的学生能帮助他们一点。我说，这里筹钱不容易，即使筹到一些卢布，也不能换成外汇。中国党员在革命失败前，生活也不容易，现在更加困难了。初回国，如果不和中国党组织接上头，不找个立足点，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只得依靠自己，哪怕先找个小的工作，能够糊口才行。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范、李谈到从东大转过去的学生及不久前到莫斯科的新生，对学校很不满意，有些人和反对派接近，可以发展几

个，因为原来的反对派不多了。我向他们提出，关于吸收人的问题，要以政治观点为主，不要只注意个人的情绪。在有不满情绪的人中，有些是思想不健全的。我向他们谈到，现在没有什么文件，但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观点的学习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讨论上，借以提高水平，澄清问题。

1929年五月，根据黎光剂的意见和介绍，曾和新生中的一个叫米申柯（可能姓周）的谈过一次话，讲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意见。我发现新生中，黎光剂不用说了，即使象米申柯这样的学生，其政治水平和理解能力还是比范文惠、李平高得多。所以如果不是以后暑假及暑假后发生的事，我也可能只持有反对派的政治观点，而不会同他们继续发生更多的联系。

中大学生反对派的改组 1929年六、七、八三个月我不在莫斯科，在中大学生中发生了反对派改组的事。九月开学后，据黎光剂向我谈的情况，改组的原因主要是暑假期间，反对派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有的少数人外，吸收了两部分人，有些是从东大转过去的本班生及少数军事班的，有些是1929年春到达莫斯科的新生。人员多了，水平也不同，其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负责人，范文惠、李平、安福已完全不能胜任和适应新的工作。因此决定进行改组，结果选出了三个人，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一个是黎光剂，从新生中选出，同时，由于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资历都比较高，所以成为负责人。一个是原中大学生万志陵，另一个是从东大转过去的，又是军事班的叫贾从舟。各年级也成立了小组，设组长一人。黎光剂是负责人，又是我过去已很熟悉的，所以他有时到列宁学院来谈问题也很方便，因而我同反

对派就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1929年九、十、十一三个月间，我再未到中大去过，因为杨放之夫妇，曾鉴泉夫妇都离开了中大，我也无人可找了，而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只通过黎光剂谈一下就完了。范文惠也曾到列宁学院来过，是以个人名义及过去的关系谈一谈。他也同意改选，并赞成黎光剂作负责人，他认为黎光剂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和李平强得多。由于我不去中大，还有其他原因，曾和我在1928——1929年上半年比较熟识的女同志费侠，也未再见面了。

中大反对派三人领导小组会 1929年十月间，天还不太冷的时候，在黎光剂的建议下，我参加了一次三人领导小组会，讨论一下今后中大反对派的工作。会议地点在莫斯科的街心花园，在晚饭后的时候，天已开始黑了。会议时间不太长，相互发表一些意见，没决定什么具体措施，准备以后他们自己再决定。参加会的是黎光剂，万志陵和贾从舟三人，后两人我是第一次见面和谈话。他们谈了十天大会以后，开学以来各个年级的情况，特别是现在人员多了，有些问题也多了，需要安排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怎样做，并交换一些意见。我也谈了一些意见，亦即和黎光剂谈过的，大概是：

1. 关于吸收反对派成员问题，要严格，以政治观点为主，不要以为有不满情绪的，或反对派情绪的人，都可以作为吸收对象。这些不满情绪的人，都可以为吸收对象。这些不满情绪的人，既不可靠，也无用处，现在如此，将来亦然。现在已有这样多的人，目前，最好不要再发展别人。

2. 已有的人员，要根据中国现在的革命形势和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地进行研究、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也不要

紧，讨论研究才能提高，不要老谈旧的问题，主要往前看。

3. 今后反对派的问题，应该限于党内斗争，不同的派别斗争。应该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将来也应该如此，对于现在的领导，我们是因为他们政策的错误而反对他们，但对敌人还是要坚决斗争。所以留在党内是应该的，不能分裂为两个党。

4. 在中大内不要进行反对学校的任何大规模的斗争。这种斗争达不到任何目的，他们那一套是改变不了的，上边有人支持，根子也深，中大十天大会无结果，东大以前的学潮也没有结果，只引起了他们的打击报复，来排除他们认为是异己的人。我们的人，已有被派到远东去的。

和其他人的谈话 1929年十一月，在三人小组会后不久，根据黎光剂的建议，曾和基巴索夫谈过一次话。基巴索夫是俄文姓，中文姓名记不得了，是河南信阳人，1927年后半年到莫斯科，入东大，在国内时为中学教员，1928年转入中大，1929年加入反对派，曾作过小组长，1929年秋后，中大学校当局曾怀疑他，找他谈话。他有点动摇，并对有些问题思想上有矛盾。我过去在东大就认识他，所以他想找我谈。我当时认为，反对派是党内的一个派别，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路线及策略上有错误，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不容许公开讨论政治观点，所以才形成了派别。这如同过去共产国际主义运动中屡次发生过的事一样。但是作为反对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我们还是和共产国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联共内反对派由于和联共中央的分歧，本来也是党内斗争。联共开除反对派是不应该的。现在反对派又都回到党内来了。夏天，拉狄克公开发表声明，也都回到党内

来了。中国将来有朝一日也会这样的。将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共同对敌的意见和要求达到一致，仍然可以在一起共同奋斗。所以，即今一时受了组织上的排斥，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只要我们继续革命，总会在共同革命战线上汇到一起的。所以，政治观点不能动摇，革命的愿望不能改革。政治观点的分歧在党内是正常现象。

这种观点，我也和张景曾谈过。我还和张景曾谈到中国党内过去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错误，除政治观点外，就是不听取群众的意见，自以为是，主观地决定问题，发号施令。如果这样下去，将来领导换了，还是要继续犯错误。中大这些人，现在这样的作风，将来也是会产生同样结果的。

以后，从十二月起，中山大学、列宁学院根据联共中央的决议，都开始清党了，此后，我和中大反对派、包括黎光剂在内，再未发生过联系了。

列宁学院开始清党 1929年十二月根据苏共中央决议，莫斯科各区开始清党，列宁学院也开始了。清党委员会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芬兰人）任主任，还有莫斯科区委派人参加。清党过程是先由委员会动员，向全体党员，非党员宣布清党方法，各人都可对任何人揭发问题。揭发问题、不拘形式、内容，公开、秘密都可以，经过清委会调查核实，再找本人谈话，然后由本人在大会上交待，让大家提意见，最后由清党委员会作出结论及处理意见。

在列宁学院内曾揭发出一个俄国党员过去历史不清楚，并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及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还揭发出一个波兰党员是曾参加过侵略苏联的白党小军官。

这时中山大学也开始了清党。在1930年一月间，朱代杰从他的中大女友沈联春那里得到消息说，中大学生基巴索夫自杀了，据说是反对派。朱代杰于1928年和袁傅之结婚，沈联春原来是袁傅之的朋友，因此他们三人常在一起。1929年袁傅之先回国了，但沈和朱代杰仍常来往，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联想到他在两个月前的思想及情绪，我们谈话的经过，估计可能是因为学校当局对他施加压力，他思想矛盾很大，大概感到无法找到出路而自杀了。我的心情很沉重，并向朱代杰讲了这些情况。

又隔了不久，还是从沈联春那里传来，由朱代杰转告我说，在中大学生中有些人被捕了，据说是反对派，有人告发了，但也有不是反对派而被捕的，被捕人中有黎光剂等。我当时认为被人告发了，因为黎光剂是新生，未在大会上露过面。当时我怀疑是李平，因为基巴索夫自杀了，显然是不能经受学校当局的压力，而李平是老反对派，学校当局可能知道他，现在不是负责人，改选后可能有些意见，又有个人主义、政治水平低，在学校施加压力后，可能告发。这只是猜想，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我当时的心情是不好的。

我和朱代杰谈了我的想法，并在这方面也要作准备，但过了几天，并无动静。

大概在二月下旬，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通过学校打电话找我谈话，问我关于和中大学生反对派的关系。我简单承认了和个别人有联系，并在政治问题上有反对派的观点。监察委员会让我写一个材料，我写了个申明，大致叙述了反对派观点形成的经过和同哪些人有过关系，交给了监察委员会。

此后，我在学校内继续学习，与一般的中国同志虽然没

有断绝关系，但联系比较少了，和朱代杰还是一样。当时我承认了错误，一方面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接受反对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政治方面；另一方面承认派别活动也是错误的，这是组织路线方面。虽然在思想上的认识当时并没有通，但由于当时的情况，事已如此，承认错误，交代问题比较好些，关于政治观点将来再说，派别活动不愿再参加了。当时政治观点也不可能想通，因为客观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没有什么说服力能使我的观点改变。

本来在东大风潮后，来到列宁学院时，一方面对东大学潮的处理很不满意，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党代表团的帮助，得以转到列宁学院，又感到很满意。这也是不幸中之万幸了。当时我在《资本论》上写过自己的一些感想，觉得在莫斯科学习的时间有限，而中国革命刚刚遭受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党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自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并同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结合起来。总之一句话，认真地学习，再不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事与愿违，对中国革命的学习、了解和分析，使自己在思想观点上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我认为不能闭门读经典著作，才去接触实际，结果又形成了那样的观点。

当时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自己接受了反对派的观点。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反复。后悔的是不该参加派别活动或与派别发生联系，以致产生了现在这样的麻烦事。我担心最大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回国了。有些人宁愿在莫斯科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当一个在红色首都远离斗争前线几万里的“中国革命家”，这是我最不愿意的，但是，事已至此，不能回国也

无可奈何了。

当然，当时想到了可能被送到某个地方去工作，或被开除党籍，经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回到党内，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形成以后在苏联流落二十多年的悲剧命运。就是在苏联党内，在一个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党内斗争竟能发展成以后那样的局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竟能造成那样的局面，这也是完全无法料到的。事后我深深感受到，伟大列宁的逝世，给世界革命带来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啊！

被捕、监狱生活及释放

(1930年3月—9月)

被捕的第一天 1930年三月二十八日午饭后，从列宁学院教务处转来电话说，中大教务处有关中大学生的事情要找我谈话，让我去一下。那时莫斯科天气还冷，我穿上大衣就去了，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中国同志。到中大后，刚进了传达室，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俄国人，向我说是他找我的，并说，我过去曾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过申明，有些问题还要谈一下，现在让我跟他一起去。我说“可以”。我们两人一起出了校门，一转弯，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他让我先进去，然后他也坐进来。走了约十几分钟，到了一个地方，是一座大楼，但不是共产国际。他领我进去，拿出几张纸，很详细地从我在国内起，一面问，一面写。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不时抬起头来望我几眼。不久进来了一个中国人，我

认得是王仁达，过去我曾听说他是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简称格别乌）的中国工作人员。那个俄国人自称叫B……^①。他说如果我的俄文程度对有些问题弄不清时，可以让王仁达翻译，帮助我。我说“随便”，“暂时可以不用”。到了晚上，他让王仁达去弄来了三个人的饭，让我和他们一块吃。我虽然没有吃晚饭，可实在是吃不下去。接着又继续问，一直问到给共产国际写申明为止。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没有，他说都清楚了。他提出的问题，我都如实地回答了。看来，以前询问被捕的人，大概都把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次找我问，大概是要证实一下罢了。他提出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我的家庭出身，在学校的情况，入党的前后经过，来苏联的经过；

到列宁学院后反对派观点形成的经过，刘仁静对我有哪些影响；

刘仁静回国时，介绍我同范文惠、李平认识的前后情况；

我到列宁格勒和李侠公等三人的谈话情况，朱代杰的观点等；

我和黎光剂前后联系的情况。

这些问题，除了关于家庭情况，在国内的一段和来苏联的情况外，也都是我在申明中所叙述过的。后来在晚十点钟，他把我带到楼下一个房间，留下我一个人，他就走了。我看到房间里挂着一个牌子：“被捕人室”。我原来猜想可能会

^①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述，此人系苏联格别乌的审讯员，名叫别列米尼（Beremeny）——编者

被捕，现在证实了。想来，之所以没有到列宁学院直接逮捕我，而转了中大的一个弯子，大概是因为怕在学院内对外国学生引起不良影响。

在那个房间里，对我作了简单的搜查，拿去了我的皮带，便将我领到一个地下室模样的走廊，一个牢卒打开了一间牢房。他用的是一把七、八寸长的钥匙，看着使人有一种精神压力感。我走进牢房，身后的门“拍达”一声便关上了，从此，我便开始了监狱的生活。

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两张小木板床，天花板上有一盏灯，此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看来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监牢。我脱下大衣，躺在床上，把一双鞋当作枕头。虽然精神已经相当疲倦，可是却根本无法入睡。以后索性睁着眼不睡了，脑子里各种杂乱无章、古今中外的事情都涌出来了，愈想矛盾愈多，而愈是找不到答案。

我想，我丢弃了家庭，为祖国的前途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来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和理论，现在却作了阶下囚，这怎么能解释得通呢？我为祖国斗争的目的未变，没有任何损害祖国的意图，也没有做任何坏事的想法，而只是对革命政策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算是什么罪过呢？即令这些观点和主张是错误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不可以用说理、争论、教育、批评等等方法解决，而却把人抓起来呢？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或者对于一个组织革命的政党来说，是不能盲目地干的，那能不管观点和政策呢？否则又怎样能使其他党外人士和群众在政治上跟着共产党走呢？过去作领导的人，不只一个人错了，不只一次错了，怎么现在还是让不同的政治见解存在呢？过去只有

上边说下边错，下边难道就不能说上边有问题吗？在上面没有说犯了错误以前，谁都不能说一句话，等到错误的后果已经无法掩盖了，却回头来检讨，为什么不可事前先听一下不同的意见呢？……愈想矛盾愈多，想得头都痛了，更是无法入睡，因此这头一天就整整一夜一点都没有睡。张景曾第一次见面时谈到的河南一些同志死难的情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时，它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以往一起战斗的许多同志大都死的死去了，有的也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想到国家成了这个样子，连纪念他们都不可能，我们几个留下的又是这样，又使我伤心起来了。

偶尔还想到家庭，还想到了历史上很多反复的事，想到了出国时的心情，想到了东大学潮中有人说学校当局照中国领导人的建议，准备对付我们的话，后来，在中国党代表团的坚持下我们没有受迫害，如果那时没有代表团的帮助是否当时就会被捕呢？或被变相地流放了呢？或被扣上反党或其他的帽子呢？中国有句俗话说，夜长梦多，而我现在却是长夜难入梦，唯其难入梦，才更觉得夜长。真不知究竟何时天才亮！但天亮了又该怎么样呢？总算是天亮了。这可真是我最难熬的一夜。如果思想上扭不过来，这样继续下去，会把我愁死的。正是：

世态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不成眠。

含怨欲说心中事，孤灯独影无人言。

小牢房的一段生活 天亮了，守卒送进了一块黑面包和一小块糖，让我吃早饭。他看见我什么也没有，又送进了一茶缸开水。我对面包看也不敢看，只把糖放进茶缸的开水里，勉强喝了一点水。我仍然迷迷糊糊地躺下，还是不能入

睡。上午，守卒让我收拾东西，我说“什么也没有”。我走出来坐上了一个闷车，还有两个人跟着。大约走了十几分钟，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停车后，我下来，又经过一次搜查，把我送进了一个四个人住的小牢房。进去时，多了一块面包，是守卒要我一定带着的，说是一天的“口粮”。牢房里已有三个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我进去不几天就走了，没有什么印象。他们见我进去，有点惊讶，不知怎么来了一个这样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问我，我只回答是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事被捕，因为我不愿说出自己的底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坦白，毫不隐瞒，态度也很自在，好象精神上没有什么负担似的。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那就没有什么，共产党员是应该坐牢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坐牢。我说，共产党员不应该坐共产党的牢；无政府主义是错误的。他说，他年轻时坐过沙皇的牢，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又坐共产党的牢，如果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时，他不会坐牢，我也不会坐牢。他还说，巴枯宁和马克思闹过矛盾，也很难说究竟谁对。我说，马克思对，巴枯宁不对。他说，也许马克思现在对，但将来还是巴枯宁对。他每天扫地、刷地板、倒马桶、整理牢房、接收面包、糖和水、分饭等事情，他都干得很好，不以为苦，也不让人轮换。我开始二、三天勉强吃点饭，面包根本吃不下去，也不想要。他劝我说，留下来晾干，过几天就不够吃了。另外两人每天不是愁眉苦脸，就是长卧不起。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给我讲了很多解闷解愁的话，不然我会一个人穷想不通的。他是有经验的，果然三、四天后，我吃东西正常了，以前剩下的面包又干又黑，但每天补充一点，都吃下去了。

这里的房间还干净，四个小木头床，床上有草垫、毛毡、枕头，屋内有个小柜可以放些小东西，如牙具和食物。面包质量也较好一些，每天六百克，糖二十克，早晨有茶叶泡的开水，午间一碗菜汤：土豆、白菜，有时有点鱼或肉，还有一勺稠粥，晚上还是粥。正常情况下，是吃不饱，但也不太饿，做得也干净。所以在饮食方面，据他们说并不太坏。晚上如果精神状态不紧张，还是可以睡得好的。

在监房内相互可以自由谈话，只是不准大声喊叫，或歌唱。睡、坐、躺或踱来踱去都可以自由随便。牢房对角走是七步，每天七步来，七步去，我就是数着无数的步子。那个律师是犹太人，据说因为家里有外汇，不愿拿出来，被拘留起来了，当时的罪名是“私藏外汇”。

据说，这个小牢房隶属于政治管理局的内牢，专门关押询问过程中的人犯，是拘留性质的。大部分都在讯问以后转到大牢，个别人也可能被释放，但是这种获释的机会是相当少有的。情节严重的人犯，则关在内牢，在政治管理局那座大楼里边。那里制度很严，但物质条件较好，这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一些，但制度比较松。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还向我谈了第一国际的情况，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历史。我在那里大约呆了两个星期，他一直是给解闷消愁的人。

有一天晚饭后，守卒让我收拾东西，我问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到哪里去？他说，他不了解我的案情，难以猜测，但根据叫的时间，可能是转到大牢去，因为释放人的时间，一般是在白天，而且我呆的时间才这么几天，也不会那样快就会释放。他的话终于证实了。

莫斯科大牢内的生活 这天晚上，我和其他一些人，坐

上了被叫做“黑乌鸦”的犯人车，走了一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大院。由于是夜里，狱卒也有点蛮横，大概认为这些人都是罪人了。在进入牢房前，东赶西叫，如同对待牲畜一样，我当即产生一种蒙受屈辱的心情，颇为悲愤，但也只是悲愤而已。

直到深夜，才将我送进一个大牢房，那是在一个大楼的第三层。牢房里已躺满了人，满地的人一直躺到门口。我勉强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水泥地上也不好睡。而最使人难堪的是扑鼻而来的气味，人多、闭塞、加上尿水臭气，几乎令人作呕，我坐下也睡不着，闭着眼又胡思乱想起来。满屋子躺着的人，似乎都在酣睡着，我想我以后大概也将在这种气味中酣睡吧！有个别人听着门一响，抬起头看了我一下，倒头又睡了，大概这是司空见惯，每天常有的事。

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先上厕所。以后便是领面包和糖、水，吃早点，情形和小牢差不多，这时我真是茫茫然不知所以。有一个不大象俄国人的，向我打招呼，让我坐到他们三个人中间一块吃东西，并问我是不是中大学生。我说，是学生但不是中大的。他问是否到列宁学院的，我说是。当时我有点惊讶，因为列宁学院是秘密的，不对外的。然后他自我介绍说，我四十多岁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入党已十几年了，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曾在南斯拉夫坐过牢，以后因为没有证据，未被判刑，只呆了一年多就被释放了。后来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在两年前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去年夏天被捕。据他说，他被捕是因为党内派别斗争，有人陷害他。他被捕后，先在内牢关了两个月，宣布他的罪名是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第六款规定的外国间

谍，到现在已经十来个月了，开始还问他，最近七、八个月，关到这个大牢后就不再问他了。他名字叫米哈依洛夫。他随身穿的衣服也都破了，因为在夏天被捕，所以连大衣等也没有，他还不如我。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犹太人是会计师，是外地的，另一个俄国人，是铁路工人。现在又加上我这个中国人，四个人四个民族，都是一无所有，大家笑着称之为“国际公社”。我坐下后，看到面包不少。那个南斯拉夫人说，大家面包可以随便吃，不按份。后来才知道，这个南斯拉夫人是一个坐牢很有经验的人。他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牢内很积极。他用铁丝作的家具可以放面包等食物，尤其是用铁片做成的开罐头的刀，可以为有钱人服务。此外他还为别人缝补衣服，以及做各种服务工作。一些富人常常把不吃的面包、剩余的罐头和糖，都送给他，他都交到“公社”里让大家吃。因此，我在那个内牢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黑面包可以吃饱，而且还有白面包及其他一些较好的食品，总算没有挨饿。这在一个落难人来说也算是一次奇遇吧！

关于住的地方，米哈依洛夫让我在牢房中间公用的大桌子下边睡觉，那里有拼成第二层的两块木板，我把大衣铺上，倒成了一个单人独铺，虽然低矮一点，但与别人无涉，颇为清静。

大牢的其他情况是，这个牢名叫布蒂尔卡，和俄文字的“瓶子”只差一个字母；是沙俄时代修建的，很坚固，规模也很大，据说俄国人都知道，在这个三层楼的大楼中，每层有十来个房间，据说还有别的楼及单身牢。每个单间原来都是单身帆布床，我初进这个牢间时，只有这里还保存着，共

有二十五个床，但地上也睡了人。后来，由于人多才撤去单身帆布床，改为用木板钉成的通铺，使床位从原来的二十五个增加到四十个，再加上地上的“地铺”，可以容纳五十个，成倍地增长了。这里连枕头、草垫及毯子都没有，物质条件比内牢差多了。

每个牢间设有一个班长，管理牢内秩序等，由大家选出，报给守卒头知道。我们的班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鞑靼人，是从南俄克里米亚半岛来的，据说因为搞民族主义，他们提出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口号。他们在这里是一帮子人，听说每个牢房里都有，彼此也知道。这个人沉默寡言，很有知识，不大爱谈什么，但处事公平，有涵养，大家也尊重他。据说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强。

牢里的口粮和内牢一样，每天六百克黑面包，二十克糖（十天发一次），早晨茶水，午饭汤，第二样有时为稠粥，土豆、大豆、用盆装着，十个人一盆。这样的口粮实在是不够吃的，但这里和内牢不同，它允许犯人家属送东西，每星期一次，有些人比较阔气，一次送来的东西，足够吃四、五天。例如，有一个莫斯科监察委员，是苏共党员，据说是犯了大贪污案而被捕的。他说在外边每顿饭至少有一只鸡，而且还有别的。当时听说该委员会有几个女工作人员，几乎都被他玷污过。他家中每次送来的面包足有三公斤，还有一、二只熟鸡、牛油、糖、罐头、香肠等，足够他吃五、六天而不用动牢中的一点口粮。此外牢中每星期可在牢内商店中购买两次东西。犯人不准随身带钱，但家人送的钱和自己的钱可以交到牢中，发给小帐，用小帐在商店中买东西。买法是，每牢房设有采购小组，由三、四个人组成，带着筐子和各

人的小帐，按各人的需要购买。主要是食品，白面包，黄油，糖果，还有烟。所以有钱的人和有家送东西的人在牢里可以吃得又饱又好。

因此，牢里的人可以分为两种，或“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家中有人送东西的，有存钱的算“富人”。什么都没有的，如我们“公社”的四个人算“穷人”。我们牢房的“穷人”只占全牢人数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富有户占多数。“富人”除了自愿地将不吃的东西给予穷人外，还从送来的东西中拿一点“周济”穷人。此外，按惯例，在两次采购中，要按各人每次采购价值的十分之一，抽给“穷人”买白面包，这已成了一条固定的例规，因此，采购小组都是从“穷人”中选出组成。由于“穷人”有这些口粮外的补助，所以还是过得下去的。

犯人每两周洗一次澡，集体去，同时对牢房进行一次清扫。即使如此，虱子还是人人身上都有，只有多少之分而无无虱的人。臭虫也在对人进行攻击，尽管每天捉，但还是消灭不了。犯人们将它们的进攻称之为“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两种。

犯人们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二十分钟，由狱卒带着排队兜圈。这是犯人们每天吸收新鲜空气的时候。在放风时，可以看到其他牢房的人。在我进大牢的第三天晚上，忽然从窗口掷进来一个纸团，原来是另一个牢房中的中大反对派学生写的。他问了我一些外边的情况，也告诉我以前被捕的人的情况。据他说就是在放风时见到我的，这当然是非法的事，但我却因此才知道一些以前被捕的人的情况。我也按纸团所指的厕所位置，回了他一个纸条，但始终不知道他是谁。

牢房里有一些书籍，其中有文学、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有的还颇值得一看。每个星期到图书馆去换一次书。在这个牢里，谈话、说笑、睡觉、走步都可以随便，其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犯人用面包捏制的很精致的国际象棋，共有两、三付，可以轮流着玩。牢里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棋艺水平还不错。我于是聚精会神地和他们下棋。我原来在外面多少已有一点国际象棋的基础知识，现在倒可以认真加以提高了。在牢房中下棋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游艺，它可以很快地消磨时光，因为两餐饭之间，只要认真下它二、三盘棋就过去了；还可以抑制你考虑问题，让你把全部精力用到下棋上。

晚上有时还举行报告会、文艺朗诵和讲故事等。因此，这里在生活及消磨时光上，条件算是好得多了。这对被监禁人的精神是很有好处的。

在大牢里也可以得到外边的消息，方法有以下几种：(1)新进来的犯人，他们一般都将外边最一般的情况向大家介绍。(2)从外边送东西进来时的包纸，一般是报纸，大家可以传观、宣读。(3)每天晚上，人们用打电报的方式和隔壁牢房交换消息。因为外文打电报不用电码翻译，可以直接使用字母，而每个牢房中总可以找到懂得打电报方法的人。最普遍的办法是用铁棒在暖气管上敲打，彼此就可以通消息了。这些当然都是非法的，但也是公开的秘密。例如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消息，我们这样传很快就知道了。起先从暖气管中得知，后来又从新进来的一个文艺界人士了解到比较详细的情况。

宣布审查结束 大概在六月间，一天上午叫我准备提

审。后来上了囚车，在车上遇到了黎光剂。我们彼此只打了个招呼，因为相互间不准讲话。后来到了政治管理局，我们两人都被放进我第一天被捕时住的小屋里。以后马上叫我，仍然是逮捕我的那个B某，没有第三者在场。他说，过去问我的问题及我的答词，他已整理成记录，让我看一看是不是那样。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个别地方经他同意后作了一些更正。最后我看到一行写着审讯人，下边是他的签名：B……。再一行是被审讯人，我签了字。以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补充问题或要求。我问他将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到法庭上去？他说，这是审讯结束的记录，说明问题就只是这些了，已经清楚了。至于将来怎么办，将报有关机关审查处理。要我回去再等一些时候，不要着急。这大概就算是宣布审讯结束的手续吧？

我回到那间小牢后，接着又叫黎光剂，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他回来了，和他的谈话也是宣布审讯结束的手续。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情况，也谈了一些听到的国内情况和学校情况。最后彼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派别活动可不要再搞了，反对派内成份不纯，而自己呢，要坚定意志，我们还年轻，留着身子，准备回国继续革命，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要争这口气。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黎光剂还说，在他去年到莫斯科时，曾在这里和政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作过有关中国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而今天却作为囚犯来到这里，真应了“昔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的说法。

我们坐上囚车，又回到了大牢。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夫和其他人。他说，我的问题可能和其他

中国人的问题一起解决，时间不会长了。他又自叹说，他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消息和动静，真有点着急，我劝他还是安心等待，可能派别纠纷不是那么容易理出头绪来的。

转到另一间牢房 七月间，有一天上午让我收拾东西，这时我多了一套衬衣。因为在六月间，学校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和十五个卢布。衬衣是更换用的，好几个月了，没有衬衣换，实在是不行。我用十五个卢布买了一点东西，除了吃的，还在监狱商店买了牙刷、牙粉、肥皂、洗脸手巾等。这使我好几个月来的半野人式的生活获得了改善。

牢卒叫我时，大家都在揣测是不是释放？住在监牢的人普遍心理都是希望有人被释放，其实这种情况很少，何况别人被释放并不等于自己获释，但总觉得气氛已转向好的方面。对于我，有人说可能释放，有人说可能是转牢，各有各的理由。我当时也摸不清楚。事实很快就清楚了。我转到同一层的另一间牢房里去。第二天我原来牢房的人看到“放风”时就都知道我没走。

转牢的原因，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中大学生的的问题已经完结等待处理了，所以才将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根据大家交换看法认为，可能是分到三个牢间里去，按一个牢间十二、三人计算，共有三十多人，这就是当时前后被捕的大概人数。在我们牢间里的人是：

1 文愕，广西人，原来就在这个牢房，在1927年就成为反对派，属于老一批的。1928年由于是反对派被学校当局派到南俄一个城市的工厂去参加生产。经过一段时间，他不愿继续在那里工作，向学校写报告，没有人理。因此，他决定不愿留在苏联，准备了一点干粮，想越过苏联的边界往外跑。

他沿南方山区边界，跑了好几天，后来迷失了方向，有一天晚上投宿到一个几户人家的住处，却原来是一个苏联边防哨所，于是被捕了，被送进莫斯科大牢中，已经将近一年了，他的衣服都破了，身体消瘦，但精神还不错。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意志比较坚强，也有政治水平，比范文惠，李平、安福等都要强些。他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人没有牵连。

2. 潘树人，四川人，1927年下半年入东大，1928年转中大，系反对派。他的脚后跟肿得厉害，进医院一看，竟从里面取出一个子弹头。据他回忆，1925年在黄埔军校时，曾参军东征打陈炯明，有一次中弹跌倒，后来继续作战，好几年没觉得怎么样，只是偶尔感到脚后跟有点痛，没想到竟是一个子弹头在那里呆了五年。医院把弹头留给他作纪念。

3. 刘慰民，河南信阳人。1927年入东大，1928年转中大，系反对派，店员。

4. 江××（大头），湖北人，1927年入东大军事班，1928年转中大，是反对派，店员。

5. 张旭升，河南信阳人，情况同上，学生。

6. 邱白成，湖北人，中大学生，系反对派，其父为国民党军官，本人学生。

7. 黄居，江苏人，1925年到中大，后作翻译，据他说是反对派，本人学生。

8. 张从德，浙江人。1925年到中大，系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小头目，既反对反对派，又反对中大学校当局。在十天大会时他反对学校当局，是相当积极的。他的被捕完全是学校当局从派性出发进行报复的结果。

9.金××，浙江人，个人关系和张从德很接近，他的被捕可能是由于误会。他和我的俄文姓相同，也叫毕托贺夫。或因派性关系，也可能是有“江浙同乡会”的嫌疑而被捕，好象为人昏昏沉沉，什么都不知道。

10.王××，俄名叫坦诺夫，浙江人，因积极反对学校当局而被捕，情况略同张从德。

11.李一凡，北方人，1925年到莫斯科，入东大，原北京大学学生，为人性格倔强，十天大会时反对学校当局很积极，曾在大会上发言直接指责学校负责人。其被捕原因就是这件事，但名义上说他是国民党的残余。

12.沈良，上海人，1929年新生，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赤卫队，专门对付叛徒、敌人和特务，曾积极反对过学校。被捕实际也是因为这件事，但名义上说他在国内有反党行动。

再加上我，共十三个人，其中除文铿系反对派，但与此次逮捕无关外，十二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反对派，五个人不是反对派，而仅仅是反对学校当局的，看来是学校当局借此机会报上级予以逮捕的。

这个监房内的情况和其他牢房大致差不多，只是这里的人水平低，“穷人”多，“富人”少，吃的东西，主要是靠牢内口粮，又加上转过来的中国学生又都是“穷人”，所以，几天以后，便感觉吃不饱或很不饱了。原来在各个牢间的中国人，本来就长期吃不饱，不象我有幸关到吃得饱的牢房。听说，他们是从一月间被捕的，到了五月间，已经饿得上楼下楼时头晕倒地了。这些情况，由监牢反映到学校，学校才在六月份给每人送来十五个卢布的。由于饿的原因，什么东西

都感到好吃了，而且抢着吃，原来不吃的东西，现在也感觉到特别好吃，只是嫌少了。这个时候我深深感到，人不爱吃什么，完全是由于有别的東西吃，真正饿到没有别的東西吃时，就什么都会吃了，而且都觉得好吃，就连长白毛的面包，干得咬不动，那也是好的，这也算是一点实践体会吧！

由于人的肚子饿，思想水平低，特别是牢房里有几个俄国小偷、流氓，又有人挑动，为了争一点小东西，曾发生过一次几个流氓和中国人打架的事。是几个俄国人动手打中国人，但中国人沈良仅仅一个人，身材虽小，却非常顽强凶猛，能战几个比他身强力大的人，使全体俄国人都为之惊叹佩服。从这次打架中，使我们联想到沈良在作赤卫队时的情况。这样的人反对学校当局，是会使人害怕的，所以这次被捕了。

文锸也积极参加回击这次反对中国人的挑战。事后，一个鞑靼人班长，大为惊讶，他说，他和文锸相处快一年了，看到他文质彬彬，很讲道理，没有想到他起而“参战”。这里的班长也是鞑靼人，和我原来牢房的班长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案件。他对中国人还好，和文锸很好，以后和我也好，常说，几百年前是一家。这可能也是他们和中国人在民族关系上是接近的原因。

在八月间，因为我们的问题这样长的时间没有解决，有一个房间所有的十几个中国人，全体进行集体绝食。绝食继续了十来天，有几个身体弱的人被送进医院。据说绝食最难过的是头三、四天，以后只是身体继续弱下去，躺着起不来，但吃东西的想法反而淡薄下去了。后来，政治管理局来人，很快即将解决，让大家停止绝食，后来大家同意了。于

是来了一个医生，看管着大家吃东西，先给些少量容易消化的，每天多吃两次，经过几天，再按正常情况饮食，但人的健康不是短时间能够恢复的。

来到这个牢房后，正好是热天，虱子、臭虫在晚上，简直猖狂得很。可怜的犯人每天都吃不饱，勉强强还不知能产生几滴血，却还要被这些寄生虫吸去。

释放以属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牢房中有四个人被通知收拾东西，其中有我，潘树人，张旭升和刘慰民，都是反对派。当时牢中有人推测说是释放。而其他几个中国人表情不大一样，但都有点舍不得的样子。如果是释放，为什么其他的人不通知，是不是不能释放呢？人们已经习惯于向坏的方面设想，虽然脑子里也有各种幻想。很快我们四个人被领到监牢楼外的一个办公室。过了一会，看到其他牢房出来的人，相互一看，原来都是反对派。从对我们的待遇来看，似乎是要释放的样子。因为我们进了这个屋子，就没有人管；我们彼此说话，也没人看。最后集中在一起，共十三个人。这时一个军方模样的人，自称是政治管理局的代表，向我们宣布，现在将要释放我们，但由于我们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已被开除党籍和学籍，将被送到外地城市参加生产，进行劳动锻炼，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改正错误。黎光剂，贾从舟两个人发还了学生证，可以回学校去。其他十一个人，于次日上车，要在八点钟先到政治管理局某号窗口领取文件。这样，我们各自拿着仅有的一点东西，离开了布蒂尔卡大牢，找着路回中大去了。我不是中大学生，到街上吃了一点东西，因为没有学生证，也不好意思进学校去。只好在莫斯科街心花园里坐着吸收点新鲜空气，过了几个钟头，

当时的心情有如丧家之犬，不知道怎样办才好。虽然经过五个月终于获释也值得高兴，可是现在愁的是无处栖身，将来还不知怎样呢？后来想到眼下要先解决过夜的问题，于是到火车站去，在那里还可以找个凳子，不致于在露天受冻。到车站后不久，又遇到两个“难友”，三个人就聚在一起，总算是有个伴了。他两人是中大学生，学校不让他们进门，蹓跶了一会，也不约而同地到车站里来了。天还未黑，有个俄国人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好象是知道我们的情况似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除这里以外，没有别处可去了。他即刻写了个条子，让我们都回中大去，说在车站上不象样子，他将打电话告诉他们，并在车站上等其他人，让我们见到其他人也告诉一下。我们也不问他是谁，就回到了中大。中大管理员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了一大间房子，找了些草垫。那时天已经黑了，他又领我们到中大食堂，用盆盛了一大盆晚饭给我们吃。以后别的人也陆续来了。我们大家狼吃了一顿，吃到不能再吃了为止，但是心里还是想吃。挨饿的滋味，我们算是有了体会了。我们吃饱了，躺在草垫上，真是觉得比过去躺在宿舍的床上还不知道舒服多少倍哩！这时，有一些胆子较大的中大学生，也来看我们。虽然我都不认得，他们也和我们谈一些情况，探问一些人的情况。

第一次受处分：流放 第二天，又在中大吃了一顿早饭。我们十一个人到政治管理局某窗口去。在那里每个人领到了一个行政流放证明，及十五个卢布。管理人员把证明读给我们听，里面说由于我们有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送到某某城市作行政流放 (аэцнцст рамцънат ъюснжа)，时间三年。此外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十五个卢

布是到当地初期的生活补助费。以后的生活费用，有待找到工作后，自给自足。各人回去可以收拾自己的行李，晚上搭车走。当时除黎光剂、贾从舟外，剩下十一个人，六个到伊万诺夫，有我，张旭升，刘慰民，胡冲谷、万志陵及程（小孩子）××。五个到下新城，即以后改名高尔基的地方，有潘树人、张光华、纪达才、杨春及傅学礼（福建人）。其他的人，根据昨天宣布的口气，可能要送到劳改营去劳改，比我们的处分较重一些。其中有一些是反对派，但我们的揣测有一些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当时听到三年，颇有点吃惊，觉得三年那么长，等于来到莫斯科的全部时间，而三年又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呀！我们又将在什么地方呢？能否返回莫斯科呢？想到文镗他们去参加生产后，不是没人管了么？……但无论如何，还是得准备行李，带着身份证，按政治管理局的命令，走向新的地方去报到。

离开莫斯科到伊万诺夫去 我到列宁学院去，向门房说明，进到里面，找了房屋管理员，去收拾自己的行李。在仓库里找了放在里面的被子和零星东西，以及一些凌乱的书籍，还有箱子。便简单地收拾一下，顺便和管理员谈了几句话。收拾以后，临离校前，我又到楼上宿舍去蹓跶一下。

在楼上看到的人很少，后来遇见了董必武。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说明就要到外地一个城市去参加生产，进行劳动锻炼，以改正错误，时间是三年。我问到其他中国同志，他说，其他的人都走了，回国了，朱代杰也回国了。阮仲一、彭泽湘也回国了。他说，在我被捕之后，阮仲一曾很不安，怀疑我是否自杀了，因为当时不知道我被捕，因为不见人

了。董必武说，我们都没有这样想，你的思想比较开朗，有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算了。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血气方刚，有些浮躁。董老当时劝勉我，到了工厂，好好工作，加强劳动锻炼，到那里后，来个信讲讲情况。

以后，我在莫斯科过去去过的花园作了最后游逛，向无知觉的旁观世界进行了恋恋不舍的告别。又到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感觉到莫斯科的食品供应可能比较紧张，外地可能会更困难一些，这给了我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到车站集合，很快就上了车，车上的人不多，原来发的只是坐票，现在空位多还可以躺下。我赶紧把被子铺上，睡下去了，便和莫斯科告别了。

虽然躺下去了，却一点也不能入睡，又象被捕的夜晚那样，头脑中不断浮现着一幕幕杂乱无章的印象。想到了在国内参加革命时那样的热情，不惜背井离乡，弃妻出国，而现在竟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明天到了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连个立足的地方还不知有没有，真是茫茫不知所措。也想到东大学潮后，曾想一心学习书本，但由于自己不安于不问是非盲目听从，怀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因而惹出这许多麻烦。如今一走，还不知党组织——自己的母亲，要不要我，理不理我。又想起中国革命的情况，很多同志死了，牺牲了，便默默为他们哀悼。当时又想到，如果随大流谁也不反对，可能没有什么麻烦，但将来工作遇到具体问题又怎能解决呢？一个革命运动，难道用这样的态度能够进行下去吗？又想到，将来能否回国呢？回国后，能否再回到党内，象从前那样工作呢？还是会有各种情绪及不顺心的事在等着我，从明天起，我就得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了，吃饭、工作，住

处，都将成为问题。就这样，我在情绪不安、精神不振的情况下，不断地胡思乱想。晚上的火车在黑暗的大地上继续向前奔跑。因而试填了一首菩萨蛮《感事》：

初生牛犊不怕虎，指点江山竟愚鲁。

曾看雨和霜，梦想入草堂。

是今不非古，逐流随风舞。

何时归田家，处处看飞花。

火车行驶时有节奏的振动声音如同催眠曲一样，不知不觉使我入睡了。醒来，已是天亮，将要到达伊万诺夫了。在莫斯科三年多的时间里，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的三年，就这样结束了，和它告别了。这是1930年九月中旬。

伊万诺夫阶段

(1930年9月—1937年5月)

到达伊万诺夫 1930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六个人到达伊万诺夫，人地两生。我们商定，由我、胡冲谷、张旭生三个人到政治管理处报到，万志陵、刘慰民、程小孩子在车站看行李等候。我们找到政治管理处，拿出我们在莫斯科领到的证明，并说还有三个人在车站。值班人看见我们三个人有点奇怪，问我们为什么作反苏维埃宣传，我们说没有。他将那些证明收起来，登记了名字，发给我们一个伊万诺夫政治管理处的证明，并向我们说：“凭这个证明，可以在本城内任何单位找工作，任何地方居住，找到工作及居住地方，告诉我们。你们是流放人员，不经政治管理处的许可，不能到其它城市去，每个月一次，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本处签到一次，证明本人在这里。就是这些，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你们也没有别的义务”。我们提出，是中国人，原是中共党员，在莫斯科学习过，因犯了错误，才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怎样找工作，哪里找，哪里住，一无所知。希望他们帮助一下。他们说，他们不管，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但是，他们说，离这里不远，有个苏共区党部，让我们到那里去试问一下，或者可以帮助我们。

到区党部去 我们到了区党部，正好见到了书记。他开始有点惊讶，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中国人？我们将过去的情

况，和到这里来的原因及希望讲了，这个人还好，静听了以后，思考了一下，出去找了个青年人，让他领我们去吃点东西，然后领我们到农民招待所去安排住宿的地方，并告诉我们先休息一下，隔一天，再到区党部来，他将替我们联系工作的问题。他还问了我能干什么，我们说，是学生，什么都不会，希望到工厂去，先当学徒，学个专业，将来回国可以到工人群众中去。区党部那个青年人，领我们到小饭馆去，说我们是实习生“代表团”，以区委的名义安排了简单的饭食。他领我们到农民招待所，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回到车站，和其他三个人带着行李，都到农民招待所住下。这个招待所虽然简陋一些，但对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隔了两天，我们六个人都到区党部去。幸运得很，不仅区党部书记在，而且金工厂厂长也正好在那里。书记便将我们介绍给那个厂长，问他能否收我们当学徒。他说，可以，工厂正扩建，需要人。他以后写了个条子，让我们到厂里找劳动部，并说，他叫加洛夫。我们诚恳地感谢了区委书记。

入第四金工厂 到厂后，找劳动部，很快就办了手续。我们当中的刘慰民在莫斯科工厂里实习过几天，知道几个工种，我们就当了车工学徒，工资每月40个卢布。那个部长说，其它问题可以找党委去。

党委当时没有书记，由党委宣传部长代书记。这位代书记名叫考里高，是乌克兰人，年纪很轻，三十多岁，他听到我们所讲的情况后，很热情。首先，要找到地方住，因为农民招待所在城的另一角，很远，上班不方便；第二，既然当了

工厂的工人，也不能长期住在那里。因此他找了两个工人共产党员，自己有房子的，让我们分成二处，每家三个人，住在他们家里，作为临时的解决办法。我们从农民招待所搬了出来，又办了粮食供应票证，随即开始上班，从此成了金工厂工人。这是九月二十号左右，对于我们这些过着流浪生活的人，开始走这一步总算还是比较妥当的，避免了许多曲折和麻烦。

伊万诺夫城 伊万诺夫是一个州的首府，离莫斯科约二百多公里。在沙俄时，已是一个纺织工业中心，有俄国的曼彻斯特（英国纺织工业中心manchester）之称。十月革命前后期间，它曾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地区。恢复经济开始以后，这里扩建了原有的工业，并建设了几个更新的大型纺织工业企业。当时已有十几个大工厂，工人少则几千人，大的多达上万人。原有的机械修配厂，扩建成机器制造厂。城市扩建也有很大发展，电车路、戏院、电影院、马戏院、旅馆、工人住宅、动力学院也在扩建，还建立了化工学院，纺织工学院，修建了新的泥煤机器制造厂。此外，州首府的党、政、军各机关应有尽有。

我们的工厂 工厂全名是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厂第四厂，简称第四金工厂。是革命后在原有修配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已有职工三、四千人。主要车间有铸铁，模型，旧金工，工具，装备，锻造，各处室及其他辅助部门。新金工车间都是新设备。除了少数小型车床是旧的以外，还有少数新的苏联自制的车床，其他大多数的车、刨、切齿、钻、立车、磨床都是进口的。我们都到新金工车间当学徒。工厂生产的产品是为纺织业服务的，有离心机、染机、刷毛机、纺织机等。

里边有一部分老工人，是革命前就在那里的，大部分是新工人，从附近农村来的，工人住宅区多为老工人参加住房合作社由国家资助建成的单家住房，颇为不错。

第一个冬天 我们进厂一个月，北方的冬天即将来临了。那时供应也紧张，连每天的八百克黑面包也需要在下班后排长队才能买到。工厂的食堂每天可吃一次午饭，只有点酸菜汤和几勺稠粥，比牢房里的饭食好不了多少。我们住在工人家里，没有床，只好睡在一间小屋的地板上。我们三个人，我、刘慰民、胡冲谷，只有我有一条被子，铺在地板上共用，各人就是盖自己的破大衣。早、晚饭是黑面包，勉强可以买一点酸黄瓜，就是这样，也只有切成片的，一个人吃几片。有时房主人给我们开水，再加几个土豆就是过个小节气了。有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喝凉水或吃雪。工人的供应，主要是面包，每个月有点白面包，两斤糖，三斤粮。徒工工资四十卢布，还得给房主人五个卢布。每星期日到城市饭馆中可吃一次比工厂内略好一点的午饭，可是一顿得花二十个戈比，且吃不到一点肉。十月革命节时，每个人有一斤牛肉，我们买了，托我们的一位师傅，将六斤牛肉加上点土豆白菜煮了一大锅，到夜里十点钟才吃了一顿饱饭。但不幸回家时，因天太黑，雨雪交加，又迷了路，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处，已经把吃的肉消耗一大半了。那时，我们的房东，对我们已经不好了，因为五个卢布太少，又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他们故意对我们不好，施加压力，让我们向党委要房子，想赶我们出去。真是，吃不饱，衣不暖，睡不好，心情也不舒畅，还得常看老板和老板娘的面孔。所以，工作虽然解决了，生活问题还是不少，但我还都是在好好地工作。

解决了住房大问题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正在为住房发愁的时候，事有凑巧，原来接待我们很热情的代书记考里高调到外边工作后，新书记对待我们非常冷淡，使我们十分失望。有一次在街上偶然又遇到了考里高，才知道他调任工人宿舍管理处的党支部书记。他对我们仍然十分热情。提出我们如能到区委会开个介绍信，他就可以在管理处提出从正在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中给我们一套家属宿舍。后来经过我们和他的共同努力，开到了介绍信，于二月间我们领得了“大船”式楼房中第四层的一套家属宿舍，两间房，一个厕所，两家共有的一个大厨房。我们搬入后，补办了一个会员手续。这是考里高第二次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以后他又帮助我们搞到了六个小单身木床及草垫，我们以后又积了几个钱，买了桌椅等家具，才算有了个象样的住所。考里高离开我厂，对我们是不便，但又转化为好事。搬入新房后，我们自己成了主人。以后我们又加入了工人大楼下的公共食堂，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一日三餐吃到热饭、熟饭，星期日、节日还可自己做些我们会做的饭食，生活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以后工资多了，供应也改善了，才算完全解决了生活问题。

由学徒工转为二级车工 1931年3月，我们当满了六个月的学徒期。在这个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车床的老师傅跟前，直接跟着他一个人学。我是守在一个专管机修配件的车床上，师傅技术较全面，加工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由于不计件，老师傅在工作时可以多给一些机会让我自己操作，因此学习实践机会较多。经过鉴定，我们获得了转二级车工的结论，并分别转入两台较小的车床，三个人为一

组，倒三班正式操作，按件计算工资。同时转二级工的还有几个俄国青年。为了帮助我们，车间还指定了教导员。但是，当学徒时，有老师指导，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到了自己单独干时，有的小问题或根本不成问题的，也都成了问题。头一个月，汗流浹背地干，结果一算帐，还不到三十个卢布，少于学徒的工资，不及二级工工资定额六十二卢布的一半。车间主任让给我们补到四十个卢布。这样一直工作了三个月，才超过四十个卢布，再过三个月，才达到六十二卢布或稍多一些。这时我们才知道，要成为一个熟练的五金工人，再努力干，也得二年时间。

这一年（1930年9月至1931年9月）的几件事

1. 1931年春，中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即1927年以前到达的部分学生，曾到伊万诺夫参观，我们遇见了他们，有的对我们态度还好。从谈话中知道，到高尔基去的几个人，在正在修建的汽车厂工作。中大已合并到列宁学院，校长由列宁学院院长兼任，原中大领导人回国去了。中大未再来新生，可能以后不再办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恢复党籍，回祖国去。

2. 我们还看到列宁学院的学生到伊万诺夫的联欢代表团，因为伊万诺夫工人代表团曾去过列宁学院联欢。在这些学生中有我认得的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曾到我们的宿舍去看了。据说，1930年未再来新生，可能不再来了。

3. 列宁学院的一位管理员，在代表团回去后，曾到伊万诺夫来，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半新不旧的线毯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他们没有忘记我们，也算是个鼓舞呀！

4. 自从我在伊万诺夫工作安定下来以后，我开始阅读一

些列宁的著作。到了住所后，生活条件改善了，我决定试译列宁伟大著作《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当时我想：（1）这部书较厚，按当时情况不会有人译；（2）不是通俗读物，一般人不会看，所以译者不会干；（3）里边谈到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很多新的自然科学，译一下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译了几章以后，便寄给列宁学院校长基尔山诺娃，征求她的意见，是否可以继续译下去。后来她回了封信，说收到了，但尚未能和有关部门商量。以后，我得了眼病，接着其他社会工作也多了，没能继续译下去。

5.1931年春我因工作不慎，在磨车刀时，眼内崩进去了异物，当时我没感觉到，因而后来得了眼疾。以后才在医院中动了手术，取出了异物，医生让我戴眼镜，说因为近视眼工作不方便才造成了事故。我让医生检查，谁知近视程度已达五百度。我只得写信给董老，请他给我配一副眼镜，因为听说他还在莫斯科。信中还简要提到我的情况及翻译书的事。后来得到了董老的热情回信。他勉励我好好工作，继续学习，以便能早日回党。他给我配了一副眼镜，还给我寄了一套绒衬衣裤，并说伊万诺夫“天寒地冻，蔽体无衣”。我又回了董老一封热情的感谢信。这副眼镜一直戴到回国，共二十五年。虽然经历了多次落地、险遇，但至今尚还完好。

6.开始政治学习。党委给我们找了一个老布尔塞维克李哈巧夫作为我们的政治指导员，领导我们的政治学习，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进行政治考察的。每个星期日或每隔一个星期日在宿舍里进行一次。他还向我们讲些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及现在苏联居民的情绪。以后又换了一个本城党校的一个教员，政治理论水平高一些，但不那么热情，而是有点任务

观点。

7.开始参加社会工作。从1931年春起，我们负责车间的墙报工作，包括自己写稿、约稿、画招贴画，从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专刊开始，每月出一次，兼介绍一些车间的生产、政治学习情况，好人好事等。此外，我和万志陵还向铅印的厂报《化铁炉》（«вагранка»），经常投稿，并和编辑邱尔古诺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吸收我们两人为工人通讯员。经过三、四个月，他又将我和万志陵介绍为州报的工人通讯员，并有时作为采访员到商店、合作社、公共食堂等单位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8.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苏联的反应。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在苏联报纸及杂志上经常报道，而且在伊万诺夫还专门组织过图片展览和报告会。我们也去参加了报告会，有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历史方面的一些参考资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解释。

9.孟丙昌到伊万诺夫作报告。1931年秋初，我忽然得到通知说莫斯科来了一个中国人，是从中国苏维埃区域来的，准备向群众作报告，但俄文讲得很不好，让我去见一面能否替他作翻译。我去了一见面，原来是孟丙昌。我替他作了翻译，并解答群众的问题，效果还不错。孟丙昌的受伤，是1925年在河南得的，到莫斯科后伤口恶化了，1928年进医院再次彻底动手术，后来养病，一直时好时坏。1930年后他仍然留在莫斯科，1931年，正值苏联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作宣传时，他曾到过几个地方。到伊万诺夫来时，他曾知道我及其他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才提出找中国人翻译。我们这次见面以后，他就走了，他在走前说，他可能回国去，希望我也能早

日回党、回国，共同工作。

又来了一批大学生 1931年九月中旬，恰在我们到达伊万诺夫一年的时候，各方面刚刚就绪，又来了几个原中大学生。他们也是经过内务部门用流放的形式送来的。被流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从得知。但据他们自己说，是1930年，还在我们未出狱前，就被派到各厂去参加生产实习，快一年了，还无人过问。他们不安心在那里，回国又无期，便提出要求回国，有时不上班。学校认为他们闹事，就把他们发放到这里来。听说又有十几个人被送到了高尔基去。被送到伊万诺夫来的计有：

1.梁实秋，山东人，是1929年入学的新生，后参加反对派，在莫斯科实习时学车工。

2.白××，江苏人，是1929年入学的新生，后参加反对派，在莫斯科实习时学车工。

3.熊云功，南方人，早期到中大的学生，不是反对派，而且连共产党也不像。

4.胡××，南方人，情况同上。

5.林丙全，上海人，原中大学生，在莫斯科实习时学钳工。

6.梁孝孺，浙江人，原中大学生，为人一般。

这些人完全是彼此不相干，毫无关系的，如果只是由于不安心工作或向学校提出什么要求，如回国之类的事，也不至于被内务部门流放，并开除了党籍、学籍，否则就不可理解了。这八个人，后两人只有当力工。梁、白当了车工，林丙全当了工具钳工。其中，梁实秋和我们的关系较好。他的中文、俄文都较好，活动能力也强。

以后不久，又有一个比较阔气的中国人，据说是留德学生，姓金，南方人，自称在德国时很赞赏苏联及共产党，所以回国时申请经过苏联到莫斯科，并想了解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因为签证手续不全，被留了下来，送他到伊万诺夫参加生产。他到后，先当学徒，在立车上，很积极，还学俄文。

这些人没有领到房子的机会，但由于直接工作，工资多一些，所以都是单身在工人村租个小房间，自住自给。这样，在伊万诺夫，到1931年秋末，已有中国人十五名了。

以后由党委宣传部主持，正式组成了政治学习班，选出班长，定期地列出学习内容，进行学习，同时也在这个班上，讨论研究社会工作情况。

全面开展各项社会工作 经过和党委宣传部长捷特科夫的商议，在全厂开展了国际红色救援会的组织工作，上边也和州红色救援会负责人陶尔克巧夫相联系，获得了批准。我们先从新金工、工具车间开始，征求会员，成立了分会，以后又发展到其他车间，前后在1932年初全厂都有了组织之后，召开了全厂性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在以后还在各车间墙报上介绍了巴黎公社及红色救援会在世界各地的情况及对革命的作用。在那里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样，红色救援会的工作，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中范围较广的部分。

推销国家公债。在1932年5月，我们积极地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公债推销工作。除了自己按标准认购以外，我们曾以外国工人名义在州报上发表文章，在市广播电台发表讲话，

进行号召，并参加了厂内，及厂外居民中的推销工作。有一次我们在居民区内帮助一个老太婆作了一件好事，解决了她的困难，她马上用现金认购了公债。

参加轻骑队工作。当时为了改善各机关、部门的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实行群众监督，首先由市委及报社组织轻骑队，参加人员有党员、团员、工人通讯员、工会基层组织人员，带着证明，对各部门实行突击访问，可以就工作、财务、售货、分配、计划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并作记录，写明特别好的及特别不好的，并整理成材料登在报纸上或报有关部门进行表扬或批评。这项工作我们也参加过好几次，从而也了解一些情况。

外国工人友谊团访问集体农庄。1932年夏，由州报编辑部组织了外国工人友谊团，有三、四个德国工人及我参加，到了本州第二大城市附近的几个集体农庄进行了参观访问。那时正是农庄集体化高潮后进行组织、生产、政治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各集体农庄都建立了政治部，由各级党组织派去了较为能干的政治部长，并授予了很大的权力，公安部门作为他们的直接助手，雷厉风行。我们访问好几个农庄，约有两个礼拜，同时也了解到农庄生活，包括学校、公共事业及商店等的情况。

积极参加农场劳动。八、九月间厂里动员职工去参加农场的秋收劳动，我们过去没有干过，但还是积极报名参加。到农场后，主要任务是挖土豆，由于不习惯，任务重，在两天的紧张劳动后，累得浑身酸痛，睡觉躺下去身上那儿都不愿意接触地板。许多人不干了，党委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坚持到底，我们几个人除了两个有病，身体不能支持而回去以外

，其他人都和党员一样，咬着牙坚持继续干下去。以后累到了这种程度，劳动以后，躺到地板上就一动不动，像个死人一样，连外边吵翻天也不知道。终于一直干了二十天左右，直到最后完成任务。能这样坚持到底的，实际上只剩下少数人了。

成为生产突击队员 我们从徒工转为二级工后，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能够独立操作了。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31年底，我们又转为三级工，转到中等车床上操作。在1932年夏，我们已成了骨干工人，并被评为生产突击队员。此后，每人领到了一个突击队员证。在当时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凭这个证，可以在工厂商店中多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生产地位及供应上两方面都有好转。

以后，车间又实行技术鉴定及提高技术水平的运动。我们一方面由于工作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已有中等学校以上的文化水平，所以在理论及操作方面进步都很快，于是便在1933年升为四级工，到1934年末就升到五级车工了。到五级以后，就是高级车工了，在工资上有保证了。这几次晋级只费了四年多一点时间，一般说来还是很快的。当然这和当时建设的速度也是有关系的。

生活供应的改善 从1930年秋我们到达时，到1932年夏，生活供应一直是困难的，虽然我们解决了住房以后，已大有改进，但过日子还是不易的，因为粮食供应，特别是肉、蛋等副食品很少。后来经过老布尔塞维克、州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的介绍，以及州职工会主席的帮助，把我们几个中国人，作为外国工人，介绍到专管内部供应的第四商店去买副食品。据说，第四商店是内部供应商店的最低一等，但已比普通商店好得多了。在那里可以多买到一定数量的副食品，

如糖、肉、牛油、乳酪等，主食中有大米、面条。到这个商店去买东西要有专门的购货本。供应对象是厂长、总工程师、大车间主任（工程师衔的），以及各社会团体、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幸列为服务对象，算很幸运的了。另外据说还有三种商店：一种是专门面向州一级的党、政、军负责工作人员，规模很小，只为几十人服务；一种是公安部门的内部商店，一种是军用商店，专为军官服务的。我们这时才知道等级待遇的不同，有这样大的差别。

此外，当时在伊万诺夫还开设有一个外汇商店，专门为有外汇的人供应的，因为外汇有限，所以主要是收购金银，如首饰、器具、碗等，不论金的、银的都行。那里东西齐全，又好又便宜。一般人都是在商店窗口看看而已，如过屠门大嚼一样，只不过是一饱眼福。

学习德文的尝试 1932年冬，我们曾有五、六个人尝试学习德文，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由厂工会出钱请了一个在俄国出生的德国人当教员，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两小时，于晚间在工程技术人员俱乐部学习，但只继续了两、三个月，以后由于教员不好，我们的条件有限，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坚持下去。

一度解决党籍问题

党委来了新书记 1932年末来了一位新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年纪不到四十岁，颇有点振作有为、积极工作的样

子，各方面的工作都抓起来了。例如，当时为了解决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各企业、部门都开展了养兔工作，而厂内化了不少钱，配有专人，但收获很小。他积极抓这件事，几个月后，大为改观，工人们第一次吃到了兔肉。他对生产以及政治宣传工作更不必说了，对各车间的党组织，也抓得很紧。

他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后，也积极地向我们作思想工作，要求我们积极工作，同时也关心我们在各方面的表现，敦促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将来还要为中国革命出力。他也向新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出，要他和我们密切联系。党委宣传部长，厂报编辑在工作中也经常和我们谈各种问题。总之，我们的情况大为好转。

解决党籍问题的基础 到了1932年末，我们多数人的情况是：

在生产上经过二年多的劳动，已成为生产工人，突击队员，在完成生产任务，劳动纪律方面，都有了成绩；

在社会工作方面，从1931年后期开始，有了广泛的活动，在厂内外都成了积极分子；

在政治方面，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响应联共及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参加各种运动。

所以，在1932年末，解决党籍问题的基础已经有了。再加上厂党委负责人的积极支持，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成熟了。

厂内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932年末，我们向厂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谈到关于我们的党籍问题，他让我们首先在新金工车间向党支部提出，经过讨论，提出具体意见。车间党支部

书记若尔其科夫根据厂党委的指示，要我们把各人的情况，在党支部里作了详细的说明，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先解决几个人的党籍问题，共有我、万志陵、梁实秋、胡冲谷，以及程小孩子的团籍。先前，我们曾给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过申请书，内容是自己分析了我们过去的错误，现在请求恢复我们的党籍，并能早日回国，重新参加革命斗争。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我们提出：这可能是由于厂党组织对我们这两年多来的表现没有签署意见和加以证明，希望党组织给写个意见和证明。

后来在厂党委的一次会议上，由新金工车间党支部正式提出，由党委宣传部长、厂报编辑积极支持，并由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宣布这件事。他曾事先征得过市委的同意，可以解决我们有些人的党籍问题。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当场由我和万志陵作了答复。后来厂党委一致通过了同意恢复党籍的决定。党委书记以后宣布，让我们从即日起，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厂党委将办理文件报请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批准。

从这时起，即1932年末，我们四个人，加上程小孩子，开始参加联共厂的基层组织生活。

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 1933年3月末或4月初天已不太冷了，还未见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通知。我曾和厂党委书记商量，能否去莫斯科一次，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催促一下，康特拉捷夫赞成这个意见，并开了介绍信及证明。由于我比较熟悉共产国际，所以由我去。我们当时是怀着很大希望的。

我搭上晚车，次日一早到莫斯科时还不到八点钟。我便

到原东大学校前面常去的街心花园，普希金像前常坐过的地方，买份报纸看看。一方面也使我回忆起三年前在莫斯科东大及列宁学院的情况。我曾打听东大的情况，说中国人早已经没有了，颇有点“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慨。过了八点钟，我才怀着惴惴不安心情，走向共产国际大厦。

我凭介绍信，进入了共产国际大厦，直接找到监察委员会。那里先见了秘书，很幸运，是熟人，即原来列宁学院教务处的秘书尼古拉也娃。我问了她列宁学院的情况，她说1930年以后未再招生，旧生回国后，也不办了，基尔山诺娃也转到了别处工作，但还经常到共产国际来。她也询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后来，监察委员会主席来了，还是那个芬兰人。他简单地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我向他讲了此来的目的。他说，你们过去写的申请书，前些时厂党委的文件，都收到了。既然联共基层组织有文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将进行讨论。说我来的时间正好，后来即将讨论，已安排了日程，让我等一、二天。以后他问我住宿、吃饭问题，打电话给房产管理员，让他给安排一下。

尼古拉也娃领我去找了房产管理员，并告诉我后天上午可以早一点来找她，一般是上午十点开会，会后就可听到消息。我对她表示感谢。房产管理员原来也是熟人，即原列宁学院的管理员，三年前我到学校去取东西时碰到的就是他。他问了我一些情况，领我到共产国际内部小卖部吃了点东西，给我开了个条子，让我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旅馆留克斯，并说住几天都行，也不要钱。还可在那里的食堂吃饭。我感谢了他帮我解决了在莫斯科的食宿问题。以后我便到原驻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的办公地方，去找那个有时在杂志上

写文章的王明。

见到王明 我直接到了中国党代表办公室，打听哪一位是王明，见面一看，原来就是过去中大的领导人陈绍禹。他不认得我，我却认识他。我当时心中颇有点惊讶，但也只有以见中国党代表的态度，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从何而来，此来的目的，并请中国党代表团指示我们留在苏联的人应该怎样工作。王明初见我时，先是有点惊讶，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便说，既然到了工厂里去了，就要好好工作，熟悉社会主义建设。你们的问题，将来总是可以解决的。我说，以后我还想比较详细地谈一下情况，让代表团给我们作具体指示。他说，以后再谈吧。

同王明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冷淡的表情，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些不愉快的印象。

遇到原列宁学院院长 在我下楼时，遇见了原列宁学院院长基尔山诺娃。她也有点感到意外。她问我到此来的目的及我们的情况。我向她谈了些情况以后，她说，如果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时，让我到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去找舒尔茨，并问我是否知道这个人。我说，听说过。她说，他是副主席，负责处理党籍问题，我们既然在苏联，他有责任管这些事。舒尔茨是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正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基尔山诺娃的丈夫。她可能不好意思说让我去找他，因此提了舒尔茨。我说，很好。如果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不解决，我就去找他，不过，他们那里准备讨论。她说，那就好了，不用找别人了。

留克斯旅馆 到留克斯旅馆，我拿出了条子。门房就给我找了个房间，给了钥匙，告诉我出入的规矩及食堂所在

地。我按号找到房间，开了门一看，很不错，两张床，全部卧具、桌椅，没有电话。以前我曾不只一次到过这里，那时住两间房的套间，这是单身房了。我这次来，却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机会来解决吃住的问题，心里感到很愉快。

留克斯旅馆在莫斯科一条很热闹的特维尔大街（即今高尔基大街）上，很多大商店都在这里。我的吃住问题解决以后，心里无后顾之忧了，便去逛大街，欣赏莫斯科的市容，当时见到有些地方被围起来，据说是修地下铁道。

第二天，我又到共产国际去找王明，在传达室打电话询问，回答说他不在，我只得又到街上去，到国家书店详细地看了看，买了一些书。我当时心里怀疑是王明不愿见我，而不是不在。

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 第三天，我一早就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见到了秘书尼古拉也娃，她说，监察委员会主席没有告诉她让我参加会，所以，她在对过找了一个房间让我在里面等消息，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上，免得有人进去。将近十点钟时，监委会主席先来了，我从门上的玻璃窗往外看得很清楚。不久又来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较年轻的，约四十多岁，似乎是参加过列宁学院清党委员会的那个人。很快，王明也来了。以后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可能是开会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到了响声，看到王明先出来，以后其他四个人也陆续出来了。监委会主席也出来了。这时尼古拉也娃出来，不太高兴地告诉我说：“会议完了，结论是按一般处理”。还说：“王明反对恢复党籍”。要我回去等正式通知。她说，再多的情况，她不能讲了。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和我一天多来看到王明对我的态度，心想也只能如此了。后

来，我再到东方部去找王明，回说，他已走了。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也没能见到王明，虽然明知找到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总是想争取最后一次机会，向中国党代表表示个态度，希望不要断了关系，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变化。我回到旅馆后，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是意志薄弱的女人，是会大哭一场的。而我却哭不出来，这样反而更难过。虽然两天来我在这个屋里是比较愉快的，可是结果却气得我坐卧不安。我觉得，1930年因为王明等人对中大学生作了那样的处理，现在又遇到了他，我相信“王明反对”的说法完全是真实的。

我所知道的王明 王明即陈绍禹当权后的化名。他于1925年冬到孙大，为第一批留苏学生。何时入党不详，但知道他到苏联以前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而是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被选送去孙大的。入团入党可能都是在苏联境内办的。他在中国曾是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到莫斯科孙大（后改为中大）后，曾和孟庆树搞恋爱，闹了一通。1926年后期，拉狄克被撤职后，米夫当了校长，王明很接近他。由于有点小聪明，俄文学通了，很得米夫的欣赏，但王明当时还不是中大学生党组织的负责人。1927年初，在中国革命处于高潮时，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曾跟着米夫到中国去了一趟。他回到中国后，一意追随米夫，看不起中国同志，中共中央曾要留他在中国作翻译，他不愿意，偷偷跑到米夫那里去，又跟着米夫回到苏联。回到中大后，在米夫的支持下，联合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借着打击“江浙同乡会”名义，搞宗派、搞派别斗争，把周达民、俞秀松、董亦湘等排挤出中大，他们自己独揽了大权。1928年米夫当了东方部远

东部长，王明更一味地对俄国人俯首听命，一味向上爬。1928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布哈林作政治报告，米夫及其他在中大工作的俄国“中国问题专家”，带领王明等几个翻译，以技术人员名义，直接参与了中共六大的各项工作。那时，许多中共领导都犯了错误，米夫后来在大会上提出让王明当中共中央委员，并吹嘘王明能作将来中国党的领导人。这个提议未被中共代表们所接受，王明未进中央。1929年，由于王明对中大学生的打击、压制及搞派别活动，在十天大会时成为学生反对的对象，但终以仰仗俄国领导人的关系，得以继续在中大当权。1930年初，以反对反对派的名义，申请上级逮捕了几十人，其中除反对派外，过去反对过他们的人，也被清除了。1930年后，由于中国党的领导人继续犯错误。王明在米夫的提议下，拿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到中国去，改组中共中央，攫取中国党的领导，自己成为“钦差大臣”，带着自己的一帮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大只有二十八个半，占据了各级领导。他们曾宣称，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实际，而懂得“马列主义”，也可以领导中国革命。1933年，他带着老婆孟庆树又回到莫斯科，作为中国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常用“王明”的名字作文章，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

王明反对我们恢复党籍的原因，我认为是：（1）过去反对派反对过他；（2）他一向执行的就是打击人的政策，有一分权力，就要用十分。1930年他借反对反对派参与抓了很多仅仅是反对他，而并不是反对派的人。在1932年联共原反对派大部分已恢复党籍的时候，我们已经联共地方组织申请，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我们积极接待的时候，王明却反对。我们

是中国人，国际不能不听中国党代表的意见。

当天下午他不见我，我决定多留一天作最后的尝试。次日早上七点多钟，我打电话找他。当他接到电话时说，过二十分钟就要到国际去，让我到那里去。他不知道我就在楼下。我就放下电话上楼，按房号找他。他的女人孟庆树出来了，说他已经走了。这给我吃了一顿不折不扣的闭门羹。上午我又到国际去了一次，答复仍然是不在。我想到来时一切都很顺利，却被王明一手弄坏了。中国革命正需要人，而我们却在这里泡着，真是毫无办法。正是：

异乡飘泊念故都，向往祖国忽捐躯。

可恨佞幸仗权势，假公报私阻归途。

归来 我搭上回伊万诺夫的夜车后，只略打了个盹，便再也睡不着了。像王明这样的人，怎么能领导中国革命呢？共产国际自己有过错误，不信任中国党的干部是不对的，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可是却让这样说不上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私心杂念、损人利己，心中毫无群众的人，凭着上面钦差的使命，当上了党的领导人，怎能不使中国革命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呢？到伊万诺夫后，我向其他人如实地讲了此行的经过情况，并向党委作了简单的汇报，说明要等待通知。同时也略为透露了一些中国党代表过去对我们有意见，对我们的事不那么支持的情况。

我们仍然继续按照原来党委的决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通知 1933年5月间的一天，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通知我、万志陵和梁实秋三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国际监察委员会的通知来了。秘书已从厂机要部取来了通知。我看到上面盖有机密字样的图章，是打字的，十

六开大小的纸，每人一张。内容，前面是姓名、年岁、简历，我们的行为，即错误内容，最后是结论。我们三个人是一样，即在联共清党以后，可解决党籍问题，参加联共党。关于胡冲谷及程小孩子的结论，是拒绝恢复党籍及团籍，党委书记康特拉捷夫说，现在清党还未结束，本来恢复党籍作为特殊情况处理是可以的，按一般情况，清党期间不恢复党籍，也不接受新党员。国际既然作出这样的结论，按一般情况处理，也只有这样了，待清党后再说吧。他劝我们在思想上不要有什么负担，除了暂时不参加组织生活外，还要继续工作，参加积极分子会议。他说只找我们三个人，其他两个人，让我采取适当方法，告诉他们，让他们既知道情况，又不要有思想负担。我们表示将一如既往，积极工作，相信总可以回到党内来，不过要拖一段时间罢了。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决不灰心。

从此，原来参加了几个月党的组织生活，就不再参加了。党籍问题未能最后解决，并到此告一段落。

加入苏联国籍 1933年夏，苏联政府颁布了在全国城市实行护照制的法令。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城市公民，都要办理护照手段，它既是身份证，又是公民权证。这对于我们来说，却出现了新的问题。根据那个法令，外国人必须具有或者本国政府的护照，或者领取无国籍的护照。我们从中国到苏联去是非法的，去后没有、也不可能和国民党政府或大使馆发生关系。如果领取无国籍护照，那么居住、行动、工作都很不方便，而且似乎是在政治上不承认苏联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经过商量，还是决定暂时加入苏联国籍，领取苏联公民的护照，将来也就是中国苏维埃公民。因此，经过

和党委的研究，由我们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填写申请表，经过批准手续，领取了苏联公民护照，从此算是加入了苏联国籍，并作为苏联公民，具有一切苏联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附带说几句关于行政流放的事。我们初到伊万诺夫时，内务部门提出的要求，即每月报到一次，和不经内务部门的许可，不准离开伊万诺夫，实际上并未继续执行。开始时是那样做的，以后也没去报到了，短期离开到外地去，如我作为外国工人代表团到外地去，到休养所去都是自由的。到工厂后，我们参加了五金工人职工会，社会工作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对其他行政流放的人是否也是这样，还是对我们有点特殊优待？在三年中间，如果从逮捕算起，则在1933年初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从宣布流放之日算起，在1933年9月也应该结束了。可内务部门却没有过问，既不要求报到，也没有按期宣布结束，好象一切须办的事都办了，算是不了了之。

从1933年下半年起，由于没有解决党籍问题，又领了苏联公民的护照，在生产上我们已成了车间车工骨干，工资已经够用了，长期留在苏联的现实已成定局，有些人准备适应这种环境，正在考虑娶妻生子，而我呢，思想上却增加了无名的烦闷。

有些人走了 1934年秋在伊万诺夫的中国人有几个人走了。他们都是1934年走的，只有梁实秋由于和我们的关系密切，所以透露了一些。据说，走的人都是由内务部派遣的，送到南方各地去，如中亚细亚地方，或者是有华侨的地方，让他们为内务部做工作的，至少是当耳目。自他们走了以

后，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或其他人来过一封信。从这里也可以证实梁实秋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流放到此，没有什么问题，内务部根据这样情况，才派遣他们去的。

从德国来的那个来历不明的金××，于1934年也被召回莫斯科，但根据召回的情况，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意。走时，很不愉快，没讲是谁让他回去的，也是一去无音信。

一封未发的信 在1934年后期，由于回党回国的希望没有了，至少在近年以内是如此。因此不时想到我的家，特别是和我相处很短，留在家乡的青年妻子，觉得应该向她作一个交待。因为1929年后曾往家中寄过几本《列宁全集》，显然会使她感到我可能快回去了，可是以后突然中断联系，五年音信全无，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必然会引起各种猜测和疑虑。没有回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幸？是否在回国后遇险或者被捕了？还是已经死了？

于是，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想告诉他们，我虽然未死，但回国的希望是没有了，所以虽然还活着，但不能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必再等我了。关于这一点，虽然在同父亲告别时曾说过，但我的妻子还是一直在等着我。现在从不告而别已经八年，不能让她再等我了。我说明这件事，对于她来说当然是可怕的消息。但不说，让她没完没了地长期等下去，岂不是更加可怕。外国有句俗语说：“宁可有可怕的结局，不要有无终止的可怕。”所以，我在信中写明了我不能回去的境况，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对她表示歉意。希望她趁还年轻的时候另谋一条出路，以渡过尚余的岁月。并希望她能独自生活，不作家庭的奴隶。

这封信虽然写好了，究竟发还是不发？几经斟酌，经过

反复的思想斗争，矛盾重重，结果还是成了一封未发的信。

江一牟到伊万诺夫 1933年春，还在很冷的时候，我们住所突然来了一年纪较大的中国人，衣服烂褛，面黄肌瘦，中国普通话说得不好，俄语也不通，一副十足的狼狈相，他就是江一牟。他是五年劳动改造期满释放后才来的。据说释放后，让他到伊万诺夫居住，他来到后，不知怎样打听到了我们，找上门来了。我看到他的样子，听他说了情况，不禁感到寒心。他的被判处劳动改造，只是因为他在中国过去的问题。

江一牟是四川人，曾在四川军阀下边当过一段时间的军官。1925年后思想有了进步，先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到莫斯科中大，对学校有些不满。我以前同他并不认识，但听朱代杰谈到过他。后来1930年中大逮捕反对派时，他也被逮捕了。我们九月间被释放后，他和其他人被判了五年劳改，到了北方很远的地方。在那里经受了五年的劳动生活，但活下来了。那时他已四十来岁了。

我们当时无法收留他，只得领着他找到了一个私人住的地方。以后，他找到了工作，碰巧对他又很适合，是在一个电气管理处看电表。由此可见，在苏联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像他那样的人，究竟能干什么呢？开始我很有点发愁，但居然找到了工作。干了几个月，还得到了好评，工资也增加了，而且租到一个不错的小单人房间，生活得满不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虽然有些旧思想，但他的思想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

苏联政府的法令 在三十年代初，从报纸上忽然看到了

一条苏联政府的奇怪法令，说对于鸡奸罪将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情节严重的判处八年。这真使人有点吃惊，当时苏联妇女大大多于男子，而且两性关系比较随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还促使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真是不可想象。

另一个法令是所谓“八·七法令”，即八月七日通过的法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凡盗窃国家财产，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财产，可以判处到十年的劳动改造。我开始以为这是为了惩办那些大盗窃犯而制定的。谁知却不是这样。有一次我们车间一个缝皮带的皮带工人，因为偷了两米皮带回去补皮鞋，被发现后，在食堂举行审判。开始我们以为，这是过去经常举行的同志审判会，是以教育人为主，处分为副的性质，谁知经过半小时的讯问，宣布判决：“根据八·七法令，劳动改造十年。”当时他的家属们听了便大哭起来。几位法警即刻予以逮捕，就把他抓走了。在场的工人们，也都大为惊讶。

后来了解到，根据这个法令，当时像皮带工人那样被判刑的情况，到处都有。他们被判刑后，都被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中去。以后过了两、三年，又成批地被释放回来。但不幸有的人在那里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这可真是只好听天由命了！

供给改善，取消配给制 1934年，由于苏联经济在集体化后有了好转，政府宣布取消配给制。生活副食品不定量了。开始有些人怀疑，于是发生了抢购风，但几天以后，就停止了，才又恢复正常。据说，在两、三年前，有些地方发生饥荒，还死了一些人。但农村经济还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很快就上去了。我们的生活也就大有改善了，尤其是工资也多了。其他工业品也有所增加，虽然还不足。

进入动力学院前后

转学技术的动机 我转学技术的原因及动机可归纳如下：（1）1934年末，基洛夫被刺后，苏联政治局势紧张起来，我们实现回党回国更无望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也无大进展，我们当时觉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而且对今后做政治工作也没有什么信心，需要改行；（2）自己不愿长期在车床上作车工，想当技术人员；（3）我过去就喜欢数理化，还有些基础。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一些，但还不太大；（4）联共当时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我想，将来万一能够回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技术还是很需要的。

考学的准备 当时我知道伊万诺夫有一个机器制造的中等技术学校，五年制，前三年不脱产，后两年脱产。我想投考插班三年级，不脱产一年，以后脱产，三年毕业。在1935年初，我到该校和校长谈了，并经他允许，利用他们的图书馆，借阅一些中学用的数理化教本。从此，我开始进行准

①所谓“八七法令”，即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8月⁷日通过的《关于保护国家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并巩固公共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议。决议宣布“公共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侵犯者“都应视为人民的敌人”，与之斗争是“政权机关的首要任务”。并规定“采用最高的社会保卫方法“枪决”制裁之，“情节轻微的，判处十年以上的剥夺自由。”此类案件“不得运用大赦”并“没收财产”。见《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2）》第619页，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编者

备，除了倒班生产工作八小时及必要的社会工作外，业余时间的绝大部分，都用到自修这些课本上去了。我在备考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由于过去学的是英文本及中文本，而现在学的是俄文本，虽然我的俄文水平近来有了提高，但很多名词，都得重新学习、记忆了。自然、数学好办一些，但物理、化学就难了，特别是物理占的数量很大，而化学则名词多得很。当时，离开中学时的学习生活已将隔十年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我仍然坚持下去，尽自己的力量，首先认真地从物理及数学开始复习。

两处报名 1935年初夏，将要报名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时，偶然看到了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招考新生的广告，我的思想一动，心想如果能考上动力学院，脱产学到大学工科毕业，也算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夙愿。但由于自己离开中学多年，年纪也较大，而且用俄文考，确实有点信心不足。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决定报名，作为争取的目标，而把考进中等技术学校作为较有把握的目标。于是我同时准备两次考试，像片、介绍信也都是双份的。两处报了名，促使我更为积极地准备考试课程。

但动力学院的招考委员会给我制造新的麻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我的报考申请。他们说我受过处分，在莫斯科那一段历史还没有最后结论，而且也没有学业证明。于是我在夜班、二班时，只好少睡点觉，抽点时间去跑证明，除了找厂党委外，还跑遍了市委、市人委，教育局，但还是毫无结果。后来，我又到了动力学院招生委员会去谈，他们说，校长回来了，让我找校长。他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谈的结果，同意由我厂党委出证明，说明我的全部情况，并由

厂行政、工会证明我的生产及社会工作情况，由我的中国同志两、三人证明我是中学毕业生。将来考试时，数理化方面的要求，与大家一样，俄文可以降低要求。这些要求我都照办了，招生委员会才给我准考证，算是过了这第一关。

这时离考期只有两个星期了，而且动力学院先考。我决定利用工人报考照例都给两个星期的休假，集中力量准备考试，特别是准备三角和化学。因为其他各门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这两门还比较薄弱。

侥幸的第一门物理考试 苏联的大学入学考试和中国不同。第一门考物理，是分班的，几个人一批，先笔试几道题，以后交卷时再口试，当时在成绩表上由教员签署成绩。我列在中间名次，他们都是苏联十年制刚毕业的青年。但五人一批，经过约一小时后，已有十三、四人都因“不及格”而出来了。在轮到我应该进去时，我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恰在这时，换了考试教员，他一看名册都是“不及格”，大为惊讶，细问一下，都是在光学的一个题上被打成不及格的。这位新教员大不以为然，给大家换了题。他看到我以后，说他第一次见到中国人考动力学院。他先问我一些与考试无关的问题，以后又问了物理，有的答上了，有的词不达意，说不清楚。他说，由于我的俄文水平，还不能把许多定理说清楚，而且物理将来还要学，所以不太要紧，转而问我数学，并出了几道题，我很快答出了，而且相信不错。他一看，很满意，即刻在物理项目下签署一个“及格”字样。这时和我一起进去的几个人，都呆着脸，看我，听着我和教员的谈话，并看着我在本班中第一个“及格”的成绩。出来后，大家向我祝贺。他们都在问我是怎么样考“及格”的。

数学考试 数学是动力学院最重要的课程，而且中学数学不再教，所以考试很重要。分两次笔试，一次口试。第一次笔试是算术和代数，自信没有问题。第二次是几何和三角。三角是“临时抱佛脚”准备的，在中学时代已经入党，社会工作多得很，当时是勉强应付的，现在已经完全忘得精光了。第一题是三角，本来不难，但由于精神紧张，遇到薄弱点，急得满头大汗，过了半个小时也没法完成。一位监考老头可能看到了，到我跟前用手在公式上划了一下，说“除一下”。我恍然大悟，两、三分钟就解答完了。以后的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两次笔试过后，轮到口试时，那个教员很奇怪地看着我，又看了题解，除了问了一些与题目无关的问题外，说不相信这些题是我答的，又当场出了几道题，其中两题是代数分解因数，我当时立即进行解答，既快又准。他大为惊讶，说我在中国代数学得很好，当即又在数学项下，签了一个“及格”。从此，我心里安定下来了，因为大家都说，物理、数学及格了，考取就有把握。

化学考试 我们班化学考试是列在第三项，有的班不是这样的顺序。化学教员是一个年轻人，问得很多、很细，笔试也多，把我弄得颇为狼狈，因为很多名词我弄不清楚，而且也是临时抱佛脚准备的。结果，他不满意，说不及格。但我将成绩表交给他签署时，他一看物理、数学都已经及格了，他停下了笔，问我什么原因，我向他讲了情况。他说，动力学院以数学、物理为主，化学只在一年级学，而且是重学，不能因此给我不及格。所以，参照前两项，他签了个“及格”。

这样一来，数理化三门都及格了，社会学没有问题，关

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我可能答得比别的学生还好一些。俄文呢，校长已经说过，可以降低要求。因此，我有把握被录取了。

进入伊万诺夫国立动力学院 过了两、三天，发表了考试结果，我幸而被录取了。总共报考的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共录取了四百名，约为四分之一。我心里高兴极了，即刻到机器制造中等技术学校对校长及图书管理员说明了情况，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以后，我又到工厂办了离厂手续，大家向我作了祝贺。1935年九月一日，学校正式开学了，我领了学生证，从此兴高采烈地进了向往很久的工科大学，并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从进工厂以来，差几天，就是整整五年了，我已成了五级车工，即高级工人，现在又成了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了。

但在精神上，这种转学技术的成绩的后面，却依然蕴含着心理上怀念祖国，怀念中国革命的情绪。但愿将来能为祖国尽一点微小的力量。因此作了三首感想诗，以作为改行的纪念。

(一)

常叹故国遍疮痍，十年投笔着戎衣。
披荆斩棘赴汤火，离乡背井举红旗。

(二)

暴风骤雨起横波，留落异域无奈何。
原望整甲再征战，归途受阻堕漩涡。

(三)

事与愿违辟新场，忍痛修文弦更张。
寒窗琢磨计寸尺，或为大厦作檐梁。

这样我便开始了新的大学的生活，整整中断了十年的数理化学习又恢复了。

第一学年学习及生活 我们班有四十人，录取的四百名学生，分为十个班。班中除我以外，只有两个年纪较大的，一个是原中等技校毕业生，参加了工作以后又来学习的，另一个是中学毕业生，当了几年钳工后才考上的。其余都是高中十年制毕业生，年龄在十九至二十一岁之间的青年。学习方式分大课讲述，学生记笔记，分班学习，平时积分。我由于听讲时来不及记笔记，只得借人家的笔记回家抄，占用了不少时间，而看参考书几乎就没有时间了。因此，学习比较吃力。学科有高等数学（解析几何）、物理、化学、机械制图、理论力学、社会学、德文、图画、体育。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我才逐渐适应，赶上了记笔记，有时候只要和别人核对或补充一下就可以了。这也是我有点幸运，即由于我的眼近视，我一开始就坐在第一排的中间，而和我并坐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都是笔记记得比较好的，既清楚又完整。我借他们的光不少，其中一个女的，还成了我的朋友，这是后话了。

在生活方面，我入校后，获准领取助学金，每月八十九卢布，这是一年级的定额。这些钱够吃的饱，虽然不太好。我原来还积攒了几个钱，从上学后，每月拿出十至二十个卢布作补充。另外由于我的住所，比单身宿舍离学校还略近些，所以我仍住在原地。第一，可以不化住宿费；第二，和中国同志在一起，不闷；第三，住所不影响学习；第四，在吃食、看电影、看戏方面还可以揩同志们的油。所以我吃得还是可以的。

第一学期结束时，未进行大考，只凭平时分数，我都过了关，没有不及格的。

第二学期开始，我的学习已经比较容易了。我经过本班同学的介绍，在纺织厂每个星期去一、两次，测绘些零件图，每月也可有十至二十个卢布的收入，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并可买些参考书。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了。学年考试结束，我居然成为班里的四个优等生之一。

苏联当时实行的成绩考核方法是5分制；“2”为不及格；“3”为及格；“4”为良好；“5”为优；也有的以不及格、及格、良好、优记分的。平时记分作为平时成绩，有些重要课还进行学年末的考试，如数、理、化、理论力学等。这种将各种成绩综合平均起来，在4.5分以上，又没有其他违背纪律的，即可评为优等生。我的总平均分数在4.6—4.7分之间。另外两个是上面所说的年纪较大的。另一个女青年，即和我很接近的二十岁的卓娅。我们四个人是优等生。

成绩发表后，马上召开了本年级优等生会议，学校当局勉励我们不要骄傲，要继续前进，努力学习。并宣布从下学年起，将作为优等生。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习。

回到工厂短时期工作 苏联大学暑假两个月，从七月一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开学。我列为优等生后，可以向学校职工会申请休养所路单，免费休息两星期，因而放到八月十五日，休息完上课。而前一个半月的时间，回到工厂作短期工作，挣了几个钱，为下学期用。工厂很支持我，说随时可办理。我从七月一日起，即回金工车间作技术调查员，月薪两百卢布，工作很轻松。车间的技术副主任，及一个总工长，都是伊万诺夫动力学院的早期毕业生，从此成为

前后同学，更是热情，在七月间的一个星期天，让我到他们家里，大喝了一次酒。而且喝醉了，还是他们把我送回家去的。

到休养所去 休养所在离伊万诺夫两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村庄，地点还不错。由于八月十五日起已过了热天，所以实际上只是休息，而不是避暑了。那里饮食也不错，确实是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

休养所离卓娅的家捷考沃只有四、五公里的样子，当在学校分离时，她知道我领了八月下半个月那个休养所的路单时，曾向我提出，要我在休养所期间到她家去玩。她说，她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距离不远，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我在休养所里曾遇到卓娅的一个邻居也在那里休息。我和他约好在一天下午去捷考沃，但刚离开休养所，就浓云满天下起小雨来，因而我们只得折回。

从此，连着下了几天雨，一直下到八月底，使休养所的人大感不快，而且天气还转冷了。

季诺维也夫等人事件 1936年八月下旬，正是我在休养所的时候，苏联政府宣布了对原反对派一些头头的“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其中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还有拉狄克。这件事一公布，报纸上又登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托姆斯基自杀了，又传说当时任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主编的布哈林也被捕了。他们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内容是叛国、里通外国、暗杀、破坏等。

当时我以非常不快的心情听了这个消息，并全部听到了审判经过。我当时在思想上却引起了非常多而且不能解释的矛盾。心想第一种可能，假若控告的内容及审判情况都是事

实，那么，这些人，从青年时代起进行革命多少年，从一无所有的被压迫者，直到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成为新政府的领导成员，以后或者由于政治意见分歧而成为不同派别，或者由于争权夺利而形成派别，但都是在公开的光明正大地为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并为自己号召群众，集合同情者，而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失去了领导成员的地位，却不安心失败而干出这些无原则的坏事，应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呢？又怎样对得起自己的历史，自己过去的同情者及群众呢？难以想象。第二种可能性则是有些事，的确有些人干了，但不那么严重。由于当权者借口这些事而大做文章，来彻底打击过去的政敌、反对派，把他们搞臭，消除在部分群众中的影响，并进而消灭他们的政治敌人。如果是这样，将说明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的胜败还未最后解决。当权者怕自己的政敌有反复的可能性，因而采取了这种办法。第三种可能是，只有派别分歧，从派别斗争的观点出发，虽然没有那样的事，或者有些事但不是那样性质的，这样，则当权者这种做法，就有问题了。

从另一方面看，过去的历史，中国的或外国的，在改朝换代以后，或者由于各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或者由于统治者要集中自己的权力，总要发生势力较量的事，各种事变，用不同的形式，文的，武的，流血的不流血的办法进行清洗，如削兵权，杀功臣，平乱等事。难道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也要重演这样的历史吗？这样，对国际工人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曾设想到一个政党内部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及处理某种问题的不同政策。资产阶级有各种不同的党，一个党内有

不同的派，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呢？不可以各种观点并存呢？或者一个是当权派，另一个提些意见，如在野党那样，彼此相互听些不同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呢？

我还想到，即使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把一些人搞下去了，他们不服气，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末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清除在群众中的影响，已使他们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又何必利用政权去把他们消灭掉呢？俄国历史上不是有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最后谁占优势不是一样有个结果吗？为什么在取得政权后，就这样干呢？昨天还是同志相称而今天就当作死敌呢？

总之，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过去因为我对有些问题要追根求源，从而使自己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心想今后不再这样追问了，不再提这些问题了，甚至不再想这些事了。好在自已已经转业，将来学点技术，作个工程技术人员，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算了吧！管他天下大事由谁来主持！

两个星期的休息，使自己的身体有了好转，虽然在精神上思想上有这样不快的事。到了八月末，结束了比较愉快的休养所生活，回到伊万诺夫，准备进入第二学年的学习。九月一日，我如期报到，见到了分别两个月的同学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 1936年九月一日开学了。班上除了有两个因为成绩不好，留级到新的一年外，还是原来班上的同学，现在都是普通工科的二年级学生，亦即最后一年级了。化学、社会学、制图、几何等学科都没有了，数学是微积分，物理已讲到光学，增加了材料力学，这是大学中最

难最重要的课程。理论力学还继续讲下去。但对于我来说，学习已经没有什么大困难了。

我已成为名列前茅的优等生，除暑假中享受了免费到休养所休息外，从这个学期开始，发了一个优等生证，凭这个证件可以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免费吃一个第三件。一般第一是汤，第二是主食，第三是个甜的，如果汁、牛奶等。助学金增加了十个卢布，成为九十九个，据说是每年级增加十个名额。加上我暑假又挣了几个钱，所以，我的伙食大有改善，可以不象有些人那样靠多吃面包来补偿，我可以吃得好一些了。

在同班中，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了，特别是有了几个比较接近一些的。卓娅和我的关系也更密切了，在班里并坐在一起，已为全班同学所公认，即便偶而我们到校稍迟时，大家也留着并坐的空位。我们俩被人称为“相好”，而卓娅自己则进一步说我们是朋友了。有时业余作业也在一起做。她并说，暑假约我到她家是想让她的父母看一看我。她也谈到，读完普通工科后，将分成电力及热力专业系科，电力将只有三个班，即占学生的十分之三，而且数理化大都要在4.5分以上的，将来我们都可以入电力系。她还说，大学生中有一种说法，“材料力学交了卷，终身大事就可办”。我们在二年级结束转入三年级电力系时，就可以定下我们的关系了。我说，我的年纪比她大十岁，而且是中国入，将来还想回国，她说，那都不成问题，不能影响她的看法，只要我对她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行。有一个星期天，她还约我到学校一块作作业，以后又让我送她回单身宿舍，毫不在乎。

总之，第二学年开始，使我在精神上、学习上又得到新的鼓舞。

但是，却没有想到意外发生的事，竟中断了我的学习，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梦。我又第二次无故地被捕了。

在伊万诺夫第二次被捕及以后

高尔基的来信 原来，1930年我们从莫斯科离开后，对于到高尔基去的人的情况，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一些，以后和胡冲谷比较要好的张光华因工作中四个指头被打掉，曾来过信，别的人都没有什么联系。1936年十月下半月，忽然又接到了张光华的信，问候胡冲谷的情况及我们其他人，但未提到高尔基其他人的情况，这使我们有点怀疑。不久，这个疑团打破了。我们也被捕了。

我们突然被捕 1936年十一月四日或五日的晚上十时，我们已经睡下但尚未入睡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内务部门的人，宣布我们被捕了，并进行住屋内的详细搜查，搞了记录，让我们的邻居来作证，并签了字。一直到十二点以后，在深夜时才封了我们的门。因为我们中间的张旭升已有老婆而且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给他留了一间房，而将我们的东西都收拾到另一间，连我们为准备十月革命节买的肉，也都封在里面。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内务部管理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在深夜里我们只步行跟着那几个人到了内务部门的内牢，在那里再次进行了随身搜查，并分别关进了各个监房。

在屋内检查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搜查的，对于家中放的那些书却逐本查看了，只看作者及书名，拿去了布哈林的书，这便使我相信以前传说的布哈林被捕的消息，大概是

事实了。

当时我们四个人，我、万志陵、胡冲谷、张旭升都被捕了。原来的六个人，程小孩子投河死了，刘慰民于1936年春已经走了，但走后一直没有消息。以后，我才知道，在当天晚上我们被捕的时候，在1931年来到伊万诺夫而一直未走的梁孝儒，和1935年劳改释放后到达伊万诺夫还不到两年的江一牟也同时被捕了，因为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所以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宣布被捕的理由及条款 我们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去审问。内容很简单：问官说，根据苏联法律，逮捕人必须有逮捕手续。当天晚上曾向我们宣布过。逮捕后，在四十八小时，即两昼夜内，应该向被捕人宣布逮捕的原因及条款，他现在向我宣布，根据内务部门掌握的材料，我犯了苏俄刑法典58条第10款的罪行^①，即反革命的反苏维埃宣传。我问有什么具体表现，他说，以后得详细审问，现在只是按法律向我们作这样的宣布，并让我签字。我说，不知道具体内容怎么能签字呢？他说，这只是通知性质的，是法律手续，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我说，既然如此，可以不签。他说，签字并不等于同意，只是表明知道了，或通知了的意思。我说，为尊重苏联法律，我就签个“知道了”。第一次提审就到此结束。现在有了法律了，这似乎是和1930年时的情况不同了。

^①苏俄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为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实行个别反革命罪行，而宣传或煽动者，以及散布、制作或收藏具有此种内容之宣传品印刷者，处——剥夺自由六个月以上。”并规定情节严重时可处死刑。

初入内牢的情况 在二、三年前扩建的州内务部办事处大楼的第一层，每个监房有十七、八平方米，四个铺位，其他情况和莫斯科的小监牢大致差不多。每天六百克黑面包，二十克糖，早上茶水，上午一汤一稠粥，晚上是稠粥。吃不饱，也饿不坏。室内很干净，还有两个柜，可放牙具及小东西。室内没有大小便用的马桶，所以空气也不坏。每天去厕次数多，随时还可以要求去。床上还有毡、枕头、被单，随时可以躺。看监的人也文明，没有听到过打、骂、吵、闹的事。理发的、医生都有。只是不让看书、看报，和受审阶段一个样，限制较严。

被捕时，有几天，我很伤心。比第一次被捕时还想不通。因为第一次被捕前已知中大有人被捕，估计自己也有可能被捕。这次则完全没有意料到。原来听到反对派头头的案件后，估计可能会牵涉到一些人，但我们只是前几年的事，已经处理过了，而且在性质上也根本没有象最近提出控诉的那种问题，而且地方党组织曾恢复我们的党籍，虽然未经国际批准，但说清党后可以解决党籍问题，我们以后也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怀疑的事。

中国虽然是反动统治、军阀当权、国民党政府，但我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和家庭也未通过信，更不会有任何的牵连。和俄国人除了工作、学习关系外，也没有干过任何的勾当。心里真是想不通。

对于我个人，特别使我伤心的是，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经过了許多波折，进入了动力学院，希望趁年纪还允许的时候学点技术，现在这次被捕，不论后果如何，是不能再继续再学技术了。现在年纪已三十，如果这几年过去了，一辈子算

任何希望都没有了，一切都完了，即令活着，也是庸庸碌碌地无任何意义了。

被捕的前两天，我还在学校里和同学们商谈怎样过十月革命节，而现在呢？他们会怎样议论我，把我猜想成什么样的人呢？尤其是卓娅，一个天真烂漫，充满信心和美好愿望的女青年，刚和我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为本班所公认，我的被捕给她带来何等意外的打击呢。……

又想到离家去国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以来，不仅没有能够作什么事，而且一而再地遇到这种不幸的事。现在一事无成，前途茫茫，连给家中一个信息也不可能。家中的人可能还在梦中等我呢……

真是说不尽的矛盾，我的头这几天有点昏昏沉沉的样子，吃也是那样，不吃也是那样，睡也睡不好，白天也是迷迷糊糊的。甚至对同监房的人，我也不愿说我是大学生，而只说是车工，问我为什么事，我说自己也不知道。

在这种沉痛的情绪下，勉强写了三首“咏怀”

一、系 狱

再看系狱心凄凉，城门失火池鱼殃。
青壮年代正好时，却陷囹圄消时光。

二、自 感

人生失意事非常，谁知我身几处伤。
自心忏悔犹未已，旧案重提太荒唐。

三、怀 乡

背井离乡已十年，外患内忧更蔓延。
万般愁绪向谁诉，满腔热泪何处潜。

内牢见闻及特别会议（OCO）的传说 我所在的内牢

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老中学教师，五十岁左右，据说是因为老问题，即革命前，年轻时曾和社会革命党有过关系，现在他们想往新帐上拉。但他说，他没有任何敌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行。他已在那里呆了四、五个月了。后出席过一次法庭审判，法庭未能给他定下罪名，又把案件退回内务部复审，这还是我初进监的时候。虽然没有释放他，他还颇为乐观。又过了些时，他忽然得到通知说，他的案件将转入特别会议（oco）。他听后大为伤心地说，这可完了。他还说，oco设在莫斯科，那里有几个人，根据内务部各办事处上报的案件，一议论就可缺席判决。他说，前几年，在政治管理局的时代，有各种特别委员会，都是采取缺席判决的。现在改为内务部了，在莫斯科的部有oco。到那里去的案件，都是按各地办事处提的结论，简单地就判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oco，同时也在自己的心里，打上了一个不愉快的烙印。

第二个，是市建筑局的一个党干部，可能还是工程师，已呆了两、三个月。据他说，内务部想把他打成经济反革命，指责他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但他说，工作上有问题，是难免的，情节也有轻重，但他没有任何反革命的事。他说，他初进来时，整个月都坐卧不安，饮食难进。那时天气还不冷，监牢中常有苍蝇，他没有办法，只得学着用手抓苍蝇，以转移自己白天的注意力，他还当场向我们表演，当苍蝇正在面前飞过，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了。以后，他渐渐想开了，就听天由命等待了。

第三个是我进去后不久去的，是莫斯科体育学院的学生，家在伊万诺夫。几个月前，曾被捕过，说他有反革命行

动，他坚决不承认，也没有可靠的证据。一个星期后，他宣布绝食，而且还很干脆，就连糖水也不喝。他的身体原来很好，经过了十来天绝食，已不能起床，医院要给他注射，他也不接受。后来才把他释放了，但不让他离开伊万诺夫。他在家里养了两、三个月，现在身体好了一些，又把他逮捕了。他说，绝食没有什么希望，但他准备将来还要这样作。

我的问题的审问内容 我被捕一个多星期后，才开始提审。问官有好几个人，有时二、三个人同时参加审问，这和第一次在莫斯科被捕时有所不同。前后两个月左右，先后问了许多次，有时一个问题分几次问，可能是想找出我的回答之间的一些矛盾。每次或长或短都作些记录。问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学校的事，大致简要地又重复了一些，另一部分是在伊万诺夫的情况，没有什么东西，无非说我们几个人有时谈论一些过去的事，以及谈论一些中国革命及政治斗争的现实问题。问的人，有的态度很和气，仿佛是谈心似的，还问一些生活情况，有的则板着面孔，似乎在吓唬人，虽然动了声色，但也不那么张牙舞爪。和我从其他三个同监房的人听到的情况不尽相同。据他们说，有时提审还象样，有时则拍桌子大骂。但没有听说打人，或动刑。

有一次我问他们，将来怎样处理我们。是否要经过法庭审判。他们说，他们的责任只是提审，弄清问题，再交给法官，看是否构成犯罪，然后由他们决定怎样处理，是进行法庭审判，还是释放。我问，是否要送到莫斯科去，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我说，还有释放的可能吗？他们说，怎么会没有呢？没有罪，就会释放。

大概在一月间，即被捕后两个多月，有一个较高级的军

官来提审我。之所以说是高级，我从两方面判断：第一，是提审的那个屋子很阔气，相当大，连桌椅也不一样；第二，是在这个人两旁，还坐着过去审问我的两、三个人，低声下气，唯命是从，显然是他的下级了。他把过去问的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以后，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或补充。他最后说，审问到此结束，我没有什么间谍、里通外国、暗杀、破坏的罪行。最后如何处理，将转给法庭，或转给莫斯科，要我耐心地等待一下。我问他，如果转到莫斯科去，我就什么也不能提了。他说，也许不转到莫斯科去，问题就是今天签字的最后记录的东西。我怀疑是要转到oco了，但未敢问，因为怕他们反问我怎么知道oco的，而且，他们转到什么地方，我问了也无济于事。所以，只得听天由命了。

在这期间，有一次提问时，问官给我看《真理报》上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算是例外地照顾我了，同时问了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和西安事变有关人物蒋介石、张学良的情况。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转入伊万诺夫大牢 大概在二月间，宣布我的问题审查结束后不久，我们坐着囚车，被转到城边的伊万诺夫大牢。我住的监房，仍然是四个人一间的，里边很干净，有床铺等和内牢基本一样。吃的东西则不如内牢，但和我同房的两个人，外边每周都有亲属送来比较丰富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沾点光，所以，对我来说，反而比内牢还吃得饱一些。

同监的其他三个人，一个是化学工程师，同时又是伊万诺夫工程技术大楼的负责人，还不到四十岁，结婚才三、四年，只有一个小孩子。据他说，开始说他是经济反革命，以后又说他不是，但知道别人。他两者都不承认，已经呆了几个

月。内务部门给他施加压力，曾动员他的妻子进行了一次会见，他妻子痛哭流涕地向他请求，他忍着眼泪向他妻子说，他不是坏人，也不知道别的反革命，要她相信，他不能自己向自己身上栽罪名，也不能诬告别人。如果有真理，他就可以出来重新团聚，如果万一不能出来，希望她不要伤心，鼓起勇气，照顾孩子，将来也会团聚。但以后，我在被发送阶段见到了他，他还是被判了五年劳动改造。第二个是会计师，是在外县一个工厂工作。据他说，他在去年十月革命节时和几个人喝酒，有人醉了，他也醉了，不知说了什么话，以后被人告发，现在也说不清谁告发的，也交待不清说了什么话。现在被宣布为反苏维埃集团，已被捕三个多月。将来究竟如何，只好让“上帝”摆布了。第三个是火车司机，据说是晚上在车站内调度车皮时，出了事故，好在行车速度低，撞车损失不大，但原因弄不清楚。他家中很困难，几口人只他一个人工作。我进去一、两天，由于闲谈及下国际象棋的关系，和他们很快都相当熟识了。上述前两个人都从家得到不少吃的东西，如白面包、糖、黄油、乳酪等。他们除了让我吃饱外（加上牢内的东西），也给那位司机一些补给品，叫做监牢中的“患难相逢，同舟共济”。

这里虽然也是四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据说也有较大的房间，但比起内牢好得多了，其优点有：

1. 每天放风一次，二十分钟，严格执行，有时白天未放，晚上也要放。而且可以随便走动。

2. 可以看书，而且有新的书籍，每一星期，有人抱一些书来，让我们自己挑，以后再更换。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本译自德国人的有关宇宙飞行的新书，从物理、数学、天

文几方面论述，相当系统，其中也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炮击巴黎的大炮所发出的炮弹，要高飞四十公里的抛物线。我初次获得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是从这本书学到的。我相当细心地阅读了这本书。

3. 可以下棋，而且那位会计师的水平比我还高，很可以消磨时间。

4. 有家属的可送东西，两星期洗一次澡，换被单。牢内有暖气，干净，没有臭虫、虱子。

5. 形式上经常有法官去巡察。问犯人有无意见，可写申请，虽然不解决问题，但颇有点人道主义的味道。

第一次被押送 经过两个多月比较好一些的伊万诺夫监牢生活之后，有一天，我被叫了出去，此外还有其他一百左右的犯人。这是将要被押送了。这时我在队中，见到了其他三个人和江一牟、梁孝儒两人，但不准说话。站好队后，押送武装士兵，站在两边。由武装队长下令士兵上刺刀，并向我们宣布押送时的纪律，不准说话，不准乱队，凡向左、向右三步者，即以逃跑论处，押送士兵可以不加预告开枪射击。总之，象煞有介事，如临大敌。以后，大家低着头，开步走了，走向火车站，所走的道路都是熟悉的，而且还从我们工厂旁边经过。看来，和我住了六年半的伊万诺夫，就这样悲伤地离开了，虽然来时的心情也是不愉快的，但如今更是在不快、悲伤的心情中被押送走的。

到火车站上了囚车，里面铁栏门形成的小间，好象装咸鱼似的，尽量塞满了人。我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有人说可能到了弗拉基米尔，那里有个古老的大牢，在那里等判决。幸亏火车走的时间不太长，而且好在是北方的四月，天气不

热，不然，在火车中会把人闷坏的。

弗拉基米尔大牢 弗拉基米尔是俄国古老城市之一，现属于新兴的伊万诺夫州。我们依然排着队，在武装士兵的押送下，从街上走过，略为瞻望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没有什么大建筑，房子高低不齐，石子马路。街上人不太多，有的人望我们一下，有的人也不注意，可能也是司空见惯了。

弗拉基米尔大牢是个古建筑了，沙俄时代就有而且是出名的。这个大牢建筑有点象莫斯科大牢，三层楼，大房子，小浴池，没有什么其他设施，两边的大板通铺，不要说毛毡、枕头和单子了，就是连个草垫也没有。生活条件比伊万诺夫大牢差得太远了。除了面包、糖的定额相同外，吃的东西可差了。一个大房子里二十多人，两个大通铺。外边送来的食物也很少，所以，只要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就会处于半饥饿状态。生病时，还有医生巡回治疗，也可以开个病号饭，吃得稍为好一些，而且可以每天喝到四两牛奶。

三层楼及二层楼的一部分，关的是所谓政治犯，一楼是民事及刑事犯。还有两个女监房，她们则更自由，放风时可以随便内外讲话，叫喊，而且可以说调情的话。此外，还有些人唱歌，有时几个人合在一起唱。常听到的是沙俄时代犯人们唱的歌曲，“春天来了，但不是为我”，调子虽然简单，但颇为凄凉。另外一首是三十年代有声电影《生活里程》中孤儿们唱的很悲伤的歌曲。

监牢里没有书籍可看，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扯淡聊天外，就是下棋。牢房里有两付用面包自作的很精致的国际象棋。还有一付自作的扑克，那是偷着玩的，因为在牢房内只有下棋是合法的，扑克是不准玩的。

除了这座大牢房以外，据说还有数量不多的单人牢房，以及比较严格的军人牢房，是专门关重要政治犯的。听说，刺杀列宁的女青年社会革命党人克普兰，本应判处死刑，但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处死，而判处了终身监禁。她就是在这里服刑的。这个年仅三十多岁的女人，据有人看到，已经像白发苍苍的老妇一般了。据说她整天地沉默无言，如同一个无感情的人。当然她也无人可以说话。

我们的大牢房间 在我呆了二、三个月的大牢房间里，人数在二、三十之间，人员流动性不大。面对面两个通铺，基本上两类人。一类是牧师及其他信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一类是党员干部及其他人，其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我是属于后一类的。“物以类聚”，两行通铺也基本上是这样划分的。在宗教界人中，有两个较特殊的，一个自称是浸礼教小牧师的人，是个会计师，每天深夜总要独自一个人起来对着墙角祷告一阵。他人很乐观，知道的东西也很多。一个是较高级牧师，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白发苍苍，胡须很长。他也知道很多东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似乎是个文人。他们那一行的人都很尊敬他。我曾同他们用一天多的时间，进行过一次反对宗教的探讨和辩论。我所提的反对宗教的理由和根据，他们差不多都知道，并有自己的解释。他们把宗教分为庸俗的和哲学理论的。并说庸俗的宗教，是宗教学作为向一般人宣传用的，有很多是不对的，但哲学理论的宗教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党员等人中间，也有两个人是比较特殊的。有一个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自己始终不说是干什么工作的，只说是党员。他知道很多党内斗争的情况和联共党的历史，还知道好

些国际的事。他曾透露一些他对政治的看法，曾说，我们这些人，包括宗教界人士也在内，除了个别人可能通过法庭判决外，基本上都将由oco判决，是缺席判决，没有释放的希望，不管你有无罪行或者有无事实。这个人讲得不多，比较沉默，但很乐观，仿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似的。另外一个是在党校的教员，自以为是无辜的，每天乱说，已经有点神经病的样子。他后来进行了绝食，监牢没有办法，把他送到医院，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死了。后来我听说，答应他很快能解决问题，他回到牢房后瘦得可怕。但神经病并未减轻。据上述那个高级干部说，他是个不大懂事的书呆子，过去只知道啃书本，现在弄成神经病。他被判刑后，到不了劳改营就会死去。答应他很快解决问题是骗他的。在这个时候，任何绝食，都不会起丝毫的作用。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的案件 1937年七月，原国防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及乌克兰军区司令雅基尔等八名高级将领，以通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件事使我们在牢中的人非常震惊。六月曾发表过图哈切夫斯基降职的消息。接着红军总参谋长或总政治部主任克玛尔尼克自杀，我们还看到内务部长亚戈达的像片被摘了去，以后又宣布他调职。真是一时间满城风雨。我们在监牢里，虽然消息很闭塞，也颇有大难临头之感。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红军中很有名望的人物。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在军中是仅次于伏罗希洛夫的重要人物，有“红军的大脑”之称。在当时苏联政权比较稳固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对这样重大的问题，那样仓促地决定，并快速地处决这样重要的人物呢？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当时，我

们对这些事也无从了解。我们不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以后，当我们被发送到北方不久，在这年末或1938年初，就听传说，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杀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有的说是伪造证据。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听到的传说就比较具体了，说是德国特务机关捏造他们几个与外国勾结的假文件，故意在捷克泄漏给当时的捷克总统毕尼斯。毕和苏联当时很要好，便转给了斯大林，而苏联政府根据这个假文件，就把他们杀了。颇有点三国演义中蒋干中计的味道。当时我们这些旁观者议论，认为不应仓促从事的说法是对的。可是，错事已经铸成了。

另外，在我们被判决前后，监狱里的人，在显著地逐渐增加，这也使我们颇感不快。

特别会议（OCO）的判决 1937年六月间的一天，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小椅，一个人坐在旁边，一个人在对面，让我坐下。问了我的名字后，交给我一张纸，三十二开大小，上边用打字机打了几行字，大致是：

“姓名（俄文的）（中文姓名，用括号）1906年生，因反革命托派活动，经特别会议决定，五年劳动改造，期限自被捕之日算起。”

宣读人——签字，读过了——（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这就是五年劳动改造的判词。我对那个人说：“我不能签字。”他说：“那你就签个拒绝签字也行。这只是个手续，表示你知道了。至于你签字，不签字，签个拒绝，都没有关系。判决就是判决，一样生效。”这就是oco的判决形式及内容，

手续也这么简单，两行字，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宣判了。人的生命，命运就这样轻易地定下了。

在我被宣判的前一、两天，那个党员干部也通过同样的方式被宣判了。除了名姓，出生时间不同外，其他的都和我的判词一样。他说，俄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没有的事，也没有法庭可判。”现在加了一句，“但有特别会议。”他告诫我，要我不要太奇怪。他说oco是在莫斯科内务部下组织的三人小组，参加这个组织的是较大的人物，部长级或更大一些的，下设秘书组具体办理事务。他们从各地内务部门送来的成千上万的案件，然后加以分类分组，按格式把案件编成号，向三人小组作个汇报，一星期或十来天一次，然后决定五年或别的期限，以后即用向我们宣判的方式，发往各地宣布。另外他们编一个略为详细的“卷宗”，将随着我们本人，作为“犯人个人卷宗”送到我们的服刑地点。而各地送交莫斯科的详细记录，就留在莫斯科，编上号，就成为我们的罪行档案，“永世”保存在莫斯科了。

他说，特别会议的判决特点是，（一）缺席判决，本人什么都不知道，更无从说明或辩护；（二）三人小组也不看各地的详细材料，只由秘书组分类，他们点头；（三）判词不提具体罪行，而是统一格式；（四）期限是有条件的，根据情况可以随时延长。所以五年到期，可能放，也可能不放，要看当时的情况。去年判的三年，今年是五年。不见得三年的就比五年的早出来。法庭判十年的，不见得我们就比他们先出来。他要我有思想准备；（五）无处上诉。

这些都是和法庭判决不相同的。

怎么办？俄国有句俗话，“人的人生，讨饭篓和监狱是难

免的。”只有鼓起勇气，准备经受最严酷的考验了。

集中等待发送 oco判决后没几天，我被转入另一间牢房，那里都是已判决的，包括oco及法庭判决的两种人都有。在那里我见到同时被捕的其他五个人，除和我在一起的三个人外，江一牟、梁孝孺两个人也在内，他们的判词也都是和我的一样，虽然后两个人根本和反对派一点关系都没有。oco判决的无理，从此更可证实。真是，从何说起？江一牟以前不知为何判的刑，到此不到两年，又以毫不相干的原因，判劳改五年。但大家都是“同命运的”，也就“命该如此，”也不值得有什么情绪，让他去吧！

这里比较自由了，监牢宣布，发送时间在一星期后，各犯人可以给亲属打电话，让他们送东西、衣服、食品及见面。我们孤零零的，谁也没有。只有张旭升、梁孝孺有俄国老婆，他们打了电报去，三、四天内，两个人都来了，送了些东西、食品、见了面，无非是洒泪而别。

监牢内集中了四、五十人，大多数是法庭判决的，罪名是第五十八条第十款、第十一款的居多，即反苏维埃宣传的个人及集团。他们自称为说怪话或多嘴人。刑期可不少，八年的、十年的都有。我当时曾看到有些人的判词，根据那些内容判八年十年，觉得实在不太相当。但有点却是事实，即中国人的一句俗语“祸从口出”，倒是证实了。不过有人说，八至十年不一定比我们的五年长！这也是新数学。

我见到了其他几个中国人，彼此都不谈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只好各人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了。我自己这时候不管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还是不断地思前想后，越想越不通，有时简直是一点也想不通。这是什么时代？是在干什

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自己人，……但自己呢，只有鼓起勇气，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如果气馁下去，将只会象那个党员干部所说的，到了劳动集中营就会死掉！那就任别人给你贴上一个什么标签，也就完了。因此，只得鼓起勇气向前看，于是作了一首《西江月》借以自勉。

少驹投身霜雪，征途路远山遥。犹似小舟迎波涛，何曾惧危思饱。

风疾劲草始见，岁寒松柏后凋。那怕天涯踏荒郊，屹立宁折不挠。

这样，准备走最艰难的道路。

到达第一发送站 1937年七月间，我们一批几十个人，经过了搜查、点名之后，排起队，象来时一样被押送到弗拉基米尔车站，又象装咸鱼似的装到囚车里去。天气正热，闷的真是不得了，幸而从小窗口还能得到点甘露般的水。夜来临了，也无所谓睡、躺，因为无从躺起，大家你靠我，我挤你，各听其便的歪着。第二天到了站，下车又转入另一个大牢，据说是在维体克，即以后改名为基洛夫的城市。这里人多，很乱，是个转发站。听说，一部分将由此发送西伯利亚，一部分发送极北方。两处气候都是不好，远处极边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哪里好一些，实际上知道也没用。在这里只呆了两三天，是等分组遣发的。这里每天有进有出。在洗澡及临时监房中，打架、抢东西、动刀子的事，天天都可以看到，真是使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一个五十来岁的牧师，因拒绝两个土匪一样的人抢东西（其中一个竟拿出一把匕首吓他，但没想到他却是个力士），反过来用那个土匪手握的匕首，刺入他自己的胸中，接着又把另一个土匪打倒。狱中守

卫进来，把那个死活不明的土匪抬了出去，另一个转了房间，就这样了事。“人命如儿戏”，这就是我到劳改营前夕得到的第一印象。我也只有等闲视之了。那位老牧师居然一点也不动声色。

不平常的一段押送 过了两、三天，从基洛夫大牢又照样地出发了，一批有三、四十人，其中有五、六个女的，在队的最后边。从押送队接收我们时，就感到不是那么严酷的样子了。到车站后，大家站在囚车的前面，押送队长宣布，开车还要等半个多小时，谁有钱愿买东西、食品的，可以站出来随士兵去站前商店买，也可以拿钱由他们代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事。有人去了，那几个女人拿出钱，让他们代买，都是一些吃的东西，数量也不多。将上车前，押送队让我们六个中国人和几个女人留下，其他俄国人先上去。我们以后才上去了。囚车和前两次坐的也大不相同，而是普通的新的硬席卧铺车，只是中间分成三部分，用方孔的窄钢板结构相隔，彼此都看得清楚。押送人员在两头，中间有通道。我们六个中国人和六个俄国女人在一个小间内，每人一个卧铺。把我们六个中国人和这些女人放在一起，可能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不会有什么问题或麻烦吧。但刚一上车，正在安排座位时，一个俄国女人就用中国话说了一声“老乡”。这使我们很奇怪。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给她使眼色，不让说话。安定下来不久，车就开了，使我们暂时忘记了囚车的滋味。

车一开动，那些女人就用中国话和我们交谈，押送人员来制止，大概他们认为上当了，为了少出事，而他们居然用他们不懂的中国话交谈起来。后来商定，可以讲话，但只能用

俄文，结果成了俄中语言混合交谈，以后他们也不干涉了。据这六个女人讲，她们都是在哈尔滨及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呆过，是原中东路工作人员或工作人员的家属。前几年苏联政府将中东路卖给日本，俄国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回苏联，当时曾受到欢迎并安排到各铁路上工作。现在很多人被捕了，她们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批人中，有的男人也是这样被捕的，他们的罪名是间谍嫌疑，劳改五年，也是OCO判决的。我们听了就问他们，嫌疑不弄清，怎么定罪，她们说：“告诉我说，如果弄清是间谍，那就不是五年了。”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这也是难以置信的事情。这又使我想起别人的有关OCO的事。

其中有两个女的讲得特别多，一个三十多岁，在哈尔滨呆了十几年，现在还很怀念哈尔滨，真是和故乡一样。另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从小生于哈尔滨，在那里读俄国人的中学，但中国话也不错，父母先回苏联，她毕业后回来才一两年就被捕了，罪名也是间谍嫌疑，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她拿出了一大堆象片，从小一直到回国前的，其中还有一个中国女学生，据说是她的邻居。她说，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罪名是什么意思，更不要说罪行了。她很怀念中国，虽然处境很不好，看到我们还很兴奋。她说，父母不知怎样，她怀疑她的父亲在她被捕后也被捕了，因为宣判后，她的母亲到牢房看她，但未见父亲，当她问到父亲时，母亲说，他很忙，身体也不好，不能来，但说时眼中含着泪，声音很凄凉，她不敢再问了。晚上吃饭时，她们硬给我们较好的东西吃，说同乡、同路、同命运的人，应该吃一些。我们一直谈到夜里，押送人员宣布，夜已经深了，该睡了。

次日天亮，我们总算第一次睡了一个象人睡的觉。醒来后，还可以洗脸，吃一顿早饭。可惜这样不平常的押送，时间太短了。我们到了科特拉斯，这是当时北方铁路的最终站点。从此，结束了铁路交通，我们开始了其他交通的行程，也开始进入了北方地区。

科特拉斯转运点 转运点在科特拉斯以北几里的地方，在北德维拉河之边，平原沙地，紧靠住树林。这时正是天最长的时候，我们住在帐篷里，地下铺一层木板，就算是我们的卧床。帐篷外是铁丝网，我们行动的范围就在网内。但空气新鲜，自然界一望无边，只有两、三小时的黑夜，有时还可以听到鸟儿在歌唱，对于我们这样半年多不见天日的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大变化。真是，当人们处于非常的境界时，平时毫不介意的东西，也会成为珍贵的了。那几个女的，安置在别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呆了好几天，以后又来了批乌克兰人。他们大部分和我们同罪名，同刑期，也是一个板印出来的。还有的是托派反革命宣传。这种罪名和反革命宣传也都是判处五年。假如不是和“野人师”打了仗，本来那几天是平安的。所谓野人师是一帮真正的刑事犯。他们除了身上穿着的褴褛衣裤外，一无所有，有的连鞋子也没有，不要说帽子了。他们停留在另外几个帐篷里，和我们之间有武装守卫隔离，但他们九点钟后，一齐冲出了铁丝网，不顾枪弹，进入了我们的区域。好在我们事先得到守卫的预告，不仅未睡，而且准备了棍棒，以乌克兰人为中坚（他们的东西多），我们只作为看守者，将“野人”打退了。我们看到这种情景真有点担心，如果在劳改营遇到这些“野人”该怎么办呢？真是，只好听

天由命吧！

我们又从这里坐船走了。我们在船舱里拥挤得很。“野人师”在甲板上，武装卫士用铁棍把守着下船舱的小梯。船走了一夜，天明后靠了岸，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野人师”下船了。开船以后，我们也可以上船甲板上动一动了。船又走了一段，我们也下去了。走到岸边不远的一个中转站，只是几座木房。我们有一百多人，都躺着休息，但不久被臭虫咬醒了，我一般是不太怕臭虫的，但也吃不消。醒来翻开木板一看（因为这里的夜晚天是亮的），臭虫及臭虫蛋之多，简直无法形容，太可怕了。我们只有起来，把身上穿的也清除一下，用脚在地上乱踏，来了个半身红。我们身上可怜的一点血，不愿再喂这些吸血鬼了，于是只好“站以待旦”了。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早晨，吃了点干面包，都不知如何是好，怎样在这里呆下去呢？

但在两、三个小时后，忽然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三十二开大小的纸条，上边有个红斜线，一叠子、顺着名叫，我们六人都有，另外还有十来个人。以后让我们上了一辆卡车，飞也似地向北开去。沿途看见一队一队的“犯人”步行着，有的似乎是去劳动，有的似乎和我们一样是发送的。但我们毕竟是“坐车”的，总算比他们优越一点。也许我们是重要犯人！上帝知道。

汽车不知走了多远，有时停下来吃东西，喝水，但在几分钟之内，我脱下的衣服转眼之间就被偷走了。这件上衣是我仅有的一件衣服。沿途的人这样可怕，真是令人担惊受怕。

天快亮时，大约是在早晨一点左右，来到了一个小站，

我们下去了，停在一个新的有几座木房的地方。

绍尔站 坐落在伊日马河上游河边上的绍尔站，只有几座木房，其中有三、四座是犯人住的，有铁丝网围着，还有好几座是站上的管理处、厨房、洗澡间和武装人员住处。这里已靠近极北方的起点，是平原地，有树林、小河，附近还有点土豆地，寂静得看不到人烟。这里管理已不太严了，偶而到铁丝网外边走也没啥。管理人员看过的报纸，可以要来看。中国开始抗日的芦沟桥“七·七”事变，我就是在这里从报纸上看到的，只是已经迟了好几天了。管理处武装人员可能见我们几个人老实，知道不会跑，也无处跑，叫我们出去在附近的土豆地里挖土豆，算是劳动吧！因此，也多给我们一些吃的。

我们到达绍尔时，已有少数人在那里。以后又来了列宁格勒的一小批，莫斯科的一小批，还有从乌克兰来的一大批。在凑到约二百人的时候，告诉我们即将出发了。从到达的人员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党员、干部也很不少。

出发时，绍尔站准备了三个较大的木船。但连棚、盖，什么都没有，只有四个划船用的桨。每个船约坐六十人，已经满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小船，有棚、帐，坐的是押送人员，带着粮食、面包和锅等东西。伊日马河上游，水浅，河小，水流很慢。我们的船是顺流而下，有时有人用桨划几下，一般是自行漂泊。完全靠水流漂泊，走得很慢，走了一昼夜才停下来，用大锅煮了一锅粥，大家每人分了一点，算是吃了一顿热饭。饭后，让大家躺在沙滩上，东一个，西一个倒下休息睡觉。真是天为屋，地为床，享尽了大自然的风味。我躺了下去，虽然很疲倦，但总是睡不着。这一天，约

略有点月光，因为天不很黑，所以月亮不太显眼。但水上却笼罩着水气，如烟一样，大概是因为入夜天气凉了，水上的潮气成了结晶，所以象烟。我望着这样的景象，才想起了杜牧的古诗《泊秦淮》里的描写：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但除了第一句外，其他情景都完全不一样了。我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所以睡不着觉。因将《泊秦淮》按韵改作名为《伊日马河》：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荒郊无人家。

大地沉寂难入梦，愁肠何处看落花？

我们这个船队顺流漂泊了好几天，其中也有一些事值得一提。如有些地方蚊子多得不得了，最多的地方，在河道窄小两旁有树的地方，河上成一层雾，船过时我们只得用衣服将头、脸、手都包起来。又如有一次过一个急滩，人们都只得下船沿岸步行，而四只船如小孩玩具那样，左右摇摆不定地在急滩中横渡过去，留在船上的两、三个大胆的志愿人员，也慌得不知所措，几乎出了事故，真是惊心动魄地才过去了。有一次在一个居民点停留吃饭时，有个人拿了两个“肉罐头”和我们的人换鱼和面包，没换成就卖了，价钱不贵。有一个人贪便宜买了，后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泥沙，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两个罐头盒套成的，所以从外表上看不出。

路上每天要靠岸停一次作点热饭，并休息一次。犯人们总感觉到饭里的油及肉太少。于是有人提出撤换“厨师”，改由我们中国人干，说我们老实不会捣鬼。在众人的要求

下，我们虽然声明未当过“厨子”，也只得干了。因为他们说“中国人没有不会作饭的，是天生的厨子”。我们只好试一下。第一次放猪油及肉时，经济管理员说，不能全放下去，不然，太显眼了，对前几个俄国厨子面上太不好看。我们只得听他的话，照顾同路人的关系，只放了定额的三分之二，即使这样大家大为惊叹，伸出大姆指夸奖我们，并让我们几个中国人吃饱为止。如果全放进去，也许会把大家乐坏哩！

这样，我们只看到天空、周围大地，在水上走了记不清是几天还是十几天，才到达了乌斯特——威耳马。顺流漂泊就到此结束了。乌斯特俄文是河口的意思，即威耳马河口。以后据说要逆流而上了。

乌斯特——威耳马 乌斯特——威耳马在苏联北方的一条大河伯绍拉河上。这里已是北方大劳改集中营沃尔库特的开始。据我们同行的两位地理教员说，他们不知道有沃尔库特这个地方。但据说还远着呢！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劳改营的模样，围墙、四角有岗楼，武装士兵在那里巡视着。我们没有进到里面去，只在外面木头房中呆了一、两天。有船了，才增加了一些人，还有几个女的，共约二百多人，搭上轮船，就逆流而上了。

船是平时江中行驶的小客船，很干净，我们这帮人东一个西一个，舱内、甲板上到处都是，各自占个位置，白天坐，夜里躺。押送人员则在客舱内，还有些食物、东西。在船上船下，我们都可以靠着栏杆自由行动。船上也许有饭，但我们是吃不到的，还是啃黑面包、咸鱼，但船上有开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大改善了。

船是用两个外轮打水前进，河水很浅，很清澈，有时可以看到水底。因为是逆水，船似乎又是超载，因此走得很慢。我们坐在船上，望着两岸，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树林，据说都是原始林，但树林都不很大，大概是极北方的原因吧。如果不是犯人，坐着这样的船，在这一带旅游一番那倒是很不错的。沿途除了树林外，偶尔可看到岸上只有几座房子的居民点，但是很少的。

和新加入我们队伍的人，很快就熟了。其中有两、三个女的，据说是教员，在不停地用沉闷忧郁的声调唱着歌，我听了唱的词，又问了她们，说是临时编的，其中有这样几句：

银白色的寒水，卷起了无数的轻波微浪；在寂无人烟的林区里，静静地流荡。高浮在河上的幽默明月，那知道人们的心情创伤？

我们逆着流水北风，茫茫然感尽凄凉，经过几个寒暑，也许能够顺流返回家乡，也许将自己的骨骸，永远在这里埋葬，被人遗忘！

这样的心情，何只是这两、三个女教师所具有的？这唱词就叫做《乌沙河上》吧！

走了几天后，到了一个农场——考其莫斯，让我们下了船，在岸上搭起帐篷。这都是押送人员根据预料而随带着的，原因是这时水浅了，不能再向上游走了。关于这个农场，以后还详作叙述。

在岸上呆了几天，果然下起雨来了，又过了几天，果然来了船，还是那样的船，我们赶紧收了帐篷，慌慌忙忙又搭船继续北上。

大概又走了一天多，树木渐渐稀少了，很快就完全见不到树木而只有一些小杂木和草了。据地理教员解释，我们大概已垮进北极圈了，以后也再看不到树木了。果然，大地茫茫，一片荒凉，什么也见不到了，我们这时的心情，实在有些不好受。

乌黑特，这个地方是船行的终点，我们就在这里下了船。这是沃尔库特的一个转运站，煤从这里装出，东西、食品和人从这里输入，满象个不大的河上码头。我们被安置在几座木头房里，住的倒也对付，只是吃的东西少，我们在船上吃干的，又饿几天了。另外，是野老鼠多得怕人，又大又多，满地跑，它们倒一点也不怕人。大便时更是可怕，它们前后跑，贴着脚根窜来窜去。

这里的犯人不少，可能在千人以上。除生活服务的外，都是装卸工。

幸而在这里只住两、三天，就让我们集合去坐窄轨小火车，前往最终目的地。

这天恰好在下小雨，时断时续，天气也冷，使我们感到，八月的北极圈确实和内地的八月不一般。我们坐的小火车，就是运煤回去的空车，又黑，也没有蓬。车走的是坡路，很慢，而且时走时停。早起啃了块面包就上车，到了上午据说还没走到一半。我们在冷风细雨的吹淋下，身上连一点暖气也没有了，倒真是成了饥寒交迫的人了！也没法子，身体再缩紧，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些“富人”拿出面包干在啃，还有人有一点面包。我们几个中国人把自己所有的钱，几个卢布凑在一起，让他们分点面包给我们，但遭到拒绝。我们想，这里哪里有一点

“同病相怜”的精神？

正在此时，忽然看到一个象中国人的样子，我们喊了一声“是老乡吗？”他转脸看到了我们，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又问肚子饿吗？说罢，他跑到前边，将一个背面包的人拦住，说了几句，把那个人的一个大面包，扔到我们还在行走着的车上，真是“雪中送炭”，可帮了我们大忙。“天涯相逢”的人，中国同胞才感觉到血肉相亲。我们摸着面包，还是热的，我们自己只吃一半，将另一半赠送给其他几个和我们同样穷的人吃。他们说：“俄国人真不如中国人！”

天将黑时，才到达最终押送目的地沃尔库特，从而便开始了极北方的生活。

在苏联极北地区

沃尔库特 在地位上是劳动营管理处所在地，从乌斯特——威耳马起，沿乌沙河一带一千多里的各个站、地的劳动营都属这里管。我也无从知道这些地方究竟有多少犯人。这里，据说有上千人，是煤矿区，沿途还有各种装运站、转运站、农场。但最多的是修铁路的人，当时铁路只到科特拉斯，从那里往北，直到沃尔库特，有二千里，都是人烟稀少或渺无人烟的地方，正在分段修建铁路。我们从那里来时，坐在汽车上见到一队队的人，就是修铁路的。因为只靠乌沙河不能完全解决运输问题，夏天要到四、五月才开冻，水也小，七、八月又封江了。由于条件不好，修路的人死了很多。我们到沃尔库特及各个站的犯人算是不幸中的幸人了！

在地理上，东边是北乌拉尔山，常年积雪，北边是北冰

洋，西边是荒无人烟的低洼地，冬天冰雪封锁，夏天泥水包围，而且有陷泥。只有南面是一条河，其他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只要把住了河口及河上通道，犯人们不要说跑不了，有翅也飞不出去。这里气候非常不好，夏天风也不小，从九、十月起，就开始积雪，到次年五、六月才能化完。不见雪的时间，一年不超过三个月。我们走了两个多月，到达时已经九月了，不几天就下雪了，但还不大。据说，积雪不少，由于风大，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干土还露着，龟裂很厉害，有的裂缝可以埋死人哩。这里已经见不到树了，在高处一望，八面荒凉，真是赤地千里。所以风特别大，大到路边得立上桩子，用粗绳连起来，人得扶着绳子走才行。

这里的煤矿是前不久才出煤的。据说，在沙俄时代，十九世纪末，一个在北冰洋探险的英国人，不知根据什么迹象，断言这里有丰富的煤田。但沙俄无力开采。革命后，苏联政府曾派人勘探，也证实了。从三十年代起才动手，但由于交通不便，远处于荒无人烟的北极，无法动用民工，所以由内务部门采取强迫劳动的方法，将犯人送到这里干活。而对其他一些有政治嫌疑或认为不可靠的人，不管有无罪证，也以各种强迫办法，送来开矿。大概认为这可以“一举两得”吧！

这里的煤还是“年轻”的，很容易燃烧，就是不耐烧。根据煤的形成历史，和有些煤块上存在的大树叶的痕迹，说明在多少万年以前，这里还是热带，茂林区，大叶树，也许当时地球的转动方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地层的变化也可能是很大的。

我们到达时，这里已用木材建起了两、三条街的房子，

福利生活部门已经有了，有几个煤井也出煤了。苏联政府下决心在这里开煤矿，是因为北方缺煤，连列宁格勒及其他北方城市，除了用泥煤、木材外，要用煤都得经过几千里从南方运去，这就太不经济了。

我因为身体瘦弱，经过检查定为三等劳力，因而不用下煤矿及干其他重活，而可以干轻活。先是整地，拔草，但不几天，下了一场雪，也开始刮风了，穿着单衣已经不行了，地上已有裂纹，根据先到的人一年来的体会，可以用一小段词儿来形容这个地方。且叫它沃尔库特调寄“忆秦娥”吧：

北风烈，八月吹来经年雪。经年雪，
咆哮似虎，刺穿如铁。
举目四顾人迹灭，仰首高望鸟飞绝，
鸟飞绝，长天无物，大地龟裂。

沃尔库特地势较高，空气稀薄，上一个小坡也会使人气喘，感到氧气不足。但气候干燥，对于肺病及心脏病，各有利弊。这里属于北极圈，差不多是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我们到时，已经天黑了，据说六、七两个月，没有夜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在露天看报纸。冬天在屋里一直却要开着灯，只是上午时南方略有点光亮，表示太阳还存在。

见到从高尔基来的中国人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批人，其中有从高尔基来的和我们情况相同的中国人，有1930年流放去的，1931年流放去的，还有象江一牟那样1930年判了五年劳动改造又判的，1935年释放的李一凡、范文惠，这次又以反革命托派活动罪和我们一样又判了劳动改造五年。来的中国人还有：鲁也参、纪大才、傅学礼、潘树人、杨春、王

源昌等。相见以后，虽然几年未见了，也没有什么说的，因为彼此都是一样的事。他们之间，除了个别人身体好的，下了煤矿，大部分都分配到生活福利服务部门。在这样的地方，见面了，有什么说呢？真是：

霜白风冷月色残，草黄荆衰日光寒，
天涯沦落偶相遇，欲语无言各自叹。

短期的衣食住及工作 我属于弱力队，在外边干了几天活后，又被派到菜窖工作，拣菜，主要是土豆。还是去年的，新土豆还未到，只是作些准备工作。这活倒还可以，不在露天，还多少可以多吃点菜。衣服还是自己原来穿的，公家的棉衣裤主要是先供应煤矿上的及室外工作的，我们还排不上号。而我原有的一件毛衣、心爱得暂时还舍不得穿，放在帐蓬里，虽然那里有两个值班的，结果反而让人家偷去了。当我问他们时，他们笑着说：“你到什么地方了，还问这些东西，而且问我们！”这个答复不言自明了。这里吃的方面，因为是煤矿区、供应较好。黑面包随便吃，各住处的桌上都放着整个的。这一点，后来就再也没碰到过。在住的方面，他们干活重一点的和来得早一点的，都住木头房，通铺，我们则住在帆布帐蓬里。据说，住这样的帐蓬还要过冬，真想不到，怎样能顶得住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和几级以上的大风及不断的雪。现在是九月，棚内有两个用铁桶做的炉子，白天封着火，夜间烧得通红。不然就无法睡觉。幸而，不久我就被发走了，未尝到冬天帐蓬的滋味。

劳动营中的怪闻 这里是个大劳动营，说不清有多少人。犯人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这样的人，是属于政治犯。不论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尽管有程度不同，但都得干

活。另一类是刑事犯，他们自己叫做生活犯，很会接近人，各层小头目都由他们充任，有一部分也干活，而且干的还不错，但有一部分什么都不干，生法子在混，完全未改本性。这里有小偷小窃、贪污、投机倒把、强奸、妓女等等。这里女犯人很少，她们成了攫取的目标，可以什么都不干。但吃、穿都不缺，有人给送上门，她们是变相的或者真正的卖淫者。没有女人的地方，还有几个壮汉聚伙鸡奸的。

还有赌博的，赌钱、赌吃的，还赌相互偷盗，输了的人必须去偷人家的东西。

偷的风气很盛行，相互偷，但较多的是偷公家的。有一次库房来了黄油，过了几天，被偷出了几箱，有的还在住房中公开拿出来吃。有的人看见了也装作不知道。

东方人可占便宜 当时那里的中国人、朝鲜人很少，除了少数几个下煤矿及干一般工作外，大多数人都在生活福利部门，如洗衣房、澡堂、面包房、厨房。所以，他们的衣食住各方面都比较好。在俄国人眼中，他们能做这样的工作，老实，是最主要的原因。

从沃尔库特被发送 到达沃尔库特约一个月，在十月初又有一批约二百多人被发送到下游。其中中国人有我、鲁也参、李一凡三个。天已经很冷了，我们被装在一个运货的大木船上，由一个小轮拖着走。过了一天，小轮单独走了，我们那个大木船便独自顺流漂着走，后边还跟着一只押送人员的小船。这时水大，所以相对说起来，走的还不太慢。

因为天气已冷，犯人们都在舱底，分成四行象在坟墓里一样，一个挨着一个躺着。但由于是个旧船，舱底的木板大概已经坏了，有的用脚一踏就见到水，可能是个漏船，而且

水离舱底板只有不过几寸，因而底板潮湿得很。有些人有东西，下边还可铺得厚一些，上边盖多一些，还会暖一些。我们三个中国人，除了身上一件秋大衣及两件棉大衣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又不那么会强占、投机取巧，占的地方又在靠楼梯的地方，上边就是个大口子，如同天窗一样，只是由于楼梯挡着，我们才没有看到天空。怎么办呢？我们将秋大衣铺在下面作垫子、两件棉大衣盖在上边，兼顾两侧。三个人侧身面对一个方向，互相挤在一起，翻身时要一齐翻才行。这样可以将各人的体温相互取暖，就靠这样来抵御寒冷。每天凌晨，船内咳声四起，不是困得很时，不容易睡得着。好在上天保佑，我们三个体弱的人，睡的地方不好，铺盖的都很少，而由于相互挤着取暖，居然顶着了寒冷而不咳嗽。俄国人觉得奇怪，连我们自己也未料到。有时夜里醒来，听到小浪打着船，心里真有点寒栗。前途未卜，不知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早晨，被咳声震醒也不起来，因为三个人挤着，比较暖和多了。

过了几天这样的漂泊生活，天更冷了，雪花也从天窗落到我们的身上，上船板一看，河中已到处是冰，岸边已开始冻了。看看水，才真正感觉到寒冷。有一天夜里，押送人员把我们都叫醒，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上岸。因为冰太多，船已走不动了。我们出来一看，船离岸只有几步，已冻在冰内，到处覆盖着一层白雪，但雪已停，而且月光高照在天上，反映到雪地，倒是一幅美景，可惜此时我们无心去欣赏了。我们船上的人，大部分是年老、体弱的，少数是调皮捣蛋的。押送人员叫我们准备步行前进，说离这里约二十里，就可以找到停留的地方。但有三、四个年老体弱又有

病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愿意在附近草堆（不知道谁打的牲口饲料）躺着等待交通工具。押送人员开始不同意，还说不能留人看管他们，他们说，他们连走都不能走了，可能死在这里，还怕跑得了吗？并希望押送人员不要留在那里，让他们安然、自由地死在那里吧！押送人员也无办法，只好不管他们了。押送人员领着我们，有时在岸上，有时在河边冰冻的地方，有时在岸坡上，踏着雪，顶着月，深一步浅一步地稀稀拉拉象打败仗的逃兵似的，散乱地排着长队摸着前进。不少人摔跤了，爬起来又走。带着行李的人，这时候可麻烦了。我们一无所有，则比较轻松。不少人找到一根棍或从树上弄一个枝杈当拐杖，这样还好走一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走得满身大汗，才望见了一个象是居民点的地方，这可盼到了。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就是我们一个多月前因水浅下船而停留过的那个农场——考其莫斯。我们都挤进了食堂，农场里的人还未起床。坐下去后，就不觉得冷了，很快，你靠我，我靠你，大家都睡着了。这真是饥寒困累交加的结果啊！直到打饭的人来了，才把我们叫醒。

天亮后，押送人员在农场要了一个爬犁（雪橇）去找留下来的那三个人，据说只回来一个病人，两个已在那里死了，把他们拉回来埋了，大概在册子上注上“病死”就完事了。

以后，把我们安置到一个新建好的马棚里，临时关押犯人。自己砍树木，建立了通铺，自己在路边架上大锅，算是给我们二百来人做饭，又装了个烧水的地方。我们三个人都分配了临时工作，我烧水，鲁也参修整锯条，李一凡值日，

都是按轻工作分配的。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发送到什么地方。在这里只是暂时的。

大战虱子 本来在三个月前，在路上押送时，身上都已经有虱子了，到了沃尔库特也没人管这些事，虱子就繁殖愈来愈多，到了这里在马棚里搭上左右上下通铺，二百多人，挤得满满的，虱子就更加猖獗了。其数量简直多得不得了，在我盖的大衣上，里外到处爬。那时天已很冷，我白天将大衣挂在外边去冻虱子，果然它们都不会动了，不用抓，用手摇打几下，都掉下去了，把衣领一翻，里边一群一群的，真把我吓了一跳。晚上初睡时，因疲倦了，还不怎样，睡醒一觉后，觉得身上到处在爬，伸手一摸，就可以抓住。俗话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多了并不是不咬，而是到处在咬，实在是没有办法罢了。

过了一个多月，天气冷得很了，才决定把我们移交给农场。为了不传到农场，对虱子进行了一场“大战”。我们铺的草全烧了，还把房屋关起来，用硫黄薰了两昼夜，我们洗了澡，把内衣全换了，外边衣服、手巾、用品全部用硫黄薰了一天，而且这边进、那边出，都要彻底过一个消毒关，然后才允许我们进农场，算是农场的劳改犯。

考其莫斯农场阶段

(1937年11月—1941年12月)

考其莫斯农场，在乌沙河岸，附近不太远的地方，据说有几个居民点，是本地区少数民族科米人住地，以考其莫斯（或科其莫斯）而得名，地处北纬六十六度多一点，虽然出了北极圈，但还是紧靠着边，所以还是属于极北方地带，但比沃尔库特已偏南约一度多，这里已经是森林地带，虽然是原始森林，但树木并不太高大。主要树木是松树和白桦树，参杂地长着，但这两种树木都是好木料，都很有用，只是生长得太慢一些。碗口粗的白桦树已不多见了，横截开来看年轮，已经都是一百年以上的树木了。

这里虽然还是北极地带，但由于有树林，而倒不象和沃尔库特只有一度之差，这里的气候可暖和多了。一般是十一月冰冻封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开江跑冰。虽然不是半年为昼半年为夜，但六月还是没有夜，十二月和一月每天有一个小时左右见到日光，其余都是白天而又非白天，好在有积雪反光，所以早晨五、六点钟赶马车出去，还是可以辨别道路的。

夏天最高温度可达二十摄氏度，劳动时可穿两件单衣，但清晨或夜里穿小棉袄也可以。冬天温度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之间，一月间则在零下三、四十度。有一年（可能是1930

年)最冷,一月份几乎一个月都在零下四十度以下。因此农场连续半个月未出工。这里也属于冰冻地带。

这个农场是前几年就开辟的,我们到时,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可能就是由这个岛而定建的。大陆(即岸上,是相对于小岛而称的)上是农场的管理处,居住处及各种生产服务所在地。因为小岛在每年开江时被水埋没,所以只能在开江后,才能住人、耕种。

农场在岸上也逐渐开垦耕地。此外有育秧的菜园。种植的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萝卜、芜菁、蔓菁、小水红萝卜、甜菜,温室及温床中的黄瓜、西红柿等,一部分自给,大部分运往沃尔库特。这里实际上是总管理处的一个蔬菜基地。由于生长期短,这里不种植任何粮食。此外有许多马房,因为没有拖拉机等,马就是主要的动力。有牛房,提供牛肉、黄油及牛奶产品。有养猪房,提供肉类,鸡房提供肉及鸡蛋;还有农业试验站。其余的面包房,食堂、澡堂,洗衣房一应俱全。以后又修建了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还建了广播站,电锯站等。虽然规模不太大,但却是比较完备的农场。

劳动营管理 这个农场的各种劳动,分散在各地进行。所以,把犯人按工种编成队,由队长直接带领,而不是象其他劳动营那样由武装人员押送。所以,在精神上不大感到强制性和监督性,其他一般生活服务及管理人员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可能是农场对犯人的劳动改造方面在精神上最大的优点之一。我们到达时,没有围墙及岗哨,不仅在工作时行动自由,在工作之余也是行动自由的,因此我们可以观察自然界,踱来踱去,如跑冰时可以站在岸上欣赏。以后,根据上

级命令，修建了围墙，设立了门岗，但也是形式，只是由队长带领人出去，但回来时都是分散的，仍然没有武装人员押送。

劳动营有一个头，是内务部门的一个小官，还有一些武装警卫人员，分别住着，但不经常押送人，所以人数不多，另外只有十几个人是自由民。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犯人，包括大小头头。在小岛上，更是自由了，在日常工作中，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劳动营里。当然，工作服都是公家发的，千篇一律，工作完时，则可换上自己的（如果有的话），这大部分是指女人，男人则无所谓。

犯人组成 农场的人员，相对的讲，流动性不太大，但还是有变动的。我们初去时，约有三、四百人，加上我们突然增至五、六百人左右，以后又有所减少。

犯人中的政治犯占绝大多数，“生活犯”很少，刑事犯更少。所以，农场的秩序很平静，比较规矩，打、骂、偷盗的情况很少。农场里虽然设有一个小屋子作为监牢，但经常是空着的。

而政治犯中由法庭判决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OCO（特别会议）判决的，还有一些是各地的“特别法庭”判处的，这都是缺席判决的，而且都是文字罪名，文字罪名是各色各样的。象我们这样的反革命托派活动，为数不少，有些人什么都不是，既不是党员，而根本不问政治的也有。还有所谓反革命托派宣传，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宣传，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间谍嫌疑等。从1938年来了一批女的，其中很多有文化，是文明的，罪名是国家变节分子家属，人民公敌家属。其中有一个是伊万诺夫市委副书记的妻子，

才三十多岁，看样子很文明，是个中学教员。她说，1937年后半年及1938年初，伊万诺夫很多党政工作人员陆续被捕，她的男人也被捕了，他事前告诉她说，那时天天在开会，天天有人不见，谁也不敢问。他如果当天不回来，就可能被捕了。原因嘛，谁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果然未回家。她到内务部门查问，也不告诉她。她问的急了，而且后来闹起来了，就把她也逮捕了。以后就定为人民公敌家属，而且判了八年劳动改造。其他人也有不少是这种情况的。从乌克兰、高加索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按这个条款判处的。

这里的特点是女人多于男人，虽然多少不等，但没有少于一半的，即二分之一。其中只有几个是小偷，其余都是政治犯。里边很有一些较高级的干部或高级干部的妻子。当时这真使我莫明其妙！如共青团中央委员、州委书记、副书记、部长的妻子，还有个别人，以后再分别简介一下。但也有普通的女工人，也有信教的虔诚女人。

四年的农场劳动 初到时，我暂时做烧开水的工作，因为他们看到我身体弱、瘦小，无力气，干不了其他事。这倒是劳动营中比较轻的工作。这个工作主要是在我们临时借住农场阶段，即在马房内暂住的阶段，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后转为正式农场犯人后，就服从农场的总的分配了。主要的劳动，按时间先后，分为以下几种：

i. 第一次到树林里去伐木放树 1938年初，我第一次被分配到树林里去伐木放树，这是我从未干过，也未想过的劳动。我从未拿过斧，但现在要拿起斧去伐木了。按体格讲我是属于三等，即体弱的，劳动定额，三等的是每天2.4立方

米。工作量，是把树砍倒，去掉枝杈，再砍成三米长，以后垛成堆，有0.8米高，这样 $0.8 \times 1 \times 3 = 2.4$ 立方米，就算完成任务了。其他人有一等二等身体的，比我的定额多，要3—3.6立方米。即垛堆要到1—1.2米高。

我第一天，在雪深约五、六十厘米的树林中，走动很不方便，费了很大的力气，几乎连吃奶的力量都用上了，弄到精疲力竭，除了中午啃块黑面包外，基本没有休息，但到收工时，我还未垛成堆。队长来了，看我累成这样子，便帮我垛成堆，一量还不到0.6米高，即约为1.5立方米。队长说，第一天，不习惯，不会，已经够累了，算是完成任务了吧！给我写了个2.4，即100%，以便我能领到犯人应领的面包及饭食。第二天，队长给了我一把较好的斧子，并告诉我怎样干，我仍然是尽了最大努力，结果只增加了一些，到了约1.8立方米。第三天又用了最大的努力，还不到2立方米。又过了两天，我累得连走路也很勉强，2立方米也很勉强了，自己坐在那里休息，因为不休息也真不行了。我旁边是个芬兰人，用自己的锯及斧，每天比较轻松地可以干4立方米。他干完之后，到我这里，帮我伐了三棵较大的树，给我补到2.4立方米。他说，放大树又快又合算。队长来见了很惊讶，夸了我，我说，我真干不了，是别人帮我干的。我放不了大树，而中小树不合算，不出活。队长说，那就算了。一个多月，不论我干多少还是有人帮助我，队长都给我写2.4立方米即100%。但由于体力弱，不仅不能有所增加，而实在干不下去，因为吃那么一点东西，也补偿不了。队长没有办法，在调度会上提出，给我改调到弱力队去。

2.弱力放树队 到了弱力放树队一看，是四五个女的，

大部分比我年纪稍轻些。我想，这样一个男人，正在三十二岁年纪，而身体这样，真有点惭愧，也担心这样怎能经得住几年的劳动改造呢？虽然队长是那样的照顾我，但在精神上我感到压力还是很大的。

弱力队的任务不是放树，而是清理场地。别人伐过树的地方，我们将散乱的树枝收集到一起，他们剩下的小树，我们把它们砍掉，和树枝放成堆，然后用火烧掉，定额是每人多少平方米，几个人合起来，共多少平方米。这工作轻得多了，收集树枝后，点上火，成个火堆，还可以取暖，望着火堆燃烧。这实际上是照顾人的工作，而平方米又是大致计算的，所以每天不太累，又可保证完成100%的任务了。

这个队中，有个女的约三十五、六岁，是莫斯科戏院中一个歌舞员，不是主角是配角。长的不错，会唱、会跳，非常乐观。除平时说笑话外，烧着火堆后，她就又唱又跳，说是为大家助兴。我问她一些问题，她的答复也很有趣。如，她不知为什么判罪，对罪名她连印象和概念也没有。她说，她也不想，想也无用；说她是演员，演员到处都是演戏，演什么角色都一样，可以跳舞，当宫女，舞女，也可当犯人。她说，乐观人常在；还说，人要处处为家，劳动营也可作家。她说，演员到处都应该演，自己演，也给别人乐趣。她确实给大家不少乐趣，也帮助我略为改变了自己的悲观、愁闷的情绪。

3. 锯板劈柴 在弱力放树队干了不久，又把我调到澡堂锯板劈柴。任务是，为澡堂准备木柴，将树林中拉来的树木，即我开始工作时放的树，锯成半米长的木柴，再劈开成两半或四半，搬到澡堂烧火的地方及洗衣服的地方。因为要

锯，所以得两个人干，我的搭手是列宁格勒一个区的苏共工作人员，入党已将近二十年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文化程度不低，罪名和我一样，也是五年，OCO判的，时间也差不多。据他说，他未参加任何派别，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当权时，他是区委委员之一。他的家庭情况，他不愿说，只说，现在和我一样。

每天的工作量，大约为二、三立方米。开始我感到很吃力，拉锯一阵子，就感臂痛，只得左右换手，而且拉不好，搭手很不高兴。但由于他文化程度高一些，教给我方法，很快就习惯了，一爬车，约一点五立方米，可以一阵拉完。劈柴也学会了。顺劈、倒劈都行。两个星期后，已不很疲倦了。另外，是在澡堂附近，可以到屋里坐着休息。烧水的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另外的好处，是这里面包较多，澡堂、洗衣房都是女犯人，她们还可以从厨房多领点吃的，面包也吃不完，我们沾点光，也可吃饱了。

澡堂、洗衣房在一起，有八、九个人，都是女的，其中除二、三个外，都是KPTB，五年，OCO判决的，从列宁格勒来的。澡堂主任是个党员，而且是个劳动模范，工作很好，在列宁格勒很有名。被判原因和我的搭手差不多。其他还有工人及非党员。其中有以后和我在九年释放后结婚的莉莎，当时是澡堂的服务员。

4. 吃饱又吃好的几天 过了两个月，在澡堂主任向派工的（分配劳力管理员）建议下，我们拉板的两个，和厨房拉板的对换了。工作一样，但到那里不仅吃的饱，而且吃的好，肉、菜、主食都好。几天以后，黑面包根本不吃了。厨房工作人员自然不用说了。厨房主任也是列宁格勒的，和我们一

样，年纪已将近五十，很有点气派，好作风，在外边就是食堂管理，内行。对我们很好，我真想不到劳动改造的劳动营中，竟还有这样好的工作地方，比外边吃的还好。而有的人，却饿得很，甚至于几乎是在饿死的边缘挣扎。但是好景不长，换到澡堂去的一对，不愿在那里，因为那里不如这里吃的好，所以向派工的行了点贿赂，又换回来了。我们不会干那些事，只得回来，但我们还是满足于这个工作的，比放树好得多了。

5.当烧火工 又过了些时，一个烧火的病了，让我代替。我原不会烧水，另一个烧水工告诉我怎样烧法，两个倒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把澡堂门一关，还可睡觉。经过一段时间，我摸熟了烧火的方法，还可节省木柴，劈柴的工作量就减少了。从这时起，我和澡堂及洗衣房的人，就更熟了一些，因而工作更近了些。

6.当马夫 春耕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马也多了，我被调到马房当马夫，而我的工作，由比我更弱的人代替了。我开始向派工的说，我从未和马打过交道，而且怕马。但不行，还得去。我向马房主任也是这样说，他给了我一个大鞭子说，有了它，就不怕马，马要怕我了。没办法，只得学着干。不久，比较习惯，倒觉得是轻工作，就是有点危险，马多了，我还是有点怕。

以后换了个新主任，有臭架子，很主观，对上拍，对下压。不久他让我放马，我不会骑马，说不能放。他一定让我去。后来，有一天晚上去，次日早晨赶回时，少了两匹马。他威吓我，找不回马就会增加劳改期，因为马比人值钱。我和他大吵了一阵，并说，将来真要打官司时，我有话说，现

在我不讲，那时说不定谁增劳改期（即加罪）。他又找了个老放马的，领着我找回。以后我坚决不再干了，恰好，赶马车的队长是个少数民族土库曼人，与新疆相邻，叫我老乡，他让我到赶马车队去。我说，不会，他说不要紧，这个工作好学，轻松，而且是长期的。我只得去了。

7. 赶马车 这是1938年夏天，我开始赶马车，在这个队里，我一直干到1941年末离开农场为止，没有再转到别的队。但在这三年半的赶马车时间内，不是象他说的那样轻松，虽然比放树轻的多了，但也经历了各种风波。

开始的困难 开始赶马车时，不仅由于不习惯、困难大，而且有一段时间拉大车，自己装卸车，途程短，而自己体力弱，几个月只凭那一份吃不饱、饿不死的口粮，有的连铁锹也举不动，但也没有办法，只得一只胳膊放在大腿上勉强装车，还有人说装得不满。每天都累得很，情绪也就低落，又有点自悲，不知怎样度过这几年。

克服困难的会 秋收时，把我调到温床菜园去赶马车作服务工作，又遇到一个队长对我很好，农艺师也很好，工作又无定额，比较轻松，不紧张。农艺师和队长认为我稳当，老实、积极服务、不偷懒，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每天保证给我写完成任务120%，这样可以吃到较好的“奖励饭”。温床菜园中都是女犯人，有些人家里常寄包裹，吃不完黑面包，送给我们吃，更主要的，还可吃菜园中的菜，葱、胡萝卜、土豆等，这不仅可充饥，而且可补充北方最缺的东西，即新鲜菜及维他命C。所以，我很快身体大有好转，精神也比较好了。关于有些人的情况，以后再专门介绍。

几次危险的事 冬天，菜园无事时，我就到大队中

干一般的活，和大家一样。但由于熟识了，特别是和女犯人相识多了，总还是经常可以得到一点吃的东西补充一下，所以虽不饱，但也不太饿，基本上可以活下去，而且每天是在大气中工作，跑来跑去，自然条件是好的。由于冬天长，从十一月到五月，差不多七个月，所以就出过一些危险事故，如：

（1）横渡初冻的河 1939年十一月，开始封江，要我们十几个人带着马和女人到下游考口瓦抢救冻在冰上的船内土豆。由于刚封江，冰薄，特别是还得横渡河，而且又在夜间，一方面听到小流水声，一方面听到马蹄下薄冰的碎裂声，但还得走。我们都是步行，手拉住马辔头，维持一定距离，相互打着招呼，前面有人探路，惊心动魄地一直曲曲弯弯地走了约一个钟头，才到达岸边，那里冰已较厚，不大危险了。

（2）几乎成了残废 在考口瓦抢救土豆时，有一天在过午后不久，宣布将有大冰来临，提前收工。各个马也有预感，我来不及穿好棉大衣，马就飞跑了，我坐在爬犁上，动也不能动。抢救地点离考口瓦有二、三十里，顺着河道，风也大。等跑到考口瓦时我已失去知觉，马到马棚后，我差不多冻僵了，别人帮我卸了马，把我抬到屋里，包上衣服，用雪狼搓起来，上身及头很快暖过来了，但两条腿不能伸曲，还无知觉。又搓了一阵，才感觉浑身到处都象针刺般发痛。他们又给我弄了点白酒，然后，用毡子、棉大衣给我盖上，直到出汗，后来我才睡着了。说也怪，第二天起来，一切都正常，居然又可以去赶马车。

（3）看到别人的残废 我当时初醒过来很害怕，原

因是曾看到过比我轻的人成了残废。那是1938年冬，我们几个人赶车到另一个地方去，因那年防寒衣服尤其是毡靴未到，我们都是穿着皮鞋。天很冷，在零下35℃左右。我只得步行。有一个懒一点，走一会，坐一会，后来遇到一个地方雪下有水，他的鞋湿了，以后又冻了，最后脚也冻了，冻到失去知觉，不能走了。到目的地以后，没有抢救过来，脚已经发黑了，结果被锯下来了。据说，如不锯，黑带会继续上升，可以致死。锯后，救了命，但成了无脚的废人了。

（4）一次大风雪 有一次冬天去拉干草时，干草离农场的地方少则二十里左右，多则四十里左右，都是顺河道的冰上来往，早出晚归，成队去，两个人算一队，三个爬犁，是够紧张的。有一天，已装好的爬犁正返回时，路上遇到大风雪，在河道上无树木，风特别厉害。。有时简直走不动，因为干草车占的面积很大，风的阻力也特别大，已经有几次将车刮倒了，空人也走不动。没有办法，和队长们商量，决定在路上露天过夜。于是将爬犁向外，马向里，弄成了一个以干草成为围墙，将一车干草卸下，一方面喂马，一方面铺在冰雪上挡寒，不分男女二十来个人，倒在草铺上休息。天气冷，也不能睡，大家挤在一起，等着风息。一直等到大半夜，风小了，才又整队回去，到农场后，已是第二天早晨，大家正在起床准备吃早饭。这样，我们在外边整整呆了一昼夜。

（5）一次马坠入湖中 另一次，也是去拉干草，在走路时，岸边已冻结。在回来时，因为大雪将路全盖住了，所以有些地方也弄不清楚是水还是陆地。有一个马喜欢走在别的马前边，所以经常干扰别的马。有一次它也认不清

路，一下子将冰压破，坠在一个湖中，虽然露出马头，它也不敢走了，我们赶马车的都给吓住了。赶这个马车的恰好是个女人，她就一下子跳下去，水浸到她的胸上。她抓住马笼头，不让马再走。然后用斧子将驾车的皮带砍断，其他几个人，将爬犁拉回去，又用绳子将马身系住，把冰打开一部分，将马救出。那个女人说，宁可冻着，冒生命危险也不能将马淹死，因为劳动营里一匹马比一个犯人价值大。出来后，也不能走了，只得将干草卸下，别人将衣服各脱一件，她的衣服全湿透了，换了，只留个女衬衣全部换下了，临时在附近砍柴，架起火，一直等到衣服全烘干了，才又整队出发。

（6）树林中迷了路 有一次秋天，我同一个芬兰女人到树林中去拉树干，我不习惯认识树林中的路，一路上很留心看马走过的痕迹，后来看到了树干小堆，即将马倒过来，准备装好车回去。那个芬兰女人即在我旁边装。待装好后，刚走了几步，发现不是路了。于是把车停下，让那个女人看着，我去找路。但左右前后找了半天，急得一身大汗，就是找不到路。我预计离开原来可辨的道路，最多不过十几到二十米，但就是找不到，远处听到割草机在响，但仍分不出方向。累了，只得坐下休息。那个芬兰女人说，她更不行，更不敢离开我。我怕再走时，离路更远了。想等另外一个常拉树枝的俄国女人玛利亚，但又不知她还来不来，如果天黑了，更不敢走了，过夜又怕遇到什么。我说，好歹有两个人，不怕。正在无办法的时候，听到赶马的声音，我们齐声喊：“玛利亚”，说迷了路。她才把我们引出来了，原来离路只十几米，我就是沿着路跑，一直没有对着方向，真不知这样容易迷路。

(7) 几乎成了错中错 一次夏天，正是农忙春播的时候，我赶车用的是农场主任、内务部一个军官的坐马。这是经过特别允许才让我用的，因而他知道我这个赶马车的犯人。他到我车旁，抚摸了几下那个很好看而“聪明”的马，问我曾否犯过劳动营的规矩，如私自通信、对外联系、外出喝酒等事。我说，没有。他说：“上边有命令，说你犯过错，要关两星期的禁闭。”禁闭即坐劳动营的牢。我说：“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也不知从何而来。外出也是集体去的，个人没有出去过。”他说：“他也怀疑这件事，所以未执行，但上边的命令，待研究一下，予以答复。”后来，一个副总农艺师告诉我，在管理会议上，他提出一个看法，解决了问题，他说：“一定是农场中某个赶马车的在外边喝了酒，被人抓住，他自己招出了别人，即我的名字，被报到上边，所以，上边才有这个命令。”他的看法，说服了主任及其他人。我算是过了这一关，几乎蒙受不白之冤。如果不是我的名誉好，真要不知所以然地被关上两星期。天下冤枉人的事，确实是不不少的。

(8) 寒冻天拉水 1939年冬天特别冷，一月份整月都在零下四十度左右，劳动营中宣布不出工，但不拉水不行，吃、日用、洗衣服、洗澡都离不开水。赶马车队决定每人拉两次，然后换人，以免把人冻坏，而且设立了一个换班站，大家都在那里取暖。到我拉时，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预防毡靴浸湿受冻，手套保持干爽，大袄前罩上围裙，对脸、鼻常用手擦等。我这样拉了两次都无所谓，后来一直拉了半天。第二天拉了一天也不换班，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他们大为吃惊，说体力弱的中国人比体力强的俄国人还能顶得住寒冻。结果，他们给我预备点酒，还特别给我一些东西

吃。我一直拉了半个月。

(9) 夜里拉水遇狼 冬天拉水是到江边，在那里打个直径约七、八百毫米的冰窟窿。有一天我夜班拉水，套的是个配种的雄马，很厉害，有力，个子大。在我刚装完水未来得及挂桶掌套时，它忽然大吼一声，前腿跳起，作了个猛扑，以后拉着车跑上坡岸去，我提着空桶在后边跟不上。上岸后，它未向应该走的地方，而跑到马房门口停下，还在嘶嘶地吼叫。我跟上去告诉了值班马夫老头。他说，可能狼来了。以后他又和我两人赶马到河边，他用鞭向四方狠抽了几下，鞭响得几乎要冒出火星，然后看到一个东西从远处树间跑过去。据他说，这可能就是狼，让我以后小心注意。而且夜里拉水时要带较大的鞭子作提防。有鞭子，即令有狼，也不怕，而且马也有胆量了。

(10) 从马上摔下来 有一次下过大雨后，我去套车，车在几百米外，为省事起见，我骑着马想走上正路，要跳过一个小沟，几乎将我摔下。又走几步，有个小坑，马到那里，打了个前跌，一下把我摔下，正摔在泥坑中，而最不幸的，是把眼镜也摔掉在泥坑里，幸而马很老实、稳当，当前腿拔出后，未向前踏，而且后退了一步，就站着不动了。我从泥坑里出来，仔细看未动过的泥坑里有个痕迹，我猜想也许眼镜就在那里，于是顺手一摸，果然找到了。我心里想，总算是大幸事，摔一下不要紧，泥坑摔不坏人，顶多弄湿了衣服，如果眼镜坏了，就会变成活瞎子。还有一次我当马夫时，在马栅中被小马驹用嘴将我的眼镜顶到地下，我动也不敢动，马栅里黑，唤来了第二个人用火柴照着才算找到了。

(11) 拉牛车 冬天，因为大批马车要去拉干草、木材及远途运输，所以不够用，而牛棚的牛粪改用牛拉，因为距离近，是可以的。但给我的是配种的公牛，奶牛不能拉车。那个公牛有点怕人，个子大，大到牛棚里不能转身，只能直走，从这个门进去，那个门出来。过去我看到它配种时，有些奶牛被压倒，所以以后专门作了架子，帮助承受它的体重。后来牛得了传染病，把牛都杀了，这个公牛也被杀了。据说，仅牛头就有九十公斤，得牛肉（除头外）约九百公斤。为了使用、驯服它，鼻上挂了铁环，否则“牛性”发作，没法管。我开始真怕，喂牛的活，让我试一试，方法是到牛面前，抚摸它，如果它很驯服，就低下头，让摸它；如果它直眼看，那就是“另眼看待”，就得小心。我试了一下，还好。以后用了几天，人到很稳当。有一次正拉着车走，忽然遇到了我原来的马夫队长，少数民族，他警告我不要用这个牛，以免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公牛听到他的声音，一看，就对着他大步跑过去了，吓得他不敢从正路走，绕着雪走，公牛斜对着他，但雪深了，牛陷进去，走不快，勉强移动，他才得跑脱。原因是一年前，他用过它，他们之间有矛盾，他打过它，几乎被它顶死。谁知一年后，它还认得他，要报复他。我才知道牲畜也会报仇！后来我休息了四、五天，换了个人，不知怎的得罪了它，它拖着爬犁从他身上过去，幸而是空车，不然可能把他压死。以后不敢轻易用它拉车了。

(12) 训练不育的牛 以后没有办法，只得设法使用不育的小母牛。先选了一条牛训练，费了不少气力。牛有个犟劲，有力用不到地方。有一次连皮带也挣断了，在牛房附

近跑，碰人、碰东西。经过差不多一个月，才训练好一个，有一个带头带路，很快又训练了两个。

农场的生产情况

生产大头菜的困难 这里需要育苗的菜是大头白菜及冬油菜（布留克），但却要经过许多的工序及准备，从冬天即开始。首先准备育苗生产用的粪筒，这是用泥炭、牛粪再加一点细土作成的，直径长约五厘米，中空，壁厚约一厘米。而泥炭需要从十来里以外的树木空隙处拉来，为此派专人到那里采掘，需剥开地皮半米深。牛粪要新鲜，不带草的。为此一个女人每天专门到牛棚里收集。粪筒用木制工具制成，将它冻结，贮存起来。这些都要在冬天准备好。四、五月间，将温床准备好，每个温床十米长，二米宽，六、七十公分深，用各种粪，主要是马粪填上，利用氧化产生的温暖，在五月间即可育苗。铺平后，将粪筒排列摆上，每个温床内可摆五个左右。以后用筛子撒上一层土，浇点水，一个人爬着向每个粪筒中放置两、三个种子，再用土撒盖。出苗后，将其中较大的留下，小的去掉，只留一个。温床上有玻璃木框，每个温床用宽一米的十个框覆盖，为防天气变坏及夜间保温，木框上还用草垫盖上。温床由女犯人看护，每人十个左右。需要覆盖或揭开时，两个人相互帮助。要控制温床的温度，太阳出来时，还要用木架半支开或全开。而各种用途的木框，每年得修理，上玻璃，编草垫，都要专门的人干一个冬天。因此，温床队是农场的一个大生产队，而且是关键的队。春耕时，大地准备好后，用小木匣，将苗连同粪筒一起运到地里栽入，这样，既有肥料，又不伤根，植物可以继续生长，只搬一下家就算了。气候好时，大头白菜可以生长的很好，也有一个

重达十几斤的。冬油菜（布留克，象中国的大萝卜）也是这样育苗。我在温床队的服务，主要是赶车，拉来拉去，拉这些东西和水、粪等。此外还有两个暖房，生产黄瓜及西红柿。

温床的其他产品 菜苗移出后，天已较暖了，要即刻跟上去，继续种黄瓜，也是育苗的，其他空出来的地方，还可种葱。收菜以后，即将入冬，温床内的粪已不能再产生温暖，必须挖出，拉到地里作肥料，待明年再装新粪。在种黄瓜时，因为没有蜜蜂及其他昆虫，还得人工进行授粉，将雄蕊放到雌蕊上去，才能得到一个黄瓜，而雄蕊多时，得打花，以免浪费生产力。

所以，温床的工作量是很大的，而农场共有三、四百个这样的温床。

马牛房 这里不仅有很大的两个马房，能役使的马经常有一百多匹，而且每年配种还生小马，马车队经常有五、六十个人，多时达到一百人左右。除跑冰一段时间内，有几十匹马还在小岛上干活。

此外还有一个大牛房，有奶牛五、六十头，还有种牛两只。曾经有一次牛得了什么不治的传染病，被迫将全部牛都杀了，作为肉类供给了沃尔库特，而又从另外一个离此地几百里的农场，赶来了相当数量的牛，及一头种牛。每天出的牛奶，除一部分消费外，其余提炼黄油及乳制品送往沃尔库特。

养猪房 我们到了以后，新建了一个养猪房，内设猪食厨房，其干净讲究，远过于我们的住房，更不要说和牛房、马房相比了。据说猪完全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是肮脏动物，而是

干净的动物，比牛马都干净。从小猪仔起，在每个房间有十几个，睡觉，食东西，大小便都有一定的角落，决不混来。小猪睡时，并排躺着，连头尾都不乱，大小便时，自己起来跑到另一个角落去，完了以后，还跑回原来的地方躺下。每天除在房内跑来跑去外，还赶它们到外边去，一日三餐有人给做，躺几天还要洗一次澡。据说，猪集中在一起，如果不干净，容易得病，还说，猪好往脏地方躺或在墙上擦是身上不干净，其实不然，而是痒的原因。还有专门的兽医照顾它们。

养鸡房 这里还有一个养鸡房，有千只以上的母鸡及少数公鸡，也有专门的人饲养、收蛋。

农业试验站 我们到后，才开始修建了农业试验站，作为新品种种植及种子的试验和培植土壤、化肥、天然肥使用的试验。农艺师直接领导，并有两个试验员，工作条件和环境，完全如自由民一样，在那里似乎感不到劳动营的约束。而且是一年四季都有事干。

其他生产及工作 伐木有专门的伐木队，其任务是伐靠近农场的树林，按树大小分别用作烧柴，修建用料，修车、爬犁用料，制作日常用具等，而较大的建筑用木材，则从别的地方运到这里，因为这里的树小，不能用。运的方法，有水运、船运、冬天马运。都是圆木，这里加工锯成板，修建房子则直接用圆木，锯板开始用人工，很费力，以后修建了用柴油机发动的机械锯。

打干草 由于这里牛马合在一起有三、四百头，所以饲料用的干草是个大事。每年春播一完，就组织几队人去附近平坦地方打干草，每队十几人到二十人，自带食粮及锅、帐

篷，如游牧民族那样。有的犯人，嫌活重，蚊子咬，不乐意去，有的相反，觉得那里自由，而且可吃鱼、蘑菇，甚至可过临时夫妻生活（队中男女都有）却乐意去。真是人各不同，有如其面，干草长得很快，五月底出来，到七月即可割了。

岛上生活 农场原来大部分的耕地在岛上，除跑冰时埋没待干约一个月的时间外，其余十一个月都有一批人在那里，粮食用品由农场供给，夏用小船，冬用爬犁。那里有犯人作“岛长”，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也比较自由，因而有些人愿意去那里干活。

开垦新地 在“大陆”上，由于要伐树，所以也就逐渐地开垦出新的地方，将树根挖去后，还得改良土壤，才能耕种。于是就从几里外运来泥炭，再加上从温床中挖出来的用过的牛、马粪，第二年即可种土豆、蔓菁等。当我在那里的四年多时间，已开垦了几顷的新地。

农场生活点滴

衣食住 穿的都是公家发的，内外上下都是，犯人一般都带有随身的衣服，但劳动中不能耐久，所以全凭公家发的。虽然是北方的气候，但冬天也只是小棉袄、大袄、棉裤、棉帽而已。在野外工作的，如伐木、赶马车及其他等，都发毡靴、手套、包脚布。吃的，一般是不饱的，但也不太饿，有些有特殊情况利用公家的额外便宜的，可以吃饱。粮食完全是靠外来供应。有一年，1939年，天气冷，蔬菜长得不好，而且九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有些菜未能收上来，大家以为要受饿了。但那年冬天，外运来的粮食特别多，冬天反而吃得比较饱，因为粮食比蔬菜易饱一些。住的方面，第一

年冬天，我们初到，住房不够，我们有一百人左右住帐篷过冬。一层帐布篷，在零下三、四十度，而且有时风也不小的情况下，开始简直不可想象。但冬天还是过去了。帐篷中用树干搭成上下二层铺，分两边，中为走道。有些人头怕冷，就头向里。我头不怕冷，就向外，即靠帐篷。中间两个铁桶做的火炉，昼夜烧着，夜间烧得更旺些，而帐篷两边仍然是霜，临睡前打扫一遍，睡一夜起来，就有一个硬币厚。中间可能整整有十五度，两米之外，可为零度，有时面包放在那里，也会冷的如石头。

1938年盖了两座新住房，我们搬进去了，算是很大的改善。

苦中作乐 俄国人也许很多是宿命论者，对于劳动营生活还是尽可能地过快活。遇到节日，劳动营中也放假，特别是十月革命节，新年，五一，都不是农忙时节，而且夏季野外队还未出去，或冬季野外队如打干草、放树等已回来，大家还是尽量好好欢乐一阵。特别是女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民衣服穿上，装饰一番。照例有晚会。唱歌、跳舞、朗诵、小话剧、音乐、伴奏，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个是莫斯科大戏院的女歌唱名角，犹太人，叫克拉雅茨，唱起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欢迎，一个晚会就得唱十来个，而且其特长是：大歌、小调、民歌样样都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各种舞，我以前不大欣赏，现在觉得特别好。一时可以忘记一切忧愁苦闷。

自由居民的劳动营管理人员，也和我们一起看。犯人们不给他们专演，演也是应酬。

临时配偶或夫妻 这里由于女的多，虽然极大多数是正

派人，不是花柳成性的人，但由于家庭失散，亲人无信息，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人生只有一次”的及时求乐思想，有些物质条件较优越，有些为了利用暂时职权，有些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有的确实由于共同工作，相互了解、熟识等等，总之各种因素，而形成了一些临时配偶或夫妻。这些多数是由于物质条件优越，工作岗位优越的，一部分是一般的结合而成。有些不很明显，有些是公开的、甚至劳动营管理人员也都知道的，他们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五十岁的农艺师，和农业试验站内的试验员，年约四十岁的原党员干部，就是公开的配偶，而且很象幸福的夫妻一样。其余年轻的，更不用说了。有的还居然生了孩子的。这可能在别的地方很少见。

修建托儿所 有的在这里生了孩子，有的原来就怀孕的，也有的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开始只有个别人，以后渐渐地多了，所以劳动营修建了一个很不错的托儿所，并说，大人犯罪，孩子无罪，应让他们正常成长。里边分两大部分，婴儿及儿童。有专门的厨房，阿姨，医生，吃、穿、住都满不错。还允许父母们和孩子们见面、玩。

和败血症作斗争 北方由于缺蔬菜、水果、维他命C等，所以，时间长了，会得一种可怕的败血症。这里是农场，情况较好些，但也有发现的。劳动营中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熬一种水让大家喝，发给生菜吃，有些人从南方让家人寄生蒜等。我在菜园工作时间多，葱及其他青菜吃的机会多，算是免去了这种危险。有一次有流行性感冒，也及时采取了措施。

其他一般条件还可以，所以犯人因饥饿、病累或其他原

因死亡的情况不多，但也有。比起听说到的过去劳动营及当时在修路队上的很多死亡情况来，这里算是很理想的地方了。

我的一次病 在农场这几年我很少生病，虽然身体弱，而且一直在干一般劳动。有一次，忽然身上出了十来个铜钱大的黄小疮，大腿上、屁股及腰上，坐睡都不便，而且流浓水，真是讨厌。没办法，只得去找医生。那里有个医生头，兼管外科。他看了说，很好治，同时看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和我谈起了中国革命的事，他是犹太人，曾是党员，对各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的颇多，也问得不少。他说，这种病是身体新陈代谢不良、物质交换不顺，如同河流被堵塞一样，只用自身输血即可。但第一次从我臂上连40 C C的血也未能抽出，只得又打回去，让我休息两天再来，并给我开了一个月的病号饭，吃的较好一些，每次午饭都有点肉，还有牛奶、白面包。第二次输血时，他根据第一次的经验，又找了个护士，同时从两臂一齐抽，抽出40 C C，然后打到屁股上。他说，不用吃药，一个星期即可好转。果然，四、五天后，即干了，以后脱了一层皮，连个疤也没有就全好了。

业余时间的消遣 经过几个月后，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一年后，搬入木房住，和人们也熟了，工作余暇时间，除了和一些人聊天，古今中外，正史琐事无所不谈，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党员、干部、教授、讲师、文学家、工程师及牧师都有。各地的人也有。以后，结识了几个女人，比较文明，教育程度较高的，其中一个格鲁吉亚人，丈夫是加盟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据说，他在一次案件中被捕后无消息，她自己是教员，四十来岁。家中还有母亲，也是教员，

已退休。还有两个孩子，在中学。一家都是搞教育的，书很多，她自己带的有，还经常从家里收到邮包，除食品外，也有书，而且最新出版的书也有，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她成了我的图书馆，在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从她那里借书看。其中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整四本都看了，其他有些古典著作，也读了一些。

有关人员的一些事

在那里四年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有些人我同他们接触比较多，颇有值得一提的，现仅择几个比较特殊的人及事，概括地叙述一下。

鲁也参，李一凡的走 1938年初，正在冷的时候，我们到农场才两个月，鲁也参，李一凡和其他一批人就被发走离开农场。到哪里去？照例是不知道，也不能问，叫走就得走。

鲁也参是在1931年被发到高尔基汽车厂去的。后来又被判了五年劳改到了沃尔库特。李一凡是1930年初被捕，1930年夏合牢时和我在一起，以后我被释放，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判劳改五年。1935年被释放，期满了。无处可去，回到了莫斯科，因无处停留，晚上自己到内务部门要求住在那里。内务部门了解到他的过去，找到了原列宁学院院长基尔山诺娃，到了她家住了几天。她介绍他到高尔基去参加工作，而于1936年末再次被捕，又被判五年劳改。现在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和我分别了，我只一个人了。

农艺师亚历山德罗夫 他已是五十出头了，在外边就是农艺师，曾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经济反革命，后改为二十五年劳动改造。自己很乐观，他说他是死而复生的人了。他

从不讲他具体犯了什么罪，而说，既然不让死，让活着，就活着吧，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他除了知道不少俄国革命前后的事外，还知道中国的不少事，对老庄孔孟也知道。什么大事，他都不在乎，总是一步一步地走。建立试验站后，他实际上和一个四十来岁的试验员成了配偶，过得很融洽。她名叫玛利亚，是个党的工作干部，一个很不错的女人，性格很好。他们两口对我都很好。在和她的谈话中，知道她丈夫是个区党部负责人，乌克兰人，被捕后再无消息。她以后也被捕了，是“人民公敌”的罪名。她很了解丈夫，知道他不是坏人。她现在没办法，和农艺师在一起，也是形势所迫，不知将来命运如何。和她谈后，才知道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到沃尔库特，又在考其莫斯农场岸边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个人自称皮鞋匠，性格非常好，而且和我们几个中国人很好，对我们几个原中共党员很表同情，原来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知道她的情况后，也不敢对她说起这件事。可怜，他们交臂失之，未能见面。这样一对好夫妻，现在彼此不相知，而她又处于这种情况。由是，是幸呢，还是大不幸呢？将来怎么办呢？让她在梦中过暂时“好”的生活吧！大概有些暂时配偶或夫妻不少是这种情况吧！

温床队长达尼亚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队长，年纪不到四十，是原苏共党员，苏共中央委员。现在闭口不谈任何政治及国际大事，也不谈自己的事，连家庭情况也不谈。只说那时工作，为人很能干，对我也不错，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后，赶的是一匹好马。她对我当面既不称姓，也不称全名，而只称一个父名，彼得罗雅奇，是很亲热的称呼。她也有个临时丈夫，是个定额员，为人上拍下压，很狡猾，是个亚美尼亚

人。我很讨厌他，曾和他大吵过一次，后来知道他是达尼亚的情人，才不好意思和他吵，我称他为哈叭狗。但他以后可能向达尼亚讲了，对我则无所谓似的，仿佛我没有侮辱过他。以后，我和达尼亚熟了，她对我那么好，我曾问过她，他是她的朋友吗？她关了门说，不要问那些事。我问，我看他不太好，为什么和他交朋友。她说，也是有原因的，不便向我说，暂时如此吧，将来还不知谁东谁西呢！我说，我就不会这样干。她说，她也本不愿，以后再说吧！

第二个队长安娜 安娜是乌克兰人，老党员，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书记处书记，她的丈夫是该州州委第一书记。她很有派头，从不说自己的事，但说很多事想不通，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有时还谈到西欧各国和各国党的一些事，言外之意，颇有些牢骚不满，但又不正面直接说。她也曾问到我过去的事。对我一开始就很好，可能前一个队长已向她交待过我的情况。她甚至半天或一天不具体给我任务，有时我问她时，她总说，自己看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许比她还知道该干什么。她很有自尊心，喜欢人家尊重她，大概是当官的时间长了，习惯了吧。她为人正直无私，工作很负责，很关心人，有时主动让我们吃一些菜，说要注意身体及食物。

第三个队长卡娅 卡娅原来也是党员。常说她和丈夫的关系及生活细节，但就是不谈他现在什么地方，是否被捕。为人很潇洒，乐观，谈笑风生。工作也较积极，但从来不屈人，也不要求人对她怎样。从性格上说，她和安娜是迥然不同的。她自己弄东西吃，也让别人吃。开始我们有点不习惯，以后觉得随便了也没什么，但工作上自觉地干活。

格鲁吉亚女人 有两三个在菜园工作的格鲁吉亚女人和我特别好，也许是因为她们也自认为是东方人吧！其中有一个女人除了经常给我书看，还约我到女宿舍去。如果不是她约我，我可能永远不会到女宿舍去的。那里比男宿舍讲究多了。另外还有两个，年纪已经大了，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可能是漂亮的，特别带有东方美。很有文化，喜欢谈论，性情温和，似乎和格鲁吉亚的男人大不相同。这几个熟识的人，都是党员。据说，那里有派别斗争，但不是反革命的问题。这是唯一说到她们被捕、判刑的说法。她们跳的舞很特别，不是蹦蹦跳跳，很带点东方的温柔姿态，特别使我喜欢。

一批中国人路过农场 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库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们一样。从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迁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亚细亚地区，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有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等。他们都是侨居在海参崴及附近的人。想到日本侵略中国，连侨民也受影响，心里着实不好受，而自己又在这里过着劳改的生活。他们所呆的船，过几天就要北上了。

中国女人黄南波等二人到考其莫斯农场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开始她们不愿和我认同乡，后来还是交谈了。据她们说，一个叫黄南波，中国人，一个姓朴，朝鲜族中国人，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二十多岁。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但

地点不在莫斯科本城，在附近一个小地方，是短期训练班的性质，人数不多，是秘密的。1938年秋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以后在监牢里呆了几个月，被判侦探嫌疑，劳动改造五年。她们的俄文勉勉强强只会说几句，以后就被发送到了这里。

她们被分配到岛上劳动，也赶马车。据说她们两个都会骑马，能在马上打手枪作战，所以赶马车很不在乎。有时到“大陆”来洗澡、开会。十月革命节时，她们也来参加晚会，和我谈话好几次，渐渐有点熟悉。那个朝鲜族女人，和黄南波在一起，但很少讲话。这年冬天，不知上边来了什么指示，凡是犯有侦探或侦探嫌疑条款的人，都集中到沃尔库特，她们就被调发走了。

一个山东老头郭金玉 我们初到时，见到了一个山东老头，五十多岁的郭金玉。他自称从山东出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里做工，上山，后来漂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劳动改造八年，到此已二年，略会几句俄国话，还是在劳动营中学的。据他自己说，又瞎、又聋、又哑，看不懂，听不见，说不出，不知怎样被判为侦探。为人很忠实，讲义气，称我们为“兄弟”，俄国人很照顾他。他的头脑还是十八世纪的，信神，特别信关公，连名字都不敢提，开口闭口称“老爷”，即关老爷。有时夜里坐起来，还打盘式地“静坐”。在1939年冬，也和黄南波等二人，以侦探条款送往沃尔库特。他们据说是步行的，行李用爬犁送。

我从这些事联想到祖国，国内接连失败，日本进攻，国外同胞也如此遭遇，真使人感慨倍加，不知何日祖国能挺立在世界各国之林，有个平等地位。试用“满江红”，学岳飞当

年抗金的精神，以作《感时》：

遥望家乡，烽火里风尘险恶。
亿万户，家破人亡，水深火热。
吉黑辽冀早践踏，沪宁武汉又陷落。
待几时，河山归故主，倭寇灭。
多少话，向谁说？无穷怨，何处泄？
奈两番系狱，手足被缚。
仰天长叹空流泪，忍气吞声徒泣血。
盼有日，飞身脱羁绊，还故国。

看房的老头 每个房都有两个看房的人，一般是体弱的老头。我们房内看房老头之一，是个老布尔什维克，1910年入党，是在最黑暗反动时期秘密入党的。出身工人，文化水平不太高；革命后做基层工作，了解事物的能力颇强。对政治问题，公开谈，而且对整个联共党内历史、派别斗争，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有自己的看法。谈笑风生，乐观处世，常在谈话中引用俄国的一些成语解释各种思想认识，如常讲的，“每个玩笑中都有部分真理”；“棒子有两端，用一端打别人时，另一端也常打自己”；“有人想一箭双雕，而有时一个也打不着”；“自认为聪明的人，可能还是不聪明的”等。有一次他发牢骚说：“枪杆子不能长期统治下去。”

同乡人的妻子 在那里偶而和一个三十多岁年轻漂亮的女人谈起来，她是我所在的地方伊万诺夫城市委第二书记的妻子，名叫温诺格拉都娃。她说，她是个教员，没有什么罪，只是她丈夫被捕后她要了解真理，到内务部门去质问吵架，以后把她抓起来。不久，判为国家叛徒家属。她有母亲，两个小孩，一个哥哥。她到此后，和家里母亲通过信，

人都还在，就是丈夫无消息。她说，1937年后期，中央派人到伊万诺夫召开会议，这期间经常有人不见了，不参加会议了，大家也不敢问。州党委书记诺索夫也不见了，他是莫洛托夫的联襟。市委书记也不见了。她丈夫曾预告说，如果他开会晚上不回来，也可能就“不见了”，大家也说不清是什么事，为什么原因，只是人心惶惶。以后她被捕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只知监房里人很多。

古新尼的妻子 一个芬兰女人，五十多岁了，一次找我谈起，问我知不知道古新尼。我问是不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她就说她是他的妻子。我大为吃惊，说不久前还在报纸上看到他露面！她怎么在这里？她说，她不愿谈她的事，谈起来很伤心，对谁也没有好处，也没有用处。她的丈夫还和她通信，有时还寄点吃的东西。我问她，古新尼这样一个大人物，要么把她弄出去，要么和他不再有关系，而不应该象现在这个样子。她说，很难说，也许和内务部门挂得不够；也许内务部门不理共产国际那一套；也许古新尼不愿为此事和内务部门打交道，总之，她无法说。她也不愿向古新尼提这样的问题。

当时有不少的女人为自己丈夫而被捕，被作为家属而判刑。却没有遇到过象古新尼夫人这样的事。

其他一些人 其他有些人也值得简单提一下，如：

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工程师，其父为俄国犹太人，因参加革命在沙皇时受迫害移居美国，儿子想念祖国，申请回来了，在苏联工厂中干了几年，现以侦探嫌疑被判五年劳改。他说，苏联企业管理烦琐，美国人用一个日记本一个人就可解决生产安排，在苏联要好几个人，好多张纸，好多程序。

一个大学教授，乌克兰人，历史专家，国内外、古今无所不晓，年已六十岁，在当打更的。谈起问题来，只偶而说个三言两语，每天都悠悠自在，也不愁闷，颇有点乐天知命，静待大局好转的味道。

皮达科夫的“妻子”，自言他还有妻子，她们也相互认识，他被判处死刑后，她也被捕，判了五年劳动改造。她还和他有个儿子，已在中学读书，现改姓她的姓，在她母亲那里。

还听说，和季米特洛夫一起在德国国会大厦被烧后被捕并在著名的莱比锡法庭共同受审，以后又宣判无罪，由苏联接受为苏联公民的三个原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也被判刑在沃尔库特劳动改造，而季米特洛夫却当了共产国际的主席。据说，他们三个人在受审期间动摇，说了什么。

还有保加利亚有名的共产党员，以烧索非亚教堂而闻名的，也在沃尔库特劳改。

管理养鸡的主人，是个匈牙利共产党员，自称入党很久，四十多岁了，参加过1918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到了苏联，成了侨民。后来曾回去过，又回来了。现在被判劳改，很想念祖国。据她说，不久前还向莫斯科共产国际及他们的党写过申请，希望把她的问题弄清，还想回国参加革命。

还有一个早年出国到柏林，后来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犹太人，年已四十多岁，后来申请回国，工作几年，现以侦探嫌疑被捕，读的书不少，滔滔不绝地好讲话，一整套唯心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在理论上不同意，公开辩论，为此曾在警戒室呆过，出来后仍然在讲。干不了什么事，却会画像，颇会弄些吃的。

oco判决的人被延期 1910年，一个被oco判决三年劳改的人，已过期，未被释放。他向劳动营询问，答复说，没有上级指示，到期也不能放。他写了个质问书，让转到上级。过些时后，叫他，他很高兴，以为要放了，但却得到通知说，oco决定，延长他的判决到八年。他回来后，大家很惊讶，问他什么原因，不放已经不对了，为什么还延期呢？他说，他知道的，劳动营管理处知道的，和我们知道的一样多，也就是都不知道。他说，在数学上 $3 + 5$ 和 $5 + 3$ 是一样的。即我们被判五年，他被判三年，他到期不放，又加五年，我们到期不放也许加三年，要放，一齐放，刑期多少年是次要的。

假木匠成了真木匠 一个原为中学教师，先到了修路劳改队去，看到条件太坏，天天有人死去，吓得他没有办法。有一次要盖房子，去挑选木匠，问谁能干。他报了名，参加了木匠队，由于他受过教育，脑子活，假木匠也干起来，以后成了真木匠，救了自己命，干了两年未死去，现在成了真木匠了。

医生吃香 农场中有三个医生，男的一个即为我输血的，据说是个名医，以后还得说他。另两个女医生，从到劳动营就当医生，吃住都正常，根本未干过一般活，大家都羡慕她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及其在劳动营的反映

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正是星期四，也是夏至，农场的春耕刚刚结束，所以我们也休息一天。上午十二时，广播喇叭（这年才装上的）忽然广播了苏联政府声明说，德国于凌晨五时，向苏联发动战争，南自黑海边的城市塞瓦斯托波

尔，北至摩尔曼斯克，南北几千里的边境上，空、陆军全面发动进攻，苏联政府宣布抗德卫国战争开始。这样惊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当然，以前从1939年已开始的部分，因对苏联没有直接全面冲突，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如进攻波兰，和芬兰的战争，都是局部的。

开始释放人及返回 人们虽然感到大战的开始，将给犯人带来不利影响，如1937——1938年的多次大案件，1939年到期的人，在1940年又延期，但八、九月间，第一批1936年被逮捕而判五年劳改期的人已到期，却宣布释放了。我们很高兴。他们办了释放手续，等着船，以后走了，大家都高兴。我是十一月被捕的，眼看也释放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又回来了。他们到了乌斯特—威耳马，即劳动营的出口站，是应该在那里领取护照、办理公民证等手续的地方，让他们暂等一下。他们作为自由民，在那里逍遥了几天。以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因卫国战争状态，到期的人，暂返原处，等待上级以后的处理命令。这样本来高兴的人，又不高兴地坐船回来了。据说，以前走了一船人，已走的算是走了，未走的及以后的，就算是不定期的延期了。因为战争发展对苏联很不利，德军节节进入苏联境内，愈来愈深，战争不结束，不要想释放了。而战争则刚刚开始。

自杀念头及谈话 1941年十月，江还未封冻的时候，我有一段情绪很不好，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离国十五年了，祖国是那样，自己无辜被判劳改，五年中几乎死了，现在眼看到头有希望了，却又遇到大战开始，释放的又回来了，自己也更无希望了，战局又那样不好，遥遥无期，再过几年，自己就要过四十了，于家，于国，于革命，于自己都没有什

么可留恋的了，还不如学程小孩那样投江死了，岂不省事少受罪吃苦。于是天将黑时，独自来到江边，徘徊在生死的边缘，自咏：

苏武北海目无亲，万里祖国何处寻。

可怜乌沙江底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想到唐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想联到自己 and 妻子，十八岁到我家已十六年了，可怜只有几十天的相处，可能还在梦想着我回去的，而我呢？看来，是归里无望了……正在江边踱来踱去思想斗争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一个人正向我走来，他加快了步伐，近处一看，是守江岸临时仓库的老头。他和我熟悉，是常谈话的打更夫，哲学教授。他看到我一个人在走动，以后发现象是我，怕我寻短见，试喊了一声，急忙走来了。他开始和我谈些别的，以后问我有什么念头，为什么这时候一个人到这里。我将绝望的思想向他讲了。他说，他也猜到了，以后我们开始对话，他反复向我说明要点如下：

1.人是生物，应该尽一切努力生存下去，只要不走错路，不苟生，就应该坚持生存下去。

2.自杀不是懦夫的行动，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是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挽救的错误。

3.不论是“一念之差”或“一贯思想”，而自杀都是错误的，如能回生，自己将会悔恨。

4.我们被判为“反革命”，为自己洗冤，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一定要活下去，不然，自己死了，听任人家给你作结论，或背着“反革命”而死去，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国家、党和家庭。

5. 他已六十岁，还在挣扎将来为自己洗冤，我还年轻，没有任何理由不自己洗冤。

6. 任何困难，再大也是暂时的，短期的，没有不变的事物。参加革命绝不能希望只有顺利，没有困难。困难对人是考验，要往前看，只能克服困难，不能投降。

这个哲学教授老头，以言教、身教，总算把我的动摇思想扭转过来了。我回到住房，大家仍然在过着“人间生活”，我又回来了，回到了“人间”。以后想来，应该感谢他。

在农场见到的自然地理现象

1941年冬，我离了农场，在最后，应该略提一下看到的自然及地理情况。

1. 北极光 这是在北方，只能在北方看到的非常好看的天然景象。一般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晴天的晚上，天空中横布着几十万里、高达几万里的火焰山似的光带，仔细看时，如燃烧着的東西，还可看到波动变幻，最好看的一年，是在1939——1940年冬，这年特别冷，极光次数多，幅度大，光影好。

还有几次在春天，是下午，日将落的时候，晴天，在太阳的两旁，还同时有两个较弱的如小太阳似的两个发光体，对称的，相距虽不很远，但在天空中也可能是几十万或几百万里。

2. 永冻层或永冻地带 这里离沃尔库特几百里，有树林，能种蔬菜，但仍然属于永冻层及永冻地带。夏天挖地不能一直挖下去，在一米多以下，就得分段挖，让冻层渐渐开冻。另一个特点是树根不很深，不是直入地下，而是在一定深度时，根向四方爬，如螃蟹的样子。所以伐木后，挖树根

较容易，如果有拖拉机，所以直接连根拔起。

3. 天象及气候 这里靠近北极圈，虽然不是半年为昼半年为夜，但夏天六、七月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不黑，可以在外边阅读报纸。植物长得特别快，没有夜间休息阶段或吐出二氧化碳的过程。冬天，十二、一月天很短，只有中午可见太阳，在室内二、三点时必须点灯。但由于光的反射及长期积雪，夜间或早、晚，都可走路，能辨别路。这里实际上没有夏天，最热的七月，白天可穿两件布衫，劳动时可脱去一件，只穿一件就可以了，但阴天，或下雨时，还得加衣服。凌晨赶马车或夜晚，穿上小棉袄也不热。冬天气温很低，最低达摄氏零下四十五度。但相对来说，这里的寒冷并不使人感觉可怕，因为空气干燥，最细微的小成份的水气，也结成冰霜了。所以，零下四十度时，十几米以外看不到人，而走路时，毡靴在雪上（成为硬雪）发出声响。

4. 天然产物 乌沙河中有鱼，在农场的因为都是犯人，不让打鱼，但出去打干草的人，却可以打鱼吃，享受点天然的食品。本地方的人，夏天打鱼，冬天打猎。陆地上树林里有蘑菇，而且数量不少，特别是由于雨水足，可以采，有时农场也组织女人成队的去采。还有一种小黑的及蓝的果子，如黄豆那样的或稍大一些，也不少，可以作果子酱，只是糖有点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作的。还有天上飞的白鸟，特别是冬天，成群地飞，犯人们不能用枪，但可以用马尾结成活结，挂在小丛林之间的雪上，这些小鸟不吃粮，也没有粮，而是吃小树枝上的幼芽及根，在小丛林中雪上跑来跑去，一头进入活结后，即走不了，静等人去捉。伐木的，赶马车的，弄上些活结，每天都可捉几个回来吃，每个有净肉七、八两。

5. 雨水大 此地靠北冰洋近，东边是乌拉尔山，水蒸气过不去，所以夏天雨水大，几年来，从来没有发生干旱的问题。冬天雪也大，九、十月即开始落雪，但不多，有时还可能融化，十一月以后雪就多了，也不能融化了。每年积雪不少于半米，有时可达一米。有一年，九月下了一场大雪，就未再化了，直到次年五月。

6. 冰冻三尺 一般十一月开始冰冻，很快河就冻实了，以后天逐渐冷，冰则愈来愈厚，开始可走人，以后可走马和爬犁，最后可以走载重汽车。在冬天严寒时，河上的冰道，变成平坦的汽车路。另外，北方一个奇景，是五、六月间河开冻时的跑冰，这时由于上边的积雪开始溶化，水势升高，将冰浮起并胀裂，成为大小不等的冰块，顺水向下流动，河水上涨，可达几米，在农场，不仅河中心的小岛被淹没，而上边的树有时只有树梢略露在外面。1940年，水特别的大，从江岸出来，一直上涨，大陆上靠岸的一些临时建筑及仓库都被拆除迁到高处，不然就会完全被冲跑。这时，本来不大的乌沙河成了宽几百米的滔滔大江了。

在跑冰前，如不及时将东西迁出，全会“付之东流”。有一次早晨，我们刚起床，听到河边有惨叫声，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站在河中心移动很快的冰块上，手拿个什么东西在喊救命，不知他是从那里被冲下来的，看到居民点，所以大叫起来。但谁也无法救他。农场派了两个人，拿着绳杆，顺河岸走一段路，也给他打招呼，但由于冰块流速快于岸上的走动，过了几里，眼看人冲远了，不见了。这也是悲剧。

7. 蚊子特别多 真不知蚊子在这几乎无人烟的地方是那样的多。打干草的人说，不戴蚊帽不能工作。即在大陆上，

早、晚不戴蚊帽也不行，特别是树林、草地。有一次放牛时一个小白牛一岁多了，由于走累了，卧下去休息，被成千上万的蚊子落了满身，几分钟后，小牛只叫了几声就起不来了，后来竟躺在那里了，待将它拉回去时，发现它身上差不多见不到血了。从此流传出一个说法，蚊子把小牛吃了。有的马，被蚊子咬得站不住，用马尾也赶不走，就在原地打滚。

离开考其莫斯农场 1941年末，从农场发出大批人，还有少数几个女的。我们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但大家在农场已三、四年，习惯了，而且从各方面的反映和了解，这里究竟还算不错，比起其他知道的劳动营，即属于沃尔库特的各个分营，还是可以的。至少，死的人很少，这对于犯人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另外，和押送及武装人员接触少，精神上不感到“犯人”的处境及强制压力和到处受监视，所以，听说要发到远处去，心理上确实有点前途茫茫，命运不定的情绪。尤其是，大多数人都是属于已经期满，留待释放的人，更是感到去一个不明情况的地方，颇有点不愉快的想法。

但有什么办法呢？终究还是得走！勉强地收拾了本来不多的东西，低着头，彼此无声无息地，茫茫然，拔起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向不知命运如何的地方。这样就和在这儿生活四年多的考其莫斯劳动营告别了。

印塔阶段

(1942年1月—1947年5月)

我们步行了两天一夜，夜间在一个小站休息了一下，到了一个新的劳动营——印塔，这是一个新煤矿区。

印塔概况 印塔在北纬六十六度，比北极圈南半度，还是属于极北方地区，与考其莫斯农场大致是平行的，这里也有树林，虽然不是那末大，但也有的地方没有树林，或较稀，不如农场那里普遍。可能是产煤地区的原因吧！但比沃尔库特，总还是好得多了。偏北几十里，有本地科米人的一居民点叫上印塔，一个小河叫印塔，这个煤矿区因此定名叫印塔。1938年，从农场曾派了十几人组成的勘查队，据说是到印塔的，现在才经过两年多，这里已是两、三千人的煤矿区了。

印塔有煤可能是在沃尔库特煤矿开始后不久就发现的，它处在修建中的沃尔库特到科特拉斯大铁路附近。因此，这个煤矿区的开采是理所当然的。当时铁路正在加紧修建，我们经过一段树林，见那里已经砍出宽十来米，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空地，可能就是将来铁路经过的路线。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进入苏联境内，一个战线就是对着乌克兰，而不久占据了苏联当时的煤区中心顿巴斯，因此，苏联加紧了这里的煤区及铁路建设。

劳动营情况 这里和农场完全不同了。劳动营四周，除

了靠河一边只有铁丝网外，其他三面都是用木板修建的围墙，上边还有铁丝，四角修建有高几米的岗楼，上边二十四小时都有站着持枪的岗哨。只有一个出入口，有守卫岗及管出入的警卫。劳改犯在围墙内工作的不能出来，到外边劳动的一律编成队，除犯人任正副队长外，每队至少有两个武装警卫带枪跟着。犯人工作时，划出一个圈，出圈就可以开枪，这示意给犯人，是在监督之下强制劳动。所以劳动时，除了自己带的一块面包外，不能找任何一点吃的。有些人由于工作性质，如马房的人、管理员及其他服务人员可以不排队，但须持有专门许可的出入证。只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出入、行动。另外，还有通宵的，常住在圈外的出入证，这就自由得多了，这些是保卫部门专门发给的。

我们初到的1942年初，除卫生所、厨房、澡堂等服务部门外，犯人住的都是大帐篷。为了保温起见向地下挖一米多深，然后搭架子，将帐篷固定上。帐篷很宽，睡两行人，中间还有两米的通道，通铺分上下两层，中间两个大铁桶作炉子。每天早晚两次，劳动营要点名，犯人们得站好队，由值班人点数，不对时，还要重点。上班、下班、出工，早晚都要点数，好象是看牛马牲畜群似的。

总之，无论在精神、物质那一方面，这里都远不如农场了。我们到后不久，心上都罩上了忧郁的暗影。

可怕的1942年上半年 我们从比较稳定的农场到情况大不相同的印塔，遇到了严冬；又遇到了不利的年头，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年最不利的时刻，这真是可怕的时刻。在自然条件方面，这年雪大，风大，而且冷。有的地方，雪堆成大堆；有的地方，风将路打成光滑滑的冰路，走不好就会摔

跤。有时大风吹起来，眼也睁不开，树也要倒，帐篷几乎要吹跑，在那里边真有点可怕，身上穿的棉袄几乎要吹透，吃那末点东西，连体温也维持不了。这是自然条件。吃的方面也不如农场。

卫国战争中苏联节节失利，德军几个月就打到莫斯科附近，占领了基辅，哈尔科夫，列宁格勒被包围。印塔原来的储备不多，人又增加了，而运输又接济不上，铁路还未修通，政府正自顾不暇，谁管劳动营？犯人连黑面包有时也没有，而用包米面面包代替，粮食很少，有时用黑麦整个煮，吃了一点也不消化，没有蔬菜，吃了咸鱼很想喝水；有些人到处去各种杂堆中找吃的东西，生的，不干净的，坏的，见什么吃什么。因而开始是浮肿，拉肚、痢疾，以后，败血病，关节炎，贫血也都来了。其他如营养不良，消化不良，气管炎等更不用说了

而劳动还得照常干。医生给假愈来愈严。有些人，不到不能走的程度不给假，因而病人急剧增加。医院住不下，也住不进去，只得腾出一个帐篷作病房，以后又腾出一个，而药品也少，实际上是让你不上班躺着等日子，试验各人的抵抗力。后来将两个帐篷分为轻重两种病人，而进入重病帐篷的，实际上是向死亡的过渡，已是失去抵抗能力，等着死而无力挣扎的人。

从二、三月起死亡的人逐渐加多，也不在“太平房”解剖了，只摆在那里等够一爬犁时往外拉，一次可拉十来个，只穿衬衣，脚上系一个小牌子，有个人名，生年，以作纪号就“报销了”。开始还派人去挖坑，以后雪深了，地冻得深了，就在离劳动营不远的地方，挖点雪掩盖住就算了。后

来，在五、六月间，雪化了，露出成堆的尸首，才又挖大坑重新埋起了，据说死了的有几百人。

我也曾走到死亡的边缘。只是坚持做到了下面两点，才未死。有个南斯拉夫人，1930年在莫斯科大牢告诫我说，在困难饥饿时要执行两个原则，一是一天三次饭要平均吃，宁可细嚼慢咽，饿着也不能一次吃下去，整天饿着；二是不能吃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宁可不吃也不要乱吃，吃了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有副作用，连一点点好东西也要赔进去。所以，只是常饿着，无力，甚至走路时摔跤，但没有得各种病。所以，衰弱到“到头人”了，但还未倒下去。有时想到本来判了五年刑已经倒霉了，现在已经满期，却又值战争，不能释放，而又到了死亡的边缘。和我一起发来的一个少数民族，体壮如牛，不久前也死了。想到这些地方，打心里悲叹地吟出下面几句，就叫《印塔厄运》吧！

阴云惨淡昼如宵，飞雪滚滚卷巨涛。

狂风呼啸围墙倒，林木摧折帐蓬摇。

枯槁匍匐战兢兢，披星戴月履坚冰。

终日茫茫饥寒加，未卜明朝是死生。

系身罗网无尽头，仰天长叹只悲愁。

印塔将是葬身处，白骨遗地谁人收？

第一首是外界，冬天白日实际也和夜间不分。第二首人是在死亡边缘。第三首是自己厄运，不知会怎样？

有一次，听说医院小灶的厨师是个中国人，违心地提着自己的小“讨饭筒”去要了一次东西吃。天黑了，人家也看

不见了。到那里去，从小窗口里说明了来意。那个中国人望了我一眼，给我盛了一小筒菜及米饭说：“给你点东西，以后不要再来了”。这真是一次伤心的乞求，我拿回去，分了一些给我邻近的人，以后再也不去了。不过，他以后也倒了霉，又遇见我，我却以德报怨，招待了他。他才为这件事对我道了歉。

但这也足以说明我已处于几乎是绝望的境地了。

我的初期劳动 从1942年初几个月，到印塔后一直在干一般劳动，编在一个队内，做些整理地面，平土堆，平坑，为基本建设作准备的工作。劳动不算很重，每天早晨出去，中午不回去，只吃块黑面包。下午三、四点回去。劳动时有两个警卫看守着。队长是从犯人中指定的，管具体分配工作，考核，上报。工作的好坏。完全靠他的估价和报告，我的性格直，能干就干，累了就休息，从不在他面前弄虚作假，吹牛拍马。有时也和他顶几句。我队中另一个自称中国人的乌兹别克，却和猴子一样在他面前跳来跳去，虽然不干什么，却成了他的得意红人。因此他总是领第一等口粮，而我只能领到相当勉强的第三等。大多数人是第二等。

这样，我在队里是他不欢迎的人，第二，身体一天一天“得不偿失”地衰弱下去，因而工作、劳动效率及成果日益减退，有时坐下去休息一下，连起来都很费力，站着不想蹲下去，蹲着不想起来，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只是消耗时间，作最后的挣扎而已。第三，因此精神上不仅不如在农场，而且日益衰退，情绪不振，真是在一天一天地计算日子，仿佛是等待末日的样子。总之一言难尽。

不幸中的幸运 也是命不该死，在四月的一天里，突然

的来了一个对我是关键性的一个幸运的转变。在清早排好队准备出工的时候，一个派工的人走来，向队长说了几句话，要两个劳动力弱的人去干别的工作。队长毫不迟疑地叫我和另一个他不喜欢的犹太人出来，拨给那个派工的。派工的问了我们的“条款”（指什么罪名），判刑期，说可以。我们就跟他走了。我当时想，反正是一个样，到那里肯定都是死路一条，到别处去，也许是死路，也许有活路，而且不去也不行，所以硬着头皮在那个人后边跟着去了。派工的说，先干几天试一下，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到什么地方，干什么。

走了半个小时，确实也是走不快。到了一个不大的单座木房旁边。派工的说：“我给你们找个好工作，只要好好干，老实干，吃喝都好，而且活也不重。”我们说：“没有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在那里将一堆木料截成半米长，劈开，搬到屋里，就是一天的活。他去找了斧子，大锯。以后又到屋内找出了女佣人，向我们介绍了。并说，工作完后，在这里等他，他将把我们送回“圈里”，即劳动营里。他便走了。

出来的那个女佣人看到我们很惊讶，原来是老相识，也是从农场来的。她向我们简单说了她如何到此地，和此地的情况。这里是自由居民区，住了二、三十家，都是劳动营管理人员、干部。她们有几个从农场来的人，在这里当佣人，也住在这里。主人去上班后，她就成了主人，任务是看门、买东西、作饭、洗衣服，吃住衣着都好，她当时即问我们大概很饿吧！给我们弄了些汤、菜、面包，先让我们坐在厨房里吃饱，又拿出烟，我不抽，犹太人抽了一阵，我们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而且，没有队长，又没有“狗”看守我们，可呼吸点自由空气。

和我一起来的犹太人叫李卜肯，原来在农场也是赶马车的，很熟识，脾气有点怪，和我很意气相投，也是队长不欢迎的人。我们彼此说，队长王八蛋把我们摔包袱摔出来了，也是我们命不该死，却遇到了这样的好地方。他又抽起好烟来了，更是高兴得很。

到午饭后，“官长”回来了。我们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大半。下午“官长”又去上班了。女佣人出来叫我们去吃饭，并说，一天就这么多活，不要干得太急，以后又给我们面包、烟，让带回去吃。快下班时，派工的来了，带我们回去，交给门岗，并说，明天在这里等他来领我们去。我们回到帐篷后，向大家讲了我们的“奇遇”，并给穷朋友们点面包和烟。

第二天，我们到另一家，还干同样的工作，虽然女佣人不是熟人，没有那样“招待”我们，但黑面包、烟，还是给的。总之，已不是挨饿的那个样子了，已脱离了死亡的边缘。这样，我们一连二十多天，挨门都走了一圈。开始，派工的每天去领我们，以后只去领，不送了，让我们自己回去了。在这二十多天里，遇到了好几个从农场来的女佣人，我们的身体因此也大有好转，精神也好得多了。

走遍了一圈后，派工说，目前不要到各家去了，以后再说。让我们两个到洗衣房去劈木柴，可作较长远的打算。洗衣房主任是中国人，下面还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好的吃，但黑面包还可以吃饱。过了几天，我和李卜肯商量，在这里终非长久之计。一旦派工的换了人，或他改变了主意，我们又得回到原队，而很可能再走到死亡的边缘。我提出想到这里一个设计单位画图去。他呢，再想办法。我向洗衣房

主任中国人要了纸笔，写了个申请书，准备交给派工的。我写后，那个中国人看见了，大为惊讶，说，未想到我有这一套写“毛子字”（俄文的）的本领。他劝我说，不要到设计单位去，每天爬到桌子上，只吃一块面包，还得饿着。不如到洗衣房来，大家都是自己人，好的不敢说，保管吃得饱，在屋里，不冷。我问他，我不会洗衣服，能干什么。他说，不让我这个人洗衣服，只要我替他管帐，收发衣服，还可学学熨衣服。他正缺这样的助手。他说，只要我同意，他和派工的一说就成，通行证也由他办，可不回“圈里”。我同意了，但我说我的搭手是个裁缝，不知能否在这里自由居民区找到工作，不然，我一个人有事了，把他丢掉不好。那个中国人主任说，没问题，这里有裁缝铺，他也可以向派工的说。李卜肯同意了。果然，两天之后，两个通行证都办好了。我从“圈里”搬出来住到洗衣房，李卜肯每天到裁缝铺工作，但仍住在“圈里”。从此，才自由多了，也没有回到死亡的边缘的危险了。李卜肯在哪里也可有“额外收入”，面包和烟都能解决了。

这对我在以后直到1946年初释放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使我度过了可怕的1942年上半年，而且以后将及四年可怕的劳动营生活中，保证了衣食住而比较顺利地过来了。生命真是如儿戏，生死的命运，在预料不到的时刻，竟能不知不觉中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谓人命在天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和李卜肯都一直在各自的单位，工作到释放为止。

坏事变为好事。那个队长无意中送我们走上了生路。而他在两年后，却又有求于我。

自由居民区的洗衣房 自由居民区，是在劳动营外边，印塔河岸的一片地方，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其中大部分为劳动营管理人员及家属，小部分为一般自由居民服务人员，分居于单家住宅及小型家属宿舍。其他理发、洗衣、澡堂、饭堂、缝衣铺、设计所、化学试验室、面包房、医院、药房和劳动营管理局，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样样都有。在我在那里的五年多时间内，每年都有扩建，以后独立成印塔劳动营管理处。随着煤矿建设，修通铁路，更建了发电厂、机电修配厂、俱乐部、营房、仓库、磨房、汽车库、农场、学校、运动场，最后成立了市镇行政机构、民事局、国家银行支行等，对外成为正式行政单位——印塔建设局。

当时的各种生产服务单位，除商店外，其他都是犯人在那里工作，亦有犯人及自由居民混合共同工作的。但在自由居民区工作的犯人，却有自由活动的机会，一种是住在“圈内”，有出入通行证，可自由出入行动的占多数。少数人还有全日通行证，长期住在居民区，几乎和居民有相同的自由活动范围，只是政治上受限制，还是犯人。但和自由居民自由来往，而且多少可以取得一些“定量”以外的收入，食、衣、住都比较好，尤其是几乎不受劳动营的各种约束。

洗衣房内除一个熨衣服的俄国女人外，主任及助手、四个洗衣服的、一个管澡堂的、一个守夜的，都是中国人。主任叫李廷甫，山东人，多年住在海参崴，三十多岁，就是他让我到洗衣房工作的。他俄文说得很流利，但识字很少，流氓地痞性格，又有点江湖义气，是个吹牛拍马，投机倒把，无所不干，无所不能的人。也很能干活，洗、熨、劈柴、打水、做饭、样样都会，但就是不干，因为是主任。吃穿讲究，

抽烟。对上级低声下气，把头头们拍得很周到，大家都称他马屁精，所以他办什么事都不难。能弄些吃的，穿的，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和居民也有搞的。其他几个中国人，除一人是奉天省人外，其余都是山东人，多是从海参崴来的，“条款”是社会危害分子、危险分子，大部分是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政府为要消除在海参崴的中国人而逮捕的，判刑八至十年不等。那个奉天人，原是学生，后来参加了抗日，因想逃脱日本人的压迫，跑到苏联，被判侦探罪十五年。据说，有这种罪名的人，根本不能领出入证到“圈外”工作的，是特殊情况才批准的。

洗衣房附设一个小澡堂，是用大锅炉烧水的。每周开几次。大人物多在晚上洗，有专门规定。

洗衣房、澡堂的服务对象是自由居民区及所在的服务单位，还有警卫处的全体警卫士兵及头头们。所以，居民个人及家属洗衣服的数量不太大，但要求高。大多数的衣服是来自警卫部门、医院、面包房。此外还有理发店、食堂、商店等。每月有上万件左右的衣服。因此，从这些服务部门也可弄些东西吃，特别是面包可以足够吃的。

我的工作 开始到洗衣房后，我管收发衣服，建立帐目，开工营单，晾晒衣服。冬天在屋内烧炉子，夏天在露天。空闲时间是帮助熨衣服。我算是学到了一点技术。以后又学会了上蓝色，加漂粉，熨西服及洗高级衣服的本领。

几个月后，大概到了秋天，李廷甫所做的那些坏事终于到了不能再掩盖的程度，因而被警卫部门没收了通行证，赶回“围圈内”，被派到大队中干一般工作。警卫部门说我老实，让我当了洗衣房主任，从此我和外边单位开始直接发生关

系。因而也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包括劳动营内及自由居民间的各种关系。我没有李廷甫那样大的神通，不能弄许多意外的、非正门的东西，如吃的、穿的、钱，但由于我安分守己的工作作风，俭朴节约的生活习惯，在我将及四年的时间内，也过得去了，而且也没有感到饥饿寒冷。当然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过了一些波折，也发生过事故。

1944年起，由于劳动营的扩大，居民区划归管理处的行政福利部管理，行政福利部设立了由自由居民担任的部长，部下设立了房产科，澡堂、洗衣房由房产科领导。那里都是犯人，科长是我从绍儿北来时同一批的乌克兰人，原来是区党部的负责人，所以对事情也有所帮助。

我的全日通行证，从1942年办理后，虽然经过了一些机构的改组，但一直继续延期或换发，始终没有间断过，一直到我被释放为止，我都住在洗衣房内。以后我自己修缮了一间房，释放后我才搬进去，这是后话了。在洗衣房内住，一直是稳定的，而且相对说是很自由的。是不自由的劳动改造中的自由犯人。在和自由居民及警卫人员的接触中，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这是劳动改造环境中很难得的机会。

洗衣房中一个骨干助手，中国人，名叫范文，是山东掖县人，原在海参崴做生意，为人很忠实、能干，责任心强，记忆力很好，但据他说，就是不能读书。他父亲花了不少钱给他买文房四宝，请先生，但什么书也读不进，而且经常有病，一直到十六岁，父亲真没有办法，让他去商店当学徒，这一下什么都好了。他现在只会写自己的姓名，别的，斗大的字认不了三担。李廷甫在时，主要工作靠他，李只会自吹自擂，对他从不触犯，他有时和李廷甫吵，李也不和他争。

他还送李廷甫一个外号叫“大茶壶”，据说是旧社会妓女院中当差的。李也无所谓。我接了澡堂、洗衣房工作以后，他仍然是做以前的工作，对于我，他是很好的助手。他被判刑期八年，是社会有害分子。我未到前，他即在那里，1946年我被释放后，他仍在那里。一直到1946年秋天刑满了，释放了，他才离开那里。

印塔的建设 从1942年夏，印塔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从劳动营所在地起，分别在北方的荒地水草上建设公路，通向未来的火车站，仓库，二、三煤矿区，本区煤矿。工程是比较大的，成千的人，分成十几队，每天早出晚归，一直进行了几个月，到冬天才大致修通。接着三个矿区同时开始基建，1943年开始了热电站的建设，以后又开始修建办公大楼，居民住宅，规模较大的俱乐部及电影院，体育场，机电修配厂，国家银行支行，学校，广播站。到1945年，已经成为象样的城镇了。由于释放的犯人暂时不让到内地去，有些犯人尚未释放，所以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前没有展开工作时，都在干一般活，谁也干不出什么，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以后基本建设开展，煤矿开始出煤，发电厂开始发电了，人物也来了。如原来在澡堂中给人送水的一个列宁格勒电站的工程师，后来被提为总动力师，基建设计工程师，建造了可以说是较先进的俱乐部。热电站站长，厂长，工程师，也都出来了，乐队，球队也组织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塔的反应 1942年秋，前线战事紧张，在印塔开始第一批征兵。这里自由居民被征的不多，因为原来人就不多，有一家父子二人同时被征了，经过几年，父亲回来了，因为他走时已四十多岁了，是担任后勤，没有

死，而儿子却被打死了。另一部分是从犯人中，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中抽了些身体好的，但据说是参加敢死队，将功赎罪，实际上是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有的人高兴，因为释放了；有的人不高兴，因为死的可能性很大。有的原是军人，因为在军队上犯法判刑，这时也释放重新参军。如福利部门有个会计，原在芬兰战争中当过飞机驾驶员，因误射击了自己的部队被判十年劳改，只呆了两年多就又去参军了。

但是，由于国家需要煤，在1943年即宣布印塔为国防企业，不再征兵，以便尽快地供应国家的战争物资——煤。这样，在这里的男人和青年女人，成了个安乐的避风港了。

来了一大批新犯人 1942年秋，正当印塔基本建设紧张开始的时候，来了一大批成千的新犯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二十至三十岁的。其中大多数是男人，少数是青年女人。以后他们被命名为“十二月法令犯人”。

十二月法令，是1941年冬，德国军队进攻到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发布的，军事时期加强劳动管理的，凡是不服从军事劳动，违反劳动纪律的，如迟到早退半个小时以上，无故旷工的，一律判处劳动改造五年。这个命令发布后，雷厉执行，很多人在几天之内就都被判五年刑期，成千地送到北方，当然还有的送到别的地方。他们有些人，到了印塔后，还说是在梦中，没有梦想到因为这样的事，会被送到这里来成了犯人。

从美国来的东西 从1943年起，美国的东西开始到达印塔。据说，有的地方到了汽车。而此地来的主要是食物。这

些东西是经过船运到苏联北方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才转运到印塔，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大批的东西补充了我们，特别是自由居民的供应。如加拿大的白面，美国的猪肉罐头，其他还有午餐肉、鸡肉、人造黄油、黄油、鸡蛋粉、奶粉、糖，几乎满了主要的厨仓。我们在自由居民区，也有机会从私人手中、商店里、食堂里分享一些食用。这样一直继续了二、三年。

来了一批军事犯人 1945年冬，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一批军事犯人忽然到达印塔。据他们自己说，是从德国境内的苏军队伍中来的。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为了报复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暴行，也开始抢劫，任意掠夺东西，从设备、食品直到私人的衣服、手表等，和美国军队会师后，美国曾提出苏军军纪不好，苏军统帅后来下令禁止，同时即对外出的士兵、下级军官进行检查，凡身上带有衣服、手表、首饰的，一律予以拘留，几天之内，在柏林及其他城市抓了一批人，后来把他们送到火车上，宣布劳动改造刑期五年、八年、十年不等，并立即运送到北方来，其中一部分到了印塔。开始他们以为要把他们遣返原籍，强迫提前复员，后来宣布了刑期，他们简直莫名其妙。前几天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忽然成了罪犯。有些人还在军装里边穿着便衣，他们到印塔后，都贱价地换成面包和烟来吃和吸了。

这是我看到的，主要由于我和自由居民接触较多，也听到了一些报纸上未登载的或只提过而未详载的故事。

莫斯科附近的大战 1941年冬，德军进到莫斯科附近，仅只半年时间，德军占领了大部分的乌克兰，全部白俄罗斯，而且逼近莫斯科，可算是气焰很高，速度很快，虽然他

们原来的闪电战计划未能实现，1943年到印塔参加警卫队的有一个青年，他因送衣服到洗衣房去，很快和我们熟识了。他是1940年夏某十年制中学毕业生，以优等生的成绩，考入了巴乌曼机器制造学院，这是苏联第一流的大学。1941年秋，学院开学后，因战争紧张，而且德军进攻的目的，显然是针对莫斯科的，所以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都开始军事训练，冬天，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也都动员上前线了。他也应征参战了，大学也不能读了，这也是大战打断了他和其他成万人的学习。参战后，他腿上中弹受伤，伤好后，德军也被打退了。这使德军的作战计划受了大的挫败。但他因伤及眼睛近视，被送回大后方，随其他几个人到了印塔。他曾讲到当时战争的紧张情况，莫斯科凡是可参战的，都进入了战壕，在冰天雪地中，终于以不小的牺牲，把德军打败了，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当然，冰雪、寒冷也帮助了苏军。

列宁格勒被围的困难 德军开始进攻苏联不久，只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列宁格勒，而且德军冲锋的坦克曾一度进了城，但以后列宁格勒能参战的人员，都参加了战斗，用短兵、巷战的老战斗法，把德军先遣部队打出城外，但他们还是把列宁格勒包围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城内自来水，下水道没有用了，粮食奇缺，每人定量愈来愈少，后来降到四两，狗、猫都不见了，人开始饿死，而且愈来愈多了。印塔劳动营副长官的妻子，一个年已三十来岁的女人，带着自己的女儿（才五、六岁）冒着德军飞机的袭击和投弹，在一个严冬夜里，坐着爬犁，经过唯一尚可过去的德军包围圈，越过拉多加湖，曲曲折折地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了。她

回忆了艰难的被围生活及列宁格勒居民的遭遇。她自己说，她是借军属的有利条件才跑出来的。大多数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乌克兰叛变事件 据说，德军进入乌克兰后，叛变的事件连续发生，其原因是多种的，比如苏联民族政策缺点错误的后果，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及对军事领导骨干的处理。特别重大的，是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一个军叛变了，而且反过来参加了反对红军的战斗。这些人，凡是以后被捕获的都处以苦役的刑罚。其他地方如克里米亚半岛、高加索等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也有叛变情况。

乡间男人的缺乏 战争开始后，征兵入伍的范围愈来愈大，到1943—1944年，据说，从十九岁以上直到五十岁的男人，都被征兵去，乡间只看到老头、小孩，青壮年男子完全不见了，五十以下的人，也很少见。什么工作都是女人干了。轻残废的退伍军人，已经成为难得的宝贝了。

大歌唱家的遭遇 1945年初，恰在印塔大俱乐部建成的时候，正需要一个艺术家来领导工作时，恰恰从内地发往沃尔库特的一批犯人中有一个大歌唱家。印塔管理处不知怎么知道了，采取了措施，抽出了他的案件，弄到这里来了。这是列宁格勒的两个名歌唱家之一，名叫毕奇考夫斯基。战前，在广播中常播送他的歌唱，所以很著名。1941年战争开始时，他在列宁格勒郊区巡回演出，德军进攻列宁格勒，包围了城市，他和其他几个演唱员未能回来，沦陷在占领区。德军曾让他在那里演唱过，因此，在德军败退后，他以背叛祖国罪被判了十年劳动改造，被发送到极北方来。

他到后，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让他当俱乐部艺术指导，

给他安排了一个单身住房，配上一个服务女人，吃穿都有较好的条件，比一般自由居民还好些。他按照列宁格勒大戏院的水平，来组织、设计和布置俱乐部的工作，建立乐队，安排服装、布景、音乐晚会，还邀请了沃尔库特的小歌剧团到这里演出。他自己也曾演过几次独唱，确实是与众不同。有一次他唱了几首歌后，还故意说了几句牢骚话。

一个人沦陷于占领区而判刑，是个不幸，判刑后而有这样的待遇，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不然，还不知是怎样的命运呢！

劳动营中的几件事 我在这个劳动营中看到的经过的事，比起农场真是多种多样的。择几件突出的事，略提一下：

“私人门路比部长还灵” 这本来是社会不正常和作风中常见的事。但在劳动营中却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然不是在某些方面，几乎在所有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如有一次一个副长官的孩子病了，到处找不到汽车，而当他到了车库门口正无办法时，却看到一辆空汽车过来了，他打招呼，司机理也不理，车飞驰过去了，他一看，是食品商店售货员抱着孩子坐在汽车里上医院去了。他只得叹道：“私人门路真厉害！”

“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调度找汽车找不到，在面包房门口发现一辆车正拉面，看路单上没有拉面的任务。调度大发脾气，司机说，面包房主任请他拉的，主任说，他请司机临时帮帮忙。调度说，是主任有副漂亮的面孔，一说就行了吗？还不是他有东西！调度说，这是“公开的秘密！”司机说：“知道就是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有一次警卫部门巡逻人员想吃蘑菇，他们二人拿了半筐到洗衣房让他们炒食。我们问他们从哪里采来的。他们说，有两个犯人，带着通行证，借口有事，跑到对岸树林里采蘑菇，遇见了他们。他们说犯人违法，不应该去树林。犯人怕了，送给他们，并请求说，下次不敢了，只要不没收他们的通行证就行。

大贪污案的审判 磨坊主任因贪污再次被逮捕了，他原是犯人，很有点贪污本领，自己吃还给别人吃，这是公开的事，许多人都知道。但审判他时，去了不少的人，其中包括揭发他的人，也是给过东西的人。但除了当场抓住的一袋面以外，他什么都不承认，他公开说：“我给过很多人东西，但除了当事人（他是受东西的人）以外，从来无第三者（即无证人），因此不能构成判罪的根据，我不怕。”他反问揭发他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给的东西少了，现在才揭发他？”大家都没有话说。

大盗窃案 在印塔几年中，那末小的市镇内连年发生过许多次的大小盗窃案，还有些未遂的，在洗衣房内也发生过一次未遂小盗窃案，其中有一次大盗窃案是印塔副长官之家被盗，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一天晚上，俱乐部正在演节目，他们全家四口人都去看了，只留一个保姆在家看门。保姆接到电话说，要她马上去找副长官到管理处有要事。在她到俱乐部去找人时，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家中被盗一空，而且及时用汽车拉出去，穿过有站岗的地方，不知去向。在印塔，只有几条街，几家住户，几部汽车，他们居然干得这么“干净”，真是了不起的。而且这个案子很久没有破获。

凶杀案 连年也有几次凶杀案，大部分是因为男女关系。有一次，一个转业军人，在印塔结了婚，不到二年，用斧子将妻子杀死，剁成几块，埋在雪中，而自己反而到妻子单位来找人。后来被发现，逮捕了他。在公开审判中，他态度坦然自若地说：“是为人除害”。他说，印塔女人少，他和她离婚后，她会很快再找别人，而又使别人受欺负。后宣判他死刑，要他上诉，他却不干，说死就死，他也不想活下去了。最后，由辩护人替他写了上诉状，改为劳改十年。据说，因战争影响，人死的多了，尽可能不判死刑。

以上是几件大事，其余小一点的，如走后门，乱搞男女关系，投机倒把，利用职权，一般偷盗，则更是不胜枚举，也没有叙述的必要。这和当时的战时及战后情况有密切关系。

科米人的一些情况 在这里看到的少数民族科米人的特点，是女人干的活多，除了家庭事务、看孩子外，有些外边的事也得干。男人却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干。第二，为了换好酒，每年冬天都来印塔，带着成批的草鹿肉，他们养成百只鹿，也不用什么饲料，来时就杀几个，皮也卖，可以说是合算的生产，半个鹿换一瓶酒，就地喝掉。还喜欢茶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 1945年5月9日无线电广播，德军无条件投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地结束了。印塔也举行了庆祝。我在洗衣房，虽然仍是犯人，但由于自由居民区有比较自由的条件，也跟着自由居民一起庆贺，买了酒，自己喝，也找人喝，欢乐了几天。当然，我还想庆祝即将到来的释放，总算是度过了最艰难、危险的阶段了。

八月间的一个夜晚，我正在俱乐部的放映室内看电影，

忽然苏联广播电台宣布有重要新闻。便立刻停放电影，转播新闻，是苏联政府宣布开始对日宣战。但不到几天，苏军进入了中国东三省及朝鲜北部，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样，一方面第二次举行了庆祝，另一方面，世界大战才算最后结束了，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苏联转入了政治稳定，我和其他在押犯人们的希望，才真正到来了。

但有时又想起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仿佛在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更感觉到时光走得慢，又感到过去宝贵光阴的可惜，还感到自己远处极北方，以后的前途也有点渺茫。因此，想到李后主的词，“虞美人”感归，我也用他的原韵，来了一首《秋感》：

漂泊流落何时了，遗恨知多少。秋雁南归逐北风，
故国山河破碎烟烽中。

区区五尺身躯在，发斑朱颜改。搔首问天无限愁，
恰似满潭积水无处流。

第一批犯人的释放 对日战争结束不久，苏联政府宣布，凡是根据1941年十二月法令判刑的，不论是五年的或五年以上的，一律释放。印塔为了不等冬天的来临，就加速办理释放及遣返手续，凡是有家而且消息确切，没有断绝联系的人，由本人报请回家的地址，即刻分批地遣返，发给路费，及路途补助费，没有衣服的，还发给随身一套新的或完整的干净衣服。家庭无消息及无联系的，暂在印塔安排工作，联系好地方后，即予遣返。不愿回去的，可留下，安排工作。有的家人没有了，在这里结婚定居的也有。这虽然尚不涉及我们，但眼看就快轮到我们的了。

第一批政治犯的“提前”释放 第一批十二月法令犯人

的释放，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基本结束。我们预计应该释放的过期政治犯人，一直隔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也没有动静。这真使人焦急。有人去打听，也无结果。后来，传出消息说，准备根据各人的表现，由劳动营管理处审核，提出名单，报莫斯科劳动营总管理处批准才能释放。大家只有等着了。果然不久，第一批政治犯人被“提前”释放了。这也是奇怪的数学逻辑。本来1941年或1942年到期应该释放的，现已迟了四、五年才释放，本来是推迟，可现在说是“提前”。管理处人员却说，因为释放还不到，这些人因为工作表现好，工作需要，经管理处审核，报请上级批准的，所以叫做“提前”释放。但不论怎样，总算是释放了。

第一批犯人释放的并不多，都是些已经担任各种负责工作，虽然是犯人，实际上是做领导工作的，其中包括少数行政工作，多数技术业务工作的人。还有个别的先进工作者。他们释放后，即刻都得到正式任命，工资也按职务开始发了，但是发护照时却说，在无特别指示前，一律留在原地工作，不准回内地或原籍，但可享受假期及探亲待遇。

我的释放及任命等 1946年初春，还在很冷的时候，第二批释放人员的名单公布了，其中有我，仍然是属于“提前”释放的，实际上是作为犯人，呆了九年四个多月，也就算九年半吧！

在此一个多月前，有一次我见到第二部主任，即劳动营中管理犯人档案的部门负责人，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他看了一下我的案卷，以后告诉我说，可以申请在第二批中释放，后来果然“应验”了。不知是否真的是他帮了忙，还是别人，我的同路到劳动营来的那个乌克兰人，原为党务工作

人员，是第一批释放的，他当时任行政福利处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可能是他出的力。

释放后，行政福利处处长问我干什么工作，我说，目前也不知干什么。他建议我暂留在洗衣房，工作也习惯了，以后有适当工作时再调动。他并说，现在自由居民多得多了，已经释放三大批人，劳动营的重点已在各个矿，原有的劳动营要缩小，自由居民区要扩大，原有在“圈内”的澡堂和洗衣房将划到自由居民区，规模大了，让我接受并搬过去。我同意了，于是我得到了任命，当了澡堂、洗衣房主任，工资每月四百五十卢布，大小也是个官。

修缮自己的住房 释放后，又不让离开北方到内地去，只得仍当洗衣房主任，但已是一个自由居民了。这时小洗衣房要搬到较宽大的建筑物里，并对原建筑进行了大修，由一个犯人组成的基建队负责。才几天就和队长熟识了，他还是犯人，修建房子是内行。我和他商议能否将原洗衣房的一半，修缮改装一间小型住房。他跟我去看了以后说，一半太大，修缮时费工费料太多，而且我一个人，或将来结婚两个人住也太大，烧木柴也太多，不如选一个角，即四分之一多一些，可修成一个不错的单间。其余四分之三少一些，可由行政福利处慢慢改修作两家或三家的住房。我商得福利处同意，便让他开始修。他说，地板要换一些，还要装天花板，屋内砌个炉子，修一下门窗，这些他都全包下来，材料能用旧的就用旧的，但砖和天花板等他负责弄去。人工他有的是，我只拿出一定数量的面包、旱烟，给工人们吃和吸，对那个基建队长，则给了一些酒和黄油。这样，没怎么花钱，而且时间不长，不到两星期就全部修缮好了。我又请福利处

派人去粉刷了墙，恰在那时，原曾在洗衣房工作过，现已释放的一个鞑靼女人，到那里去帮我打扫清理，把屋子收拾得成个样子，我搬了进去，从此开始了独立的自由民的生活。

因受报复而终于离了洗衣房 我被任命为澡堂、洗衣房主任并搬进了新居不久，房产管理所及福利处换了新领导，是个自由居民，象在军队上干过似的。是个官僚气十足的小庸人，摆架子，爱受人捧。简直非常讨厌，但对我，似乎还好些。到任不久，不知得罪了谁，被人晚上干了两刀而住院了，工作交副所长代理。这个人叫克比兹，是格鲁吉亚人，原为犯人，刚释放不久，是个上拍下压，鬼脸鼠眼的活小人，管理所的人给他送个外号叫“老鼠”。他刚到，就向我要肥皂，那时正是缺肥皂的时候，我凭老相识，总算从仓库还可弄一些。我对他说明了情况，并说他要洗衣服，可以无代价地给他洗，但肥皂不能给他。他就说：“以后再看吧！”我知道他要报复我了。果然，不久，有一次澡堂的水管及水泵一起坏了，修理用了一天，他就借口我工作失职，将我解除工作，并派了一个原来和他相识的人到洗衣房去。洗衣房的几个人进行抗议，并让我上告。我说：“不怕官，就怕管。”我早已不愿干，干也没有好处，乐得以这个小罪名被解职，于是我便作了交待。以后我到管理所算帐，会计师很气愤，问我到那里去。我说，想到电机修配厂去或设计所。他说，好几年没干这种工作，怕干不了，管理所出纳要生孩子，快休产假了，不如暂时做出纳，在两个月内慢慢找点东西看看，并找找工作。我同意了他的好意，由他向那个副所长说明，我便当了出纳，工资仍然是四百五十卢布。

当出纳员 经过会计师的指导，二、三天就熟悉了出纳

员的工作。事情不多，收各种房产所的费用，水电费、房费，各小单位的费，每天结一次帐，交给银行所，每月发两次工资，还有些小的经济帐目。一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坐着。于是我到设计所去借了一些机械、电气的技术书，还有些教科书，认真地抓紧时间，在工作空隙及回家后，阅读起来。其中有的是温故，有的是学习新的，总之，这倒是很不错的工作。这样我一直干了两个月。预计老出纳员产后快要上班的时候，我便抽时间到机电修配厂去打听那里要不要人。这次也是好运气，到那里很顺利，说可以干技术检查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即刻办了交待，不再当出纳了。

到机电修配厂当技术检查工长

顺利的入厂谈判 我到机电修配厂见到了代理厂长，过去略为认识。我在当洗衣房主任时（还未释放），他也是和我同罪名，同刑期，同是过期的犯人，那时他是汽车库的机械师，也在自由居民区住，所以曾打过交道，他是俄国人。我和他谈了以后，他说，厂里需要技术检查工长，我愿干时，可以写个申请，他一批即可到管理局干部处办理手续。我打听了这个厂的情况及工作范围，我说，机械方面无问题，电机、电器方面我不很懂。一般技术检查工作我在外边干过一段时间。他说，问题不大，电机电器方面他也不很懂。这里有两个电气工长，很好，开始一段他可帮忙。既然如此，我当然很高兴，可以转入多年梦想的技术工作了。克比兹“老鼠”对我的报复，恰是我第二次劳动营中的坏事变为好事，技术检查工作比洗衣房主任，不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好得多了。这在以后还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是后话了。

我欣然写了申请，他批了一下，我到干部处办了手续，

干部处下了命令，任命我为机电修配厂技术检查工长，月工资九百卢布，比洗衣房主任的工资整整多一倍。这时已是夏初了。

机电修配厂情况 机电修配厂是在热电厂的旁边，是热电厂修建投产后，随即开始修建的，慢慢从小到大，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八、九十个人了。修配厂的任务，是修理各种电机，这是主要工作，还要负责修配一些小型机械，制造一些配电盘、开关，修理各种变压器、电器仪表，还负责各煤矿的电气安装、线路修理，由于当时几个煤矿已经投产，所以工作还是不少的。根据任务，厂内外机械及电气两部门，除少数领导人员，包括正副厂长、设计师、工程师，连仓库管理员、会计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副厂长兼机械部主任。电气部主任是个未满期的女犯人，年纪有二十六、七岁，原系莫斯科电机厂绕线工，后毕业于技工学校，又进了电气学院，学了二、三年被捕了。但她从不谈自己的事，我以后和她熟悉了，她也不说，说谈了没有用，也无好处。她工作很积极，理论、实践都有，记忆力强，经过她手的电机，她都记得，而且什么毛病，修得怎样，象一位好医生一样，对“病情”了如指掌，谁也别想骗她。八、九十个人中，自由民有二十多，都是释放的犯人。其他六、七十人，都还是犯人，每天整队到围墙里，白班人较多，二班人数少，只是一些车工、钳工。工厂有十来台车、刨、钻床，还有一些工作台，以及修理变压器的一些机件。还有工具室和仓库等。

正厂长，是格鲁吉亚人，是个电气工程师。当我进厂谈判工作时，他不在厂，由副厂长代行职务，后来我才知道，

厂内原来有一个电气工程师，犯人，担任技术检查工作，是个犹太人，溜须拍马，颇得厂长的信任，但副厂长很讨厌他。我去说时，副厂长趁厂长不在的机会，要我当技术检查工长，而把他改调做电气试验员，去修理变压器。原来，我当上检查工长那样顺利，是恰好遇到这个机会，也是幸运的事。厂内还有几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是修变压器的工程师。一个是“电气大王”，是波兰国籍的法国人，什么都会干，什么都懂。一个是电气安装钳工，能在三百至五百伏电压下带电操作。还有一个电气钳工，才二十多岁，是个特殊人，以小偷罪名判刑三年，父亲是列宁格勒联共党某区区委书记，很显要，儿子却因中学时和坏学生在一起，学会了偷窃本领，在一次假偷中被当真偷而判了刑。为人和工作都不错，很机警，许多困难的工作，都是他去解决的。

开始工作时，当然有一些很不习惯，有些干脆不了解，所谓“浮在上面”，这是电气方面。那时我更加抓紧学习业务知识了，晚上回去看两、三个小时的书，白天看的，听的，不懂还可以问，所以，总算进步了，还可以。几个月后，大致已就绪了，工作基本上可以拿下来了。

和莉沙结婚 在我去机电修配厂联系工作时，即见到几年前就认识的莉沙，她那时在电气部门当绕线工，以后我到厂当了检查工长，很快我们就结了婚。那时我已有自己的房子，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所以，一切都很顺利。莉沙比我小一岁，列宁格勒人，在一个烟卷厂当女工。原来她中学毕业后，未进大学到卷烟厂当了工人。先是青年团员，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一批青年团员被集体介绍入党，以后不久，因政治觉悟及兴趣不高，自动退党。家中只有一个老母，很

溺爱她，为她找了个对象，还未结婚，就发现他酗酒而吹了。以后就拖延下来。1936年反对派事件发生，列宁格勒逮捕了很多人，把她也逮捕了，说她的退党是受反对派的指使而反对共产党，以“反革命托派活动”和我一样判了五年劳动改造。1937年到考其莫斯农场后，我在1937年冬转到澡堂劈柴烧火时，开始和她相识。以后一起在温床部门工作，常在一起。1942年初我到印塔去自由居民区劈柴时，她在那里的一个医生家里当佣人，1943年以后我到洗衣房工作，她转到医院，也常来送衣服。1945年她转入印塔农场，成为先进生产者，第一批释放，后到机电修配厂当绕线工。八、九年来，我们时而相遇，时而分开，现在两个人都释放了，已是老相识了，两个不幸的单身，很快就结合了。

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她的唯一老母也饿死了。我们结婚后，她给她尚存的一个叔父，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位语文教员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这就算是她唯一亲人了，而我呢，也是只身无靠的人，又是她的旧相识。她全面管家务，我倒可以利用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

我购置了一些家俱，有前门买的，也有后门买的，私人做的，总之，很快就置办安排好一个满象样的过生活的家了，又约定一个日子，做了一些吃的，请了最接近最熟识的几个人，算是祝贺结婚吧！

在结婚前后，我们谈到过去、现在及将来。除过去、现在的同病相怜而外，我向她谈到，在目前及今后的情况，我们是会和好亲热地生活下去的。但只有一点，如果将来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多大年纪，只要我有可能回国的话，我将不顾一切，不留恋任何东西，包括和她的生活，我

一定要回国，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要她对我有所谅解，到时候不要后悔，不要阻挠我。她完全同意，认为我在苏联这么多年，有可能回去时，她决不阻挠。在苏联，她是没有办法了，决不能因为她的幸福，使我不回国。她爱我，一定可以和我过得好，也了解我，所以希望我走自己最愿意走的路。

为此，我作了一首诗，它反映了我们结婚的特点及思想情况：

同是天涯沦落人，几番别逢终成姻。

兄母零落遭丧乱，孤独漂泊历风尘。

北极九载思有梦，故国万里目无亲。

今朝友爱度岁月，又虑他日子居身。

一个朋友及其家庭 托尔斯泰曾经在一本小说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而不幸福的家庭则各有不同。”我的一个朋友，犹太人，斯莱德，原为莫斯科一个国家书店主任，不知为什么和我一样被判了刑。我们曾在考其莫斯农场相处，一同来到印塔，一起释放，他以犹太人的关系在供应处当计划员。他被捕后，妻子和儿子被迁出莫斯科。妻子也是犹太人，出生于美国，父母曾因是俄国老社会民主党员，被沙皇迫害，迁居美国。她曾和美国人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后来离婚了。因向往苏联祖国，带着两个儿子回苏联，在一个姨母家住，和斯莱德结了婚，又生一子。大儿子，即美国出生的，当时已进大学，因学习成绩好，参军当了军医，还到前线去。他们母子三人，被流放到中亚细亚。她曾找过当时管莫斯科红色救济会的列宁夫人，她说无法帮助，劝她带着自己的缝纫机以谋生计。他们到中亚细亚后，受尽流放的痛苦，但她咬着牙，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她的二儿

子，因是美国出生的原因，从中亚细亚又被送到另一小地方，在一个修配厂中当车工。斯莱德释放后，她和小儿子从大南方，不远万里来到了极北方相会。十年的决别，好在又重新相遇。他们大儿子，以军医官的身份，还带着勤务员从德国境内来印塔和他们相会。

北方的供应及待遇 印塔属于极北地区，供应及待遇有特别规定。这是苏联政府为照顾边疆的困难，地方气候不好，大家不愿去的北方的一种物质刺激。那时因战后，内地供应不那么好，而印塔则比较充裕。我们也享受和自由民相同的标准，每人每月肉鱼七公斤，除面包定量外，还有几斤米、面条、糖、黄油。除蔬菜缺乏外，食品是吃不了的。工资也较内地多，同等职务的工资比内地多百分之十，以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直至百分之百，才不再增加。工龄计算，只要在本地区，都属于本企业工龄。休假时期比内地多一倍。如内地工人为两星期，这里为一个月。工程师、领导干部内地为四星期，这里为八星期。连积三年可一次领半年休假，回内地探亲还可报销旅费。我的工资，技术检查工长九百卢布，也是比内地较高的。

第一次参加选举 1947年2月，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战后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人民权力机关的全民选举。选举是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那天，印塔的机关、地方苏维埃、投票地方，都张旗结彩，装饰成节日一般的盛况。我们被释放的人，也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大清早起来衣服整齐地到投票地方去参加选举。仪式实际上很简单，各人拿着选民证，到投票处领一张选票，上边已有印好的候选人名字，本人只要将它折好，投入箱内就是了。选民在投票处即用布隔成几个角落的

小室中，只用铅笔在票上划个圈表示同意或划个×表示不同意就是了。以后出来在选举人名单上划个记号，就算是参加选举了。有病的人，不能到场的重病者，由选举委员会专门预备了马车，由工作人员抱着投票箱，带着选票，到各病人家里及医院，让他们投票。关键是本人得自己投票，这样才能统计出参加投票公民的数目。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虽然身在苏联的极北方，不论在服刑期间内或释放后，在心情及注意力方面没有一时一刻忘记祖国，总是在留心祖国的情况。但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只是偶而在《真理报》或广播上的寥寥几句简单的消息。据报载1947年初期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共产党驻上海、南京及重庆的代表，都撤退了，其中，董必武是驻上海的代表，也撤退了，离开上海前，还发表了声明。

以后，于三月夜又在《真理报》上用几句报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中共中央事前已撤到了别的地方。当时，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认为延安失守，是对中国革命前途非常不好的征兆。从长征后，经营了十几年的革命根据地又丧失了，胜利前途又是茫茫无期了。当时我想，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后如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我这样的人，总还是有希望回国的。现在的不顺利情况，谁会理会我这样的人。想到这里虽然事隔万里，心中却有无名的沉重感。这使我想起了祖国，仿五代词中的一首“相见欢”的词调，也试填一首，以表达心情：

相见欢 《春怨》

春来却似深秋，风飕飕，寂寞寒月高照离人愁。

乡梓念，如浪翻，何时休，总是无限惆怅在心头。

想到离家二十年了，自己也进入四十，即将走完青壮年，快近老年了，头发牙齿都已经脱落，尤其是牙齿，初到“东大”时候使人羡慕的洁白整齐的牙齿，现在已经脱落不少了。现在是“一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菜”，只管些不关重要的杂事了。

在机电修配厂的工作及见闻 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事。如一个煤矿的电机被另一个煤矿的机械师偷了去，到机电厂修理时发现登记号和原电机性能不符合才知道；刚修好的变压器，被别人接上大电炉烧坏了；一个刚修好的电机，在路上运输时将轴摔弯不能用，而都怪修理的不好，电气部主任证明，煤矿才被迫承认；一个煤矿的变电站因线路坏了，让“小偷”电钳工和电气工程师去修理，这位电气工程师摆架子，却被电钳工捉弄，出了洋相，使电站半小时不能工作，后来由总动力师干涉，才弄好；煤矿空气压缩机坏了，由总动力师决定用未修好的电机临时顶替，挽救了煤矿的突然停工；一个铁匠以普通钢打工具，偷换去高速钢而被副厂长发现，被迫交回了原材料；钳工的欺骗行为；试验电机时出过故障及不幸事件；电钳工们自己制造扩音喇叭，烧开水用的电棒，以贱价出卖和换东西；仓库管理员被迫偷梁换柱等等，时间虽短，却都可分为几段小记。

我的意外脱险 1946年冬，一个六十瓩的大电机在绕线大修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把转子放在里面试验。接上电源后，无论如何，在电气仪表上都不见指示针摆动。后来大家都弯腰去看绕线有无断裂处。我也弯腰去检查，站在电机对面，不知怎的，忽然电流通了，那个几十公斤重的转子，

如同炮弹一样，突然从定子中射出，正对着我，我的两腿不知怎么的，一瞬间本能地放开，转子从两腿间穿过去，还跑了一米远。不仅我吓了一跳，连电机周围的人脸都发白了。自己看不到自己，想来也是神色大变了。真是有点后怕，如果碰到两腿上，死了倒也算了，如不死，两腿断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成了一个无用的残废，那会怎样呢？当时我的表现还镇静，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但我内心产生不少的各种可怕的思想……真没有想到，一瞬间的偶然事态，竟能对人的一生起决定性作用。

类似这样的事，也还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给我的印象深，而且它的危险性使我好几天都不安心。

和厂长的冲突 1947年春，因为一个小电机的修理，和厂长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冲突，也暴露了厂长的为人。这是一个约两瓩的小电机，是食堂用的，一个轴又细又长，修了以后试验几次都有点缺陷，电气部主任也为之伤脑筋，决定重修。有一次厂长问我，我说有缺点，还未找出原因，他问什么原因，我说，电气部主任也说不清，他粗暴地找到电气部主任，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搬起那小电机往地下一摔，说，要你们这些饭桶做什么，索性让你们再修吧！电气部主任脸色变白了，一句话也未说，低头走了。我生气了，我说，这样的厂长，不知叫什么东西才合适！他瞪了我一眼说，叫什么东西也是厂长。说罢走了。我把电机搬起来一看，出头长轴全弯了，我去找副厂长兼机械部主任将这件事讲了，让拆开重修。

这个厂长也是和我一样的罪名被判刑的，第一批释放的。释放后任命为厂长，以前也是干这个工作。有能力，但

粗暴、主观、任性、骄傲自大，喜欢人奉承。副厂长问我说，厂内有个犯人工程师，犹太人，很会奉承人，是学电气的，和厂长配合得来，但对机械一窍不通，而又自作聪明，原来担任技术检查工长。但那个副厂长很不喜欢他的工作，尤其是性格，所以在正厂长回内地时，就把他撤职了，而让我代替了他。厂长回来时，我已掌握了工作。但那个电气工程师犹太人，当时当了电机试验员，由于他不懂机械，有一次联轴节出了事故。现在可能又在厂长面前说我的坏话，想把我顶下去，自己重当技术检查工长。厂长这次借小电机发脾气，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小题大做，给我脸看，要我今后注意。我和莉沙谈起这事，她也是如此看，并建议，天暖时，最好离开他，离开这个厂。我当时想，我已释放了，劳动营管理处对外已改为印塔基建局。当时已宣布，从1947年起，解除了“释放后的政治犯必须留在原地工作”的禁令，我们在极北方已整整呆了十年，有机会到内地去，还是最好，换环境总会好一些。唯一值得留恋的，是自己修缮的住房，自己是主人，到新地方不会轻易有这样的居住条件，但只要找到工作，住房也逐渐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商量准备天稍暖时，即申请离开印塔，而且根据规定，还发给到自选地方的路费。

离开印塔到内地哪里？ 到内地去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第一，工业区，在那里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第二，能找到一个下车后的立足点，住下去，然后才有可能找工作。经过打听询问，很快就解决了，我到了一个和我在一起工作过而和莉沙也很熟识的女人——安娜，她是和我同时释放的，她的女儿已从老家来找她，并在这里结了婚。安娜和我们的

罪名、刑期都一样，是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那是个苏联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安娜有个亲姐姐，自己有一座住房，儿女们已成长，独立工作，可以作为我们下车后的立足点，住一些时候没有问题。经过同她事前的通信联系，征求了她姐姐的同意，她又给我们写了信，于是，我们可以带着地址，从印塔动身了。

我们在四月间，即天气已转暖的时候，写了申请，厂长乐意地签了字。我主动地离开了他，省得解职还要经过一些手续。在干部处那里办了手续，算了账，加上一年两个月的休假，我们两个人从印塔到乌拉尔的路费、行李费、路途补助费，加上我们存的几个钱，一共有几千卢布。我们又积累点食品、粮食，做了两个箱子。这时，既有些不愉快的、前途茫茫的心情，也有些到新地方去，脱离了十年流落的地方，走向内地较好地方的愉快心情。在1947年五一节以后，我和莉沙坐着从沃尔库特通向内地的火车，离开了印塔。

到乌拉尔路上的见闻 在我们走之前，有一个材料供应处的相识告诉我当时坐火车的危险性及要注意的地方，说战争刚结束，乱得很，要我们注意小心，我们感谢了他。从印塔搭车，走了不久，就到了考口瓦。从沃尔库特开出的车只到这里，再往南去，就得转车。在那里下车后，遇见曾在农场工作过的一个相识。他现在在那里工作，我们住在他们家过了一夜。第二天转车，到基洛夫，即我1937年曾在那里转牢的地方。这里是个大站，车站上坐满了等待转车的人。每次车来以前，票房门口挂出牌子，说明这趟车有几个座位。我们等了一昼夜，也未转上车。没办法，只得按人家教的办法，私自找了一个铁路工作人员，一张票签字给五个卢布。

我们两个人，多化了十个卢布，弄了两张卧辅转车票。算是转了车，可以到乌拉尔去了。在这里听到一件在火车上打劫的事，是两个冒充军人，以检查护照为名，打劫了三个乘客。但由于乘客之中一是穿便衣的军官，所以到了一个大站，就被这个军人找到内务部门，破了案而抓住了。另一件事是我们下车时，趁人正乱的时候，一个女人假装接另一个女人，相互拥抱，这时女旅客的背包就被割开，“接车”的女人也不见了。

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终于到达了乌拉尔的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个很大的站和城市。下车后，由莉沙在车站看着行李，我去打听安娜姐姐的住址，先去找她。费了好长时间才算找到了。原来住在城边，住房倒不小，只是交通不便。我将信交给了她，相识后，她欢迎我们去。然后我回到车站，私自找了一个拉东西的货车，多化了几个钱，连人、东西拉到了她家，算是找到了一个立脚点。我打听了这里找工作的问题，她说，只要有专业知识，这里找工作没有问题，就是住房很紧张。但是，她那里可暂住，等什么时候找到房子再搬。他们家只有老两口，而房子却有三、四间。家里还有牛。我又想起了当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北方是必须离开的，而到这里还不知怎样，处处都要钱，即在安娜姐姐那里，吃的、连动一动都得花钱。我有时也想到了祖国，一点好消息也没有，颇有些观感，也作了一首诗《到乌拉尔》：

北极流落正十年，九死一生尽艰难。
满腔惆怅别旧居，无限彷徨觅新园。
异域豺狼初敛迹，萧墙鬼蛇起狂澜。
只身漂泊几万里，故园望穿何日还。

住了两天之后，看到了安娜姐姐的为人，生活条件那样好的人，却是个贪财鬼，一心想在我们身上弄点东西。我和莉沙商量，赶紧找工作，找工作之后，即令住单身宿舍或租别人的房都可以，但不能再在她家住。于是我便立刻开始找工作。

第一次试探工作的失败 我略为休息后，即到乌拉尔最大的一个工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干部处去试探工作。我拿出了印塔的证明，是印塔基建局干部处的，证明我是那里的“机电修配厂的技术检查工长”及我的护照。干部处负责人看了答说，根据介绍信可以在厂内找到工作，但按护照情况，不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内落户口。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他可以公开地告诉我，这个护照是××××，即不能在首都，重大城市及边疆城市落户口，是根据内务部的内部规定，外人不知道。因此，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在本厂工作，而户口落到附近小城市，但上班不方便；第二，是到附近各区的小城市去找工作，并在那里落户口。他说这里附近工厂很多，找工作无问题。我向他表示了谢意。回来后，即和莉沙商量，决定到附近地方去，但到哪里去呢？

到第一个区去 我们向安娜姐姐讲了情况，并希望她帮助，因为她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她说，离这里向北两、三站路，有她另一个妹妹，可到那里去，那里也有工厂。她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们约定只带随身衣服，一点吃的东西，其他东西暂时留在她那里，待安排好后再回来取东西并感谢她。于是我们搭郊区车向北去了。

按地址找到了安娜的第二个姐姐。她有自已的住房，但除住房外，很穷，还不如乌拉尔那个。看来，她们的关系不

好，她怪姐姐有钱不帮她。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已成人，参了军，二的是女儿在中学读书，小的是男孩，在高小读书。她的丈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军队中的俘虏，后来留在苏联，当年年轻力壮，很能工作，自己修建了一座住房。现时已五十岁左右，有病，不能工作了，只领少数的退休金，顾不住家，经常躺在火坑上。一家人不仅不照顾他，而且还常骂他无用。有一次家里无人时，就剩他一人，他看到我 是外国人，便向我诉了苦，并说俄国女人没良心，他现在成老马了，连自己的孩子也受他女人的影响反对他，有时还说一些民族主义偏见的话。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

我们住那里只有几天，但他们还是揩我们的油，名义上向我们借钱，实际上是硬要。我们想，乌拉尔那位那样有钱还想揩油，这里穷的更想硬要，真是“寄人篱下多本难！”

这里有个冶金厂，我去了一次，找不到适当工作。另一个矿，也不行。那个冶金厂厂长说，我应该找机器制造厂去，说这里向北两站，叫叶高尔申，可到那里去试一试。我和莉沙商量后，让她在这里，我自己去那里，必须很快抓紧找工作，因为每天领不到粮票，每天买东西吃，一天一百个卢布还吃不饱（加上其他花费），自己带的东西也消耗得很快。

找到工作前后 到了叶高尔申，打听到那里有个矿山机器制造厂。到干部处，处长是女的，我将护照及印塔基建局的工作证明给她。那个女处长看了之后，问我是否还愿干技术检查工作或其他工作。我说，如果有技术检查工作还愿意干，如果没有，再谈其他工作。她说，让我等一会儿，她给技术检查处打电话，让检查处来人和我谈。这时她简要地问

了我的来历，我也简要地问了工厂的情况、规模，那些车间、生产产品等。

很快，检查处长来了。干部处长让我们相互作了介绍。那个处长戴着眼镜，一口流利标准的俄语，谈了几分钟后，他让我稍等一下。他出去不久就回来，拿了一张某个机器的装配件图纸，问我看图及技术条件的能力怎样，我看了一下，问题不大。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及图纸上的一些公差，配合代号，我答复了，并说有些东西，几年未接触了，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他说，还可以。确实，我的这些答复，还是十年前的那些知识，在印塔时，很少接触过这样的图纸。他说，厂里的产品不复杂，没什么问题，很快就能习惯。关于工作问题，他说，目前没有空缺的技术检查工长职务，以后可以考虑。目前先担任技术检查员，但仅次于工长，按高一级的工资定。让我一方面先熟悉一下工作，一方面等待一下。工长工资是八百八十卢布，高一级的检查员是六百五十卢布。让我担任这个工作，供应待遇和工人、技术人员一样。他就向干部处长说，暂时按六百五十卢布的技术检查员接收工作。以后他就走了。

干部处长让我将工作证明留下来，给了我一张入厂工作人员表，让我就地填了。以后她给了我证明，让我办理粮票供应票证等等，并问我的家庭情况，还有谁，何时可以上班等。我向她讲了，说隔一天上班，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先通勤几天，以后找房子，或暂时在单身宿舍住几天。她说，工厂的房子很少，现在不能解决，以后再说，可先住单身宿舍，再租房子。以后办了入厂证手续，从这日起算是找到了工作，并且是和“专业”对口的。这是1947年五月中旬。

我想到，凭那个证明，总算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在印塔两次对我的打击，都变成了好事。第一次是从劳改队内到了自由居民区，离开了死亡。第二次是从洗衣房出来，弄了个技术检查工作证明，很快找到了工作，而且以后起了决定性作用。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人的命运，在飘幻之中，真不知何处是祸何处是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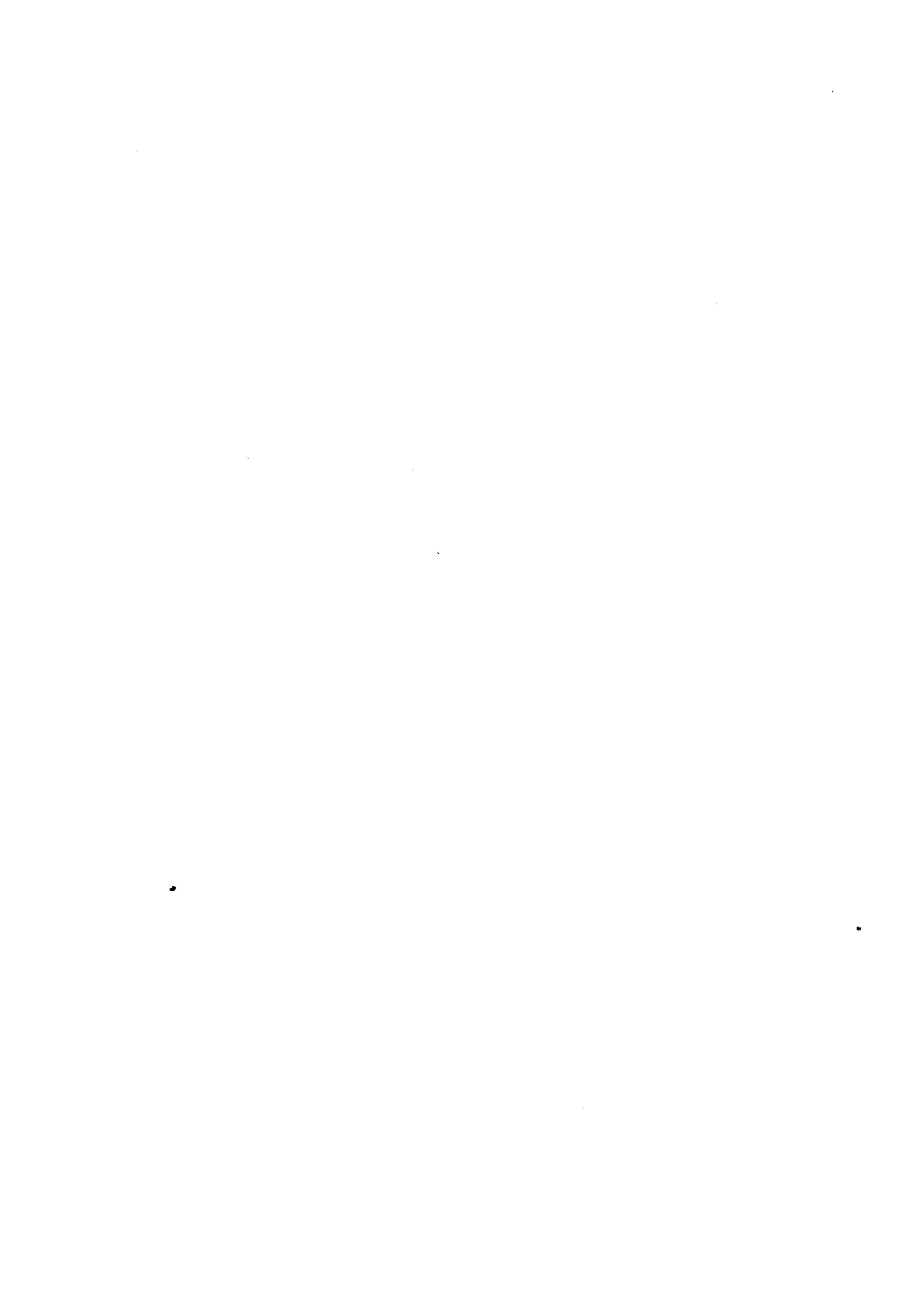
从单身宿舍到租房 由于通勤要两方都走很多的路，只走了一天就吃不消，所以我决定暂在单身宿舍住，于星期六下午回去。星期日早晨我和莉沙来到叶高尔申，我先领她到了单身宿舍，并和一个女人讲好，安排晚上住的地方，我们便到离工厂不远的街上，挨家挨户打听有无房子出租。直到上午时，才遇到了一家夫妇两口，年纪已大了，说他们的女儿家可出租，告诉了我们地址，我们从南边又跑到了北区，找到了他们的女儿家，见到了一个妇女，我们讲了来历，希望租他们的房子住。她说，得和她的丈夫商量，并让我们看了他们家，和可能租给我的房间，大概提了条件，一个季度一车煤。她说，厂里是可以供应的，每月五十个卢布。让我们考虑一下。第二天，即次日，我们再来一次，最后定下来。

我们自己商量了一下，我又向厂里问了一下，是否可以供给煤。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女主人说，她丈夫说，中国人老实，可以让我们住。我们也说，厂里可以供应煤。因此，一言为定，从我们搬进的日子起算。于是，我向厂内请了一天假，和莉沙一起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安娜姐姐家去搬运行李。到那里后，我们讲了情况，又买了酒，请她们吃了。才雇了车，到车站，下午才回到叶高尔申，雇车，将行李运到

我们租的房子里，算是安了家。这已是1947年五月下旬了。

在这十几天里，到处都得多花钱，吃东西很贵，也吃不饱，但也费了将近二千卢布，超过了我们带的钱的一半。带的东西也吃了不少。待我们住下后，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套还未穿过的新绒衬衣居然不见了。这是安娜姐姐趁我们不在时，不知用什么办法将箱子打开，翻过了一遍，将衣服拿去了。真是，如果我们真住在那里，以后还不知会怎样呢？但毕竟也是个立足点啊！

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在乌拉尔地区的生活了。



在乌拉尔阶段

(1947年5月—1949年10月)

这里的环境、工作、生活情况

区的情况 叶高尔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北二、三百里的地方，是个区的中心，各种区的行政机构一律齐备，除矿山机器厂外，还有两个较小的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是比较萧条的，还是一个农业区，附近都是集体农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把乌拉尔作为后方，这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带包括这个地区，开始建立了工业。

厂的情况 这个厂叫国营煤矿机器制造厂，直属煤炭工业部管，是生产部分煤矿机器及一些工业用备件的。原来这个厂在乌克兰，卫国战争发生后，德军很快进入乌克兰，这才慌忙地从那里撤退到这里，厂领导及一部分技术骨干和设备都迁过来了。到此后招收了部分新工人，利用一些旧房子，又快速盖一些新房子，匆忙地投产，生产军工产品，代号是“零件”，实际是火箭炮“喀秋莎”炮弹的弹头。大战后改为生产煤矿机器及备件，由于是仓皇建厂的，所以各车间比较分散。我所在的车间是金工车间，不论在生产规模、人员、技术力量、设备等方面，都是全厂占第一位的，因为它不仅生产本厂产品的各种零件，而且还生产本厂产品中不需装配的矿山机器备件，它占全厂产品产值的相当一部分，其

它的车间还有铸造、模型、工具、锻造、焊接、装配等车间，及行政、技术管理部门，福利部门，以及仓库、供应、销售等单位。

金工车间约有一百多台各种类型的机床，还有铣、刨、冲、磨及切齿等机床，这里还附有热处理的淬火、渗炭及技术检查处所属的量具检验部门，车间有三百多职工，白班人最多，二班工人及车间生产服务都有，夜班只有十几台机床工作。技术检查方面有一个站，设有站长、检查员，只作白班。此外每班有一个技术检查工长，各工段有检查员，归工长领导跟班工作。车间有正副主任、技术主任、调度主任及调度员。总工厂各工段有生产工长。此外还有定额、临时仓库、会计财务人员。

我进厂后不久，一个原技术检查工长辞退了，我即被任命为技术检查工长，工资升为八百八十卢布，并属于该厂的正式工程技术人员，因为工长都是属于这个等级的。技术检查处长在和我谈工作时，可能已经知道金工车间的一个技术检查工长将辞退，而没有人代替，但他一下子又不能肯定我能否接任，所以来了个试用阶段，作为补充预备。我经过一个短期试用后，才让那个工长辞退，由我接任了。当然，开始我心中也无底，过去在伊万诺夫虽然在金工车间工作了几年，又短期干了技术检查员工作，但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外面十年完全未接触这种工作，以后干了一年，也未接触过图纸及真正的检查工作，而仅仅是熟悉阶段。现在我到新的环境，先让我有一个熟悉阶段，也是大有好处的。

另一个检查工长和总工长，都是由工人提拔的，工作认真，没有架子，相处还不错。站长也是工人提拔的，只是为

人保守，水平低，只知道对上拍马，谨慎从事，很不得群众信任。我在那里二年时间，没有出什么问题，却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在以后再讲。

1947年下半年的生活片断，艰苦的生活斗争 我们到后，由于只我一个人工作，地方供应远不如印塔，而且我们又没有什么经济基础，生活很艰苦，特别是在1947年下半年。

租的房间及房主人。房主人是个工匠（细工），参加四年斗争，幸而未死未伤，并在战线上入了党。他说：“那里入党很容易，只要自愿申请，参加过一次较大或艰苦的战役就可以”，他各方面水平都不高，复员后回到这个新开的街道，由公家帮助款项，自建了一座木式标准房屋。战争期间及以前，他们都住在他的岳父家，即我们访问打听的那一家。他现有三个孩子，大的十岁，二的八岁，均战前生，现有个一岁的，是战后回来才生的。他每月工资六、七百个卢布，但有利条件是可自己申请原材料，为自己作家具，开始是为自己作，已经都作全了，现在还申请，但作了拉回家就卖了，这样每月还可卖三、四百卢布，房子附近有自留地约三亩，土豆每年可收两、三千斤，还有葱、大头菜、萝卜、黄瓜，完全够吃，还养有牛、鸡、狗等，生活是颇过得去的，虽然不及高薪阶层或官员。我们住的是他的四间中较小的一间。四间是一个卧房，一个客房，一个小间及厨房，女主人不工作也没有问题。我们到后，在一个月內，由厂里送去我买的一车煤，解决了他们的燃料问题。莉莎未工作，我们的小屋也收拾得很干净。我们很自爱，不沾他们的任何光，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够紧张的，但女主人可以放心地出去干别的

事，让莉莎看家，所以关系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据女主人说，以前曾有一对夫妇，曾偷过他们吃的东西，而且答应给的煤也没有给。房主人和我也谈得来，后来他们的孩子学习不好，让我给他补算术课，每天给我一斤牛奶作为报酬。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离开乌拉尔，约二年的时间。

一段艰苦生活的种种 钱花得很快，我们从北方带来的几千卢布快花光了，除路上的路费，到乌拉尔后，每个停留点都得花一些钱，此外还高价从市场上买东西吃，即使要维持半饱的状态也非常贵，例如土豆一小桶，只有十五个左右，市场价格是一百个卢布，吃一顿饭就约二、三十个卢布，而国家价格的东西太少，连我们带的几十斤粮米也吃完了，后来总共只剩了八百个卢布，我们觉得这点钱都花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决定存入储蓄所不再花了。只好用别的方法去克服困难或忍受一下。这八百个卢布后来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年底苏联货币改革时，十个旧卢布折抵一个新卢布，存钱在一千个卢布以上的，都打折扣，愈多折扣愈大；而一千个卢布以下的，一个顶一个，所以我们的存款，后来可以抵八百个新卢布用了。

自己的小园地，我们租房属于一个新开的街，在叶高尔申的最边区，街名为“五月九日”，为纪念对德胜利而命名的。这条街只有一面总共才有十几座房子，另一面是空地，我们到时是五月后半月，虽然有人种的土豆已长出来了，但还能种。我们买了两桶，自己把里边的肉吃了，皮留得略厚一些。在房对面挖了几十米见方的地方，种下了土豆皮，过些时出来了，但长得很弱，茎儿只有筷子粗细，秋收时也算大小挖了一大桶，土豆个最大的如鸡蛋，总算没有白赔进

去，而且也尝了自己的小园地的收获。

当描图员 为了增加收入，特别在初期工资还是六百五十卢布时，我到厂里领回一些描图工作，利用星期日在家里干，每天也可得十几个卢布，但描过几次以后，感到胸部痛，从此才体会到描图的苦处。当时这份活还是很费我的眼力的。

三米呢料的价值 我工作了两三个月后，在厂里领了三米呢料，本来再花点工钱就可以做一套衣服了，但我决定去换东西吃，原来想换点肉、鸡蛋或土豆，将准备过节，但到附近乡间一问，只能换五、六桶土豆。农民这样自私自利，投机剥削，真是未免太厉害了，我索性宁挨点饿，也不再换了。

挖土豆的收入 九月间附近的农庄都开始收土豆了，我和莉莎在休息日到离我们住处有好几里的地方去帮人挖土豆。每挖十筐可得一筐，即第十一筐归自己。我们头一次费了很大的力气，一个上午只吃了十几分钟的面包，共挖了三十三筐，这样达到了三筐收入的定额，因为土豆收成不好，费力就大，好在自己也有收入，还可以在大堆土豆中挑好的。以后又去了两次，收入八、九筐土豆。这在我们当时说来，真是改善生活了不起的事，一筐相当于四桶么！但这活也真累，回到家里连饭都不想吃就躺下去了，第二天上班，感到浑身酸痛。每当我们吃土豆时，总是回想起挖土豆时的滋味。我仿照中国过去很有名的一首诗，李绅的五言古风，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便成了：“挖薯已过午，腰痛汗滴土，才知盘中餐，块块皆辛苦。”

莉莎去割麦子 十月间，附近农庄由于劳动力缺乏，号

召人去割麦子，每割一俄亩（约合中国十五市亩左右），给麦子一蒲特（十六公斤，合中国三十二市斤）。我们除土豆之外，还得解决吃饭问题，莉莎便到一个村庄去干了将近一个月，那里天已经冷了，农活又累，她两只手被麦秆扎破，肿得可怕，可她还在继续干。在休息日我们也去帮忙，在那里吃不好，睡人家的地板上。她十月革命节时回来休息了几天，过了节又去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动，总算弄回来约一百斤的面，这是除了给房主、自己吃及除去麸皮的净收入，总算是一个大收获！但她确实累坏了，我也忙坏了。经过这样辛苦的劳动，我们感到今冬的面和土豆总算有把握了，不然就会象下面所说那样不堪设想了。

吃野菜的后果 在八、九月间，土豆还未下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段时间被迫吃野菜。主要是吃一种野麻，别的也无什么东西，这个地区就是那样。开始吃了几次，觉得肚里有东西了，但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它没有什么养分，只是白白增加胃负担，连拉的屎也还是青色的东西，这样一直到第一次挖土豆有了收入，才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十月革命节后才算克服了。

第一次在乌拉尔地区过十月革命节 在十月革命节，我们尽自己的可能，准备吃好吃饱，为了过节商店里每人供给三公斤白面。莉莎早早去站队，总算是买到了一份，我们两个人也足够吃了，我又去买了一份。有一天我到调度员那里去作客，吃饱了还带回来一点。这样莉莎尽可能做了一点菜饼，买点酒，又和房主人吃喝了一顿。他们吃喝一个整天，并和他们的岳父母又吃喝了一次。这个节总算过得不错，来这里第一次感到不限制地吃东西，但由于几个月未吃过

真正的饱饭，所以吃饱了还想吃，真是所谓“肚饱眼馋饥”了。这次我才了解了俄国工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如心理、风俗以及过节的生活。

在和女房主人的父母相识后，才知道她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而是在四、五岁时拾的或收养的孤女，但表面上象亲生一样，外人看不出来。她的父亲年轻时非常不正当，虐待妻子，不把她当人看，自己又在外游荡，乱搞女人，所以没有孩子，到了五十岁后，才有好转，但自己不能生儿女了。

十月革命时工厂里给行政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发一些奖金，我也得了二百个卢布。这样，我们可以多买点酒，因为其他定额的东西还仍然受限制。

晚上我们休息时，虽然和莉莎也谈谈话，但彼此都还有一些无名的孤独感想，我则想到过去，想到中国的革命形势、政局、也怀念一些过去的朋友，不觉也参照唐诗，哼了一首绝句：“独在异乡为异客，待节来临目无亲，遥望故国峰烟处，浴血奋战念同人。”十月革命节后，已完全进入了冬季，我们将莉莎割麦子挣的一百斤面，几大筐土豆，作为粮食储备，加上按国家配给买的東西，虽然吃得并不好，但总可保证吃饱了。

苏联1947年十二月的货币改革 在十二月间，苏联进行了货币改革。据说主要原因，是为了消除卫国战争时期引起的货币膨胀，商品供应不足，卢布太多，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价格悬殊，而为了平衡稳定价格，必须将以前发的旧卢布收回，换新卢布，这个工作原来是秘密进行准备的，直至十一月中旬谁也不知道，但在中旬后，距十一月十日发工资不

到一个星期，即预支十一月份工资，而不是原来的二十五号，而且支付数目也多于正常的百分之四十，大家都莫名其妙，二十日以后，这个秘密忽然有人传出来了，说旧卢布不再用，而要换新卢布了，而且有人说，在国家银行中，看到已运来新卢布，同时商店抢购风马上起来，除书店外，百货商店、食品商店内货架上的所有东西，都被人抢购一空，连平时买得很少的日用品如香水、梳刷，食的如花椒面也都抢购一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百货商店里几乎无人买的价值几千元的钢琴，也被买走了，小市场上也没有人卖东西了。这些都是不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

后来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即三十号的晚上，果然广播了这件事，从次日早晨起，旧卢布一律停止使用，而使用新卢布，为此，(一) 十一月份清算工资将一律发新卢布，十一月预支的而花完的数目，可以兑换成新卢布，但数目不超过预支的百分之多少。(二) 储蓄所的存款，凡在命令发布前的存款处理办法是一千卢布以下的，仍按一一换成新卢布，二千卢布以上的按比率折换，愈多的折换率愈大，但仍有效。

(三) 职工个人原有的卢布，除十一月预支的以外，由各单位开证明。每十卢布换新币一卢布，但不能超过本人一个月工资额，没有证明的不予兑换。这样一来，职工没有什么损失，而搞投机倒把，高价出售食物赚钱积累下来的旧卢布，基本上都成了废纸了。

我们下决心留下来存入储蓄所的八百卢布，现在幸运地没受损失，而且还可以比原来多购买好几倍的东西，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算是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

但有些人却吃亏了。我们车间有个刨工，家在附近乡

村，养有两条牛，战争中卖牛奶和自留地产品，还搞一些投机买卖，有人说，他积累了一麻袋的钱，准备将来再买新房。有人传说旧卢布快不能用时，他还不相信地说：“苏维埃政权不能不讲信用。”广播宣布后，他凭证明兑换了几百个卢布，其余几万卢布都成了废纸。他为此害了一场病。另外，有人走后门，在储蓄所凭认识的人或用贿赂手段，事后将钱存入，但写上以前的日期，结果被核对时查出，有些人还被捕了。

新卢布发出后，物价稳定了，国家商店的物价也统一了，以前存在的高价和平价的差别也不存在了。

取消配给制 在宣布新货币和货币改革的同时，宣布从1947年12月1日起，取消配给制，一切商品，不限制定额，敞开出售，开始有些人抢购，但不几天就稳定下来了，货架上的东西也都出来了，多了。莉莎可以从商店买回必需的食品了，我们积蓄的一点东西，现在也可以接上去了，至少可以吃得饱了，虽然还不那么好。糖、黄油、肉都可买一点了，虽然有时还缺货。

但是，“三春好景不长”，配给制取消后三、四个月，天气将暖的时候，忽然供应紧张起来了，不仅其他副食品很感缺乏，连买面包也得排大队，有时排队也买不到。后来莉莎天不亮就得起来，穿着棉衣去排队，最后影响到工人的生产。照例，这个时候传说，发现了投机倒把，也抓了一些人。也有人说，由于乡间没有粮食，这里人们都到城市来买的缘故。

最后，工厂被迫实行厂内供应，将面包、糖等在车间按人口供应，这才勉强度过了难关。这样一直继续了两、三个月

才好了一些。直到1948年五月以后，我们的生活问题才算是稍微解决了，虽然还是住着租用的小房间。总之，自从离开了北方，大概经过了一年以后，才渡过了困难甚至是饥饿的阶段。这个为生活斗争的阶段，才算基本上稳定了。

到特罗伊次克去的前后 在1948年春，正当面包问题紧张时，收到了在北极圈劳动营里比较接近的长期相识的朋友斯莱德的信，说他们一家也离开了印塔，回到了他少年时代曾生活过的南乌拉尔的故乡，特罗伊次克。那里气候较好，比乌拉尔暖和多了，他已在那里落户，找到了工作。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去，两家共同在一起，既不至于那样目无亲友地孤单，也可以在精神上、物质上相互帮助。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与其迟干，不如早干。这样便动了我家搬家的念头。

经过和莉莎商量，决定利用我五月间的例假，我们两个人到那里去了一次，亲自看看，还打算带着我们的东西，只留下床铺和必需品。我们准备，如果在那里可以的话，莉莎就留在那里，我一个人回来，办理离厂手续，收拾其余不多的东西再去那里。在五月下旬，我们离开了叶高尔申。

特罗伊次克在南乌拉尔，要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转车，由于没有经验，在那里竟呆了一天才坐上向南开的火车。

到特罗伊次克时还是凌晨，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只得在车站上等着。以后才知道斯莱德曾到车站去了，但未接到我们。天亮时，还不见街上有什么人，使我感到这里不是工业城市。我们提着箱子，一面走，一面摸着打听，六点多钟才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彼此说了些别后一年的情况。

特罗伊次克是个较老的城市，充满了小商市侩。只有一

个小冶金厂，一个肉类加工厂。在那个冶金厂内见到了过去在北方认识的工程师，他家在那里，我和他谈得很详细，并和叶高尔申作了比较，我和他一致认为，这里是找不到我在那里的工作的，即不如叶高尔申，这就是个关键问题。斯莱德在商业局工作，一个月六百多个卢布。住房条件及其他燃料、供应都不如我在叶高尔申的。经过了实地了解和比较，和莉沙商量结果，认为不值得搬移。但为了说服斯莱德和我们在一起的愿望，我们商定，我还是回去，不超过假期，而且回去后，我将争取在工厂领到房子，安排好了，请他们到叶高尔申去，那时我们有基础了，不会比我初找工作时那样困难。斯莱德也只好同意了。于是我先回去，让莉沙暂留在那里。所以，这是一次不值得而又劳民伤财的旅行。

回叶高尔申后，房主人详细问了我的情况，很表示歉意，他以为我们不满意他那里的居住条件。我尽量作了解释，他仍然提出，或者我们搬入大间，房租照旧；或者仍在小间，降低房租，直到将来我们领到公家房子为止，希望我们哪里都不要去。他们很喜欢我们。我同意了，并感谢他们，以后又写信给莉沙，让她回来，并向斯莱德说明情况，如他将来到我们这里，远比他那里好。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旅行，以后只继续和他通信，死了到别处去的心。

其他生活上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小秋收 虽然我们原来想走，但在走前，还是挖了一块地，种了一些土豆，也居然有一些收成，以后又趁便宜买了一些，都存在房东的地下室，还买了些胡萝卜、大头菜、葱，算是有点贮备吧！

莉沙的厄运 1948年秋，在一个黑夜的晚上，我去上班了。她一个人出来到院子里，因走错了路，跌入房主人在院里挖的两米多深的坑里，坑内靠边放着梯子，还有一个铁棍直立着，几乎跌在棍上边。因此而受了伤，她喊叫起来了，房主人才出来扶她上来。她腰、臂受了伤，躺下去了。我夜一点回来后，敲窗，她咬着牙给我开了门。第二天才告诉我详情。真是不幸，好在未伤到骨。

后来她到医院去看，医生说需要加强电光照射。她只得每天去，按时间及规定照射。但有一次护士耽误了时间，照射过了头，她晕了过去。医生进行了抢救，以后又听了她的心脏，怕有后遗症，但很奇怪，据说，不仅没有后遗症，而且原有心脏功能不全的病症，反而好了。真是“偶然新疗心脏法”。据莉沙说，以后没有再感觉不好受。

夜班时小树林中的虚惊 一次冬天我下夜班时，这次恰好只有我一个人，从工厂回家，在离家半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约一里长的小树林，路上黑得对面不见人。忽然听到对面有不正常的声音，我即刻躲在一棵树后，细听一下，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又过两、三分钟，毫无声音了。我正在准备走出来，因注意时间长瞳仁放大了些，可以分辨出近处的树及路了，忽然又听到跑步声。我又停下去不敢动，以后看到有三、四个人跑过去了，因天黑的很，跑的不快，而且不在一起。以后完全沉静了，我才找到路回去，一路上仍很惊怕，因为那时常听说有人抢劫、伤人的事。所以平时还行，到发工资时，总是约着同路的人，几个人一起回家。回家后，也不敢向莉沙讲，怕她害怕。

次日，听说那里有人被抢劫，而且伤了人。

以后听说两次抢劫案。一次，我们车间的一个工段长用游标卡尺当手枪把个小偷给抓住了，并送到警察所去。一次，一个车工，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小袄，在半明半暗的夜晚，被小偷误认为皮褂子，强迫他脱下去，而给了他一件破大衣。这样一来，他反而赚了。

一个女青年的死 厂福利处有一个女记账员，才二十岁，十年制中学刚毕业不到二年。她管些钱如收房租、煤费等。有一天，上午下班后，她突然未回家，后来发现中午时她投入附近一个小河死了。我们车间有个车工和她相好，内务部门狠追问他，是否因为爱情不遂而自杀。后来才从偶然谈话中发现是那天上午会计师去查账时说，她的账目差错几千元，有判几年劳动改造的可能，她害怕而自杀了。后来发现账目无问题，是会计师自己未弄清楚。但好好的一个女青年却死了！

为房子问题的申请 1948年冬天，厂内开始建造一座新宿舍。我知道后，便写了宿舍申请书。过了一些时间，我又去找厂长，打听房子的事。他问我跑了几天了，我说，是第二次，他笑了笑，倒是说出了真实话：“我批了之后，你还得去好几次才行，一两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说：“我不会那样，怕人家厌烦。”他说：“俄国人就是这样，不要怕麻烦。”

1949年春，听说房子快建好了，我又去找厂长，他批的更具体了：“建好后，分给一户房子。”但可惜出了不幸的事，我没有享受房子的命运。

德国的俘虏兵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俘虏兵。据说，在叶高尔申有几百个德国俘虏兵，集中在一起，住在城边的一个地方。里边分几个大队，大队又分几个小队。在这个厂内

有一个大队，在我们金工车间有一个小队，有十几个人，其他车间也有。一个小队有一个带队的，可能是原来的小军官，他不干活，只负责派工，并领着他们来和回去。每天早八点，他们按时到车间。由总工长及调度领着小队长分派工作。他们主要是干些力工的活，技术检查站也有两、三个，帮看些零件。上午他们和工人一起休息，自己带面包，还有点其他配面包的东西，喝点开水。他们不懂俄语，也不学俄文，和他们谈话，就是用手比划动作。小队长略知道几句俄语。穿的还是旧军衣，一看样子，就知道不是俄国人。他们表情呆滞，从来没有一点和颜悦色的样子。到了五点钟，他们就整队回去。

据说，他们1945年就在这里，集中住在一起，象个集中营的样子。开始不出来，以后，在1945年冬或1946年初，开始分队工作。我在大街上也看到他们在修路，也有修建房子的。他们住的地方，没有红军守卫或看护，来往行走、劳动也无人监视，但他们个人不能出来游逛，只有整队出来劳动，有人带队。在住的地方，他们自己有服务部门，如补衣服、修鞋、理发、医疗等，都是自己干。他们的供应不太好，但高于一般俄国人。里边的管理人员，是他们自己安排的，由原来的军官担任。他们在苏联的节日，照常休息，而在新年、礼拜日，也有自己的文艺晚会，自行作乐。

侵略军的威风，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有人说，他们的军官，可能还有点上级的样子，在士兵中还发号施令，保持自己军队中的派头。

在1947年冬或1948年春，他们被遣返回去了。叶高尔申其他地方的俘虏兵，也都回去了。

除了前述的一般车间工作，我再分别叙述工作及生产中的一些片断回忆。

· 月、季末对技术人员的围攻 厂里的生产情况一直不太正常。往往是月初松，月末紧，最后几天拚命干。到了月末、季末、25号以后，厂里的调度员、车间主任、工段长，带着力工及零件明细表，在技术检查站那里，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纷纷催检，催搬运，实际是在抢，降低技术条件，讨价还价，鱼目混珠，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只择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技术人员打上钢印，在发货单上签了字，就万事大吉了。有一次，技术检查工长在下午班时，不得不向厂技术检查处长打电话求救，请他来解围。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机器端部的缘扣坏了，应该重换重车，车间主任一面下令给工段长修理，一面使眼色让装车，被我看到又在车上卸下。车间主任被我问得不能答复时，却责备工段长不听命令。工段长一面点头认错，一面拖修，一面又对我笑，而且说：“就是那么一回事吧！”

蒙混过关未成的大皮带轮 有一次，车间技术检查站向外发备件成品时，发现一个大皮带轮是废品，三角皮带槽不对，仔细一检查，却没有钢印。这是个大件，按规定是技术工长亲自验收的，而工长只有我和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大锻焊件，是有一定数量的，工票上也有验收数目，应该一致。这样显然是漏检了，或某个人作了人情，放过去了。当即找了另一个检查工长来，我们两人都说，没有漏检的事。他提出，作这个零件的，只有三个人，将他们都找来，互相对质，一定可以查出来。于是就这样决定，把三个人都找来，说明情况后，问是谁干的。其中一个当即承认是他干的，是在夜

班，学徒干坏了，他发现后，天未亮，车间人少，他们将成品库打开，把坏的放进去，换了个好的，再装在车床上，将原钢印轻轻地车去，才交检，想混过关。他未想到没有混过二次复检，现在不能怪其他人，他只好自己承担责任。

空心主轴缘扣差错 有一次接晚班，一种备件“主轴”最后车缘扣工序，在我进行样品验收时，发现螺纹环规只进两三扣就进不去了，在测量内外直径，螺纹宽（方缘扣）时，也未发现错误，但在测量全缘扣十几扣的总长时，发现有点积累误差。我开始怀疑是否挂轮有错误。据说，上一班已干了一整班，有十几个已验收。我打开成品库，一看，一批都是那样的。我即命令停止工作，寻找原因。并立即派人到上一班技术检查工长家，将他叫来车间，向他指出这些情况。他说，因为是旧工作，他只试了两三扣后就不再试了。我建议检查挂轮。一看，原来机修时，钳工把一个挂轮齿数为127的，车英制缘扣的位置和125齿车英制缘扣的位置颠倒了，因差别过小，所以误差很小，未能发觉，幸而我们班长发现了，不然就可能造成大批废品。这件事使我以后更小心了。

这件事由于我的警惕才发现了。以前有一次因为我对一个小塞规未作仔细检查，上边有个小疤未发现，造成了一小批（约十几个）齿轮废品。因此对我、工段长及检查员都扣了一点工资，作为赔偿损失。这是一件小事，但使我在检查工作中吸取教训，时时提醒我小心注意。

忽然有人请我吃喝 在金工车间外边附设了一个不大的热处理工程，那里有两个炉子，零件特别是齿轮备件的热处理工序都在那里进行，如淬火、渗碳、退火等，而验收是由检查工长自己担任的。有一次忽然那里的热理工约请我和

他一起在休息时间吃东西，他买了香肠，还有酒。我不吃，又说不会喝酒。结果我吃我的，但他硬给我一些香肠，便过去了。又隔了两天，他又来一次，我借口有事，没有去。后来又过了几天，他才拿出他前几天热处理过而质量不合格的九个齿轮让我降低条件验收。我才联想到他请我吃喝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我说，这些不至于报废，但可返修，再进行一次热处理。我还告诉他怎样返修。我也将这事告诉了另一个检查工长及站长，但说的倒不是请吃喝的事，而是返修的要求。

草图事件 有一次，车间生产任务中有一个零件要大批粗加工，一时未找到图纸，车间副主任说他记得尺寸，便作了个草图。我迫使他签字，不然就不准生产。他不耐烦地签了字。下一班又生产了一小批。第二天从计划部门找到了图纸，一核对那草图的一个尺寸短了，使这批零件成了废品。副主任只好收回了草图烧掉，将粗加工的零件从半成品仓库中取出，改作别的。车间工艺师说，根据他的经验，车间生产时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不要凭记忆力，一切按现成文件、图纸办事；第二，一切经过正式手续，应该签字的，都要即时签字，不能说空话。归纳成两句话：“不要凭记忆工作，不要相信任何人。”

和车间主任的一次吵架 有一次月末，斜齿轮备件生产数量很大，但由于检查人员的疏忽，有一部分备件需要稍为返修才算成品而未返修。这时我正在当班。车间主任因为我过去和他顶过嘴，他想借机报复，在车间内大吵，并说，技术检查人员阻碍生产，他要赶我出去。我开始向他说明，他反以为我没理了，更加吵得厉害。后来，我的火气来了，和

他大声对吵，并说他无权赶我们走。我继续要技术检查员严格检查，不作任何技术上的让步，并派一个技术员站在门口发货的地方，又告诉门岗，严格检查发出的成品，无技术检查的盖章及签字不放任何备件出去。我对车间主任说：“你有多大本领，都使出来吧！”说完，我就愤然返回检查站。我们吵时，车间的机床都停了，工人都看着我们吵。

后来，总工长约我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去，说他请我有事商量。我拒绝了，说，我有事找他时，我去他那里，他有事找我，让他到检查站来。总工长说，他是车间主任嘛！我说，让他对工段长们作威作福、耍脾气吧！我无责任听他那一套。总工长没法，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嘻皮笑脸地来了，好象没有吵过架似的，说要找我商量怎么办。我说，昨天怎么样，今天还是照样办，没什么可商量的。他看我的气未消，说，我们俄国人的规矩：“谁要记旧事，就不能在地上活着。”我说，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谁要不记旧事，他就不能作人。”他笑着说，你来俄国这样久了，应该按俄国人的规矩办事。我说，我是中国人，还是按中国规矩办事。他说，有问题还是得谈。我觉得，冤宜解不宜结，以后还得在一起工作，他既已不咎既往，改变态度，只能迎着，我们开始谈问题了。

这次的教训是，对俄国人不能软，他们欺软怕硬。以后很长时间，他都不敢再发脾气了。

厂长是个什么人 我到那里不久，来了个新厂长，家属未来，只有一个人。这人平时不糊涂，就是好喝酒。厂门前有个小卖店，他来来往往一杯酒，有时吃点东西，有时只用小手巾一擦嘴。这是白酒，啤酒更是当茶水喝。为了省事，

他每月两次领工资后，即交给小卖店二百个卢布，由小卖店自己记帐，每月两次，多退少补。

他到任后，厂里的生产秩序并无起色，前松后紧，更为厉害，每月二十至二十五日以后无星期日，月初串休，这已成为习惯。煤炭部及职工会虽然禁止这些做，但他还是照样干。有一次恰在月末，副部长到工厂来视察，他的串休布告有一张被单身宿舍揭去，报告了副部长，受到了一次大批评。

有一次产品不合格，他硬要发出去，技术检查处不签字，他自己签字。那个处长，即我进厂时接纳我工作的那个人，是个正派人，本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借口说，和平时期已到，要回到列宁格勒原厂工作，而辞职了。厂长向部长报告，提出将原副处长提为检查处长。这个人是唯厂长之命是从的。他凡事甩手，但一年内却出现两件不利于他的事。一是厂生产的鼓风机未带电机，被其他单位告了个“产品不配套”。一是为某矿生产的一个斗车发生事故，被告到法院，罚了款。

新技术检查处长的吹毛求疵 新处长不仅对厂长唯命是从，拍马奉迎，而对下边的人，也要求对他奉承。这和原来那个处长大不相同，我的性格也不会这样，他就吹毛求疵，常想找我的差错，我当然也格外小心。有一次，因为我帮助车间调整滚螺机工作，而有几个零件未来得及进行巡回检查，他就召集车间全体技术检查人员开会，借这件事对我批评，说调整机床是车间生产人员的责任，我们不该插手。我说，未及时检查零件是我未尽到责任，今后将注意；但说不应参加调整机床，而将生产和检查截然分开，我却不同意。为什么我们

不应该关心生产，防止废品于前？这些话使他很不高兴。最后他说我不尊重领导，会议不欢而散。一个检查员劝我说，要注意，这个处长不比前处长，要防他报复。但在1948年十月革命节时，他居然提出给我二百卢布的奖金，而另一个检查长和站长却没有给，说我工作有成绩，并帮助了量具检查室的工作。据说车间主任也曾提出，虽然我同他顶过，但在生产上我却帮助车间办了一些事。以后，这个处长似乎对我缓和了。

战后苏联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及措施 1948年，战后的生产及经验获得了恢复，所以政府提出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及措施，除发布指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夏天，煤炭部派来了一个检查组，进行工厂的生产质量检查。方法是，任意选取几百已装配好待运的皮带运输机，除焊接件外，进行全部拆卸，然后按技术要求及图纸进行零件检查，以后再行重装，对各种零件进行互配以检验其互换性。在检查中发现了一百多处不合格的地方，并让厂领导、车间主任、技术检查人员在场自己看。事后，列出了问题及改进要求，作为今后改进的方向。

废除技术检查专业人员及制度的尝试 在乌拉尔地区有一个厂，曾在1948年提出废除专业技术检查人员及制度，完全由工厂、工段长等生产人员自行检查，据说，很有成绩。我厂曾派了几个人去学习，如何实行完全在自觉基础上建立自检的新的生产秩序。开始说得很好。在我厂正在准备照办的时候，第二次考察一些具体作法及经验时，却发现该厂已恢复了技术检查专业人员的制度，这是根据上级命令做的，因为使用该厂产品的单位纷纷反映说，质量下降了。大

家提出，在当时的觉悟水平、计件工资、奖金制度等条件下，行动上的自觉和口头上的说法之间还有很大的矛盾。

计件工资与定额的根本矛盾 苏联工厂内除行政领导、管理服务及技术人员外，工人基本上都是计件工资制。当然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也有一定关系，前者是从后者演变出来的。工资等级是很多年以前制定的，即八级中每一级工每小时的估价，折合成卢布数目。而根据当时的工资水平及物价比例，计件工人为了达到适当的工资数目，必须完成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才行。这就形成工资和定额的根本矛盾。而定额是根据工艺及操作规程定出的。所以，工艺、定额、工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工段长和车间领导，常常需要采取各种临时措施，以调整、增加工人的工资。完成计划，但挣不到钱，就成了公开的说法了。当时曾提出改革办法，但一直未能实现，而且以后一段时间也未实现。

和厂工艺处工艺师的一次冲突 1948年，我对厂内车间生产基本熟悉以后，有时进而想较深入了解一些技术问题。有一次，在图纸上看到一个技术条件说齿轮啮合系统 $r = 0$ ，我不懂齿轮啮合原理，就问常到车间去的一个工艺师。这个工艺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但常常到车间指手划脚，还搞些工卡具改革，穿得很神气，说话更神气，象是颇有威信的技术人员。但他对我的答复却是：“你是技术检查人员，知道怎样用样板及卡尺检查零件的尺寸，符合图纸要求就行了，用不着知道设计上的东西。”我说：“我是工长，不知道这些很不好，而且也不能答复别人的提问。”他有点不耐烦，说别人更不需要这些东西。当时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和他分开了。

以后我决定弄懂这个问题，并了解齿轮的一些基本知识。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跑图书馆、书店，到处搜罗有关齿轮及齿轮加工机床的书，不管懂不懂，顺着看下去，还常到滚齿机上去看。过了一两月的时间，对齿轮略有了解，而且有一次看到了代号 $r = 0$ 及其他代号的解释，觉得非常明白，看了几遍就完全理解了。这时心里非常高兴，原来不是什么奥妙不得了的东西，同时准备对那个工艺师作报复性的将军，出一下我的气，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我班里的检查员。

真是，事有凑巧，不几天那位工艺师来车间了，还是陪着总工艺师来的，他更显得神气。我即刻找到了那张图纸，拿到他面前，他正在那里向总工艺师指手划脚地讲什么。我又问他那个问题，他依然还是那样答复。我当即郑重其事地对总工艺师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向他说，请他问这位工艺师不回答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说可能有两个：一是他懂得，但不让别人懂，借以作自己的资本；二是他自己并不懂，但不愿在别人面前丢脸，而假装懂得。我现在请问，如果是第一个原因，那我现在已经懂了；如果是第二个原因，我可以向他解释，我不怕别人懂得我懂的东西。那个工艺师脖脸都红了。总工艺师看到这个样子对工艺师说，车间提出什么问题，应该答复。对我说，想弄清问题很好，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我说就是想弄清这个问题。以后他们走了，那位工艺师再也不来车间了。

尽可能钻研技术 我到工厂后，曾挤时间努力看一些技术书籍。但在1947年内，因生活困难，未能多看，收获也很少。从1948年春起，我积极看各种书，还和该区唯一的小书店挂上了钩，买了一点书。后来又参加了厂内组织的技术夜

校，但去了几次，费力大，收效小，于是我决定自己看书，但没有一定的计划和安排，见到可看的书就看，如工艺师手册，以后为了齿轮啮合问题，我曾集中地看了些这方面的书，经过一段时间，具备了基本知识，以后我又集中力量了解滚齿机的工作原理、构造、调整及加工工具滚齿刀的结构。和那个工艺师的矛盾，给予我很大的推动力。我作为技术检查工长，还有有利条件，可以了解各种机床、量具检验室及其他工艺规程等。几个工段长，都是从工人提拔起来的，有实践经验，但没有技术知识。我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特别是那个切齿工段长，尤其是在下述事发生后。

一次成效——发现滚齿机说明书的错误 1948年秋，厂里接收了一批齿轮备件订货，是模数8，直径在400毫米以上，宽100以上， 45° 斜齿。原厂内有的“共青团”滚齿机是满负荷的，过去作的都比这个小。第一批二十个毛坯，作为试制品。机械加工后，滚齿时一连废了两、三个。厂内各领导、车间的总工艺师、设计师、机械师、主任、工长几个人，每天“会诊”，认为是机器磨损了，需进行大修。修了再试，还是废品。又更换了油，重磨了滚齿刀，但依然是废品。各种猜想和方法都用遍了，还是废品，两个月内，试了十几个都是废品，而且问题都是一样，就是成不了渐开浅齿形。我也在观察，并和切齿工段长研究，据他说，可能是挂轮中的差动装量有问题。我于是拿机床说明书，按计算公式进行差动装量挂轮的验算，我回家后，吃了饭，一直算到夜里一、两点钟，才发现说明书中，模数8，斜 45° 的四个齿轮中，有一个应该是64齿，而说明书中是62齿。我又仔细核对几次，还是如此。我认为发现了说明书的错误，心里很高

兴。但头脑已疲倦极了，勉强睡了一下，五点钟就醒了。我提前到厂，夜班切齿工还在工作，但这个零件未加工，因为只剩下三个毛坯了，没有领导在厂，她一个人不敢干。我向她说明情况，她很相信我，即按说明书配的挂轮差动装量中62齿，换成64齿，装上一个新主坯，开始切削。到十一点，白班开始时，已经进刀有四十多毫米，而且齿形很正常。车间主任一看，大为惊奇，即刻打电话，找来了原来参加“会诊”的各技术领导人，报告试制成功及原因。大家也都很高兴。一直到上午休息时，第一个零件切成了齿。这使我很高兴，从此，自己钻研技术的信心也更足了。

初步认识仪表 从1948年起，我在白班工作时，还常到附设在金工车间内的，属于技术检查处领导的量具检验室，那里有两个女检查员，她们的任务是定期地检查金工车间工具室的量具，如塞规、长规、角规等。我在那里了解了标准量具，约翰逊块规、精密游标卡尺，硬度测量仪及测定、检验量具方法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仪表。过去在北方没有见过，在伊万诺夫时也没有机会见到，而只在书本上看到。这也算长了一点实践知识。

军工生产的准备 1948年秋，可能苏联政府感到英、美对苏政策开始强硬化，可能有新的战争危险，曾下令各工厂，凡是过去生产过军工产品的，要将生产技术准备工作来一个总检查，并准备随时投产。这件事由工艺处和技术检查处负责。工艺处检查了全部生产卡片、工艺过程及图纸。技术检查处复查了各种量具、样本、标准量具。这时我才知道所谓大批生产的零件“1”是火箭炮“喀秋莎”炮弹头。而装配则是在军工厂进行的。

第三次被捕经过

未实现的回国意图 1949年春，中国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三大战役后，已在准备渡江南下，攻占南京。我的回国意图又复活了。准备向苏联政府机关写申请。这件事我先向莉沙提出，她表示，虽然在她个人的心里，不愿我走，不愿我离开她，但是为了真正同情我的处境，年纪已大了，离开祖国已很久了，在苏联又有这样不幸的经历，才同意我申请，并表示决不阻止我。她希望在我能回国后，只要我的妻子还在，能够和她团聚，她说，作为妻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丈夫的，不论什么时候回来。

因此，我立即起草我的申请。不幸，刚写好还未来得及发出时，又发生了第三次被捕的悲剧。

被捕情况 这次被捕与第一、第二次不同，是在工作岗位上发生的。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上白班在上午十点左右，忽然有一个内穿军服外穿夹大衣的人要求我到检查站去，结果到了一空房间，是工段长临时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他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让我看一张纸条，原来是逮捕证。我当时怒从心起，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该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要我在上边签字，我说，不签。他说，他的任务是逮捕我。我说：“那是你的事。”我问他，要不要我交待工作再跟他走。他说，不必要。我说，那责任在他了。我和他出了车间，外边还有一个人，坐在马车上。我们一起上了车，他让马车开到五九街，即我住的地方。

到了住所，见到了莉沙，她知道又是来逮捕我的，眼中流下了泪。我说，不要怕，没干坏事，怕什么。他们开始在家内进行搜查。遇到书籍、信件，便问是谁的，我说是我

的。后来见到斯莱德信中有国际象棋上走步的符号，问我是什么密码？我生气地回答：“你们拿去找专家鉴定吧！”除了几封信外，没有拿什么东西，只写了个记录，让我收拾了随身衣服，又出门坐上马车，把我送到区民警局去。来了一个穿军装的，陪我坐在一间房子里，以后给我送来饭，我也吃不下去，晚上，大约七点钟左右，来了两个人，一个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张讯问纸，写了我的年龄、姓名、民族等，又提出了一个官样问题：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您有反革命活动请您交待。”

我说，没有那么回事。他说让我自己写上答案，然后签了个字。他说这是手续，根据法律，逮捕人后，应该宣布为什么。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他让人给我拿来毛毯，将桌子对在一起当床，可以休息，并告诉我厕所的位置。屋内也无人陪我。我胡乱躺下去，似睡似梦地混了一夜，只觉得时间很长，因为实际上睡不着。

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送来了饭，我多少吃了一些。又过了一阵，来了个穿便服的人，要我跟他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是州的首府。那个人表面上很客气，说路上没有任何拘束形式，只是希望我不要随便离开他，我说可以。这样他领着我到了叶高尔申车站。他买了票，我们上了普通客车。在车上彼此没有谈什么。过了些时，快到终点站了，我问他，看来，我一下子回不了叶高尔申了，我的妻子见不到我，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将要着急。问他能不能给我带个纸条，使她放心。他说可以。我即刻借了笔，写了个纸条给莉沙，大意说，在问题弄清以前，我一时不能回去。要她放心，并安心地等我，不要怕，也不

要急。写后，交给了他，他看了一下，说一定转到。我稍微安定了一些，虽然怀疑他是否能将这个短信转给我的妻子。

下火车后，他仍重复了一遍，要我不离开他。又领我上了公共汽车，到了一个地方，进去一看，象内务部门的传达室。他打了电话，出来了两个人，他向他们交待了。这两个人领我到里边去，经过了照例的搜身、登记，又有一个带手枪的守卫，带我上了楼，走了一段长的走廊，然后开了一个监牢。这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部门的内牢。从此我结束了叶高尔申整整两年的工厂工作及生活，和这个厂告了别。虽然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但也只好开始我的第三次被捕的不幸生活。

州内务部内牢及受审情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部的内牢，和伊万诺夫的基本是一样的，每间四张床，一天吃三次东西，六百克（一斤二两）面包，两小块二十克糖，这可能是全苏的统一标准。内牢很干净，从窗口看及去提审时的路上所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有四、五层楼，房间很多。办公、监牢及其他保卫、服务都在这座大楼。内部的制度也和伊万诺夫的一样，这对我已非新事。

我进去时，牢房里已有三个人。而后来我还是最先离开的。所以，人员流动较小。三个人中，一个是本地区一个冶金厂单炉炼钢车间的机械师，四十岁左右。据他说，战前他就该厂工作，战争开始他参了军，打了两年仗被德军俘虏，关在德国西部的集中营内，生活很苦。1945年美英法联军进入西德，他被释放，享受美国兵的待遇，吃得不错，没事干，胖了。大战结束后，被遣返苏联，仍回本厂当机械师，工作不错。这次被捕，说他有叛国嫌疑，他满腹牢骚，说

打了两年仗，在德国集中营受了两年罪，现在又坐牢。他已经来了两、三个月了。

第二个是俄国籍的德国人，祖父一代从德国移民来时，还在沙皇时代。那个地区都是德国人。是个农民样子，很落后，也脏，没有什么东西，乱吃，身上虱子不少，说是以通外国嫌疑被捕。

第三个是个教员，知识分子，什么都谈，也不悲观，但就是不谈自己的事。我有时想问他一点情况，试探他，他总是说“让上帝安排吧！”

我向他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有点嫌疑吧！我极力表示平静态度。

第一次提审 使我心里非常焦急的，是从我进入牢内后，整两个星期，一次也未找过我。我勉强吃东西，睡不好觉，前思后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什么原因逮捕我。第二次被捕时，是因为反对派头头们出了事。现在一切债都还了，而且多呆了四、五年，释放才三年，因此就横了心，不生气，准备在提问时和他们“干仗”。

两个星期过去了，真是过得太慢了。有一天晚上，我被提审了。问案者表面很客气、文明，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只隔两、三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桌上放的东西，他的动作、眼光、神气，他的军装很整齐，看他的肩章，知道他是个中校，是个不太小的官。我问他能否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他说叫费德伦柯，是乌克兰的姓。他开始凝视了我一会，仿佛催眠术人用的办法，想在精神上给我压力，我也对看他的眼睛，注目地望着他，表示准备对付他的挑战。他时而翻阅一本较厚的十六开的大本子，可能是从

别处调来的内务部门关于我的档案，或过去的证词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开始说话，大概经过翻阅这些旧档案，知道了我过去的情况。又补充地问了些他想了解的问题，又问了一些有关1927年中国革命及以后的情况，他也谈了一些。可能他在这段时间，略微看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他问到了当时对中国革命策略及政策上的分歧，还问了1937年伊万诺夫阶段的情况，又问为什么我要到乌拉尔来。总之，是些一般性的谈话，主要是过去历史方面的，以后，他写了一个提审记录，除我的姓名、年纪等外，是问题答案性的，一问一答。写后，交给我看，问是否这样，有无不同意见的地方。我说，没有。他让我签了名，他也签了名。他说，时间晚了，已经十一点了，第一次就谈到这里。回去了，脑子也未有大波动，疲倦了。也睡了。

第一次暗暗地流了泪 半个月来，我没有什么特别悲痛，只是常常心里涌现出一种无名悲哀，特别是思念故乡的心情，有时简直使人想到发疯或神经错乱的程度。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我满指望回国在即，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无缘无故又来这一套。有一天，恰恰三个人都被提审去了，那是在午饭以后，我一个人在牢房里对角地踱来踱去，更增加了无限的孤独感，偏偏外边又滴滴答答地下起了小雨，中国人所谓风雨雪月都会使离人增加愁闷。我忽然想起了李后主的“浪淘沙”词，从“帘外雨潺潺”开始，想起自己的命运及处境，还远不如那个亡国之君，多少年来，一直无止境地一浪接一浪地在折磨人。一个人究竟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才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折磨？！因而，按原词改动，以表达自己的感怀：

浪淘沙《夏雨怀乡》

窗外雨潺潺，忧意阑珊。暖风无奈心里寒。异乡图
圉作囚客，谁共悲欢？

含泪望铁栏，祖国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逐
波东逝水，天上人间？

我不能继续踱来踱去了，只得靠着墙蹲下去，两手抱着头，反复地自吟，“含泪望铁栏，祖国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不觉地真的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让出声音。但由于不出声，更感悲切。我想到多少年来，经过了多少感情变化，甚至在死亡的边缘上，都没有流过泪。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四十多岁了，意志衰退了；也可能是离国太久，怀乡病更重了……总之，泪珠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滴着，成了杂乱无章的湿点，我呆木地不加理会，让它留在那里作个短暂的纪念吧！

门忽然响了，使我如在梦中惊醒，赶紧用脚抹去地板上的泪痕，擦了擦眼，站了起来。是那位教员提审回来了。他看到我这种情景，心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问为什么，使用别的话打断了沉寂。

以后的几次提审 从六月以后，又提审过三、四次，大概每隔几天一次。但基本上都是为提审而提审，问了一些鸡毛蒜皮、不问也知的事，主要是在乌拉尔地区这一段，如为什么到乌拉尔来？怎样来的？和谁相识？见过中国人没有？到过什么地方去？和谁通过信？在车间、工厂有谁是较好的朋友？谈什么政治问题？监房里有几个人？什么样的人？和他们谈过什么问题等等。

在提到通讯关系时，问到斯莱德是什么样的人，通讯中谈到国际象棋走法的一些符号，问官笑着，说我懂得棋，可能下得不错，他也会下棋，但不太好，如在外面，倒可向我领教一下。我说，幸亏他懂得象棋，不然可能当成什么密码对我问个不休或找专家分析鉴定呢？他笑着说，哪有这样的蠢人？我说，就有就有，自己不懂，却怀疑别人干坏事的。他用眼看了我一下，问我说话是否言外有意。我说，我从来是有啥说啥，从不口是心非，说的一套，干的又一套。他又看了我一眼，不再问了，可能不愿让我借端再讽刺他。

有一次我问他，时间已不短了，你们掌握的材料，要提审的问题，及逮捕我的原因就是这些吗？如果是，这算什么问题，如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不拿出来？如果仅仅是由于这些问题，那么不逮捕我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他笑着说，他是问官，我不是问官，只能他问我，不能我问他。不然，就弄错了位置了。他又说，在监房里不是闷的无聊吗？到他那里坐一坐，谈一谈，而且可以看看报纸，不是很好吗？

每次提审谈一些事以外，在结束前半小时左右，他总是写一张提审记录，一问一答，他自己写，自己答，写些不痛不痒的事，以后让我看一下，签个字，有一次我发现签字之后，还注明晚上从几时到几时，脑子里忽然动了个念头，是不是计件（计时）工资，也适用于他们作为领加班费用呢？我就问他是否也计报酬，加班？他笑了笑说，这与我没有关系。我在那里坐几小时，对我只有好处。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情况及看报纸 从第二次提审开始，似乎是彼此认识了，他开始谈一些中国革命战争的情况，解放军已于五月末占领上海，并继续向南边作全面的进攻。我

要求能看报纸。他说，可以破例满足我的要求，并把桌上放着的《真理报》交给我，让我坐在那里看。他只是说，第一，只能在这里看；第二，当然也可看别的消息，但回监房不要向别人谈任何消息。以后在提审之间的日子，他还将报纸积下来，到提审时谈一段后，就把好几天的报纸一块给我看，只是愈看到国内战争的胜利情况，心中愈是着急。这真是使人难受啊！

他说到中国革命即将完全胜利，而除了中国共产党外，为什么还有其他党派，还要政治协商会议？我向他说明，这可能和十月革命前后的情况一样。

见到他们的长官及法官 有一次在提审时，进来了一个军官，问官当即站了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官了，他让我站起来，我没理他，那个军官说不必要，我更坐着不动。问官说，我没有礼貌。我说，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说不必要，我何必起来？他又不是找我的。问官说，我太高傲了，虽然这是小事。

又有一次，进来了一个穿黑制服的人，还带了一个人，问官起身和他们打招呼，并对我说，这是法官及法官助理。法官端详了我一下，就问我，对牢内管理，提审情况有无问题或不满意的地方？我有什么要求？我一听是法官，就直接回答并反问他：“一个公民没有犯罪证据能否逮捕？能否判刑？”法官说：“逮捕是有法律依据，经过合法手续的。判刑要经过法律，法庭。”要我放心。我说，我到此已一个多月，还不知犯了什么罪？也不知是哪个法官，根据什么签署的？法官说，他不能具体说，因为还不了解我的情况，但都得有法律手续。说罢同问官只谈了几句话就走了。

和问官的争辩 法官走后，问官有点不高兴，但未发火。他说，我和法官的谈话，既不礼貌，也不合乎事实。他说，他们按法律办事，我应该相信苏维埃政权和法律。我说，我没有什么不礼貌。至于合乎事实与否，他走了，没有同他谈。现在我可以问他（问官）。对法律，我不能相信或满意。我现在不怕因此扣上反苏维埃政权的罪名。过去我亲身经历过。现在我在怀疑。在此已一个多月，我不知为什么逮捕我。我具体问了问官一下：“过去已处理过的，是否仍可逮捕？”问官说，我被捕的原因，将来总会知道的。已处理过的，不能再捕人。如果找不到罪行，可以释放我。

我说，被捕的原因可能有，但根据是不会有的，现在我就知道。释放的话，我不敢抱任何幻想。听说俄国有句俗话，监牢的门窄得很，进时容易出时难。我亲身验证过，问官不敢作出释放人的结论，也没有人敢批准这个结论。他说，这种看法不确切。我说事实胜于雄辩，问官举不出释放人的例子，也不能怪某个问官，他个人也可能无能为力。有些人今天处理别人，过些时候也可能自己成为被处理的对象。这话，我今天说的是空的，无济于事，我处于这个漂泊的低潮，被冲来冲去。问官不能帮助我，如果对我不多加枝节，比较实事求是，我就很感谢了。法官只起签署的作用，他也不能干出更多的事，不论他怎样想。正是“命运在捉弄人”！

问官听后耸了耸肩说，不谈这些事了，谈具体事吧。我提到让他给我书看，允许给妻子写信，和妻子见面。他说，在这里不能看书，以后可以考虑。让我看报已是破例了。写信及和妻子见面问题不大，问题快结束了，结束后，他们将

通知她，让她来。

最后的一次提审 在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次提审中，问官费德伦柯向我说，问题可以结束了，问我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提审了，他不问我也要问他的。我说：“我的问题或罪过是什么？是否要经过法庭？”他说：“我没有什么罪，过去的事是过去了。在乌拉尔阶段没有什么事。将来是否经过法庭，现在还不知道，得报上级研究一下。”我说：“这就矛盾了，既然我没有罪，为什么不能定是否经过法庭？难道能审判无罪的人？现在不知道，要报上级是否报oco（特别会议）？”

他说，没有什么oco。我说，什么时候取消了oco，没有oco了，由谁来解决？我希望问官能给我说得具体一些，将来究竟要我怎样？能有什么处分？我不抱幻想，但也不要瞒我！

他说，在提审过程中也谈了不少，他可以比较具体地说一些。我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罪，但乌拉尔地区是个重工业基地，我过去曾有过问题，受过处分，现在国际环境正好，为了国家安全起见我及我这样的人，需要换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工作生活。这是他所能够告诉我的最具体彻底的事了。

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逮捕我，再次经过监牢，给我以痛苦。如果需要换个地方，由民警局通知我一下，我安静地收拾一下换个地方就行了，为什么要现在这样干？

他说，对我这样的人，还是要审查一下，至于为什么这样作，不是象我们所说的那样，这是上级命令，他们是执行者。他说，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已经超出了他该说的范围。希望我不要再追问其他的事了。他在这两个月和我打交

道的过程中，尽可能不给我更多的不快，但只能到这种地步，他说，要我相信，两个月来一直是这样的。我想可能是流放了。他们有权，权就是法律，就是根据。我只好逆来顺受了。从此结束了审查阶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牢情况 过了不几天，在七月底，我坐了“黑乌鸦”囚车，路上什么也看不到，被拉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牢，在那里耐心地等待上级的决定。

这个大牢的情况，和以前呆过的莫斯科及弗拉基米尔大牢大致一样，即在饮食居住的条件比较差，但自由性却大的多的。书虽然不多，还是有一点可看；下棋，晚间讲故事，作报告，白天互相讲笑，有时还可以非法地弄到报纸看，什么都可议论，有巡回医生，时间过的快得多了。俄国人的特点，有点随遇而安，以为命该如此或听天由命，悲观发愁的人，倒是极个别的。每天有半小时的放风，也较随便，还可以作操，跳跳，不象别处那样严。因此，时间过得快。只是监房超员，又值七、八月正热的时候，两边通铺睡不下，后去的人只得睡在地上，但由于地板是水泥的，睡了几天就有好几个人病倒了，我去后，幸好有一个人将大皮袄给我当褥子，所以还好。从九月起，天不那么热了，便都可以挤到通铺上去了。人员经常在四、五十之间，正常情况仅二十四、五个人，还是可以的。在那里我一直呆到十一月初，前后共三个多月，才算得到了流放的通知。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所见所闻的情况可多了。下面仅摘述几点：

大牢内人员情况 大牢内的人员流动不太大，一般在那里要住三个月左右，也有较长一点的。在这四、五十个人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比较多的是二十、三十几岁的年纪轻一

些的，是各种刑事犯及生活犯，如盗窃、失职、贪污，还有个别杀人犯。当然，属于这类的也有年纪大一些的。但没有或很少如1937年那样的言论犯，由于说了什么话，而被定为反革命的。第二部分人数较少，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如通敌、叛国、侦探嫌疑，算是政治犯了，还有几个从中国回去的原白俄侨民。在三个月里，仅在我的牢间内，我就遇到了四、五个白俄侨民。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6年起，苏联政府号召在中国的俄侨回苏联，不咎既往，只要愿意回去的，一律以苏联公民看待，安排工作。不少人回去了，也安排了工作，有的全家回去了。但从1948年底1949年初，陆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逮捕，就象1937年对中东路的原工作人员那样。在这几个人中，是从哈尔滨、青岛、上海回去的。他们大都是商人，比较特别的，是一个从哈尔滨回去的年轻人，才二十岁，未结婚，父母还未被捕；一个是从上海回去的，已四十多岁了，据说他在上海怡和洋行（英国人的）工作，能讲英语，也略懂中文。他谈到中日战争时，中国军人的叛国卖国行为，说美国从远地，经过印度、缅甸、云南空运到四川的汽油，被他们用船私运到上海、汉口，卖给日本空军，用来反对中国。说在武汉失守时，苏联曾派了一个空军志愿军大队在武汉附近反对日本空军很有效，后来日军勾结中国守卫这个空军大队的军队，夜间袭击驻地，从此，苏联不再支援了，日本空军得以任意空袭。这些白俄的罪名，大部分是叛国、间谍等，是缺席判决，即oco（特别会议）那样的机关处理的，刑期都是不少于十年的。他们的怨言不少，说是受骗了。第三部分人也是比较少数，但也有好几个人，是和我一样的，在1937年被判过

刑而未死的，1946年释放的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是原判为五年而呆了八、九年的不幸的人，今天又倒了霉。

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人，前后有十来个人。经过我们的相互谈话，交换意见，大家得出了几点共同的想法：

- 1.这又是一个运动。不管过去有罪无罪，释放后怎么样，都得移民，这是上边的命令，是无可奈何；

- 2.仍然是由oco判决，即莫斯科特别会议；

- 3.流放地点是西伯利亚，人口稀少的地方。曾经有人就这样被送走了。

我们这些人中，有几个值得略为提一下：

一个瘸子 原是莫斯科的党的工作人员，入党较早，1937年判刑五年，在沃尔库特时，曾和鲁也参相识，很能说，腿是在煤矿中受伤才成为瘸子的。妻子仍在莫斯科，释放后不能回那里落户，只得在离莫斯科一百多里的地方落户口，而常住在莫斯科，他曾讲过小人物搞贪污的情况。后来，他到乌拉尔走亲戚，又被捕了。

一个医生 也是1937年被捕的，是很高明的外科手术大夫，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御医”，在第一次劳改期间由于是一个大医生，没有受折磨，还保养得很好。后两次在牢内作演讲，讲生理及手术。

一个哲学兼历史学教授 和我们情况一样，为人很开朗，修养也好，还保持了好身体。他对中国革命及历史情况很熟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如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他都很了解及分析得很好。他经常鼓励我，说我将来一定能回国。

其他还有几个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建筑师、教员也是

这样情况，和我的关系也不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很快知道了。这也是意中事，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大家也都议论过。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命运也很悲愤，但是人多了，也只是谈一谈而已。但总的说来，我的希望还是增加了，相信将来总有可能回国。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驱逐蒋介石政府驻莫斯科大使的消息，也同时发表了。

我大下象棋 到大牢后不久，我就和一些熟悉的人，特别是过去和我同命运的人。而这些人差不多都会而且好下棋，这是在狱牢中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所以，牢里下棋成了风，时间更过得快。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次象棋比赛。参加的有十几个人，有东西的拿出一些来吃，如白面包、糖、黄油等。我聚精会神地参加了比赛，经过几天的比赛，我居然得了头奖，还吃到了一些东西。

大牢中的其他案件 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乳品管理处的大贪污案。据说受牵连的有几十个人，他们中间的头头，即是州管理处的负责人。听说，他们的头头曾提出拿一百万卢布给法官等一批人来勾消这个案子，而法官等要求二百万卢布，他们在讨价还价不休。我听了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不知此案以后如何了结！第二件是一个管钱的出纳，自己贪污了几万卢布（一次工资）而自己作了假伤，被判为失残，劳改五年，后来因为他的老婆回娘家买房子而被揭发，从劳改营中调回复审。真是，做假的人，还是很容易暴露的。

和莉沙会面 在十月下半月，我这个牢房中的穷人，忽

然收到了食品。他们说，妻子来了，将要会面了，要我准备，并且批流放的判词也快下来了，他们的经验就是这样。果然，不久，守卫通知“准备见面”。我见到了莉沙，守卫很有礼貌，会见是在一间房内，不是过去听说的隔着铁窗。守卫给我们搬来了两张凳子，他坐在旁边较远的地方，让我们谈话。我把简单情况告诉莉沙，说明可能是流放，不会有其他不幸的象1937年那样的事。大概十一月可能走，到地方后，即打电报给她，她将来可以去哪里，重新团聚。她哭了，我劝她心放宽一些，不要怕，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准备不久即可相见。莉沙谈了我被捕后的情况，她的困难，只得暂时在基建处做临时工。女房主人对她不太好，但主人还可以，所以还住在那里。以后守卫说，时间快到了，有话抓紧说。莉沙还带了几件防寒的衣服，让我注意身体，到地方就给她消息。她走时，总算心里有了个底，不那么悲伤了。

所谓“判决” 十一月初我们监房中同时有三、四个人被召出去，向我们宣布判词，仍然是OCO（特别会议）的，还是三十二开大小的纸，说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另外的人是诺沃西比尔斯克（新西伯利亚），这次更简单，连本人签字的手续也不要。据俄国人说，这次用的字眼是放逐的意思，可能较自由一些，沙皇时代，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和其他不听从沙皇的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就是用的这个字眼，要到那里落户，大概要作那里的居民了，但是“没有期限”。我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没有限期”几个字却是非常可怕的，“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这对于我是特有的最沉重的。但也无可奈何，随他去吧！到那时候再说吧！只要“青山还在”！

流放被押送出发 我们回监房后，向大家讲了情况。有几个还在等着。这次出发不再集中，只让我们随时准备，未和家属见面的，也都见面了，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准备的。过了几天，就被发送了。

我们被发送时，领有干粮。一共有几十个人，都是同命运的人，挤到一个车上，人多于位置，挤得很。我们只嫌车走得慢，不如早到为好。车走了两昼夜，来到了新西伯利亚。我们下车后，排着队在街上走，我和另外两个人，因身体已弱得很了，头发晕，眼发黑，蹲下去就起不来，不能走了。押送我们的人，让我们出了队，坐在路旁休息，又弄来了一点水，以后才慢慢地走了。大牢是转运站，木板通铺，已很冷，吃的很不好。

过了两天，守卫人员宣布有卸土豆的工作，谁能去干时可以吃饱，吃饱就是报酬条件。我们的人中去了二十多个，回来时，这些“同病相怜，同舟共济”的人，还给未能去的人带来一些熟土豆，我们大家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以后又从南方来了一些人，和我们是同一类的，经过编组，又继续向东前进。

到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车上又闷了两天，到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是边疆区的中心。这里的大牢很大，三、四层楼，我们被安置到大牢角一层处，象个火车站的监房，依然是通铺，但旁边有暖气管，虽不很热，还有点暖气，对我们这些穷哥儿们来说，总算好一些。

吃的和乌拉尔一样，比前一站好一些。放风时间较长，因为是单独的一个院，管得也不严，即使这样也觉得精神上好一些，等着分配到各地区。第三次的六个月监牢生活，真

是使人厌烦透了。

这几天内，大家相互谈得很多，经历是大同小异。过去劳改的地方，都是极北方，有几个就是在这个州的极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诺内尔斯克，那里是个有色金属矿，很大，有镍和铜，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北方了。人员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干部、工程师、教员，而且有的是党员。

久别重逢见到鲁也参 在大牢中等待分配时，又来了一批人，忽然见到了从1937年冬在北极农场相别的鲁也参。1930年在莫斯科相别，1937年又在北极相遇，相别；过了十二年又在此相遇，而且将相别。他们是从南方来的，也是再次流放到这个边疆的。他的精神倒还好，比我强一些。我们谈了一些别后十二年来经历狂风暴雨仍然幸存的情况。他还带着吃的东西，是在苏联南方被捕后一个女相识送给他的。以后我先释放，前后相处只有两、三天，彼此握手告别说“后会有期。”

内务部门的人两次找我谈话 刚到大牢不久，守卫找我出去，领着我弯弯曲曲上了楼。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他向我说不是提审，而是找我谈谈情况。他问了我的专业，能干什么。过去作过什么，以便内务部门考虑将来分配到什么地方工作。又问我多年来见过中国人没有，和他们有无书信来往。中国话是否忘了等问题，我简单地回答了他，心情有点不耐烦，他又问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我感到有点奇怪。所以我转而问他，他认为我的态度怎样？他说，他希望我讲。我说，这是我第三次受处分了，但我从来未反对过苏维埃政权，即是说，对我的处分是错误的。我问他的看法。

他笑了笑说，他觉得我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我的处分，他无法改变。他问我愿否作点帮助苏维埃政权的事来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说，如有可能，愿意这样干。但目前无可能，也不愿干。因为地位所限。他说，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即是说，如果遇到听到有反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能告诉他们一下。我说，我不很明白他的意思。他具体地说，他们希望我能到一个地方，那里可以找到工作，那里有少数中国人，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俄国人不了解。当我和他们接触时，如果遇到坏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能够告诉他们，这是维护苏维埃的人应该干的事。希望我考虑一下再说。

回来后，我同一个是老党员的老工程师大致谈了这些情况，他说，完全拒绝不好，他们可能采取报复手段，而且我们是老党员，如果真遇到反革命，还是应该告诉他们的，但只要凭良心办事，应付一下还是可以的。但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

过了两天，又找我进行第二次谈话。我说，我未干过这样的事，但见到或听到真正反苏维埃政权的人或事，根据我的信念，我将向内务部门报告。但是我干不了的事，不干，也不要让我干，没有见到的事或人，我也不报告。行，就这样。不行，随他们的便。请他们另想办法。他说可以，我不愿干的事，他们也不要。他说，我将到离这里不太远的煤矿区，叫伊尔什，那里可以找到工作。从此地到一个火车站，到那里内务部门报到。他给我拿出一百卢布的钱，说是路费及十来天的生活费，以便在找到工作以前用。我说他路费要多少，他说，大概四十个卢布。我拿了五十个卢

布说，除路费外，我可以有五、六个卢布，够买两天面包吃的就行了。他说，明天将释放我，让我搭晚上的车，自己走。

离开大牢去流放 次日，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值班的狱卒招呼我带着自己的一个“讨饭”式的包袋，离开了大牢，还带了点面包，自己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买了到扎奥则尔内的票。在车站内外转了一回，算是多少有点自由的样子，才搭上十点钟的晚车。从此结束了第三次大牢的生活，开始了又一段前途未卜的飘泊生活。上车后，很快就对付着坐在座位上睡着了。次早醒来，据说，已快到站了，收拾了自己的口袋，准备投入新的奔波。

在西伯利亚阶段

(1949—1955年8月)

我在西伯利亚差不多共呆了六年。这在政治上，今后工作及生活上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四个方面，即生活，接触的人，生产技术及政治局势分别叙述。先从生产方面开始。

几年的生活情况

到达分配区及找工作 194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约七点钟时到达了扎奥则尔内车站，这是一个不大的车站，是本边疆省的一个区，相当于中国省内的一个县。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长途特快车在这里不停。这里有政府区一级的各种行政机构。11月中旬，在西伯利亚已经够冷的了，虽然尚未入严冬，满地冰雪已不融化了。我只穿了一个秋短大衣，皮鞋，破帽，感到比较冷。下车后，知道机关还未办公，外边冷，不敢出去，只得在候车室内等着。八点以后，往区内务部门办事处去报到，找到了专员，他给我发了一个流放证明，是打字的，他说，这个流放证明就是身份证，代替公民护照，可以在本区内任何地方找工作，落户口。限制条件就是不经过区内务部门的同意，不能到本区以外的地方去。其余找工作、居住，其他个人生活他们都不管，我都有自由。只是找到工作后，告诉他们工作单位，让他们知道就行了。后来他又说，离这里七公里的地方，就是伊尔什煤矿区，有公

共汽车可到。那里有中国人，也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也可帮你的忙，你们是老乡。

我出来后，找到小饭馆吃了一顿不大好却饱的饭。几个月没有坐在桌子上吃饭了，有点不太习惯。以后花了三个卢布，买汽车票到了伊尔什。下车后，我即打听那里有中国人，人们告诉我离此地不远的有一个土窑子里有一家。我穿着的破旧衣服，经过几年薰得发黄了，背着个破袋子，象个讨饭化子一样，来到那一家。那位中国人问了我的情况，说他那里窄小，不方便，让我到煤矿工人中国人住的集体宿舍去，那里可以暂住一下，并找工作。我按着他指的路，走了约二里地，才找到了那个宿舍。屋里有二十来张床，房子很大，有两个炉子，因为就在煤矿旁边，烧煤不受限制，倒觉得怪暖的。床上还铺着草垫，单子，都是用钢管焊的单身小床。

屋内有几个人，是倒班白天休息的。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干什么的，中国那个省人。他们大部分是山东人，都坐过牢，释放后到这里来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他们说，有空床位，我可以住在那里。关于我工作的事，我是要手艺的，可以到工厂里去，不必下煤窑。我就找了个空床，休息了一下，以后起来，在炉上倒了一杯现成的开水，配着干面包，吃起我的“午饭”来了。

这时进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较大的人，见到我这个生人，便和我谈了起来。几分钟后，就说“老疙瘩，不要吃这个干‘列不’^①了，到我家去玩一会儿，就离这里不远”。

^①“列不”系俄语面包一词的音译。

我和他走了，他介绍了他的俄国老婆，就去打开水，动手包饺子，很熟练。我倒不好意思起来。很快做好了，让我吃。我说，初见面，不相识，就让我吃饺子。他说，人出了门，既不能背着房子，也不能背着锅，大家都是一样，吃了再说。这还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吃饺子哩！这个人就是以后和我多次打交道的李玉书。真是“到处有坏人，也到处有好人。”我一直坐到晚上，又吃了点东西，他送我回宿舍，让我第二天还到他家去。

我回到单身宿舍，满暖和地熟睡了一觉。第二天早起，吃了块面包，就到这里的机电修配厂去找工作。这是个很小的厂子，我拿出了我的流放证明，厂长看了，问了我的情况，过去干什么。以后他说，检查工长，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名额，已有人了，不能再用我。但暂时可以当车工。我说，好多年未干车工了，有点困难。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只有干车工了。当时找到了秘书兼人事干事，办了入厂手续。以后他问我有无住处，并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到第三煤矿的单身宿舍去住。那里离工厂很近，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我第二天晚上就去上二班。

我回到中国人的单身宿舍，向他们告别，并感谢他们，又向李玉书告别了，感激他的照顾。他让我上班后，休息天到他家去玩。这样，总算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又当车工 从1935年八月考入伊万诺夫动力学院不干车工到现在已经十四年多了，经过了多少风浪，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手脚都不灵活了，现在又当车工，各方面都很不习惯，而且还是小车床，连工具、辅具也没有。经过工长的帮助，总算慢慢地开动了车床。工件是些不大的，一时又

不能熟练，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些年轻人。过几天后，虽然逐渐好转，但总是不行。苏联又是计件工资，做一件，算一件钱，头半个月，只挣了一百个卢布左右。以后直到1950年三月，每个月只波动在二百至四百五十卢布之间，从未超过这个数字。这点钱仅够两个人的日常生活饮食而已。三月间，因小卧铣床上活多，只有一个铣工，我过去当技术检查工长时曾帮助调整过铣床，所以我能转到上边工作。那里活轻些，但工资却多些，可以达到四百五十卢布的水平。

伊尔什的情况 伊尔什是本区的一个镇，但由于这里是个产煤区，有三个煤矿，所以就和一般的市镇不同。这里有学校、药房、饭铺、商店、电影院、图书馆、邮政局、储蓄所、锅炉房、单身宿舍、机电修配厂、基建局、矿务管理局、水泵站，还有象样的小市场。离这里三、四里路还有一个南矿区，火力发电站也在那里，附近有集体农庄。所以是人口较多，不亚于一个小城市。这里还有政府行政机构——**镇苏维埃**。

莉沙来西伯利亚 我到达伊尔什的次日，即打了电报告诉莉沙，并说详情信告。以后给她写了封信，说明我找到了工作，虽然不很满意。也写了西伯利亚及伊尔什的情况，并问她如果想来此，即可收拾东西准备，如果怕冷，可以明年春天再来，并说，生活可能暂时有困难，要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后来她回信，说即刻就来，不怕任何困难，并让我找房子住处。我向李玉书谈起这件事，并征求他能否将他房子中的一小间租给我们。他完全支持，并提出在目前我工资低的情况下，生活又困难，每月暂出五十个卢布的租金，水及用煤完全不用另外出钱，以后我们的情况好转时，再将房租增

加到每月一百个卢布。这样，莉沙在十二月中旬，天正冷的时候，来到了西伯利亚。我到车站去接她，并雇了车子，将行李拉来，在李玉书家安下了自己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李玉书及其一家 李玉书的老家在山东，青年时代因家庭困难，即随他的同乡到哈尔滨谋生，后在一个生意家当学徒，后来学做饭，但尚未达到厨师的水平。日本占领东北后，他和其他人跑到山里，后受日本人迫害，逃到了苏联。苏联政府以非法过境罪判处他劳改三年，被释放后，在西伯利亚一个小地方工作，后来才搬到伊尔什，这时他已和现在的俄国女人波利亚同居。到伊尔什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修建了房子。

李玉书在土豆地里打更，波利亚去地里偷土豆，被李发现，以后就认识了，因而同居。波利亚身强力壮，一百多斤的东西，提着走几里路不成问题。她的丈夫，参战后一直无消息，只有一个小女孩。他同李同居后积了几个钱。我们到他们那里时，已经又生了两个小孩。李当时在伊尔什是清理公共厕所的，每月三百个卢布，但主要收入是自己种菜，西红柿、黄瓜及菜苗等，拿去出卖。每年一季为八、九个月。种得的农产品，每年可在小市场上卖得一万卢布左右，超过一个工程师全年的工资收入。他冬天没有什么事。我到那里时，正是他清闲的时候。李为人慷慨义气，很有点中国江湖好汉的味道，所以见了我们，即请我们吃东西，还把钱供给我们用，送给我土豆。我们住在他家很方便，关系也好，一直相处到莉沙被捕，我迁居到包罗金露天煤矿为止。波利亚的一个特点，不同于其他俄国女人（包括和中国人同居的）没有鄙视中国人的习气。

莉沙找到工作 由于我当车工工资有限，住房问题解决后，家中可以不必担心，所以莉沙决定去找工作。她原有的职业在这里没有，只得找一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在本地药房里找到卫生员工作，因为药房小，实际上是服务员，什么打杂的事都干，月工资三百卢布，离机电修配厂只有五、六分钟的路，倒也方便。药房里有个主任，另一个从医学专科毕业不久的药剂师，第三个就是莉沙，工作环境还不错。这是从1950年三月开始的。

机电修配厂初期情况 当时修理厂直属矿务管理局，直接受该局的总机械师业务领导，其中电气部分受总动力师领导。我到那里时，还属于初期情况，建立才四年左右。有五台车床，二台牛头刨，一台卧铣，两台钻床，一台滚齿机未用，无人使用。这就是金工车间。还有个电工车间。有些简易电修装置。一个铁匠炉，有两个炉眼，一个三百公斤的空气锤，还有个钳工组及电焊、气焊工人，刚修好一个铸铁车间，一吨的冲天炉，及两个模型工及铸铁的一套装置及工作人员，加上行政技术管理人员共有七、八十人。生产任务是服务于几个煤矿的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的修理，简易机械设备，还制造一些简易的电器，及各种安装等，也为附近单位服务。工作还是不少的。

我被任命为工艺师 当了三个月车工后，厂里情况已略为熟悉。我常看到总机械师到车间内指手画脚地干这干那。我打听有关他的事。有一个较老的工人说，总机械师正在改装一台挖煤机，和一个煤矿运输装置，说他能吹，工人们不知他肚里有什么玩艺，背地里叫他大炮。但有个优点是肯干、敢干，和群众关系不错。有问题可以找他谈。于是有一

天我在适当的时机，即他来车间办什么事时，大胆地向他提出，问他搞改装设备要不要人帮助他制图。他问了我过去干什么。我说了以后，他说，可以试一下，于是他找了厂长，又找我，让次日换点干净衣服，准备接受任务。次日我穿了我唯一干净的一套衣裤去了。他让厂里找到Tr尺，仪器、图板，他又从管理局拿了一本矿下交通运输的书，给我布置了任务。他要在煤矿内窄轨铁路交通线上制造装配一个活动岔车装置，给我作了解释后，指出参考图纸及说明，还说可以到厂后正式轨道的道岔那里看一看，如必要时，还可到煤矿下看一看。让我画出图纸，零件图，明细表。时间不限制，有问题随时可商量，以画好为止。这段时间的工资，他将让工长办理，我不必操心。并让我交待了卧铣上的工作。

我当时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有点怕，因为未干过。我原以为只画点零件图或测绘点零件。既然给了任务就得干。于是我白天上班，看参考图纸及书，又去看实物，晚上回来吃饭后，就聚精会神地画草图，我在乌拉尔买的仪器，三角板起了作用。莉沙全力给我创造条件。总之，在办公室每天八小时，全力以赴，在家里每天也不少于五、六小时，有时在梦里还在制图呢。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总算画出了图纸，粗略地作了明细表。那个机械师见了我就问“进行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困难？”我总说：“正在慢慢摸索。”他说：“不要怕，错了也不要紧，试验么！”他也未要求看我的草图，因此，我也得到了鼓舞，一星期后，我告诉他草图已成，请他看。他说，这么快。他立即找来钳工工长，又让我找三个钳工，在我的帮助下按这个图纸试做一套。需要加工的零件，由我出草图制造。这样组成一个试制组，我实际上成了组长

兼设计员。

经过几天的努力，试制出了一台，就装在工厂的大院内。在试制过程中，总机械师常来看。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临时作了一些修改。后来这台装置运到第三煤矿就地作了实验，根据现场情况，又作了一些具体修改。这样前后费了二十天的时间，总算是试制成功了。至少，那位总机械师很满意。以后，他和厂长商量，让我作技术工作。根据1950年的工厂定员，全都满足了，只有工艺师一名还空着，于是由厂长下令，他批准，任命我为机电修配厂的工艺师，从1950年四月十日起，月工资八百八十卢布。四月一日前的工资，由工长开工票补齐。从此，我不再在机床上工作，而成为技术干部了。关于这位总机械师，名叫别列克罗波夫，以后再谈谈他。这里只是作为我的生活及工作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作专门的叙述的。其他生产技术工作，将另作专述。这是流放开始四个月的事。

第一次种、收土豆 1950年5月中，机电修配厂职工每月分到了用拖拉机耕好的地，百分之十五公顷的面积(约合二亩半)，给大家种土豆用。我从李玉书那里借了土豆作种子，和莉沙到地里种土豆。这片地离工厂不太远。六月初下了一场雨，以后土豆出的很齐，只是由于没有经验，种得有点密。我们心里很高兴，因为多少年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成片种的土豆。我们在星期日，还去锄了两次草，拢堆。虽然很累，心里却很痛快。九月后半月，在天气好时，厂里组织了集体收土豆，这一天李玉书也来帮助我们，由汽车给拉到家里。我们自己临时缝了两个口袋，又借三条，共装了七、八袋，约有一千斤，收成不算大，但对我们来说，这

是我们成家以来的第一次大丰收。回忆起在北方、乌拉尔吃土豆也要按个来盘算，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又从李玉书那里弄了一些大头菜、黄瓜，解决了蔬菜问题。

晚上遇到的一次悲剧 1950年末的几天，因为工作多，天黑得早，常常回家较晚，有时八、九点回去，虽是晚上，已算是黑夜了。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工厂，要经过两条窄得象胡同一样的街道。我快步走到家时，忽然觉得对面来了一个人，走得很急，虽然很黑，但还能感觉到。我赶快靠到一个墙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个人匆忙地过去了。我刚走几步，转到我住的街上，听到一个人在问：“是谁？”不听另一个答话。过了几秒钟，又听到说：“噢，沙沙！”但接着就是“哎哟！”的一声，仿佛有什么倒下去了，接着听到一个人快步跑了。后来我还听到那个人“哼哼”地叫，似乎接不上气了。我赶快回到家中，心中还“呼呼”不住地跳，赶紧叫李玉书和他的壮大女人波利亚拿了火柴、蜡烛出去看。待我们走出几步，已见到我们街上隔两家人都出来了，拿着灯在找血迹。原来他们家的一个青年人被刺死了，死前口中还不住地喊“沙沙”。他们说，可能打劫他的人被他认出是“沙沙”，（俄名“亚历山大”的简称），那个人才把他刺死，以灭口实。莉沙及李玉书听了，也为我害怕，我以后晚上回家，如果一个人走，一定带着一根铁棍。

排斥中国人的事 1951年春，有一次一个星期日我到小市场去，被一个俄国人无故地推了一下，几乎把我推倒，莉沙扶住了我。莉沙质问他，他问我是否中国人，我倒问他：“是中国人该怎么？不是中国人该怎么样？”另一个人听到我说话的口音，说，大概错了，走吧。这两、三个人赶快走

了。我回来后，讲了这件事，李玉书说，前几天有两、三个俄国人和中国人×××吵架，以后想打那个中国人，不料反被中国人打了，那几个“老毛子”大概想找中国人报复。还有排斥中国人的事。

莉沙的再次被捕 不幸的人，真是不会有安生的日子。1951年春，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女计划员梅莱（在哈尔滨长大的犹太人）说，他们几个人是在北冰洋边劳改过，期满释放的，现在工作才不久，又有人被捕了。她们姐妹二人，也在时刻准备着。为此我耽心莉沙是否也会“依样画葫芦”地再受到我和她的遭遇。但又想到我们所处的地区，已是流放区了，在这么远的边疆，也许不至于……而且怕莉沙有精神负担，所以，也不敢向莉沙提起这件事。两个月过去了，未再有被捕的事，我以为可能停止了。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又是五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药房的一个女药剂师打电话告诉我，说莉沙被捕了，让我马上去。我到那里时，见到药房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有一个人和莉沙站在那里，和我在乌拉尔被捕时的情况，甚至月份都完全一样。我也没有话说，跟着马车回到住所，在小屋内进行了搜查手续，以后坐车到区里去了。我回到厂内，略为交待了应办的事，说家中有事请了个假。

回住处后，我向李玉书及波利亚说明了情况，估计没有什么事，我将申请让她仍回到这里来，只不过是將公民证换成流放证明而已。我将被翻乱的东西进行整理，当时心里非常苦恼，只是有心无心地在放置。后来发现莉沙的花镜还在，没有眼镜她连一封信也不能写，于是我即刻到汽车站去扎奥则尔内去，到内务部门给她送去，并要求同她再见一

面，因为根据经验，她可能于次日被送到州里去。内务部门允许了，我见到了莉沙，除劝她不要怕，耐心外，还让她向内务部门申请，流放回原来的地方，我也将替她申请。并告诉她，过两个月后，审查结束时，我将到州里给她送东西，并看望她。

到西伯利亚才一年多，莉沙又被捕了，从此，我又开始独自生活了。这种对国家是劳民劳财，对人民是无辜受罪的事情，真不知当权者是什么主意！我自己每天早晨利用波利亚生火时，做点饭，午饭到工厂附近的饭馆去吃，就这样对对付付地过日子。

到州大牢中去看望莉沙 1951年8月初，莉沙被捕后一个多月，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的大牢去探望莉沙，并给她买了一些食物。这和1949年我在乌拉尔的情况是一样的，不过是我与莉沙两个人互换了位置罢了。见面后，她一直在流着泪说：“恐怕不能在一起了。”我劝她，我和她两面申请，也可能批准她留在本地，反正不会有别的事，只是流放而已，流放在一起，还不是一样？其他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情况了。

接到莉沙从流放区的信 十月接到莉沙来自流放区的第一封信，说她被流放到北方，离铁路较远的一个林区，那里主要是伐木。天已经很冷了。她由于年纪大，未分到伐木工作，而是在居民点内准备小桦木块，作为拖拉机的燃料。住在一家的小房间内，生活条件差，不知能否坚持下去。她挣的工资勉强可以吃饱，要我把冬天的衣服、毡靴、棉手套、帽子给她寄去，并寄一些钱及食品。她初到那里有困难，要我帮助她，以后就不要了。那时机电厂已搬到露天采矿区的

包罗金，我也搬到那里。我按她的地址，给她寄了两个包裹，以及一些钱，以后和她常通信，还给她寄钱。

这时我一个人分了一间房，经常感到无限的寂寞。白天由于工作关系，还好些。晚上回去，尽可能钻研一些技术书籍，甚至抄写一些技术资料，好在精神上分点心。晚上临睡前，常常喝点酒，以便容易入睡。有时想到自己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现在又过着这样孤独的生活。自己处于无期流放的境地，虽然工作还好，工资也无问题，但将来终究会怎么样呢？

孤独生活中的议论 莉沙被捕的消息，不久就传到厂内。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计划员梅莱听了大吃一惊。她以为已经不再逮捕人了，谁知又出现这种事。我向她讲了过去的情况。她一方面同情莉沙，一方面也为自己担心，但也没有办法。我对她说，也许我们是OCO判的，所以这样，她们不是OCO判的，也可能不至于。她说，很难说，但愿如我想的。

秋天来了，可能是我的烦闷情绪不断地有所流露。有人开始劝我另找人，结束孤独生活。过去和莉沙的关系虽好，但不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被迫离开了，也不能使自己精神上经受更多的苦闷。

我搬到包罗金，自己领了一间房，我们厂的一个女秘书，十年制毕业的，才二十多岁。借口帮我照顾生活，宁愿当我的女儿，似假似真地要搬到我那里住，女计划员梅莱劝我不要上当。她说我这样的年纪和工作条件，决不能受她的骗，上她的当。她说，她的脾气不好，更主要的是她来自中国，是个白俄，过去为此判过刑，不能和我结婚，不然将来会出大问题，因此，劝我另找一个人。

也有一位华侨，给我介绍一个云母片厂的女工，说她父亲知道我，她也愿意，年轻，有积蓄，我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及年龄，将来还不知怎样，不愿害人家跟我倒霉，所以也婉言拒绝了。

和林娜的关系 1951年10月，我厂铸铁车间主任要请事假及例假休息约五十天。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人，厂长让我兼代车间主任。当时铸铁车间未搬动，仍在伊尔什，那里的工人仍在那里，还有一部分有家的其他车间的工人，也在伊尔什。因此，我经常到伊尔什去，有时早上去，下午才回来。那时铸铁车间的小锅炉房有三个倒班的烧火女工，其中有两个年纪较大的，还有林娜。那两个女的，和我谈到家庭生活问题，曾建议我和林娜同居。林娜也问到我的生活情况。我说，不很方便，自己也无法收拾。林娜提出，发工资时她将到包罗金去，可以抽时间去帮助我。我同意了。后来，她去了，收拾了屋子，窗户用棉花塞了，又用纸糊了；做了午饭，吃了，又为我做了晚饭，晚上回伊尔什。以后，我交待了铸铁车间的工作，但有时我也到伊尔什。一次天晚了。我到李玉书家，路上遇到林娜，说到她借她婆婆的洗衣板还得还，说时，眼里含着泪。另有一次下午，我从伊尔什回包罗金等汽车时，遇到林娜，天很冷，她让我到她家去坐一会儿。我见到了她的妈妈和她的孩子。

十二月中旬，她到厂里领工资时，到了我住的地方，给我洗衣服，又做了饭。我提出同居的问题，她表示同意，并说她的妈妈也见过我，也同意，她将再同妈妈商量一次，以后再告诉我，让我到她家过年，即1952年的新年。

林娜当时二十九岁，乌克兰人，1941年卫国战争发生后

她正十九岁，被动员参加战时劳动。她原来的丈夫，是她的同村人，战争一开始，即正在入伍后不久，被调到前线参战，1942年初即受伤，在军医院治好，已成为太重的瘸子了，定为残废军人，和她结了婚。因德军向乌克兰进攻很快，他们一家，包括他的丈夫的年纪不大的两个妹妹，父母，都到西伯利亚，以后到伊尔什落户。当时她已有两个孩子，大的七岁，小的四岁。他的丈夫当时在基建局当出纳。利用丈夫的转业费及抚恤费，盖了一座简易的房子。1950年丈夫因醉酒，把领的工资失掉了几万，因失职判处了劳改十年，她为此和丈夫离了婚。后来到机电修配厂找工作，先作打更的，后当清扫员，于1951年秋末冬初到铸铁车间当烧火工。家里生活，凭她的有限工资，有不少困难，但因自己有房子，及自留地，母亲在家照顾孩子，勉强对付着还能过得去。据我的想法，她了解我的情况后，主动找我，一方面知道我，另一方面经济原因也是一个因素。以后，经过我的帮助，她进了业余学习班，学成了开电机工。

同居后，她在伊尔什，我在包罗金，主要原因为工作关系。我有一半时间在伊尔什。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她建议，举行了一个小型祝贺仪式，纪念我们的同居，请了厂内相识的几个人。

林娜全家搬到包罗金 1952年夏，我在伊尔什领了工厂分给的土地百分之十五俄亩，连同林娜住房附近的自留地，都种了土豆，在住房附近还种了黄瓜、胡萝卜、白菜和葱等，秋收完毕后，决定于九月底全家搬到包罗金。那时我已要了一个较大的房间，并在地板下挖了个地窖以储存蔬菜。搬家的原因：一、林娜已怀孕几个月了，今秋冬不能再烧炉子，改

为开电机，以后连开电机也不能了，所以应在包罗金厂内工作，只能干轻工作；二、在伊尔什生孩子照顾都有困难。搬家前，在伊尔什找一个相识而人口较多的一家，让他们暂住在林娜房内，既看管又保护，待到明年再重新回来。

莉沙回到伊尔什、包罗金 1952年10月末，天已冷了，有一天区内务部门打电话给我，告诉莉沙经过申请，流放区已改回到原来扎奥则尔内区，让我告诉她到那里去。我告诉了我的新住处，让莉沙直接到包罗金来。同时我告诉了林娜这个消息。以前我曾将我和莉沙的情况告诉过林娜。我说，林娜现在怀孕，即将到临产期，我年已四十六岁，和莉沙相处几年也未有孩子，因此我将和林娜继续同居，是为了孩子；但和莉沙将保持朋友关系，并将给予必要的帮助，包括找工作、房子及必要的物质方面。我们三个人相互见了面，交谈了这些情况，达到了默契。以后，莉沙将东西留下，自己到伊尔什李玉书家，一方面暂住，一方面去看望他们。

莉沙的工作安排 我回到工厂便和同事们谈到莉沙的情况。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工程师乌克兰人提出可以到他家去，他和他的妻子商量后，我们同意了，他的妻子是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科长，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大女孩在上中学，还有二年前生的一个小男孩。条件是莉沙替他们做家务工作，做饭，打扫房间，买菜和粮食等，也看小孩，在他们工作时，还管洗衣服、挤牛奶。在那里住、吃，每月净给工资一百五十卢布。我向他们保证莉沙为人可靠，他们生活、居住、工资决无问题。我将这种情况告诉了莉沙，她同意了。因此，我把莉沙及东西送到那个工程师家里，彼此见了面，再次谈

了话。这样，暂时地解决了莉沙的居住、工作、饮食及生活问题。

莉沙转到南矿区工作和居住 莉沙所在的家，主人叫杜格尔，是乌克兰人，过去也被判处劳动改造八年，原为基建设计工程师，释放后落户在这里，后来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她原有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留下了一个女孩。莉沙初到那里两、三个月还满意，食、住问题都解决了，工作也不累，每月工资虽不多，但可全部留存，只买些穿的。莉沙曾对我谈过不只一次。但从1953年春天起，杜格尔暴躁性格发作，和他的妻子常有口角，但不敢怎样，因为房子、家庭用品都是妻子的，他是一个人进去承受现成的，但却时常将各种不满在莉沙面前发泄。因此，莉沙提出坚决要走，那怕困难的地方也不在乎。我曾劝她暂忍一时，待我给她找地方。有一次，她流着泪要求我，我很难过，我积极想方设法找房子，开始在包罗金打听，又想另找一间房子，但都未成。

不久，机电修配厂扩充了，在南矿区的原发电厂取得旧发电厂厂址，因为他们搬到新的大厂址了。那里扩建作为金属结构车间，和伊尔什的原铸铁车间，加上一个焊接、钳工组，成了一个分厂。我常到那里去，因此，我借口在那里要住，所以向该区管理局要了一间宿舍，还不错。然后我将莉沙搬到那里去住，后来又在那个区的食堂，给她找到帮厨的工作，月薪三百五十卢布。这样才解决了她的住、食问题，而且比较不错。过几个月后，将我领到的住房，改为莉沙的户主，使她的宿舍可以合法化。这样，可以保证她固定居住到老。一直到1955年8月，我回国时，她仍然安静地在那里

居住和工作，什么也不愁，物质方面有了长期的保证。

小孩子的诞生 1952年11月27日林娜入医院，小孩子诞生了。先一天，不记得和林娜发生了口角，她一定要回伊尔什。原来，在十一月中旬有一次她到伊尔什，因上卡车不慎，曾从车轮上坠下，后来有时身上见血，医生让她注意，因为这时怀孕已经八个月左右了。我坚决不让她去。但我上班后，她还是收拾而去了，到汽车站等车时，觉得腹痛加剧，只得步行到医院，大夫说她要早产，让她住院，她回家拿了一些穿的，住进医院去了，上午我回家时，她妈妈把情况告诉我，我便立刻到医院看望她。她还能出来见我，说可能早产，因为原来产期应该在十二月下旬。我劝她注意休息，并听医生的话，不要再固执。下午，我工作时，心里很不安，觉得我已经到了四十七岁，这次林娜怀胎，满望能见下一代，却偏偏有这种遭遇。五点下班后，我直接到医院去了。一个护士出来见我说：“祝贺你生了个儿子！”但由于早产，孩子很瘦小，只有四斤半（二点二五公斤），而且很弱，也不睁眼，不吸奶，但有呼吸。是半小时前生的，母亲还昏迷不醒。她让我去买一瓶葡萄酒，煮几个鸡蛋，并送点晚饭来。我问护士，小儿有无生命危险，她说，现在难说，看今夜如何。我只得赶紧回去预备吃、喝的东西送去。护士让我次日七时左右，再送饭去，到时即可知小儿命运。我回去后，一夜基本未睡，只是偶尔自动地，略为合眼迷糊一阵。次早我送去食物，还是昨天那个护士接了饭说：“祝贺你，可放心了，小儿子夜里十二点才哭出声，并第一次吃了奶，母亲也复醒了，能吃饭了。现在母子都在睡觉，不便惊动她，上午可不必送饭，晚饭送来就行。”这样我多少放了心。

三天后，我问护士能否见一下林娜。她说，外边很冷，产妇房里很暖，母亲身体弱，出来怕感冒。让我到窗外，可以隔窗看看林娜。她去告诉了林娜。那时正冷，窗户都是冰。林娜从里边将冰化开手掌大的一片，和我隔窗相见。因是双层玻璃，说话听不清。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比划，问我愿否看小儿，说小儿在睡觉，我摆手示意不要动他。我很高兴，又看到刚生孩子后的慈祥和悦的母亲表情，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仅仅三天，情况就大有好转了。我对她笑了，并向她摆手，劝她好好休养。

一星期后，护士告诉我，母子可以出院了。让我带小被，毛毡和母亲衣服去接。我送了去，等着在里边包好，我抱了孩子，林娜跟着回到了家里。我一层一层地打开包，一直好几层，终于看到了孩子，不禁使我心一酸，看到的却是那样瘦小的小儿。满脸皱纹，脖子细的似乎支撑不住小脑袋，手脚细弱，如同一个光身小麻雀一样。要不是自己的小儿，我真要扔了永远不愿再看他。他还在睡着。我拨开他的眼睛，他也不醒，还在睡。吃奶时他不睁眼。一会儿小嘴不动了，大概又睡了。第二天早起上班时，我又拨开他的眼皮，他还是不看人，仍然在睡。我们邻家老太婆看到我的情绪，大概想安慰我的样子说：“小孩子有骨头就行，肉是以后长的，满头皮皱纹也不要紧，那是能成人，生活力强的表现”。我说，我不懂，但愿如此。我听说，小孩子是“七成八不成”，这个八个月多一点的小儿，还不知能否成长，怎么办？只有听其自然了。还加上各种思想，联想到自己的一生和命运，将来能否回国，年纪老了等，不禁谄了一首诗，纪念小儿的诞生：

流离漂泊廿载余，年望五旬生维驹。
产院闻讯情暗喜，家中见婴心忧虞。
冰雪寒流袭摇篮，朝风夕雨阻征途。
半生怀念依稀梦，亲母重逢能与无？

根据林娜的意见，给小儿起名为沃娃，即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名字，而当时小孩子叫这个名字的还是比较多的。

一场虚惊 冬至前后的一个夜间，小孩子开始小哭，后来大哭不止，而且身体乱动不安静，我从来未接触过小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林娜和她妈也猜不透，他奶也不吃。我没有办法，只得问她姥姥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她是每天照顾他的。她想了一会儿说，小孩子两、三天没有拉屎了，是不是拉不出来才哭的。我只得穿了衣服，这时已是夜里好几点了，无办法，只好奔赴医院。雪地月夜，天很亮，只是风大，吹得我浑身打战。还是到产科去了，敲了一会门，才出来一个护士，正遇到小孩子生时的那个护士，她还认得我，见到我那样子，又是半夜，很有点惊讶，问什么事。我把情况讲了，问她怎么办。她说，如果是两、三天没拉屎，那好办。她去拿了个尖头小皮球，叫做小儿灌肠器，让我拿回去，并告诉我怎样用法。如果拉屎后不哭，就没问题。如还哭，再找小儿科大夫。我感谢了护士，回去照法办了，刚打进水，就有一个白屎块，如同圆铅笔粗细，四十毫米长，出来了，小孩子也不哭了。我不禁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小孩子又吃了奶，即刻睡了，这真使我虚惊一场。

第二天，很早就到医院去，还了灌肠器，又千谢万谢了那个护士，她让我买了一个放在家里。

孩子得了气管炎 1953年3月，天还冷的时候，忽然室内取暖设备的热水管道炸裂，室内温度很低。那时小孩子已四个月了，长得稍为丰满一点，已经会玩笑了。虽然将作饭的电炉整天接上线，房里仍然冷的很，也不能整天把孩子裹起来，因此，孩子受不住冷气的袭击，得了气管炎。后来，一直很久也没有根治好，时轻、时重、时发，直到回国后八、九岁时，才有了好转。

又搬回伊尔什 1953年5月，由于天气转暖，自留地需要耕种了，而在包罗金则每月要付几十个卢布的房租，所有菜蔬都得买，加上牛奶，费用将是浩大的。回伊尔什可以大大节约，而林娜可以在南矿或伊尔什工作，我虽然主要工作是在包罗金，但也得跑南矿及伊尔什，我退了房子，每天搭厂内卡车上班，只是略远了一些。为了工作方便起见，还暂留了一个小房间。

小孩子在伊尔什共呆了两年多，先后得过各种病，除气管炎外，有百日咳，大肚皮，寸白虫，麻疹等。有一次晚上忽然发高烧，睡觉也不能睡，直哭个不停。没有办法，在夜里十点，我和林娜抱他到医院，打了针，林娜和他住了院。总之，好的时候和病的时候，差不多对等。

我的脚病 1954年冬，我的右脚脚面在二拇指和中指中间，出了个泡，起初未注意，但一天之后，居然肿得连毡靴也穿不进去了，林娜的妈妈看后，说是ПоЖка（中名丹毒或丹毒性发炎），在俄国乡村中可用念咒法治疗，而且不出脓，会自己消下去。我不信，也没有会念咒的人。后来，连路也不能走了，只得到伊尔什病院，医生让我住院。到苏联二十七年了，虽然我原来身体就弱，又经历了不少的急流浅滩，狂风

暴雨。这还是第一次住院。值班女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很和蔼可亲近的人，她让给我打青霉素，而且每隔六小时打一针，夜间也不例外。我问她是否是ПоЖа，有无念咒治疗法，她说是，我有点惊讶，说她是医科大学毕业生，难道也信念咒？她笑了说，不信，但听说是那样，具体原因如何，她不知道，但那是事实。这倒是无法解释的事。经过两天的打针，肿消了，脓也出来了。又上了药，又住了两天，轻了一些，厂里打听我，实际想催我上班。我出院后，晚上就又睡，睡一夜就消腫了，拖了两个月才好。

赢得两瓶香槟酒 我们厂长是个好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1953年后，包罗金有了苏联自制的香槟酒出卖，是当时最好、最贵的酒。厂长常谈到这种酒，却又舍不得花钱买。有一次不知怎样谈到墨西哥和各国的关系，我说墨西哥是美洲古国之一，他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才建立的，并说敢和我打赌，以一瓶香槟酒为输赢，由计划员作证，会计师作保。以后各人去查历史书，百科全书，结果他输了。又一次包罗金洗衣房来我厂订货制造一个小设备，我让厂长签字时，他说洗衣房的俄文字母写错了，我说他错了。他说他是俄国人，俄文比我强，我说，别的字不敢说，这个字敢和我打赌吗？于是又是一瓶香槟酒。结果一查字典。他又输了。当时那个计划员还为我担心，我告诉她，在北方当了四年洗衣房主任，这个字我非常熟。厂长输了以后说，他认输了，以后再不同我这个“知识广博”的人打赌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过去，哪是“知识广博”的问题。

自种菜园及自作小车 搬回伊尔什后，即开始种自己的菜园，土豆不说了，还种些大头菜、胡萝卜、黄瓜、葱、向

日葵及西红柿，逐渐地学会了园艺，特别是西红柿，还得打尖。遇到虫害，也学会了用烟水灭虫。此外，还得常常浇水，挑水的地方远，有时我、林娜及她妈妈每人挑两次，虽已有点累，但还是不够浇菜。因此，我决定做一个拉水车，在车间里托人给做了车轴，车轮找两个废旧的滚球轴承，弄些带钢，钉子，又在家中弄了车杆，几块板子，将冬天腌酸白菜的木桶装上，拉一次比我们三个人每人挑二次的水还多，算是解决了问题。

以后小孩子过一周岁了，因为大肚皮、软骨病，还不会走路，所以我又让一个电焊工和一个钳工，作了一个小车，让孩子推着学走路，也可以玩，对孩子很有好处。

工资及奖金 自从我当了工艺师后，每月工资八百八十卢布，还是比较可以的。这可作为日常生活的预算。但只要能完成任务，还可以多得奖金。其数目根据超额的百分比计算，少则一百卢布，最多的一次可达六百卢布。以后当了技术科长，工资则是一千卢布。所以，在1955年我离厂时，平均工资将近一千五百卢布，奖金基本上都花到每月预算外各种购置用了。

俄国人的生活习惯 在西伯利亚的几年，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俄国人的生活习惯及优缺点。他们来往比较多，每逢节日、喜事，比较熟悉相近的人，包括男方或女方的都在内，总要相互访问、请客、吃东西、喝酒、跳舞、唱歌，一来就是半天，或到深夜。邻家之间，也有这种情况。小儿生后，头两年生日也是如此。客人参加这样的会时，往往自己带一瓶酒。主人除备几瓶酒外，还常用糖自己作点酒。有些人，简直认为不喝醉不过瘾。另外还有无缘无故的酗酒现象，以致

打架，伤人等。

从乌拉尔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比较喜欢吃饺子，名叫西伯利亚饺子，和中国的做法一样，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其他饭菜的作法都不一样了。每年冬天，各家都腌酸白菜。

男女关系比较随便，据说，类似西欧各国，不象东方民族那样。办结婚手续的和未办结婚手续的都可在一起居住过活，社会上也承认。党的组织、国家、行政则认为个人私事，不干涉，更不惊怪。

贪污、占小便宜、化公为私、走后门办私事、挣私钱等现象是很多的，有些是半公开或公开的，而且相互勾结、包庇。所以有句可怕的俗话：“处罚小偷，不是因为他偷，而是不会偷。”

一般来往，争论，或发生争斗，是硬以欺软，硬的容易占上风，软则受欺压。

西伯利亚中国人的情况及见闻点滴

中国人的一般情况 1949年11月我到伊尔什的时候。中国人有好几十个或上百个。绝大部分都是因从东北过境到苏联，被判处三年劳改释放后，到那里谋生的。他们出生的原籍却是山东人，是离开本省到东北谋生的。他们说我是耍“手艺”的，他们是卖“拉包代”^①即卖力气的。当时有些人在煤矿里工作，以后煤矿停止出煤，他们大部分是挖土方工程，打石头，当力工，清厕所，还有作小生意的，但没有进工厂的，只有到后来才能有几个进厂工作的。还有收买废品

^①“拉包代”系俄语PaboTa的音译。

的。大部分人当时是光棍汉，一部分人和俄国女人生活，有结婚的，也有未办手续的，其中不少人生了孩子。生活一般还可以，因为在那里谋生还容易。

在政治上他们是落后的，不认识俄文，中文认得也不多，有些年轻的，多少懂得一点中文的，俄语说得也好些，有的连俄国话也只会应付几句。思想也落后，有些人有爱国心，希望祖国强盛起来。在外国的人，只求不受欺负之外，什么也谈不到。有的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说共产党是穷党，有的说蒋介石还是大总统，还有人不知中国现在是那一“朝”。苏联地方政府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的教育、宣传。他们曾大为赌博，还有吸鸦片的。怎么种植鸦片，怎样收割鸦片，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在那里看到的。

因为这些人落后，只作力工，不会讲俄语，生活方式不好，所以受到俄国人歧视，认为中国人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些和中国人同居、结婚的俄国女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而只是图吃、穿、过活。

要求我了解的第一个人 1950年初，那个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牢里找我谈话的B某到了伊尔什，在基建局内务部门代表室找我谈话，除问了我的生活、工作外，提出要我了解一个人。他说名叫张方，据说他于几年前过境到苏联，原为满洲国边防警察的一个班长，那时这个警察队伍是受日本人领导和指挥的，他们怀疑他过境目的是侦探，希望我弄清楚他的身份，干过什么事，为什么过来。我说，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B要我打听，同张认识和张谈，慢慢打听，希望张能向我讲实情。他说，张方过境时是冬天，地点在满洲里附近，河区冰冻，所以很容易过来。他说，不要操之过急。过

两个月，他将再来，听我了解的情况的汇报。我那时住在李玉书家，经过了解，张方就住在同一条街上，但在另一头，彼此也知道。在一个星期日，我和李玉书到张方家，和他认识了。张方那时在收买废旧物品，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中学毕业生，大战时在飞机厂当服务员，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家中生活颇不错。张方才三十多岁，说话、干活很有能力。在中国上过中学，但未毕业。关于当警察班长，过境的情况，和B某说的大致一样，但说过境的原因，是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欺负中国人而引起的。他说，他听说苏联不错，才跑过来，被捕后，他把实际情况讲了，但俄国人不信，怀疑他是侦探。他说，他不懂俄文，也不知风俗习惯，家又住在辽宁，很远，未通过消息。他说，他开始很失望，俄国人坏，但呆了三年大狱后，到这里还很好，房子，地也有了，生活不错，工作也轻，讨了老婆，也不错，他已不想回去了。家里即令有人活着，不见得需要我，生活也不比这里好。他只是有点想家，如果过几年能回去或回去一次，看看家里，就心满意足了。他也问了我的情况。我们前后一年内，见过好几次面，也只是那样。如实地向B某作过几次说明，也未发现他有什么类似侦探的任何情况，以后也就算了。

到州里去调查一个人 1950年夏，B某又来到伊尔什，要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一次，调查另一个中国人，类似张方的情况，我说，这样远可能不方便。他劝我试一下，并提供了线索，到那里中心市场去找作生意的中国人，即可挂上钩。我请了三天假，说想去买点东西。在市场里见到两个卖菜的，两个卖石膏玩具的人，都住在叶尼塞河彼岸，接近

我所要调查的人。我到那里，见到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有俄国老婆，孩子已大，在学校读书了，住在他家，他和俄国女人对我还热情，说“出门人不能顶着房子走”。

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我要调查的，他们有来往。据说，那个人是收破烂的，和张方的工作一样。生活不错，还卖些零用品，是用卖破烂的钱弄来的。他在伪满洲国当过兵，因受日本军官的欺负，跑过来了。在这里比在中国好，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老家在山东，也没什么人了，不愿再回中国去了。和中国也没有什么联系。第二天，恰好他的儿子到我住的中国人那里去玩，他又领我到了他的家里，只见了他的俄国老婆，本人到南方一个地方去串门了，几天内不会回来。据说是做一笔生意。据他老婆说的情况，日常生活、来往的一些人，大致和我的房主人夫妇两口讲的差不多。我也和其他几个中国人谈过话，印象是，他们主要是谋生，作生意，赚几个钱，讨老婆，成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对日本人恨得很，认为在俄国生活容易。

关于王宪忠 1951年初期，我开始认识了王宪忠，他在伊尔什所有的中国人中，是比较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已结婚，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年纪三十来岁，做的一手好针线活，有前夫，被捕，不知下落，遗有子女二人，叫王宪忠为“爸爸”。王宪忠自己说，他曾在抗日联军中干过，知道高岗。有中学水平，俄语也说得比较好。还懂得点技术，会开汽车。是在和日本人的一次战斗中因敌人占优势退无可退时，进入苏联境内的，被以非法过境名义，判了三年刑，释放后才到伊尔什的。那时，他已有自己的房子，自留地，种西红柿每季可赚几千卢布，女的给人家作衣服，收

入也不错，自己有缝衣机，家中有收音机，常听中国广播。王宪忠还常到外地及坎斯克，他曾向我谈到见过鲁也参，说是个什么样的人，问我认识否？我说，不知道。他还曾到过中国驻新西伯利亚领事馆。由于他的这种情况，曾引起内务部门对他的注意，在1952年，那个B某曾让我留心他，但没有让我交待他的其他情况。1953年有一次可能是要逮捕他，情况很急。那年春天，即将种土豆的时候，王宪忠跑了，大概经过一个多月，他才回来。我见到他后，他将跑到中亚细亚去的原因，路上见到情况，及为什么又回来全告诉我。内务部门在1953年夏天公开找他谈，让他安心，说现在不会逮捕他，情况都变了。

1953年夏，内务部门可能大改组了，对这些人也不再怀疑追问了，B某也未再来找我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内务部门驻伊尔什专员也换过几个人。此后，未再有人找我了，使我在精神上放下了一个包袱。

一个铁匠 1950年夏天，我当了工艺师后不久，有一个中国人到机电修配厂来找工作，是个铁匠。姓陈，是河南省豫西人，真是老乡中的老乡了！他曾在中国军队中干过，后来到了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他很少打过仗，是在土办军工厂当铁匠，能修理枪械，配零件，铁匠手艺不错，能做当时俄国铁匠不会干的活，即锻焊接。他也曾因非法过境被判了三年劳改。那时他已有一个俄国老婆和自己的房子。他的技术不错，能作细件锻造，颇看不起俄国工匠。我虽然帮助他调整工作及工资，但他嫌工资少，而不愿在那里干，改到别的区去了。临走时，和我亲切地告别了。

大力士 那里有个中国人姓赵，是河南省滑县人，更是

近同乡了。三十岁左右，力气很大，比一般俄国人的力气还大，在装卸队工作，俄国人给他送个绰号“大力士”。他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干过。原在关内军队中干过，后来随军到了东北，后转入抗日联军，高小程度，中文还可以，俄语不通，只能讲几句普遍用语。和其他人的命运一样，但爱国心很强，家中还贴他自己写的爱国对联。已经有俄国老婆，两个孩子，家中很简单，住的是自己用土坯盖的房子，有自留地。他很能吃。对我特别亲热，只是以不能回国为遗恨。他看不起俄国人，说俄国人常把重活推给他干，而工资并不高。谈起中国的事，不论什么，他都是眉飞色舞。

三个工厂工人 由于我在电机修配厂当了工艺师，实际上是技术负责人，有三个人不愿在外边作零星的力工活，商量好了到厂里来找工作。我向他们提出，没有手艺，别的不能干，只有到铸铁车间做翻砂工，他们同意了，干得很不错，工资也不少，车间主任俄国人也很夸奖他们。他们也满意，说我在那里不受俄国人的气。这三个人中，原来只有一人有家，另两个人以后也娶了老婆。有一个山东人，娶了一个很有能力，相当年轻漂亮但却是个很瘸的女人。以后熟悉了，对我很热情，常开玩笑话，她的男人，虽然笨，不好看，不懂俄国话，但很能干，老实。她自己很漂亮，可惜是个瘸子，不然，决不会找他这个中国人。但是，如果不是瘸子，找另一个俄国人，不见得能过得这样好。这也是不幸而有幸了。

州里的一个皮鞋匠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心市场门口处的小木房里，见到了一个中国人皮鞋匠，姓韩，已加入苏联国籍，年纪五十岁左右，据他说，半个州城市都知道

他叫“沙沙”。我同他谈了一阵，他很热情，让我到他家里住宿。他有自己的相当好的住房，带有自留地，在州城的边区，据说可卖五万卢布。他那个小木房，每月要交五百个卢布的税，而每月可以有三、四千卢布的收入，假如他只出工二十天就可以了。修做皮拖鞋，每双一百个卢布，女人穿的花样皮鞋，每双四百个卢布，订货人经常不断，供不应求。他有个挺不错的俄国老婆，才三十岁，已结婚十年，只有一个九岁的女孩，在小学读书，女的母亲在他家做饭，干家务，我初进去时，认为是他的妻子，而把妻子当做女儿，他笑着用中国话告诉我，那是他的岳母，和他年纪差不多。自留地里有井，自己不耕，雇其他中国人种菜，除自用外，还可卖钱。妻子是俄国十年制中学毕业的，结婚时才二十岁。我去时，恰好在商店里出现中国的红花缎，四百个卢布一米，他给年轻妻子作了一个睡衣，用了一千六百个卢布。韩说，老家是山东人，还有个老母七十多岁了，不时他还寄些东西回家，只是关税太多。韩也颇知道一些苏联及中国的事。我回国前曾去看望过他一次，他说，如果我用钱时，可给我几千卢布，希望我回国后能给他老母每月寄几个钱。我说，几十年未回国，不知将来怎样，不敢答应这件事。我自己有钱回国，不要他的钱帮助。总之，他是相当阔气的人了。

中国人的国籍及结婚情况 在伊尔什的中国人，除少数人是中國国籍，有中国护照外，大多数是无国籍的，这样在苏联便没有正式公民权的待遇，和俄国女人结婚后，生下的子女姓母姓。后来，苏联政府颁布法律，俄国人可以和外国国籍的人结婚，也可以申请外国国籍，也可结婚后保留苏联

国籍。这样就消除了国籍问题的上法律障碍。那里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有俄国女人，她们不计较外国人，虽然她们有些人看不起中国人。有些中国人经济条件好一些，她们就更不在乎了。当然有些是为了生活，认为中国人老实，爱劳动。而有些中国人生出的子女，对中国人也有点看不起的。

下面叙述一些见闻点滴：

日本的俘虏兵 1950年伊尔什有几十个日本俘虏兵，他们和乌拉尔的德国俘虏不一样，是在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工作，领工资，有自己的宿舍，他们不能在那里结婚，因为是俘虏，而且苏日正在交涉关于俘虏处理问题，但他们有些人有俄国女人“同居”。后来，听说两国谈判结束，日俘都要遣返，而日本提出的数目，除了死亡的以外，和苏联统计实有的数目相差较大。因此，苏联政府下令，所有日俘都要遣返，不准办理无国籍手续，更不准申请留在苏联办理转国籍等事项。而被遣返的日俘，日本不仅不让他们回家团聚，不给工作，而且是直接运到北海道某个类似集中营的地方，一则是处分他们做了俘虏，二是消除“赤色”影响。因而有些日本人不愿回去，有意逃避，但也没有办法。遣返集中之日，他们坐上汽车，有些人掉泪，俄国女人临时夫妻也哭不成声。

各种人命案件、伤人、抢劫、偷盗、贪污事 我在伊尔什的几年中，有几起人命案件，多数属于谋财害命，也有因为酗酒或争风吃醋的，情节不一。但人命案件发生后，即令破获或当场认出的，一般都是判处徒刑，很少听说判有死刑的。有人说，由于战争中死人太多，战争年间出生率低，苏联人缺，所以一般不判死刑。而政府机关报则宣传是苏联

政治的成绩。抢劫、偷盗、贪污、酗酒的事，则屡见不鲜，一些贪污的人，生活还是很充裕的。

还有一起比较特殊的是冒充军人的案件，因为此人成了先进工作者，照片登了报纸，他的家乡人在报纸上认出而被揭发了。

在我们厂里，还发生了两起工人自干的偷盗案，结果都被查出逮捕。

还有些流氓歹徒，相互赌博，输赢的目标是谁输了，谁就得去偷或甚至杀害某个人。为此有一次对象是曾经整过他们的一个民警，输的人应该去杀害他，但由于斧头不利，民警力大，只受了重伤而未死，结果抓住了犯人，才揭发出这个流氓集团。

制造假文件、偷改公债票 苏联国内公债数量很大，每个职工每年要拿出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买公债。公债用抽签还本办法，原来为十年还清，后改为二十年。因此，每年总有几次还本及奖金的布告，有的为了得奖，有的为了早还本，甚至于修改号码，也有被发现的。

我们厂有一个定额员，二百个卢布的公债票，幸而得了几万卢布的头奖，一下子得了等于十至二十年的工资，买了房子，结了婚，成了个幸运的小富翁。

机电修配厂及工作

煤矿管理局 机电修配厂是直属坎斯克煤矿管理局的一个企业单位，为各个煤矿服务，也为本地区及附近各集体农庄服务。管理局原在州里，1952年包罗金露天开采矿投产后，迁到这里，机电修配厂也迁到这里。从此，产煤中心由伊尔什转移到包罗金。在煤矿管理局属下的有伊尔什煤矿、

南煤矿、西伯利亚大道“上加马拉”煤矿及露天矿。这个地区产的煤是褐煤，是比较年轻的煤层，最浅处在包罗金，在地层下不深，只有三、四米，所以采取露天揭开地皮办法。煤层深十米左右，据说，下边还有一层，厚可能超过十米。这里用挖土机直接挖煤装车运出，供应西伯利亚这一带的燃料，产量逐年增加。

机电修配厂前后情况 由于管理局迁来，煤生产量增加，机电修配厂也逐渐扩大，以后又和原来基建公司的修配厂合并，设备、工人、技术人员都增加了。厂内的车间也增加了，除在伊尔什增加铸铁车间外，南矿增加了金属结构车间，以后在包罗金又增加了一个小炼钢炉，加上金工、电工、锻造，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小型机械厂设备较全的修配部门，人员到了二百多。1954年成立了技术科，有设计师两名，工艺师、定额员各两名，计划、检查各一人，由我担任科长，这样，行政上是厂长负责，财务上有会计师，技术生产是技术科。此外，还有总工程师职务，但由于人选变动太大，在我的六年时间，前后更换了七个人，所以没有起了什么作用，而具体事，基本上是由我担任的。各车间都有个主任，因为人少也兼任工长。六年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及遇到的情况，简要的可叙述些，当然，大量的还是一般技术性事务工作。

调正使用滚齿机及加工 机电修配厂原有一台“共青团滚齿机，”能切模数8，最大直径五一六百的直齿轮，但一直没有调整，不会操作。有些齿轮配件，只有在牛头刨上划线刨，斜齿轮根本不能作。我当了工艺师后，幸亏我在乌拉尔参加过滚齿机调整工作。我找到说明书，将机床进行了检查，了解了工具室的滚齿刀，并配备了其他工具，使机床开动

了，还是新的，没有什么毛病。我又教会了一个平铣床上的工人，让他也学会使用滚齿机，但因工作少，仍不能独立操作。在这上面曾作过齿轴，小涡轮。有一次钻探队钻机上螺旋齿轮坏了，但厂内没有适当的模数铣刀，我改变了模数，保持原中心距，改变了速比，作成了几对齿轮，使钻机未多停工，受到了很大的表扬。

又一次露天开采矿基建公司一台英国进口的列车发电站锅炉上的蜗轮裂开了，蜗杆还完整，但一测量是英制齿轮，为了不影响发电站工作，将齿轮把合暂用，另配了一对模数的蜗杆蜗轮时，又得到一次大表扬。这也是我在乌拉尔“多管闲事”的收获。

热电站软化水处理设备的制造及安装 这个设备是我第一次按不太复杂的图纸制造的。我还是比较细心的，也怕出错误。后来完成了，总机械师让我带钳工队去就地安装。我有点怕，因为我从来未安装过设备，表示不行。总机械师勉励我，钳工们拥护我，他们说，他们自己会想法安装好，只要我在图纸及计算和对外联系上负责就行。我只得去了。总动力师也支持我。因为这是为动力设备用的。

在安装过程中，我发现水循环系统不太合理，向动力师作了说明，并建议改为自上而下。他同意了并签了修改的图纸。在即将完成时，忽然从莫斯科电力工业部来了个检查组，是由三个犹太女人组成，据说是专家，她们一看说图纸改错了，原来的水循环系统是对的，自下而上是为了既能使用，又能修理过滤器；按现在修改的图纸，只能使用不能修理。她问是谁改的，谁签的字。我向她们反映了情况，并向总动力师反映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还有这个目的，自己不

好见她们，借故走了，让我按原来的图纸，遵照检查组的意见重改一次。我们干了，试验情况良好。从此，我得了一次教训，未弄通的东西，不能随便改。

在安装过程中，我帮助了钳工们，但也学到了一些实际安装知识。

挖掘机长臂的修理 1951年冬特别冷，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零下三十五至四十摄氏度之间，在露天煤矿工作的挖掘机的长臂由于冲击负荷大，金属冷硬脆性增加，发生了连续断折两、三个，使十之三、四的挖掘机不能使用。矿务局先运到机电修配厂一个，惊动了总工程师、露天矿的总工程师和机电厂厂长及技术人员。怎样修理？从未见到。经过商量，决定试作一个箱体，如同套火柴盒那样，再用电铆焊接法及对焊法。为此并邀请了基建公司的室外低温高级电焊工用特殊电焊条焊接。并为此制造了专用夹具，最后修理完了一个，运到现场进行试验，和完好的一个配用，结果，再次发生了断裂，但不是在焊接处，而是在原未断处。这证明焊接是完全成功的。以后又连续修复了几个。为此，矿务局对机电修配厂作了专门的表扬。我也得到了新的实践经验。

改装木料装卸机 矿务局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木料装卸机的图纸，作为任务让我们试制一台，总机械师提出两个修改要求。第一，是改为自己走动的，而不是推动或拖动的，第二，是改为可以双边卸车，而不是原来的单边卸车。在修改过程中几乎出了大错误。一是在改自动行走时，我在车架下边作了一个减链机，电机及正反向开关，用链带动齿轮，但忘记在原来的轴上加键，这样就会造成车轮转动轴不转动的情况。这是我在下雨天的路上救一辆马车时，发

现车轮打滑现象时觉察到的。第二天上班后，赶快作了更改。第二件是改双边卸车时，上边的框架成了四点都活动的方形，经过一个装配钳工指出作了改正。以后，经过试车，没有出笑话，大家都很满意。

修理三立方米的挖掘机 1953年夏，一台工作过几年的三立米挖掘机坏了，焊接件底盘裂开，其他磨损亦不少，露天矿领导决定大修。机电修配厂既无起重设备，又无那样大的加工机床，只得组织了修理队，在现场用土、小设备设法对付。我们将挖掘机拖到一块平地上，在近处搭上帐篷，设备、工具、卡具、人员、电机都在里面，把小机床直接装到挖掘机上。

对底盘裂开的情况，我把我的看法及修理方法，写信并附小图给乌拉尔厂说明情况。后来该厂回信说裂开原因可能是由于违反操作规程引起的过分冲击，因为原来的设计安全系数是很大的，焊接质量是经过验证的。并提出修理方法及图纸。因为那个厂是权威的厂，我们只得按我们的可能性，参考他们的图纸，进行了修理。同时还采用了很多以小干大的办法，总算修好了。

制造煤矿中用的吊斗 一个竖井煤矿升降用的吊斗坏了，必须一个备用的。过去在乌拉尔金工车间曾制造过这种设备的零件，别的金属结构及锻件都是其他车间做的，而且当时金工车间的设备也比现在机电修配厂的设备强大得多。但当厂里分配这个艰巨任务时，我还是勇敢地答应了。厂长及总机械师都表示积极支持及鼓励，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那怕在质量上差一点也行，只要能在新设备到来之前，使生产不受影响就可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还花了很大部分的业余

时间，自己直接参加了计算、划线、放样，试装等工作，经过几个月，总算完成了。

其他设备修理 在几年内还在厂里修理了各种煤矿用的设备，如各种大小鼓风机、钻探机、联合采煤机、装煤机、运输带及其他辅助装置。在这些修理过程中，我也从头至尾了解情况，搞配件测绘及工艺编制，同时参加对各该项设备的使用和调整，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总之，厂虽小，但对机械设备品种和性能，了解却不少。

一次合理化建议及设计、制造小型号板机 那时煤矿中经常需要电机及相应的设备，如水泵、鼓风机、减链机，运输机上半联轴等备件相当多，而在加工圆圈六个孔时，需要划线、且不易准确。我根据过去车工的实践，提出了一个夹具，可减少划线，卡盘找正等手续，并提高准确性。又根据基建局的号板机，设计、制造了一个较小型的，适合我厂使用的号板机，代替过去的人工号板。这两面都试验成功，而且顺利投产。为此报到管理局，奖给我半月的工资，还发了奖状。

为农机的机械化服务 从1952年起附近几个农庄到厂里来要求为他们的机械化搞些设备，原则上要简单、便宜、易于操作维护，并能和他们的现有机械配套。因此，我和几个钳工走了几个农庄，了解情况，给他们制造输送带，传动轴等。

但经过一些接触后，对农庄情况有了比较多方面的了解。总起来说，可有以下几点：

1. 各个集体农庄集体经济的富裕程度悬殊很大，有的积累资金很多，达几百万卢布，存在银行。有学校、俱乐部、

电影院、图书馆，集体的牛、马、鸡、猪数目也多，生活较好，按二五分的东西也多，穿的、食的、住宅、道路、电灯都不错，但这是少数。在西伯利亚的广阔大地上，每户平均有地均合一百五十亩左右，而中等水平的较多，有少数则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土地面积也不少，原因是多方面的。

2.农村生产的机械化，全靠国营拖拉机站为农庄服务，其费用在收获的粮食中偿还，作为国家收入，这个数目加上自然税，还有国家收购粮计划，占农庄产品粮的相当大的部分。这都要交给国家粮库。其余的，除留下种子外，才按二五或工作日分给农民。

3.各户有自留地，耕的比较好。农庄内各户的生活水平悬殊也大，农庄主席等领导人，拖拉机站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生活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也有利用职权及亲属关系谋私利的事。

4.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严重，结果，女人多于男人，老年多于青年。

烘麦机的设计、制造与安装 1954年5月，区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据天气预报说今年秋天多雨，麦子不能晒，所以要设计、制造烘麦机，以供给没有该项设备的农庄，特别是产麦多的农庄。统计结果，至少需要十台。因此，决定让安装公司生产两台小的，机电修配厂生产八台大的。但图纸不全，又要限期在八月间造好，九月初安装好。由各农庄签订合同，银行保证贷款，供应处保证给钢材及薄板。干不了或迟误了，而真的阴雨连绵时，厂长要把“党票”交出来。我的任务是组织图纸，提出材料单并领导生产。为此，还专门到一个已有一台小型烘麦机的农庄参观一下，取得具体的印

象，因为，我们还从来未见到过，也不知怎么烘法。

我和设计师及另一名工艺师即刻动手，全面准备，铸铁造型来不及，采用样板制法。一方面画图，一方面开始铸铁及锻件生产，同时组织钳工，制造夹具。八月初零件准备工作大部分就绪，为了试装好第一台，以修正发现的问题，我在这半个月中很少睡觉，之后，又到南矿的金属结构车间检查装配情况，给钳工组一个突击包干的任務，定下二千个卢布奖金，要在一星期内试装出第一台。昼夜加班，从早七、八点开始到晚七、八点为止。按期完成了，应该修改的地方也改正了。八月中旬，即分别组成三个安装组到各农庄就地安装，我坐着车子，轮流巡回检查。八月底，头三台装好，并都作了试车。其他几台在九月间也都安装完毕。天气虽不是阴雨连绵，如预报说的那样严重，但比起前两年是阴雨多了，烘麦机起了作用，我前后一个多月未能安睡，也算有了收获。

钻研技术，采购书籍 自从当了工艺师之后，接触了很多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迫使我积极地钻研技术。我从几方面着手。一是实践方面，和工人们商量，了解，询问，自己看，试验，动手干，这是属于日常工作的。另一方面，即是增加书本上的知识。在伊尔什时有一个不大的图书馆，技术书籍有一点，但不多，也没有书店，只能借阅一些抄记一些。到了包罗金后，经济条件好转，那里有个小技术书店，我和书店主人开始认识了，她是个将近四十岁的人。不久她和我厂的铸铁车间主任结了婚，这对于我获得技术书籍更方便得多了。她有时也替我到省书店去选一些书。此外，我还经过邮购买一些各省区及小地方难以买到的新书。当莉沙在时，她给我创造

了较好的读书条件。莉沙被捕后，到小儿诞生，约一年半的时间，我精神上很苦恼，却也是我认真读书以转移注意力的时候。我常于晚饭后先稍睡一觉，八、九点钟起来，在静静的夜间，聚精会神地看书，用笔作各种记号，画线，眉批。不懂的地方，多读几遍，遵照中国古语“书读万遍自然通”的道理，有时真不能弄通时，暂作问题留下来。再加上我作为工艺师，实际上是技术负责人，能够到各车间去直接了解情况。所以，我对生产全部工艺过程，包括电气在内，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工厂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在西伯利亚这几年，取得全面知识的机会好得多了，收获也大得多了。阅读写作的能力也提高多了。

以下，略谈一些有关接触过的人的情况。

第一个总机械师别列克罗波夫 别列克罗波夫就是提议让我担任工艺师的，工作积极敢干，负责任，技术能力也高。开始我认为他是党员干部。后来，遇到知道他底细的一个木匠，才听说，他因政治问题被判过五年劳改，劳改时几乎丢了命。由于他的工作态度，说话直爽，可能因此被人整过。但奇怪的是，他释放后，居然能够获取这样重要的职务，而且能那样大胆地工作，值得我学习。如有一次他提到设计和生产的关系，说，他忙于事务没有时间坐下来搞设备改造的设计工作，而是零敲碎打，所以拖的时间长，效果不好。本来应该是三年设计一年制造，而他是一年设计三年制造。他提到矿区交通条件不好，路面损坏时说，俄国人就是不如美国人，他们是先修路，后建设，俄国人是先建设，后修路，既慢，车辆易损坏，人也受罪，建设也慢。他有一次向机电厂厂长说，只要是一心为国家，干工作出点问题也不要紧。在

我为包罗金列车发电站配制涡轮时，设备超负荷工作，颤动得很厉害，我很紧张，唯恐出事。他看到这种情况时鼓励我说，不要怕，为公事即令坏了设备也不要紧。为了完成紧急任务，就得让设备出力，能制出大涡轮就是最大的收获。有一次一个煤矿的机械师画了一张滑滚图纸向我们订货，制成后，尺寸不相称，头大尾尖，不象样子，他问我怎么做成这个样子，我说，按他们的图纸作的。他说，以后我们自己应作主，不然，按他们的样子，会作出长角的鬼来。还有一次在急需安装一个变电所时，任务很紧，煤矿有停工的危险，他亲自赴现场，穿上工作服，自己背起一段电缆开始走，并喊大家都来，一下子，不仅矿工来了，来不及穿工作服的大小头目也都来了，这样，十几分钟就把电缆拖到了地方，仅一个上午就把变电所安装好了。还有一次煤矿被水淹了，他即刻动员所有人。一天之内，四台水泵都下了矿，同时堵住了水口，救出了设备，煤矿只停了一天。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第二个总机械师季里普肯 大概在1952年后期，第一个总机械师调走了，矿务管理局迁来了，随着也来了一个新总机械师叫季里普肯。他派头很大，和别列克罗波夫相比，是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我对他很有戒心，怕他摆威风，挑我的毛病。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他对煤矿生产有一套知识，但对机械设备及零件却不很懂。有一次露天开采矿的一个关键运输设备出了问题，那里的总机械师出差了，副总机械师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这时，他束手无策。经我厂厂长介绍，我带了两个钳工赶到现场，发现大减速机中涡轮杆的定位环坏了，我们配了个新环，暂时用着，又向上级申请备

件及轴承，才解决了问题，从此他对我有了信任。另一件事，是他有个比他年青约二十岁的娇妻，从州里中技校毕业，什么也不懂，但因为他的关系，将她安排到我厂当工艺员。她到厂后，实际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对政治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倒感兴趣。那时《真理报》常登中国消息，她还有《人民中国》画报，常和我谈，因此建立了感情，关系较好，她曾要求我帮助她，并由季里普肯当面向我提出。这样经过半年以后，从1953年下半年起，他对我的信任及关系，不亚于第一个总机械师。有好几次他到各煤矿去检查设备时，带我坐他的汽车去，以后又送我到工厂或回家。当我申请回国被批准时，他极力支持我，并对我用中国名字称呼。

由于这两个总机械师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使我在西伯利亚五年多的技术工作中，能够大胆、积极地工作，办事比较顺利，特别是比较全面地增长了技术、生产、管理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

厂长何许人也？我初进厂时，厂长是个非党员，酒鬼，还是在建厂时任命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又暂时任命了一个，但不久就走了。以后的厂长和我一起工作，直到我回国时为止，共约四年多。

这个厂长名叫考培洛夫，是个党员，中技校毕业水平，卫国争战时曾参战，但在内务系统工作，未上前线。他到厂时，正值我领导生产矿井吊车及从包罗金安装软水处理设备结束回来的时候，给他以较好的印象。不久，厂里又从中技校来了四个成绩较好的毕业生，三男一女，一个当了定额员，一个当了工段长，一个当了工艺师，一个成绩最好的

当了设计师。厂长开始很器重他们，以后可以不要我这个来路有问题的人，或不依靠我。他们都是团员。但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使他失望了，有一次托他们三个人作的工作，完全弄坏了，后来还是我给修改后勉强收尾的。气得他在会上说，他们四个人抵不上我一个人，而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和我一样。从此，他打消了让这几个人代替我的想法。

1953年，因为做一次化工厂更换设备的预算时，我曾和他发生了矛盾。他想多弄些钱，要我尽可能把预算作多些，但他们提出无理要求，我和他吵了一架。他以后屈服了，因为没有别人能再干这件事。1953年秋，中技校毕业生又来了两个，一个作计划员，一个作技术检查。那个新计划员是个女的，是代替原计划员梅莱的，梅莱过去和厂长发生过矛盾，现在自己觉得要被排挤出工厂，她也准备走了，但使我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在梅莱将要走时告诉我，说我可安心工作，因为新计划员和铸铁车间主任告诉她，厂长曾分别建议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但被拒绝了，说干不了。厂长曾向铸铁车间主任表示，我就是脾气有点不太好，工作都不错。既然，他们都不愿干我的工作，他将不再想这件事，而将和我搞好关系，让我继续干下去。为此，他在1953年十月革命节时，在厂的光荣榜上列入我的名字，贴上像片，还发了奖品，并让他的妻子，儿科大夫，给我的小儿看过几次病，认真地诊断过并开了好的药，对我这个多病弱小的孩子，帮助不小。

他身为厂长，却很爱占小便宜。如在编制工厂预算后，他硬要写入自己是参加人之一，因为按苏联基建规则，编制预算人可增加百分之十的费用作报酬，他说，将来可以请大

家吃喝一次，这样加上了约一千卢布，等银行批准，工程完成后，将一千卢布领出，以一百卢布买东西，自己拿去六百，只给我三百。他在自己的住宅中，找钳工利用公家的管子及零件，安排了一套自己取暖的装置，用的工时及材料，他让我分担在几个订货号上。他从管理局弄了一台使用过期已该报废的小轿车，弄到厂里来让钳工修理，换了一些轴承，自制了一些零件，勉强装成，虽有毛病，但还可以行驶，因而也常自己坐着去巡视。

他也有一些优点，对厂的扩建，还是很积极的。高板机是他建议制造的，厂内装了电弧炉，建立了金属结构车间，又建立了一吨的电炉炼钢车间。他积极支持为集体农庄搞机械化。

他支持我申请回国时说，站在党的利益和观点上，赞成我回国，虽然站在工厂的角度上看，希望我留在厂内。他建议组织技术科，并任命我当科长。1955年夏，我离厂回国前夕，他被提升为管理局的干部处长，实际上是我和他差不多同时离开了厂。

厂的几任总工程师 厂虽很小，但在编制上总工程师这个职务，实际上是一个生产技术负责人，下边是工长，以后也叫车间主任。1949年末，我到厂时，原厂长已他调，由总工程师代厂长，即我说的酒鬼。以后来了个中技校毕业的，当了总工程师，只一个多月，以不称职撤销，改任金工车间主任。这时我已任为工艺师。第三个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很年轻，只来了两、三个月，就走了。第四个是从劳改中释放的原某厂的总工程师，懂得技术，但也干了几个月，就离厂回原籍了。第五人是从机电局来的工程师，自称是某城工

学院毕业，很干过一些工作，对电气是专家，而对机械制造懂的不多。他说，一切依靠我。他有时还吹嘘，有一次吹破了，被人告到管理局干部处，经过仔细调查，原来是个冒牌的工学院毕业生。而到机电局去是犹太人相互包庇进去的。第六个又是工学院新毕业的，初来时穿的很阔气，厂长也看着他像个样子，但只干了几天，就露出了是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他马上报干部处改任为工段长。最后一个，是露天矿的总机械师，一来年过六十，二来由于受到副总机械师的排挤（副总工程师从工学院毕业不久，其父为副局长），所以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到厂内来，实际上是过退休生活的，遇事，能不管不干涉的就不管。过去和我认识，修理挖土机的方法，就是他向我建议的，后来经过修改及具体落实修好的。他公开地向我谈过他的处境及“人生哲学”。所以在我担任工艺师及技术科长五年多的时期内，换过了七个总工程师，他们在厂里的生产技术上实际上未起过任何作用，而我则是实际上的生产技术负责人。这使我的工作较多，但也能使我独立工作，自己摸索，迫使我钻研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对增加我的知识及经验，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技术科的成立 1954年，机电修配厂和原来包罗金基建修配厂合并，人员多了，车间增加了，技术人员也多了，厂长报矿务管理局，提议成立技术科，以便对内对外有一个集中的技术领导及负责组织。当时在厂部有设计二人，工艺二人，计划员一人，定额员二人，检查员一人。各车间主任六人，生产技术得有个归口。而总工程师，如前所述，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象样的人选。当时，技术科长的人选，按资历及技术资格，应由设计师杜格尔担任，但他怕事，坚决不

干，厂长则另找别人，但无人答应。他向我提出，我说我有顾虑，政治原因是主要的，他说，没有必要，他征求过局里的意见，他自己对我没有别的看法，只要我干，他一定给我以支持。这样，我同意了，他下达了正式任命，工资升为一千卢布。

在工作上，对内基本上还是那样，因为大家和我的关系，已习惯由我负责技术及生产。杜格尔资格虽老，但由于工艺知识缺乏，曾出过几次差错，无法焊接零件，群众关系不好，工人常和他闹别扭，所以一直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在对外方面，却方便得多了，我可以技术科长的名义，对外和各有关单位代表商谈问题，并以科长名义签署文件、协议，和国家银行代表商议价格、合同，有时可代厂长签字。

技术科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离厂回国为止。

这时听到的新闻点滴

在这一段时间内，各方面的政治变化是很大的，不论在苏联、中国及我自己都是如此，故作简要择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牢中。因为大牢中不准看报纸，当时只能听到一些片断的消息，但就是这些简明的消息，也使我非常高兴，觉得中国历史将开始一个新的转折点，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和几万万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毛主席到莫斯科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即刻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建交。驱逐蒋介石政府驻莫斯科大使。1949年12月中旬，我刚到西伯利亚不久，才进工厂，尚未安顿下来时，从报纸上知道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

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坐专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我的住处及工作地点仅七公里，但可惜没有机会瞻望一下。这次毛主席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大典，同时举行第一次中苏党政最高级会议，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以后，我听说毛主席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并未到车站欢迎，而且停了一天，也未会见。毛主席生了气说，如果不愿见，可以回去，他并不是专门来求斯大林接见的。以后这话传给了斯大林，才接见了。

在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上，及《真理报》发表的照片，和斯大林并坐在一起的是毛主席。

在1950年1月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以后，毛主席仍然乘专车，顺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国。

斯大林七十寿辰的隆重庆祝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日子，苏联领导人布置了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不亚于纪念十月革命节。事前很久，由苏联政、党领导人组成了人数众多的寿辰祝贺委员会进行筹备。寿辰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差不多都去了，《真理报》在几天前就开始登载各国政府、兄弟党、各单位的贺电、贺信，广播电台也不住地广播，小单位的贺电、贺信只登个名，这样也连续登了相当长的时间。据说，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列宁五十周年寿辰的活动。当然，时间不同了。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件 自从苏联和南斯拉夫决裂以后，南斯拉夫被驱逐出情报局，相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苏联已把南斯拉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看待。而考虑到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中与南斯拉夫相邻的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可能有不同意排除南斯拉夫的人，于是他们就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开始了各种案件的审判。其中最大的一起是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拉伊克等人的案件，还有几个部长，被认为是反苏、反本国政府，反人民而判处死刑。和苏联1936——1938年对国内原“左”右派头目的审判一样。在这些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苏联内务部门曾派人去加以协助。一些人认为，这是出于苏联政府的要求，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消除对苏联的离心力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苏联物价情况 苏联在1947年12月取消供给制，进行货币改革。此后，物价比较稳定了。但一般说来，由于战时的几次增价，物价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由于经济已经逐渐恢复，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必须逐步降低物价，提高新卢布的购买力。因此，从1949年起，就开始逐年地进行降价。包括食品、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品方面，每年降价一次，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和二十不等。虽然经过几次降价，价格水平仍高于战前，比起1927——1929年就更高了。因为战时的加价，只要在广播中通知一下，马上一天之内就提高百分之百；而战后几年虽然连续降了几次，但累计起来，仍不及一次加价的的多。如1927年面包价格很低，可以说微不足道。所以，在饭馆中吃饭，实际只收菜、肉、汤的钱，而一个人吃的二、三百克面包的价格，照例是略而不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黑面包每公斤高达两个卢布左右，白面包是三个卢布。

选举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战后，我还在极北方时，曾参

加过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一次选举。这次战后第二次参加选举。选举时间一般是在二月间。这时最冷，也是农闲时节。当时包罗金有一个代表这个煤矿区的名额。某个星期六提候选人时，由于露天矿长的一时高兴，提出了一个矿场上年纪才二十二、三岁的卷扬机工人，是从乡间来到不久的女青年团员。矿长说，她有代表性，一是工人，而且是青年工人，共青团员。当党组织宣布通过后，大家颇为惊讶，连这个女工自己也不知所措。以后印出的宣传传单，有她的像片，但履历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勉强用大号字排出。而到选举时，一般投票人只是到场投已经印好的票，履行一次选举手续而已。也不管选的是谁。有些人连所选人的姓名也记不住。听说其他地区选了不少名人。

一个不愉快的通知 大概在1952年末或1953年初，地区内务部门一个新专员找我签一张通知单，内容是流放人员如果不经地区内务部门的允许，擅自离开本地区，将受到处分直到二十年的劳改。我看后签了字。但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对流放人的限制本来就是如此，现在又让在这个通知上签字，说不定内务部门又有什么对付我们这些人的打算。我问专员为什么多此一举，他说，这是上级命令，他不知道原因。如果没有坏事发生，这个通知也许是例行公事的废纸；如果将带来不幸，那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了。这个通知的阴影在我心中回荡。过了些时，以及忙于工作，也未听说发生什么事，才渐渐淡漠下来。

医生事件的经过 1953年初春，报纸上突然发表了对犹太医生的长篇起诉书，其罪状有谋害苏联政府要人，和国外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反苏政治密谋等等。但在十几个被告

人的名单中，有好几个是俄国的著名医生，专门为领导人治病相当于过去的“御医”。以后又接连发表了对他们的控诉，其大张旗鼓的气氛，和1936——1938年宣布的一些大案件时一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否大清洗的事情又要发生了？这又使我联系到那个不愉快的通知。我自己只有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但愿这次不涉及我们。

发表起诉书时还宣布，不久即将进行公开的法庭审判。之后，报纸还透露出揭发这些医生的人是一个年青的女试验员，名叫波列修克。为此，苏维埃最高主席团还授予她列宁勋章。以后又发表了有关社论、通讯等材料，从各方面提出许多证据。

但是公开审判并未即刻开始，苏联政局便发生了变化，斯大林逝世了。

开始，人们以为由于斯大林逝世，苏联党政领导忙于其他大事，审判问题被搁置了。但到了夏天，报纸忽然报道，所谓犹太人医生事件，经过复查是个错案，是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进行的迫害事件。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消息，如苏联内务部主持这次迫害案件的侦查长，被判处了死刑；被控告的医生予以释放，恢复名誉，送往南俄疗养以恢复健康。对被授予列宁奖章的揭发人波列修克，宣布剥夺授予的奖章，等等。

斯大林的逝世 1953年3月初，报纸上突然报道斯大林病重，以后由专门组织的医治委员会抢救无效，于三月五日逝世，病症是脑溢血。据说是突然间发病的，即时已不省人事，舌头不能动，所以对后事也未安排，医生的抢救，只是略为延长了一小段时间，而未能起作用。很快宣布，由马林科

夫任部长会议主席，接替斯大林的政府职务，副主席是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任党的书记。还有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为政府领导人。形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

斯大林逝世后几天，全苏各地同时举行追悼会。我们的追悼会是听莫斯科的广播，厂内职工和管理局职工及领导都在一个大会场里，没有人在会上讲话，只收听全苏统一的追悼会广播实况，和苏联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大家都很严肃，闭口无言，过分的严肃到彼此也不讲话的程度，大有不谈国事的样子。

据年纪大的人说，在1924年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出及追悼会时，大家奔走相告，有的甚至流着眼泪，不知怎么办，将来会怎么样，议论纷纷。而现在却没有人发表什么议论。

报纸上报道斯大林的奠仪上，只说有亲属，但其妻子却未露面，而且从三十年代起，也未露过面。这使人联想到三十年代他的第一个妻子逝世后，他娶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卡冈诺维奇的女儿的传说。

斯大林逝世后不太久，《真理报》曾刊登了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有关斯大林逝世的一篇演讲，未加注释，不是摘录或引述，而是全文。这种做法，据我多年印象，还是第一次。他说，斯大林继承了列宁，但执行了自己的政策，现在新的苏联领导人也宣称将继承斯大林的政策，但这种宣称，也将无碍于他们执行自己的政策，至于究竟将是什么样的政策，将在以后才可看出。我看了以后，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执行新的政策？医生事件的变化也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一件事，是马林科夫当了部长会议主席后，发布了一些改进国民经济政策的措施，以减少人民负担以及民主方面的东西，引起了苏联人民的好感。

贝利亚等人的死 继犹太人医生事件平反之后，接着，在1953年后的一天，忽然宣布贝利亚以叛国罪被捕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当时未发表类似起诉书之类的东西，但指出将受审判。这使许多人颇为惊讶，但不表同情，因为贝利亚从宣传斯大林是高加索布尔塞维克的创始人进而升为中央领导人，主管内务部及以后内务部的权力过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威信，人们包括党政干部在内，都是怕他的。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在秋末，报纸宣布贝利亚因叛国活动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这和苏联其他内部事务一样，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和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他主管下的原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米尔古诺夫。其他未宣布的是否还有，也不得而知。有人说，他们想搞政变未成，也有人说，他们想搞第二次大清洗，以除去反对他们的人，这都是以后听说的。我在苏联二十八年的时间内，所见到的内务部负责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虽然他们都对敌人（有真的，也有错的）进行了镇压。最初，从非常委员会改变为国家政治管理局时是雅哥达，他曾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反对过反对派，在1937年大清洗开始不久被撤职，以后和布哈林一起被处死。接替他的，积极直接进行大清洗的是一个毫不出名的叶若夫，而中央领导人已是贝利亚了。但只过了一年多，1939年叶若夫不听说了，有的说疯了，有的说撤职查办了，被处决了，仅十三、四年间，上述两人连续执政，现在都被处死了。真实情况无从了解，这些人忽而威风凛凛，备受信任，忽而罪大恶

极，死有余辜。这真是令人不可捉摸！

宪法纪念的改变及其他 1953年12月初，照例是纪念苏联宪法日，1936年开始，年年如此。但这次纪念时，报纸上没有出现“斯大林宪法”的字眼。我厂厂长考培洛夫在作报告时，也未提到。以后，他向我解释说，过去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宪法是全民代表制定的，代表全党及全国人民的，不能说成某一个人的，其他类似的提法，也将更改。

厂长还说，在1937—1938年的肃反清洗中，斯大林犯了很大错误，杀了很多不应该杀的人。有一些是中央领导人、中央委员、党代会的代表，也被错杀了。如斯大林多年共事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只是不赞成他的清洗政策，斯大林就逼他喝酒死去^①，以后却授以国葬大礼，动员许多万人给他送葬，说他因患心脏病突然死去。193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书记波斯蒂舍夫因反对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并且拒绝在乌克兰执行，被调回莫斯科，几天内即被处死^②。连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也有被处死而另换人的。军事领导人如原国防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等也是被错杀的。

马林科夫的辞职及列宁格勒事件 1955年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宣布他自己未能执行农业发展政策，久，铁托和南斯拉夫在苏联有崇高的声望。以后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铁托的形象被描绘成比美帝国主义头子还坏。

^①毒死的传说不确。据苏共二十大及有关材料说，1930—1937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哥）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在1937年2月17日用手枪自杀于家中。

^②巴·彼·波斯蒂舍夫1934—1937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37年被解职，调任古比雪夫州党委书记，1938年被捕并开除出政治局，1940年被枪决。

使农业生产下降，提出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大会同意后，由赫鲁晓夫提出，以副主席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等仍然任副主席。报纸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是很新鲜的。因为在苏联建国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生过部长会议主席因某个问题而辞职的事，而过去只有因工作调动而辞职。

这个消息公布后不久，厂长考培洛夫告诉我说，我可能要回国了，应向我说一些真实情况。他说，马林科夫是被解职的，其原因也不是因为农业未搞好，而是搞错了列宁格勒事件，他要负责任。

列宁格勒事件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48年列宁格勒州委及市委书记是沃兹涅先斯基，这个职务是很重要的，相当于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般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沃兹涅先斯基是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时任作战经济计划部长，写过一本书叫《苏联战时经济》，有一定的功绩。战后改任州委职务。当时负责国家安全的贝利亚给中央及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说沃兹涅先斯基及列宁格勒其他一些领导人参与了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日丹诺夫并有叛国通敌罪。斯大林将这个报告批给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调查核对。不知是他们之间有矛盾，还是马林科夫怕贝利亚及斯大林或其他原因，未经调查清楚就批了这个报告说是事实。这样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导人就被处死了。现在查明贝利亚这份报告是捏造的，马林科夫未经调查就批准这个报告，是应该负责的。其他内务部的负责人也有责任，有些也被处死了。

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 1955年五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南斯拉夫，意图改善苏南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不

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苏联主动地采取措施，想改善两国的关系，但仍未能完全修好。

我和莉沙的平反 1954年春末，苏联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以纠正前些年间肃反扩大化的部分影响。法令的内容是，凡是过去被判处徒刑或劳动改造为期五年及五年以下的，一律撤销原有的刑事处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限制，并完全恢复公民权。

在1937—1938年期间，判处徒刑和劳改的各级法院，还有由法院的各机构的缺席判决，如特别会议（OCO）及各地的特别委员会等。法院的判决，以前的不知道，在1937—1938年期间，五年的很少，八年十年的却很多，重大的案件还有十五、二十及二十五年的。在1937年，我见到的成批人，都是特别会议判处的基本上都是五年，以前还有三年的，在末期及1938年则已有八年、十年的。据说，由OCO判处的都是在法院上不能构成案件的，有些仅是怀疑对象，有些则是政治意见不同等等，所以肃反扩大化在这方面牵涉的范围最广。而有些“说怪话”的人，都以“反苏维埃宣传”的罪名被判处八年到十年。如果被判五年就算是幸运的了。有些人经受不住，在劳改期间死了；有些我们这些幸存的人，现在还在流放。所以符合条件而能在这次获得平反的，也只是被判刑人员中的一小部分。真是死的死了，不死的只有少数人才有幸获得平反。

这个法令颁布后约两、三个月，在七月间莉沙先得到通知，由区内务部门办事处发给了根据这个法令开具的证明，撤销刑事处分，解除流放，并完全恢复公民权。过了两个星期，在八月初，我也得到通知，并领取了同样的证明。证明

是铅印的，下边填发证明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内务部。上边证明的编号已是上万位了，这使我知道虽然总的平反范围不大，而人数却也是相当可观的。至于不包括在这个平反范围内的被判刑人数字，就大得多了。

我和莉沙都领到这个证明后，便买了点酒菜，共同喝了一次，互相祝贺自由生活的恢复，祝贺我们幸存下来了，终于洗掉了多少年来的积垢，虽然已经是暮年的人了。

我拿着证明，回到工厂，又和厂办公室几个人喝了一次。以后又由工厂开了证明，到区民警局换了护照，或公民身份证明文件，我曾问他们，用这个护照是否可以到别处去，或到别处落户口？因为1946年我释放时取得的护照是有限制的，不能在大城市落户。民警局的人说，这是清白护照，任何地方都能居住和落户，到莫斯科去也可以。从此开始了完全自由的生活了。这是1954年8月的事。

这年秋天，我开始申请回国，这一段，将在下边作专门叙述。

回国前后

第一次未成的申请 如前所述，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我曾准备申请回国，但未及提出申请，就第三次被捕了，因而申请回国的事，遂成了泡影。

1953年夏，我在西伯利亚机电修配厂工作时，想念祖国的心情愈来愈强烈，当时莫斯科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苏大使馆，所以申请回国的念头，又屡次起伏。但当时我尚处于流放阶段，办申请感到困难。经过思想上的反复斗争，还是冒险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询问关于申请回国的手续。“冒险”之一是，我处于流放地位不允许这样

作；二、我虽是中国人，但已属苏联公民，中国大使馆对我成了外国大使馆，写信给外国大使馆，可能引起意外的麻烦。但当时的有利条件是中苏关系正好，不至于有“通敌”的危险。在给大使馆的信中，我也简单地提到我所处的地位。

过了一段时间，我居然收到了从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来的一封信。我心情激动地赶紧打开这封信来看，信是俄文打字的，因为我写去的也是俄文信。回信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按我的情况，没有完全的公民权，是不能谈到或考虑到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回信，虽然使我失望，即目前不能考虑回国的手续问题了，但也给我一线希望，情况变化时，可以申请回国；而且，这样一封试探信，居然可以按时得到回信，说明大使馆还是很重视这样的问题的。另外一个安慰，就是没有出麻烦，信的来往都安全到达了。

给中共中央的申请书 1954年秋，我取得了完全公民权的护照后，认为一年多以前阻碍我申请回国的原因已不存在，因此，决定正式写申请，而且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自己的母亲写信，并寄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转送。但在开始动笔写信时，感到几十年未用中文写东西了，确实很困难，何况是写这样重要的信呢？于是我开始郑重其事地用俄文写，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终于免为其难地翻译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滑稽的事啊！

这封信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申请书，内容大致是：青年时参加革命，入了党，被送来苏联学习，原想学成回去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平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奋斗；以后因犯错误被留在苏联，未能回去，实在遗憾；现在终于有可能回国，希望党中央能让我回到自己的祖国，继续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一点工作；多年来我在政治上落后了，希望在技术工作上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第二部分是我自己的简历，包括在中国的情况及入党前后情况、家庭情况、到莫斯科学习的情况，以及犯错误和受处分、恢复党籍未成、又被判为反革命，继而流放，最后平反等事实。第三部分是附给董必武同志个人的信件，大意说明我热烈盼望能回国，董老知道我，也知道我当时在列宁学院及犯错误的情况，希望董老能在中央说句话，帮助我实现回国的愿望。当时我在《真理报》上看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有些人我听说过，但知道的只有董老一个人。考虑到当时能够回国的把握并不大，所以才特地又给董老写了一封信，向他提出我的请求。

这封信三部分共有好几张信纸，此外我还将俄文译稿也装在里面，这就更多了。我想，这封信那么多，如果只用中文写，恐怕中途内务部门进行检查，碰到不懂中文的苏联人，还得找人翻译，既耽误时间，又可能引起误会或怀疑。因此，虽然信纸已有数张之多，我还是将俄文稿都装了进去，于是成了一封相当厚的信；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挂号发出，以备查询。总之，写成这封信前后费了不少时间，发信时，已经是1954年的10月了。

十月革命节到坎斯克 我完全恢复自由以后，很想到坎斯克去见见鲁也参。我于1938年初在苏联极北方考其莫斯农场同他分别后，再没有见过他；直到1949年11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牢中等待流放分配时才遇到了他，知道他将留在本州。后来，我从中国人王宪忠那里打听到鲁也参在坎斯克餐厅工作。十月革命节连放假带休息，一共有四天，我便利利用假期到坎斯克去。恰在5号从坎斯克来了一辆卡车，是

一个工厂派到外面搞备件时路过我厂办点事的。我和该车的采购员一谈，他也知道鲁也参，于是商定坐他们的卡车到坎斯克去。

坎斯克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仅次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个城市，比我们的站，即区中心大得多了；坐火车去那里需要六、七个小时，坐汽车也要七、八个小时。这天，天气很冷，我穿着皮袄，在卡车上冻得可厉害了。中途我们曾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吃东西，喝了点酒防寒。到达坎斯克已是午夜十二点了，他们直接拉我到饭馆的后门，因为前门已关了，打夜班的人还在，只有从后门叫开进去。车上的人只要饭馆给弄瓶伏尔加酒喝喝就行。后门叫开了，我打听鲁也参，有个女人出来，自称是鲁的小姨子，并替我拿出一瓶酒，打发了汽车司机，然后领我去鲁也参家。深夜叫开了鲁家的门，我和鲁也参意外地相见了。夜已经很深了，他让我吃点东西，赶快安排睡觉。我很快就入睡了，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正是节日，吃饭喝酒，欢欢喜喜地过了两天。我见到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和他与前妻的十九岁的儿子，还见到了坎斯克的几个华侨，以及他的几个俄国客人。不用说，我们详细地谈了别后的情况。

鲁也参到坎斯克后，未做过一般工作。他一开始就到饭馆工作。因为他在沃尔库塔劳改时学到了一手烹饪的好本领。他工作一段时间后，经过考核被授予特级厨师称号，成了公共饮食业的专家，以后又升为主任。他的工作很好，上下也都满意。工资略多于我或相等，但收入却很不少，而且在商业技校兼任食品学老师。吃的、喝的、住的都比较好，酒

肉、香肠、水果相当丰富，应有尽有。他买的房子一院两座房，他的小姨子住了一座小的，他住的一座有五间。据说此房价值八、九千卢布。比起我来，他像个小富翁，我倒像个穷光蛋了。这又使我想起那个有技术的皮鞋匠——他的收入大大超过了“无技术”的工程师——的事例。在苏联，手艺人吃得开。

我向他谈到我经过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请回国的情况。他说，他在不久前也写了。我们想念祖国的心情是一样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的处境和遭遇都一样，而且不约而同地写申请，时间也大致相同。我们还谈到，如果顺利的话，还可能一起被批准，一起办手续回国呢，那该多好呀！

1955年新年第二次到坎斯克 发出申请书已经三个月，仍无讯息，我心中颇为着急。于是我利用新年的两天假，第二次去坎斯克。在那里，我和鲁也参商量了两件事。一是估计回国的可能性，我们认为中共中央批准是可能的，但看来一时还解决不了。因为预计申请书到大使馆后，那里得研究一下，也许还得和苏联的有关单位商谈一下，然后才能转给中共中央。中央事多，收到后也得研究一下，调查一下，然后再通知大使馆与苏联交涉等一系列手续。估计这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尽管焦急，还得耐心等待。二是假如不可能回国，中共中央不批准或苏联不同意，那就得作出留在苏联的打算。我已有了孩子，工作地点在包罗金，不在伊尔什，原住的房子不好，而且是林娜原来的丈夫的，由于这种原因，我不能长期住在原来的房子，而应当购置自己的房子，住公家房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当时的资金只有两、三千卢布，而

买个像样的房子，需要六千卢布，所以希望鲁也参能援助我三千卢布。我的想法是根据第一次到那里去看到他的情况而作出的。鲁也参满口答应说，如果今年上半年没有回国消息，他可以援助我钱，再多些也行，什么时候要都行。这样，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我心中都有了底。

1955年的春梦 1955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林娜和她妈、她的大孩子到外边去了，只有我、小儿子及米舍在家。这时，忽然有一个讨东西吃的茨冈女人来到家里。这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还保存其游牧性质的人，到处流荡。男的牧马，女的会跳舞、算卦、乞讨。我将剩余的一块面包送给她，她表示谢意，并乘机抓住我的手，看手纹，要给我算卦。我不信那一套，将手抽回来。她说，她已经看了我的手，可以向我讲三件事。一是，我住的这个房子，今年不能再住下去，要离开这里；二是，我的小孩子身体很弱，但生命力强，会活下去；三是，还有另一个人在等待着我。

我当时未予注意，她就走了。她走后，我的思想上却有点波动，也许是人在希望不能满足时，常常会产生幻想的原因吧！今年要离开这里？是不是不久会有批准回国的消息呢？今年能够回国吧？有这样巧合的事吗？小孩子命大，能活下去？这也许是她对我的安慰话。有女人在等着我？可能是照应到莉沙了。这样一来，倒使我想得很多，但是，留在脑中的，还是“今年离开这里”这个大问题。

真是巧得很，这天夜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正参加中国的国内战争。我们由南方向北进军，似乎越过了两军交战的分界线，到了开封，好象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也未见到任何家中人；于是又费了好大的

力气，才到了老家，见到了多年未见过的妻子，她居然还是年轻时的样子，我很惊讶，上前去和她说话，想问她别后情况，她却不理我，竟怒气冲冲地用双手尽力推了我一下，几乎把我推倒，使我突然从梦中惊醒。醒后，脑子里又琢磨“还有一个人在等我”这句话，难道是我那在国内相别二十九年的妻子？

夜正深，但已难入睡，回想起和家中妻子结婚时及别后二十九年的情况。中国人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不懂白日没有想到，而且好多年也未曾梦到过，而今天忽然作了这样的梦。几年前我在乌拉尔监狱中，曾见到过一个在河南呆过的俄国人。他曾到过新乡，常在开封。他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在新乡和太行山之间都曾“拉过锯”，有些地方已打成平地。我想着，家乡也许早已不成家乡，妻子也不一定活着了。今天怎么忽然又梦到了呢？又想到申请书发出已五个多月了，该有消息了。但为了获得批准回国，必须经过很多个关口：信要安全到达，大使馆及时处理，转到中共中央，经过调查，而且顺利取得结果，中共中央很快处理，并给予批准，再向苏联政府交涉等等。有一个卡住了，就要受影响，也是难事。回不了国怎么办？回去了，又怎么办？……总之，思绪不断。后来，我还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春梦》（仿苏轼词）

少小初结发，相处只几天。匆匆未及话别、萋萋廿九年。

迢迢两地茫茫，魂魄何处寻觅，万水隔千山。

几经险风涛，可还在人间？听妄言，疑残梦，难成

眠。

信鸽传书，能否飞越九重关？

人生只有悲离？明月竟无圆晴？此事真太偏！

但愿断弦续，琵琶能复弹！

到办公室不知第几天，我正在画图时，忽然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只大蜘蛛。我惊了一下，想把它弄出去，对面坐的设计师忽然看到说，不要动它。老年的俄国人常说，蜘蛛到面前是报喜信的，一定会有好消息。旁边坐的老定额员也这样说，我也不好意思动它了。呆一会它自己走了。真是茨冈女人的话、梦、蜘蛛都巧合了。如果好消息真的来了，也许会使人对这些巧合增添迷信的色彩哩。

兴奋的通知 1955年3月中旬或4月初的一天下午，厂长还在召集生产技术会议时，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在场，厂长忽接到区里的通知，并让他用笔记下，我听到是有关我的事。我开始兴奋起来。以后厂长告诉我，区接到省内务部门外事局的通知，让我即刻到省内务部门外事局去办理出国申请手续。当时大家纷纷议论说，好消息真的来了，厂长也为我祝贺。会计师让出纳员预借给我二百卢布，即刻就走。我也未回伊尔什，只托人告诉林娜，便即刻到汽车站，搭车到区里，买了当晚的车票，赶到州里去。

到外事局办申请手续 次日早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找到了内务部门外事局，接见我的的是一个年纪五十多岁左右的老头，很和气。他简单地问了我一下，然后就拿出了有好几页的一个表，是出国人员申请表，让我填。表很详细，列了很多项目、格式。我先看了一下，对一些不大明白的项目，提出了询问。在我准备动笔填写之前，他让我先去照相

片，连同将来办理护照的相片，要洗九张。我感谢他的提醒。照相时，我说明了情况，次日便可以取相片。照相回来，吃过午饭，我便开始在那里填表。

正好这时，鲁也参也到了。我们俩此时相见都很高兴。他也是昨天接到通知的，但搭的早车，所以下午才到。当时我们更高兴的是能够一起回国了。那个老头知道我们熟识，就让我告诉鲁也参填表方法，又让他也先去照相，让我们俩找个旅馆住下，将表带回去填，于次日连同相片一起送来。老头交待我们要小心，不要丢了表，并按时送来。我们找了个旅馆，除填表外，还谈了其他一些事。

次日，我们带着表，去交给那个老头。他逐项看了，有些地方需要补充或修改。后来他说，我们被召来填表，是上级通知的，所以护照可能三、四个月就下来。如果我们自己申请，要办好全部手续，少则要八、九个月，不然就得一年左右。我们感谢了他，并希望能快一些。他看完表后，我提了个问题说，我的表上没填妻子，但有个孩子，才两岁多，想带回去。他说怎么无妻子而有孩子，我说是同居生的，未办结婚手续。他说，那也得填上。至于带孩子的事，根据苏联法律，经父母双方同意，由地方政权机关证明，并另照相片，也可附带申请书一起上报。他并告诉我怎样写，怎样办，如何找地方机关证明等，并说，回去就办，愈快愈好。我再次感谢了他。我和鲁也参非常高兴地同坐一趟车往回走，我的路近些，先下车。

路上我向鲁也参提出，如果孩子也回去，我恐怕难以照顾，而他的俄国女人要和他一起回去，他们又无孩子，是否可先由他们照顾一下。他同意了，说回去和他女人商量一

下。我说，如果同意，我将孩子送去，让孩子离开妈妈一段时间，让他们习惯一下。他说，商量后，告诉我。

关于孩子的申请手续 回伊尔什后，我向林娜谈了在州里的情况，并提出想带孩子回去的愿望。我提的理由是：

(1) 我有机会回国时一定要回国，有言在先；(2) 我年将五十，只此一个小孩，我走后，她还有两个孩子；(3) 我将来不知什么时候成家，她年纪还不很大，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有三个孩子，尤其是一个中国孩子，对她是个负担，我带走对她只有好处；(4) 在经济上，她有三个孩子及老母，负担不了；(5) 我将尽一切能力照顾孩子，决不会使他受委屈，她可以完全放心；(6) 我将来走时，除本月工资，只带过去的公债，可换成钱及随身穿的衣服。其他四年来的购置物，家里的东西，我全不要。

林娜提出能否和我出国的问题，我不同意，理由是：(1) 她有两个孩子，还有老母，这是很大的负担，而她不能只身和我走；(2) 我二十九年未回过国，初回去不知怎样，不能带这样的家；(3) 更大的问题是我在苏联这样久，一切都习惯了，有家有孩子又有工作，但想念祖国的心情仍使我不顾一切地要回国；而她到中国后，话不懂，不能工作，四邻朋友一句话不通，必将闷得不得了，又会想念祖国……

经过说服及林娜自己的思想斗争，她同意了我的意见，她不要求出国，让我带孩子回国。

然后我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个声明书，说经过协商，我们两人同意我带孩子出国。然后我拿了这个声明到乡人民政府找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说，这样的声明书，地方政府可以证明，但需要双方同时在场，并用较大的纸写好，

工整些，后边留地方批字。我照办了，并说服林娜和我一块去。乡人民政府主席找了秘书，四个人在场。他又问林娜是否真同意我带孩子的意见，她说是真的同意及其理由。于是他在我们的申请书后面，很工整地批了这么几句：

“本申请书是经过父母双方协商同意后写的，并在我、地方苏维埃主席及秘书在场时，由父母双方同时签名，因此，特予证明。”

下边，他的职务：“伊尔什地方苏维埃主席”，签字；秘书的签字。年月日，地方苏维埃的公章。

事前我同孩子合照了相，连同这个证明书，用挂号信寄到州里。林娜也和孩子照了相，作为留念。总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总算比较顺利地办好了手续。

关于我回国的议论 自从我回国问题公开以后，厂内及煤矿管理局知道我的人，有两种意见及议论。一种是支持赞成我回国的，认为回祖国是好事，应该回去，中国缺少技术人员，在苏联象我这样的技术人员很多。在祖国可能还见到亲人，回国还可以作点事，参加建设等等。

也有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说，回国生活可能困难，不如这里；这里妻子、孩子、家都有了，回去还不知怎样呢？对于后一种人的意见，我婉言谢绝，说明回去不是为了享受，正因为困难，才要回去干。但两种人对我都是出于善意，都是为我好，这是可以肯定的。

厂长的安排 1955年4月，我从州里回来以后，向厂长谈了办手续的情况，他认为我的出国已成定局，时间可能是四、五个月内的事，所以他提出让我准备找接替工作的人，让我在工艺、设计及技术管理三方面分别带人，自己少干工

作，让接替人多干工作，并让我提出技术科长候选人。

另外，我手头上的一个较大工作，是帮助露天煤矿总工程师搞的一个技术革新项目，即铁路地基清理设备，要加紧完成设计及制造，争取最近能试验一下。

将小儿送到坎斯克 考虑到使小孩子在回国前逐渐能离开妈妈及姥姥，回国时搭车方便，回国后能习惯生活，我在征求鲁也参夫妇同意之后，于七月间和林娜商量将小儿送到鲁也参家，并将各种原因及理由向她说明。坎斯克是个大站，国际列车在那里停，而在扎奥 则尔内是不停的。林娜同意了，同时也想看一下鲁也参夫妇，所以决定我们俩一块儿去。

在七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下班后，我和林娜将小儿必需的衣服、小被子包成包袱，一起搭公共汽车到了扎奥 则尔内车站，买了晚十一点的车票，搭到坎斯克。小儿初时不习惯坐火车，我让林娜陪着他躺下，他很快睡着了。次日晨五时到了坎斯克，天尚早，我们抱着小儿在车站睡了一会儿，六点才离开车站到鲁也参家去。鲁也参夫妇热情地招待我们。孩子吃得很多。当时在鲁也参家的还有她妻子的女儿、女婿、外孙儿，其外孙才三岁多略大于我的小儿。两个小孩子“一见如故”，就天真地无约束地在一块玩起来了。孩子一天玩得累了，也吃好了，八点多钟就要睡觉。我们陪着孩子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林娜和我在孩子的额头上轻轻吻了几下，趁孩子熟睡，我们悄悄地收拾了一下，和鲁也参夫妇谈了一阵。鲁也参的妻子说，孩子明天醒了，如果不很哭闹，就没有问题，过两天就好了。如果有点哭闹，他们会哄他玩，不过，如果他不吃饭，哭闹发烧时，将给我们打电

话，我们两人不论谁，就得来一个，因为有的孩子，想妈妈可能想出病来。我们约好，在星期二下午打长途电话问，如有问题，星期二晚上我们两个来坎斯克。这样我们又搭夜车回伊尔什，星期一早上，即赶着上班。林娜看到这一切情况，表示满意、放心。

星期二下午，我从办公室打长途电话到坎斯克问鲁也参，他说，你可以放心，小儿吃、玩、睡都没有问题。让我星期日或隔天再来。

星期六晚上，我一个人搭车到坎斯克去看孩子。星期日早晨到鲁也参家时，孩子还在熟睡，我看那小儿的天真、无忧的睡态，心里很高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走后，孩子一夜也未醒，第二日早晨醒了，问爸爸妈妈哪里去了。他们说，上班去了。孩子和他们的外孙儿，由女儿照顾吃，以后一块玩，外孙儿叫妈妈，叫姥爷、姥姥，他也跟着叫，一直没有闹过。晚上他问，爸爸妈妈怎么不回来，他们告诉他明天才回来，他就跟着外孙儿一块睡了。这样，很顺当地就习惯了。

早饭时，孩子醒了，看见我，赶紧跑到我面前说，爸爸回来了。又问妈妈呢？我说还未回来，今天回不来了。我问他，在这儿好不好？他说，吃得好，玩得也好。这一天，他总不离开我，我到外边，他也要跟我去。因为他小，跑不动，我也只好不远走。他兴奋得午觉也未睡。晚上，我哄他睡了，又照例地在他额上轻轻地吻了几下，又搭晚车回来了。我向林娜讲了情况，让她放心。

办好护照的消息 八月初，在我有一次从坎斯克看孩子回来时，我到民警局那里，想打听一下孩子出生证上更改名

有一个认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看到一个通知，我的出国护照办好了，让到州里去领。我很兴奋，便即刻回到包罗金厂，打长途电话给鲁也参让他去查问，后来他来电话说是事实，我们即约定次日到州里去。

到州外事局后，我们见了面，接见我们的 是一个年轻人，不是那个老头了，是个十足的官僚。我们向他讲领取护照的手续，他说很简单，把原有的苏联护照带来换取。我们说，想到莫斯科去买点东西，并看一看。他说，那就不能换护照，因为出国护照不能在莫斯科住旅馆和通行。因此，他建议我们先到莫斯科去，回来再换护照。我所最关心的是孩子出国手续，急于看一下护照。相片还是我一个人的，但后边加了一句“随同小儿弗拉基米尔”。显然是后来补的。我放心了，心中暗暗地感谢那个老头儿给我出了主意，帮助我解决了一大心事。

我们又到国家银行州分行打听出国人员换公债及外汇的手续，那里的负责人曾到过中国，对我们很热情。他说公债可以换成卢布，其数由所在工作单位，开张历年购买公债的数目的证明。关于外汇，是每个出国人员可用卢布换取中国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小孩子是七十五元，所以我可以换二百二十五元人民币，兑换率是一个人民币等于两卢布。了解清楚后，我和鲁也参约定时间一起去莫斯科。

第一次到莫斯科去 八月中旬，我和鲁也参坐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途车。除了1927年到莫斯科来时那一次，多少年了，坐这趟车去莫斯科还是第一次哩！车的结构及内部装备，作为普通卧铺车来说，比1927年有了很大的改进，阔气多了。因为是快车，小站不停。大站卖东西的，现成的供

旅客用的饭盒都有，比较方便。经过四天多的旅行，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我们直接到了大使馆。大使馆仍然在克鲁泡特金街，原是旧中国大使馆，还是清朝时代建立的。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只是当时驻有国民党政府的使者，所以从未到过。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了。门口有苏联民警站岗，他们不阻拦。进门后，在收发室坐着一个俄国女人。我们说明来意，她到里面传达一下，很快出来了一位姓王的，可能是负责护照签证工作的。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后说，有出国护照的，一样可以在莫斯科停留。他说，他记得我们出国护照上大使馆签署的入境日期是9月10日，比苏联外交部签署的出境日10月10日早一个月。不知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要我们即刻回西伯利亚，换取护照，办理手续，再回莫斯科，由大使馆签署入境新日期，然后再在莫斯科停一下，买东西，从莫斯科直接回国。为此，他说可在大使馆后边房子里住宿，明天再回去。

我们听了，才知道州民警局那个年轻人坏了事。我想到，如果第一次填表申请回国时遇到了他，而不是那个老头儿，还不知我的事和孩子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真应了中国人的“办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话，机会和遇到的人，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去买了次日的车票，在街上略逛了一下，在大使馆后边睡了一夜，次日便搭车回西伯利亚。这次虽然空跑了一趟，但也未完全空跑，弄清了情况。我和鲁也参商定，回去办离厂手续，换公债，我到坎斯克，将孩子留在那里，再到莫斯科。回国时，让他们顺路将孩子送上车。

办理离厂手续 从莫斯科回来后，办了离厂手续，领了

一个多月的工资，交待了工作，并向大家谈了一些路上的情况；还抽出时间完成了露天矿厂总工程师的技术革新设计工作；又按国家银行办事处负责人的意见，由工厂开了我历年认购公债的证明，从莉沙那里拿了公债，其中比较早期的几百卢布，还本期已很近了，留给了莉沙让她用，其余的从1946年到1955年期间积累的，约有七、八千卢布，换成了钱，并用四百五十卢布换了人民币外汇二百二十五元，实际上是个支票。算是结束了几年西伯利亚的工作和生活。

就在这时，由于东奔西跑，风雨交加，忽冷忽热，我得了重感冒。会计师玛利亚将我安置到她家，吃了药，又做了几次汤、细面条给我吃，两三天就好了。于是由玛利亚及计划员、出纳三个人为主，预备点酒、菜，准备约请厂负责人、技术科人员、会计处负责人及几个工长、钳工，在一起话别。

告别酒会 约了厂内二十来个工作人员，到玛利亚家参加告别酒会。我买了几瓶白酒，几瓶红酒。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来参加酒会的人也都自带一瓶酒，这次酒会共喝了三十瓶酒，从下午五时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为了不使大家大醉，酒是分开喝的，吃、喝、跳、说，然后再吃、喝。我的兴趣特别高，喝的、吃的都不少，居然也未醉，还用中文唱了国际歌。玛利亚、索菲亚作主人，忙个不休。

晚间，下起雨来，所以十一点后，近处的人走了，远处的以及几个伊尔什的不能走了，就在地板上胡乱地睡下过夜，天也不冷，所以没问题。次日早晨，有点头晕，俄国人说，每人再喝两杯就好了，于是又将昨晚的空酒瓶拿到商店换了两瓶酒，加上残菜余汤，又吃喝了一顿，上班也迟了

些。大家尽欢而散，都祝贺我一路平安，顺利回到祖国，为人民作出贡献。

向莉沙告别 感冒好后，我到了南矿区向莉沙告别，告诉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即将到莫斯科去，从那里直接回国，并将带小孩子回去。莉沙向我表示一方面留恋惜别，一方面又予以祝贺，祝贺将及晚年时终于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她留我在那里吃饭，买了酒，也谈了多年来从认识到几次重逢和别离的情景。现在终于要离开了，颇有点“生死别离”的心情。最后，我问她要买什么东西，她提了几样，我记下来，答应从莫斯科一定买下并给她寄来。

向林娜告别 我又到伊尔什向林娜讲了情况，并告诉她小孩的情况一切都好。林娜已离厂，准备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哥哥那里，并给了我通讯地址。我告诉她，最后行期定时，将路过坎斯克，如果她有可能时，让她到坎斯克去一次，再和孩子见见面。

向李玉书及其他中国老乡告别 我从林娜处又到李玉书那里。我向这个第一个和我相识的、并多次帮助我的中国老乡及他的俄国女人叙述有关情况，并向他们告别。李玉书买了酒，做了菜，并约了过去认识的几个中国人，吃喝了一次。他们要我回国后，一定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国内情况和工作的安排。他们也问了办回国手续的情况，并问不回国能否回国探亲。我告诉了他们回国探亲的手续。他们也说，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回去就更难了。

赶马车的本领又起了作用 次日雨还未停，下午才住了雨点，但因为雨太大了，到车站的公共汽车也不通了。而我不能多耽误时间，鲁也参还在等我。我只得找露天矿总工程师

师给我找辆马车，赶到加玛拉站搭车，该站虽不大，但却是列车加水添煤的一个站，所以西伯利亚大道上的快慢车，包括所有国际列车都要在此停留。这个站离包罗金只有十几里路，也有个煤矿。当天早上，马车来了，我坐了车，带着箱子，和玛利亚告别，并将我的皮袄留给她作纪念。她让我电告车过加玛拉的日期，答应最后话别。

坐马车快到加玛拉，已看见铁路，那里的小桥被水冲断，这条小河过不去。马车夫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不敢过河。我让他将马缰绳给我，说我敢过，他劝我不要冒险。后来我看到离此几十步远的地方，河面较宽，且有车辙，认为有人从那里过，那里水一定浅些。于是，我赶着马车转向那里。到河边后，马不下水。我让马夫提着我的箱子，蹲在车上，我也蹲着，以防水漫过车箱，然后拉紧缰绳，将鞭子一扬，大喝一声，赶马下水。那匹马大步地进入河中，水愈来愈深，马步愈走愈急，最深处，马肚子已看不见了，水也漫到东西上，但只几步，过了最深处以后，水浅了，马步也慢了。我们就这样顺利地渡过了河。马夫对我说：“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套本领？”我告诉他：“回去时，还从这里过。”我也未想到，劳改时赶马车的“本领”，居然派了用场。

第二次到莫斯科去 到坎斯克后和鲁也参商定了走的日期，并作好准备。他也举行了告别的酒会，交待了工作。参加告别酒会的还有几个和他熟识的华侨。动身前，我们两个人将所有的钱约三万卢布，到储蓄所换成了活动支票，以便到莫斯科分期使用。这种支票有每张三千卢布的，一千卢布的，很方便，随时随地可在储蓄所兑现，这样就解决了携带款项的困难，又安全，又轻便。

我们到莫斯科先把行李存在鲁也参的一个熟人家里，然后到中国驻莫大使馆。仍然见了那位王同志，他将我们的护照入境日期延到10月10日，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约一个月的时间住在莫斯科。这位王同志向我们谈了我们回国的问题及一些有关情况。

我们的申请及允许回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然后才由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办理交涉。回国以后，将由中央安排我们的工作。这次我们回国是按苏联公民资格的出国手续办理的，这样快，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按中国公民回国手续，就需要先申请转国籍手续，得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起码要两年时间。那就拖得太长了。现在这样回国，中央还是一样接待我们，回国后，国籍问题是个形式，不会成问题。

关于我们多余的钱兑换人民币问题，他说，苏联政府不让兑换人民币，因为这是苏联的外汇，按外汇比率，用卢布换人民币，苏联吃亏，所以除了出国允许的数目以外，不能再多换。我们的钱可以买成东西，甚至可以买摩托车，带到中国，再换成人民币。还可以买其他东西，中国大使馆可以给予证明，不受限制。所以，我们可以自行处理。

鲁也参提到他的俄国妻子到中国去的问题，他说，只要苏联政府允许，办了手续，大使馆签入境证没有问题。有关华侨回国问题，他说少数华侨想回国，向大使馆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使馆一般地劝说他们不回去，但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们在苏联生活很容易，生活也不错，中国农村生活比较困难，劳动强度也高，他们回去后不习惯，所以劝他们不要回去。

关于住的问题，他说，我们在莫斯科可停到九月底，不误过境外即可。因为时间长，我们可能还要游览一下，所以

住在大使馆不方便。我们说，自己找旅馆没有问题。

在莫斯科的住宿 我们打听，在市中心的大旅馆，每人每天要三十个卢布，太贵了。其他旅馆，由于夏季人多，到处满员。有人向我们讲，农业展览馆附近的招待所可以住。我们去了。那里人不太多，找了个房间，三张床位，但当时只有我们两人，每人每日十个卢布，房间很好，很干净，钢丝床、卧具也干净，茶几也有，该招待所共有十几座五层楼，可容纳上万人，为招待各地来农业展览馆参观的人，所以价格便宜。在楼下有食堂，规模不小，只是离城市中心稍远些，但有几路公共汽车可通。还有百货商店，货源不多，但日用品还是不少的。因此，早饭、小点可在哪里吃，午饭则游到哪里吃到哪里。晚饭有时在外边吃，有时回来吃。不愿到饭堂吃，在小吃部也可以吃，所以，倒还方便。我们在这个招待所一直住到动身回国前两天。

在此期间，鲁也参曾到乌克兰他儿子参军的地方，看望他儿子。那里的领导，为了照顾他们父子的关系，给了他儿子假期，让他和父亲一起到莫斯科，一直到送我们上车为止。

为鲁也参妻子出国奔走 当鲁也参回国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妻子也愿跟他到中国来，因此，他也写了申请。我们希望她能和我们一起来，所以曾到各个机关打听，催办批准手续。我们曾找过苏联内务部、外交部的办事机关及内务部外事局，还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来访接待室去。那里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接见访问人，需要每天上午排队坐在那里等。什么样的事，什么人，什么地方来的都有。秘书接见后，分情况处理，有些人的，要求迫切的，非大

人物接见不可的，才转到上边去约定时间再谈。但总的说来，还是能解决问题的。这里的官僚主义，从表面看来，还不太严重，据说，这是从加里宁时就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

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是，到中国可以来，但时间来不及，大概得到明年了。

在莫斯科采购及游览 我们在莫斯科游览了一些公共场所，如文化公园、河上公园、运动场、工业展览馆、农业展览馆、艺术展览馆等等。当时的情况，比起二十年代末期我们在莫斯科时大不相同了，繁华得多了。特别是莫斯科的地下铁道，1932年开始修建，1933年我到莫斯科时只见到街头上有围墙围着的地下工程上下出入口。1936年建成了第一期的环行路，墙上还有纪念当时的交通部长卡冈诺维奇的字样。以后又建第二期工程，卫国战争后又建了第三期工程，因为不能交叉而只能上下交叉，所以第三期工程就很深了，最深的有几十米，都是自动梯，不然人们上下太吃力了。各个站的设计，彼此都不相同，通风、照明都很好，而且一期比一期华丽。据说其建筑费用之高及外观之美在世界上数第一位，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修建的，不计成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投资。这里上下班时人拥挤得很厉害，如果地下铁路一旦发生事故，对居民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困难。

莫斯科的工业品供应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有的地方也有排队的。饮食方面也无大问题，首都的供应还是有优越条件的。我买了一些东西，有西装一套（一千三百）、收音机（一千）、雨衣（六百）、秋大衣（八百）、手表三块（四百一个，计一千二百）、照像机（七百）、毛毯（四百）、机械制造资料全书（七百）及其他日用品，约用了八千多卢布。鲁也参买的东

西略多于我，但由于用他的钱，合起来还是我买的的多些。由于不知中国的情况，还买了些将来工作可能用的，如仪器，计算尺，游标卡尺等，甚至图钉、绘图笔等也买了。

我还按莉沙的要求，给她买了些东西，用邮包寄给她，也很方便，有专门管这事的部门。

其他回国的准备工作 九月下旬，我们到国际旅行社预定了回国的国际列车车票，时间是10月2日。我们定了下铺，声明有小孩子，买了软席，连中国境内餐车上的两天餐券在内，合计一千三百六十卢布，相对地说，不算很贵。据说，飞机票是一千六百卢布，但不能带二十公斤以上的行李。

定票后，给中国打了个电报。原来，潘树人比我们早办好手续，于七月间回去了，路过坎斯克时见到鲁也参，到北京后，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曾给鲁也参写过信，告诉了地址。我们有了地址，所以可打电报，希望他能接我们，因为我们几十年不在国内，过去也未到过北京。只是打电报用俄文，需要用拉丁字母拼音，作了点难。

我最关心的是孩子如期上车问题。我们打电报给鲁也参的夫人，告诉她车过坎斯克的时间，此外还打了一次长途电话，亲口告诉她一次，并请她准备好，把孩子送上车。

我还给玛利亚拍一封电报，告诉她国际列车过加玛拉的时间，但由于时间在晚上十点，希望她考虑不一定到车站来，因为离包罗金十几里，而且没有公共汽车。

在将离莫斯科的前两天，我们离开招待所到了鲁也参的相识家，在那里打好行李，因为以前买的东西都寄存在他们那里，还请他们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以表示谢意。那里有点中国风味的饭菜，是莫斯科的高级饭馆之一。

10月2日，我们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他们送我们到车站，鲁也参的儿子也送了我们。

对莫斯科的片断印象 在将及一个月的莫斯科停留阶段，比起二十多年前变化太多了，简单的片断印象，大致可归纳为几点：（1）繁华多了，在交通、城市建筑、生活等方面都有进步；（2）钱的势力大为加强，什么地方都要钱，还到处要小费；（3）莫斯科成为大工业城市，但也是很大的消费城市；（4）各种各样的小投机盛行，倒买倒卖东西，甚至运动场的票也有私人买卖赚钱的；（5）生活很繁忙，街上见到的人都很紧张，仿佛忙得不得了似的，坐车、等车时，看报纸的人，到处皆有；（6）有小汽车、拿高薪、住别墅的人多得多了，早起，小汽车大批进城，五点后，又大批出城。

归国途中

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 1955年10月2日，我们和送行的人告别，搭上了莫斯科——北京直达的国际列车，离开了莫斯科。这是世界最长的直达列车，预计将走九个昼夜，11日晚才能到达北京。两地之间还有六个小时的时差。

国际列车的设计、结构、制造、内部装备等方面，在我所坐过的火车中，都是第一流的。我们坐的软席，是包厢式的，硬席也差不多，只是稍微小一点，床位是硬的。其他内部装备大致一样。地毯、收音机、桌子、照明灯、夜间睡灯，一应俱全。车走得很稳，很准时。吃、坐、睡，都很舒服，这样的长途旅行，有了这样的舒适条件，才不至于疲劳厌倦。这是我有生以来五十年间，第一次坐上这样的列车，加上我的心情特别愉快，所以，这次旅途真是最称心如意的

快事。

我们的软卧间有四个床位，我和鲁也参都是下铺。两个初次出国的苏联电气专家在上铺。他们到越南去建设热电站，带的东西很少，随身衣服，洗漱用具和一些资料等。我们带的东西较多，除一个大木箱在行李车内，其余四个箱、两个包袱、几包书，把行李架都放满了，好在是直达车，不用转车时倒运行李。

车上满了座，绝大部分是专家，有的是第一次出国，有的是返苏联休假又回去的。一般的作风、态度都是比较好的，没有发现俄国人最常见的酗酒现象，只有一次有两个据说是钳工的喝醉了酒，以后再不见了，可能临时撤回去了。我们同房间的专家说，苏联政府对他们有特别指示，严禁酗酒。

列车服务 列车服务是比较好的。我们知道莫斯科的规矩：“小费”要花在前。上车的当晚，我们和那两位专家商量给列车员点小费，大家同意每人二十五个卢布，合计一百个，相当于一个列车员工资的五、六分之一。当时我们凑足数，给了列车员，说：“一路上的茶水钱。”他们点头道谢，一路上随时都供用带糖及柠檬的茶，整理房间也很认真，真是“有钱能买猴上树”。

列车附有装璜漂亮、供应较好的餐车，除饭菜外还有白酒、红酒、啤酒、小菜，但价钱贵。所以我们早、晚饭自己吃，有时早饭在车站上吃，每天午或晚饭在餐车上吃，每次一瓶白酒，²一瓶红酒，有时还加啤酒，但付钱是轮流的，以免每次各人分付。所以，一路上吃的喝的都不错。

因为是特别快车，小站及中等站不停，只停大站或加水、煤专用站。车上很安静，没有什么杂乱人。

玛利亚送别 列车经过西伯利亚快到我的工作地点时，思想中涌现了各种不同的回忆。车已过扎奥则尔内了，快要到加玛拉了，时间已是晚十点，我仍准备下车。车停后，在暗暗的灯光下，静悄悄的站台上，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前面，我即刻下车迎上去。玛利亚迎上来，亲切地握手，问我是否一切都顺利。她谈到很想到中国去看一看，还问我将来是否有机会到苏联来见见面，祝我愉快地回国。我说，一切都好，满足了最大的愿望，到中国去不会难。我将来也可能因工作出差再到苏联，但愿有机会见面。我感谢她这样晚，走这样远，一个人来送别。她说，夜里不能回去了，准备在车站呆一夜，明天一早回去，还可以赶在八点钟上班，我将买的一些东西，送给了她作纪念，并请她转向其他同事问好。火车汽笛鸣了，十几分钟的谈话结束了，我们再次握手告别。我上了车，她的影子很快地消失了。

坎斯克站、小儿上车 在加玛拉站和玛利亚告别后，心情更是起伏不定，下一站是坎斯克了。平时慢车要五个小时左右，特别快车只要两个小时。一方面急切地想见到孩子，一方面又怕各种“万一”的不顺利，那才真没办法。这两个钟头，根本无所谓睡觉了，鲁也参也未睡，等待见到他的妻子。

夜里十二点，车到了坎斯克。我和鲁也参下了车，在静悄悄的站台上，远远看到几个人。我放心了。我们赶紧迎上去，鲁也参的妻子，亲家，还有两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抱着我的小孩子，他看见我，喊了一声：“爸爸！”我接抱过来，他两手抱着我的脖子，又喊了一声：“爸爸！”将头放在我的肩上。等着再和他说话时，他不再答应，一看，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抱上车，放在卧铺上，他仍在呼呼地睡着。我下来

和他们告别，据鲁也参妻子说，今天下午才告诉孩子说我要来了，并把他的随身衣服、小被子打好。他坐在小行李上，也不睡，要等爸爸来，也不玩。抱他来车站时，他已经很困了，但就是不睡，还问：“爸爸什么时候来？”现在困极了，见到我，倒在我怀里，抱着我脖子，达到了目的，心放下了，很快就睡了。

他们还带着篮子，里边有酒、香肠、酒杯，女人们想的真周到。我们在车门口还吃点，喝点酒，碰了杯，作最后的告别。他们祝我们顺利回到祖国。两位华侨还送我们两人每人一架价值七百卢布的照相机作纪念。恋恋不舍，充满了离别之情。

鲁也参的妻子买了一张票，坐两站，准备和鲁也参多谈一谈。前两站离她的女儿不远，然后再转回去。

鲁也参妻子把林娜的一封信转给我。她说，接到我们的电报后，曾给林娜一封信，告诉她我们路过坎斯克的日期，以便她能来和孩子及我见面。她没有来，回了一封信说，她身体不好，经济也不宽裕，很想孩子，有时夜里梦到，但她已经和我们告别了，印象还在，如再见我们一次，不会有什么收获，而精神上会再受一次刺激，所以不来了。她只希望我们一路平安，到北京以后给她写封信并把孩子的像片寄给她，作为我们之间的纪念。别的，她不再想了。相信孩子在父亲的照顾下，能长大成人。

上车后，孩子在沉睡中，实在是太困了。我给他脱了外衣、上衣和皮鞋，又在额上吻了几次，他一动不动地呼呼睡着了。我在卧铺旁边，放个箱子，使铺位宽了些，我躺了下去，但很难入睡。虽然一切顺利，可以放心了，但思绪绵

绵，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我们醒了不久，小儿醒来，一看，情景不同，便喊着“姥姥”，哭起来了。他学鲁也参的外孙把鲁的妻子叫“姥姥”。我心里一酸，忙给他解释，又怕他不习惯和我在一起，赶忙拿出玩具给他玩，给他吃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好了，话匣子打开了，又问东问西了。有一个专家会逗小孩玩，很快就熟了。不到半天，他在车上跑起来了。爸爸长、爸爸短地说个不休。不到一天，他也到各厢间去玩了，车上就他一个小孩，增加了不少的热闹。特别是有一对新婚的捷克专家夫妇和一对约五十岁的苏联专家夫妇，都很喜欢他。不仅给他各种吃的，还给他缝了个小娃娃，领着他玩。因此，他一直到北京，及以后，也未闹过一次。有时俄国人问他到哪里去，他说，“跟爸爸到北京去，”问他妈妈呢？他说，“在那里，没有来，”用小手指着车外。问他想不想妈妈，他说，“有爸爸就行了。”专家们说，大概爸爸比妈妈亲，所以小孩想爸爸，不想妈妈。

重绕贝加尔湖 过了伊尔库次克，天已经黑了，那时安加拉河上正建设水电站，灯火辉煌，特别好看；绕贝加尔湖时，无数灯火倒映湖中，更为好看；这使我联想起1927年初次绕贝加尔湖的情景，天时、地理、人事，我的年龄、心情都大不相同了。也想到，曾有相当长时期我们对于回国完全绝望了，而现在却越过绝境，走上了回国的坦途。当国际列车重绕贝加尔湖，我心想，人间有多少事不为人所能预料啊！抱着无限的热诚，回国后，一定要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再作点工作。此时此情，我再填一首“浪淘沙”，《重绕贝加尔湖》：

重绕北海边，不似当年。雪花纷飞又冰天。曾忆汉

使牧羊曲，既叹亦欢。

往事几变迁，多少辛酸。黑发离国落发还。珍重余岁尽余力，高厦添砖。

以后，我们甜蜜地入梦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完了贝加尔湖。

苏联境内最后一站，奥特波尔 1955年10月9日刚过午，列车到了苏联境内的最后一站，奥特波尔，俄文ОТ ЛОП是回击战的意思。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远东红军在这里集中，进入满洲里，以后这个地方才改为现名。由于中国和苏联的铁路轨宽窄不同，列车在这里得换车轮，约需四小时。方法是用专门吊车，将车箱吊起，换上较窄的车轮，同时洗刷车身。海关人员则在这里进行出境护照检查，大概因为中苏关系好，手续很简单。这时旅客们都下车，行李不动。各人办些邮电事务，鲁也参将余下的一千卢布寄回给他的妻子。无其他事的人，都在随便游览。我领着孩子，不能远走，只在附近踱来踱去，心中思绪不断，再过一会儿就要进入自己多年梦想的祖国了。只是小儿不时问些滑稽的问题，打断我的思路。

天还没黑时，我们都上了车。几分钟后，我们就过国境线，在火车上看不到什么其他标志或守卫人员，而只看到十几、二十几米宽的松土带。松土带是新犁过的，从南到北横贯着，虽然过去从小说上、口头传说中看到或听说过犁松土的原因，但这次倒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到达满洲里 只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就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了。

车刚停下，中国海关人员即上来进行入境调查。手续也很简单。见到我们，就问我们要不要换人民币。我们拿出外汇支票，他们很快下车替我们换了三百七十五元人民币。海关人员态度很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非常兴奋地下了车，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车站上散了一会儿步。这时天已完全黑了。

很快，中国的车务员也上来了，告诉大家已经挂上了餐车，可以用晚餐，还用中国话重复一遍。从此，在中国境内是中国乘务员。中国乘务员也会说俄语。

我和鲁也参向同厢专家建议到餐车吃中国饭，喝中国酒，共祝我们回到了祖国，欢迎他们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已换了人民币，可以购买我们想吃的东西：酒、小菜。他们同意了。我们进了餐车，餐车很漂亮，不次于苏联的，而且还更好些。这时我们才知道苏联的餐车只在苏联境内，从满洲里已是中国的了。餐车上吃了中式做法的西餐，觉得更有味道。中国白酒、红酒、啤酒，喝了个够，还吃了水果，小孩子也吃得不少。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精神爽时，则能吃能喝。回车厢后，很甜蜜地在祖国大地上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一醒，未起床，即隔窗尽情地看望祖国的大地，想到过去的历史和统一的新中国。想到自己终于回来了……我曾作过一首诗，纪念回到祖国。后来看《毛泽东选集》及鲁迅的书时，知道了曾在河南工作过的青年有为的党负责人李求实，于1931年和其他四人牺牲于龙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见《南腔北调集》）中，写了一首很好的诗，即：

惯于长夜过春时，孀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首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为了纪念回国并怀念李求实同志，将原诗改用鲁迅的原韵，修改为《回国感怀》如下：

投书故国请缨时，别妇携雏断藕丝。
二十余年历风雪，四旬末岁举红旗。
冷将惆悵埋异域，热抱忠诚赋新诗。
今日立下愚公志，抖擞精神着戎衣。

初次听到富拉尔基 次日上午十时左右，车到富拉尔基，只停三分钟。有三个在乌拉尔实习的上海青年下车，这三个人我们是在车上认识的，其中一个学炼钢，两个学轧钢，因工作任务急，在这里下车到工作岗位，因此，我才知道这里有钢厂，并且知道叫富拉尔基。

祖国境内的旅行 东北过去未来过，出国时是从海上到海参崴的。沿途看到的祖国东北比较荒凉，人口较少。到哈尔滨及长春时，我都下车散步，看到站名还写着俄文名及中文名。到沈阳时，已是晚间入睡时，未见到过去听到的“奉天”。一路很顺利。10月12日上午，到了山海关，我下了车，登上天桥，看了山海关的景致，并第一次买到纪念画片。我还向俄国专家介绍并解释了万里长城。

以后又路过了唐山、天津，都是早已闻名但未见过的名

城。

下午，快六点时，列车开始演奏中国国歌，并报告即将到达北京了。我盼望多年的中国首都即将在眼前了，心中的激动情绪，无法用言语表示。郊区已出现在眼前。很快，车停了，我们下了车。

刚下车，先见到潘树人来接我们。他介绍了组织部招待所的招待员王同志。金明也来了，我不认识，但和鲁也参相识。招待员雇了车，将我们的行李运出站，又雇车运往招待所。我们四个人，由潘树人抱着小孩子，我们手提着手提包，慢慢地缓步在北京的大街上，走向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方面坐了整整九天的车，想走动一下；另一方面，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想在祖国首都，缓步地走一走，观看一下渴望已久的首都的市容。

1955年10月12日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进入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北京比较有名的新华饭店，地点在前门外煤市街。招待所已预备了现成的房间，行李已经安排下，一切都顺利，终于回到了祖国，受到了没有想到的接待，开始了中断二十九年的祖国的生活。

在北京停留期间

(1955年10月—1956年1月)

新华饭店，组织部招待所 新华饭店是三层楼的大饭店，在北京旧时即是很有名的。房间很多，很宽敞，一楼为厨房、食堂、大厅、办公间及少数房间，二楼、三楼为房间，有电话交换台，伙食等各种服务都很好。那时正在开全国合作社会议，部分代表住三楼。另一部分是各地调动工作或治病的中级党员干部。从苏联回来的金明已分配工作，走了。潘树人还在，我和鲁也参两人，杨春及两小孩，还有从远东回来的一个姓王的和妻子、孩子。

其他人的待遇怎样我不知道。我们的房间、用具、被服等都不出钱，每月每人七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小孩子三十五元，共一百零五元，只是生活饮食费，完全够吃，而且可买零星东西。住了几天后，经组织部介绍，雇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每月二十五元，加上吃的，孩子的三十五元实际上不够用了。为了使保姆能不误解孩子的要求，他们彼此不通语言，我教给了保姆几个孩子的儿语，如拉屎、撒尿、喝水、吃东西。这样勉强地逐渐使她能领他玩和吃。

到招待所后，填了简单的登记表及一个履历表，作为在组织部的登记，也作为招待所的登记，以及作为办理生活费及粮食关系。招待所都替我们办了，不然，我回国是颇有点麻烦的。出国前，未到过北京，现在也不熟悉。幸亏潘树人早

来，已先有点常识，倒可作我们的向导。

中国虽然实行了定量供给制，但1955年末，供给还是很充裕的，北京吃的问题，一点也感觉不到限制，不象苏联那样。商店里的货物很多，饭馆到处皆是。祖国过去是穷得出名的国家，几年内能有这样大的变化，真是不简单呀！

我想打听一些人，但毫无结果。招待员姓王，是河南人，曾在河南大学读过几天书。只知道稽文甫，是当时河南大学校长，其他老的人，他就知道了，他提到的新人，我都不知道。

总之，回国后受到的招待是未曾想到的好，和原来的打算住店，联系找工作，大为不同。使我感到向往多年的祖国，真是同母亲一样，来接待我们这些多年远游的人。

见到了一些熟人及董老等情况

见到杨放之 经过一些日子，没有打听到熟人，报纸上也未看到什么人名，有一次忽然在《中国年鉴》上看到政府各机关负责人中有国务院专家工作局局长杨放之，心想可能是老同学，虽然“放之”两字不同于原来的“芳芝”，可能是原名太像女性而改过来了。于是我向招待所电话员黄泰梧提出，请她代我找。黄泰梧年纪才二十岁，还在业余学校学习，略会几个俄文字，自己起了个俄名达尼娅我们刚到几天就很熟悉了，是因为她很喜欢我的小孩子，和他玩，说几句俄语，小孩子到她交换台内看到各种按钮、接头，小红灯时暗时亮，确实好玩得很。她说，政府、党机关及负责人的电话都是保密的，但她可以通过组织部招待所的交换台找到任何人。有一天，她果真找到杨放之的电话，我和他第一次在电话中谈了话，他想不到是我找他，但一说话就彼此知道了。

他问了我的住址，说他将到招待所来看我。因为，他很容易来，而我是不能到他那里去的。

过了两天，他来了，如果不是事前打电话，见面后我们是不会认识的。相别时是二十左右，现在经过了二十六年，都变成老年人了。见面后，各自谈了些几十年来别后的情况。杨放之于1929年上半年离开中大，被派到海参崴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职工会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后来回到上海，在工人区工会工作，有一次因为发生了公开逮捕，他因近视眼，看不清楚，还继续向前走，结果也被捕了。他在监牢里呆了一段时间，人证物证都没有，被释放了。以后到了延安，一直在党内工作。现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专家工作局局长，杨放之已有自己的专用车，领着我和小孩子，到了他在国务院的住宅，见到了他的妻子（也姓杨，在延安结的婚）及其四个女孩子。他说，黄励，他的第一个妻子，比他先回国，后在南京被捕牺牲了。他妻子对我们很亲热。他们住的房，是平房改建的，有暖气，很不错。

老同志中，他只知李沛泽，在人民大学工作。刘绍文，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稽文甫，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副省长，人大代表。这些人，他都曾见到过，其他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或是否还活着。

我到富拉尔基后，出差到北京时，还见过几次杨放之。

到组织部谈话 到招待所后，过了些时，组织部分别找我们谈了话。接见我的是个姓李的，约四十岁左右，似乎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在相互谈了些话以后，他提了几点意见：

我们的申请是经中央批准，由组织部办的。现在对我

们按干部招待，将按本人专长及志愿分配工作。

我们在苏联的情况，中央是知道的。关于政治条件及情况，组织部在向有关单位介绍时将予以说明，并由组织部负责。这主要是历史问题。我到工作岗位后，对一般同志都不讲，对党委负责同志可以讲一下。

关于国籍问题，组织部不能办，但也不考虑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和其他同志一样看待。

关于回家乡问题，在未了解家乡情况前，暂不要回去。弄清情况无问题时，可回去看一看。

关于工作问题，组织部将根据我们的志愿和有关单位联系，并将抓紧办。我们过去未到过北京，离国很久了，可以住些时候、了解些情况，不必太忙于工作。工作有的是，只怕干不完，不怕没事干。

十一月末，组织部第二次找我谈话，那时我已找过董老谈过话了。还是那个李同志。他说，董老给组织部写了信，按我的专业分配工作。现已和一机部干部司联络好，我分配到一机部，具体什么地方，由干部司安排。如有问题，我还可找组织部。李同志征求我还有什么意见及问题，我表示同意，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感谢对我的照顾。

见到赵毅敏 从潘树人的口中知道了刘昆即现在的赵毅敏，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昆是我大哥的同班同学，在留美学校时曾认识，同学过一年。他毕业后，勤工俭学到法国去，1927年我到莫斯科东大时，他已从法国到那里，成为党员，作翻译。我仍然经过电话员黄泰梧打听到他的工作地点，于十一月的一天，到他的办公地方去见他。彼此还都认识，他谈到：

他的爱人李雾仙，现名李沙，任师范大学副校长，身体有病，今天不能来见我。

原来他的同班同学郑若谷已经反动了，其他同班同学不知还有谁在。

他的工作很忙，但身体不太好。他1928年在东大，未即时回国，而又呆了段时期才回来。

武汉解放时，他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宣传工作，在街上偶而遇见了我的大哥马云。他失业了，在街上摆小摊，卖香烟。见了后，由他的妻子李沙给介绍了一个工作。

第一次见董老 我回到北京后从报纸上看到董老代表中央到新疆去，十月末才回来。我写了封信给董老，讲了情况并希望见他。他的秘书到招待所来了，说董老刚回来，身体不好，让我等一等，十一月上旬，秘书第二次来，约定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去见他。那时他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面后，我还认得董老，他也认得我。谈了些一般情况后，董老问我，在1930年后，我是否又犯过错误或没有什么其他活动及是否和国内有联系，我说，没有再犯过错误，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和国内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回国前给中央写的申请及情况，都是如实地写的。现在能回来，只希望多少能为祖国做点工作，组织部很好，我很感动。

以后董老提出：过去的事，在莫斯科的情况，他知道，中央也知道，所以才批准我们回来。能回来就好了。过去犯了错误，认识了，改了就算了。不坚持，不继续犯错误，就好了。中国党的政策，对干部就是这样，既往不咎。将来到工作岗位上去，这些事也不要对一般人谈，因为，在苏联受

过这些处分，如果说是自己做了坏事，也不符合情况，也不会自己说自己坏；如果说苏联处理错了，也不好，既影响中苏关系，也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不说为好。中央知道就算了。自己也不要背包袱。也不要情绪。周达民、俞秀松当时并未犯过我那样的错误，但以后留在苏联，连小命也丢了，我还保了小命能回来，比起他们来好多了。关于工作安排问题，可提出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以便中央考虑，以前未到过北京，多年未在国内，现在也不要忙，住些时，看一看，了解些情况，学习一点。国家现在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在苏联工厂干了多年，可以干技术工作。

将来可以回家乡去看一下，但不要带任何亲属，中国是不准以私人关系走后门找工作的，我可以对乡亲们说，刚回来情况不了解，也不认识什么人。董老又说，中国农业有很大进步，但还不充裕。

见到李沛泽（王若飞的爱人） 在十一月的一天，天已黑的时候，我找到人民大学，在一个接待室内见到王若飞的爱人李沛泽。初见面时，彼此一下几乎不相识。我向她简单地谈了我留在苏联的情况，她谈到王若飞回国后，工作很好，不象在莫斯科时那样有情绪。以后曾被捕过，后来参加领导工作，不幸飞机失事，死了；现在她有个儿子，已十六岁，就只她母子两个。我向她提到党籍问题，说在苏联未解决，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想提出党籍问题，她过去在河南呆过，在莫斯科也知道我的情况，能否当我的证明人。她说，她知我是党员，但不能作证明人，因为在河南时不在一起，不知道入党的情况。她说，东大是党校，可能不会再要证明人。

在北京公安局外事部门的登记 在组织部招待所时，户口、粮食关系都不成问题。但考虑到将来到外边去时，得有个户口关系，所以我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部门去询问这事。由于我拿的是苏联公民出国护照，他们一定要我按外侨登记，以后又发给我一个外侨居留证。真是有点可笑，在苏联当了二十多年外国人，回到祖国还得当外侨！没办法，这叫法律手续。以后，我到富拉尔基工作时，还用这个外侨居民证落户。幸而以后落了户口，无人再问了。

工作安排 十一月末，在组织部和李同志作了第二次谈话后，我就到一机部干部司去报到。到那里后，因为组织部事前已告知，他们要我填了个表，问了情况，让我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去后，干部司告诉我，根据我在苏联工作情况，分配我到三局去，说他们已通知三局。我即到三局干部处。处长姓田，让我填了个表。这时有个人自称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人，劝我到他们厂去，又可回家乡，只要我同意，他即领我回洛阳去，一切负责安排。田处长说，待他们研究一下再说，让我隔一天去。后来我按期去了，田处长说，已和局长商量过，局长自有安排。后来局长来了，是钱敏，找我谈了话，让我到黑龙江的富拉尔基，说那里将新建一个重机厂，还有大批苏联专家要来，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必到洛阳去。钱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分配到哪里都行。一定要好好工作，以后钱局长说，重机厂的领导都在北京，正在审查重机厂建厂的技术设计，我可参加技术设计审查会议，将来和他们一起到富拉尔基。以后，钱敏局长即让三局一个女秘书，要了一个汽车，送我到汽车局，

参加重机厂的技术设计审查会议。

参加工作及重机厂技术设计审查 到汽车局后，见到了重机厂的领导人周宇博、乐于泓，他们让我参加生产准备组，当时负责人为于云生、李泊辰，还有几个技术员。

技术设计是苏联作的，重机厂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重点项目之一，设计审查会议由第一设计院主持，是将原设计翻译成中文，邀请设计院及重机厂负责人和各专业技术人员按项目分成小组，对苏联的设计分部分组介绍，提意见，然后整理出审查意见，提供给苏联专家，作为参考意见，然后再最后定案。我参加这个会议的开始日期是1955年12月1日，这也算是我到厂报到的日期。因为当时重机厂的领导及各处的负责人都在北京，厂址已最后定在富拉尔基。

我当时因为对重机厂不了解，也不能提什么意见，而且有些中文技术名词我也不熟悉，有些南方技术人员讲话也不完全懂，因此我只能了解些情况而已。技术设计审查会议一直开到12月末结束。重机厂的一批人都要回富拉尔基了，我向厂领导提出想回家乡去接家属并看一看，他们同意了，批给我12月和1月两个月的工资二百九十二元人民币，即每月工资为一百四十六元，他们说是按中央组织部给我定的级别应得的工资。在这段时间，我们仍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晨坐汽车上班，午饭在汽车局食堂吃，晚饭回新华饭店吃，保姆照顾我孩子。从领工资之日起，我告诉了招待所，不再领生活补充费，但仍住在招待所。以后回家乡，带着妻子及侄女，仍在那里住了十来天，直到1956年1月16日，动身去富拉尔基为止。我和家乡及家里的联系，也颇有点巧合，不然，我即同孩子单独离开北京到东北去了。

回到家乡及接家经过

巧遇李同志 在苏联办理回国手续时遇到了一个曾在河南住过几年的俄国人，说我家乡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是“拉锯”的地方，有些居民区已夷为平地。回国后也听到过这种说法，经过几次打听也找不到人，所以我对家庭的存在或还有人的可能性，没有信心了。因而也准备分配工作后，先到工作岗位，以后再说。

但事有凑巧，在招待所调整饭桌后，有一对五十左右的夫妇和我同桌，姓李，是哈尔滨市委干部，在北京治病并等待调动工作的。他们带了一个三岁的孙女，和我的小孩年岁大小一般，高矮也一样，两个孩子虽然语言不通，却在一起玩得很好。这引起了她奶奶的注意，就谈起我怎么有这个“洋娃娃”。我谈了情况后，她说她有个哥哥在我县百泉中学当教员，不久将来京看病，届时可向他了解家乡情况。果然，过几天来了。因为我正有事，只见了一面，谈了不多时间，以后他就走了，我有点后悔。他回河南不久，给他妹妹来了封信，说他学校的图书馆女主任，和我弟弟马卓生不久前是同事，知道我过去的情况——原名马霖。我三弟在小冀中学当教员。大侄女在开封师专读书等。他说，他将把我回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我很感谢他们，并即刻给家乡和开封师专同时写信联系。从谈论小孩找到了家乡的线索，也算是一种“巧遇”吧！这是十一月底的事了。

和家中的通信 十二月中，我参加技术设计审查会议时，先后收到了家中侄女瑞馨的信，及开封师专瑞香的信，都向我讲了家中的情况，并提到我的妻子还健在。据说，当我的信到家中时，侄女瑞馨从乡邮电所拿回去时，就跳起来

了，祖母、妻子、八叔开始不敢相信，以后轰动了全乡。当然离家三十年而生还的人，不仅现在，而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信中说家中生活很困难，我即寄去十五元钱，并说准备新年回乡去，还问需要什么东西。以后又接到三弟从小冀来的信。这样，才和家里联系上了。

从北京到河南小冀 十二月末，重机厂设计审查会议将结束时，我向厂领导说明要回乡。由于小冀是个小站，只得坐慢车去。事前我写信给三弟，说预计十二月三十日到小冀，元旦可能到乡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对保姆说明情况，并买了些东西，给祖母买了一件皮货及衣料，带了些吃的。从永定门车站，搭夜车回河南去。一路上一方面精神紧张，心情兴奋，一方面要看东西，也无卧铺，一夜也未睡。天亮后，进入河南境内，心情更激动，到新乡站后简直坐也坐不住了。十时左右，到了小冀。

下车时，人不多，各人都走了。我提着箱子，在站房里问到中学怎么走，奇怪怎么不见三弟来接我。在将出站房时一个女人自我介绍是三弟的妻子——陈玉琦。然后领我到三弟的中学校。三弟当时在上课，后来到车站时，因走岔了路，未能见面，待他再回学校时，才见了面，还可认得，但变得太多了，老了。见面后，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他们让我在学校休息，说家中如同“鸡窝”一样，不方便。但我还是到他们的“鸡窝”中去。在那里看到他们的住所，见到了侄子瑞成，商谈了对家务的处理办法，大致如下：

由我带妻子及瑞馨到东北去；祖母及瑞兰由弟媳带领到小冀，另租较大的房间；家中可带的东西带出来，粗笨东西交给家中的亲属；家中住的房子卖掉。

因此，由我弟媳陪同我回家乡处理这些事。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日上午搭车到新乡。

回到了家乡 搭车只走一程，就到了新乡，我青年时代多次经过的地方，现在看来比过去规模大得多了。到新乡时，天刚到午，赶着去买到辉县的汽车票。在那里遇到了弟媳的亲戚，也是回辉县的。

汽车很旧，看来“服役”期不短了。头天下的雪，正在溶化，路很不好走。汽车路是土修的，据说是日本人占领时强迫修建的，占了民田，所以很直，路基很高。到辉县时，天还未全黑。我们到了那位亲戚家。以后到街上散步，找饭馆吃饭，看到家乡群众都在过新年，对联和灯笼不少。

我们预雇了一辆手推车，第二日，即新年元旦，天明后不久，才七时，我们就离开辉县回赵固去了。手推车推着弟媳及我的箱，我步行。一路上不断注意分别三十年的家乡风土村落，田园树木，真正说不尽的思想反复，回忆怀念。似乎都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景况。有变化，但不太大。

一路上我逐个问推车人到了什么村庄。二小时后，到了“花木”，这是我很熟悉的村庄，离我家乡只有八里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很注意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姓马，说他很知道我父亲，听说我过去出国了，现在怎么回来了？这是第一个认出我的老乡了。以后看到右手边的村子，说是“苗谷”，我说知道前面望到的村庄，即是赵固了！我们从南路进入村庄，很快到了“大街十字”，以前印象中的南大庙，南大街“商店林立，宽广大街”，现在看来是那样的不大，使人有点不敢相信。但是随着我们走的人，大人，小孩子逐渐地多了，虽然他们不直接和我讲话。可能风传了我将回来，又看

我的衣服穿戴，不象是本乡的人。我也东张西望，街道、房舍，似乎有些认识，但也不全象，足以证明我离家乡的时间，确实是很久了。三十年，说起来，真是惊人！

到家中两昼夜的停留 到家后，见到了我已不认识的妻子，又老又瘦，完全不是分离时或梦中见到的少女幼妇，但精神尚健，和年已九十的犹慢步出来迎接我的祖母，扶着瑞兰，她们悲喜交加，祖母流下了热泪，妻子鼓着勇气，克制着，没有掉下泪。很快，八婶、八叔、七婶、本家霁霖两个哥哥也都来了，这些人还是可以认得的。我还来不及和他们谈许多话，屋内及小院里已经挤满了乡邻、大人、小孩、青年，都是认不得的人了。妻子赶快打开火准备饭，看时间才十点刚过。

我前后左右看了一下家中住的地方，仿佛是到过似的，后来回忆了一下，才想起是小时曾在这里上过私塾的那个学房，大致还是那个布置样子，地点在“北胡同”，不是原来的住宅了。

不久，离我乡只三里的板桥和一里半的韩营两个村的亲戚也来了，大多数都不认得了，老年纪的提起还可以想到，年轻一点的，根本连印象都没有。本村中年纪大些的，向我说他自己的小名（即乳名），有的还可回忆起儿童时代在一起玩时彼此相呼的小名。本家人说我变老了，但乡音还没有全变，不象有些人离家不久就“夸声夸气”地变了腔调。这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唐诗人贺知章的诗的味道：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情况是完全符合这首诗的，但也有些点不同情况，所以再作一首，以说明自己：

幼年从戎落发回，尽昼辛酸志未衰。
多少往事付流水，整盔理甲战地来。

上午，乡里由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组织合作社，让我去讲话，我欣然地去了，借机会和老乡们也见见面。到会的人不少，有几百人。下午我拿出给祖母买的皮货及衣料，由弟媳等做了，晚上给祖母试了一下，她不再脱了，很高兴，眼眶里含着热泪说，没想到她还能见到我，又穿上我给买的皮袄。

第二天早饭后，由瑞馨及本家一个侄子到乡政府办理迁移户口一事，他们两人又到县里去了一次，直接办到黑龙江富拉尔基。因为是骑自行车去的，午后不久就回来了。

第二天将午时，大哥也来了。据他说，他接到三弟的信后，即日从汉口请假回河南，前天即我们离开小冀的时候，他正是坐的那次车下车的，我们上，他下，恰恰错过了。他到小冀后，次日还是坐那次车到新乡，晚到辉县，今天赶到家，和我们一样，只是迟了一天。下午更为热闹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多年未回家了。这次算是团聚了，而且和乡亲也都见了面。

第二天，乡亲们还陆续有来的。我和妻子、弟媳、大哥商量，第一，家里任何人都不带，而且不能答应他们。第二，次日即应该走，在家中费用太大，粮食也吃得多，孩子在京也不放心。第三，由弟媳在家处理后事，并到辉县百泉去一次，感谢那位姓李的老师。第四，到板桥雇辆小车，送

行李及妻子坐。

次日晨，只带了两条被子，我的箱子，小车推着，妻子、瑞馨、我和大哥，辞别了祖母、弟媳及诸位乡亲们，离开了幼年时候成长的相别三十年的家乡。在这里只呆了两个昼夜。

返回北京 不到上午时，我们就到了辉县的汽车站。汽车下午才开。我们留妻子和瑞馨在那里买票，我和大哥到城里去找继母的娘家，未见到人，以后又找父亲在报馆工作时多年的同事杜荫南，他还健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了。我们谈了些多年的往事及父亲的晚年，在那里吃了一顿饭，留下了粮票，他居然未拒绝收下了，可见粮食限制是很严的。不然，他决不会收这点粮票的。

下午即赶去搭车，也来不及欣赏县城的市容。到新乡后，天已黑了。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客店。大哥准备搭晚上南下的车回汉口。大哥和我们利用时间去看了他的大女，我们的侄女的一家，他们住在新乡，她是电影放映队员。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了。晚上，大哥回汉口，我们住在客店里。

第二天，我们到车站附近的街上游逛了一下，比几十年前繁荣得多了。在街上遇到本家兄弟马雱，是妻子认识的。他也提出和我出来的事，一方面我请他吃饭，一方面也婉言谢绝了。

晚上八点，我们搭上北上的车，次晨六时到了北京，进招待所后，保姆已起来，孩子在呼呼地睡着，我就放心了。从二十九日晚离京，匆匆忙忙地马不停蹄，到回来已整一个星期了，保姆说，孩子没有闹，很乖，只是常常问爸爸。她也听不懂。有时电话员黄泰梧也和他玩。

我回家时，未带小孩子，家中人问我，我说明理由，但带了像片回去。妻子到北京后，保姆告诉孩子：“妈妈来了。”他仰头看看不作声。她又说：“姐姐来了。”他口中说“姐姐”，但不知什么叫“姐姐”。妻子上前亲抚他，抱他，他也不拒绝。以后照顾他吃饭，和他玩，晚上照顾他睡觉，一两天后，他习惯了，也喊妈妈、姐姐了，这样我们组成了一家人，为我们到东北来打下了基础。我也可安心地出去工作了。

当我们到东北后，陆续地和家中及本家的其他成员，发生了通信关系。

到达富拉尔基

到达富拉尔基 因为留在局里还有些事，所以，一月十五日由组织部招待所介绍，买了国际列车到富拉尔基的票，一家大小四口，坐车直达富拉尔基，从此，开始了在东北的生活。

回国后和苏联相识人的一些联系

给林娜的信 到北京后不久，给孩子照了像，以后连像片给林娜寄了封信，告诉她我和孩子顺利到达北京，并受到很好的接待，各方面都好。这是我们预先约定的。但到此为止，也不再通信关系。这是使她放心，同时也不再打扰她的心。我们从此断了藕丝。

给原工作同事的信 还给原工作同事们写了信，特别是玛利亚、索菲亚，主持给我送行的人及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的人。说明了我受到很好接待的情况。她们并且给我回过信。但不久就再未通信了。我只是让她们转达问候而已。

和玛利亚的通信 以后玛利亚还回过我几次信，从我到达工作岗位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彼此不再通信了。到富拉尔基后，1956年，我还趁有人到苏联工作之便，给她带去个被面，表示对她给我送行及我病时照顾我一两天的谢意。

给厂长考培洛夫的信及回信 到工作岗位后，也曾给原

厂长考培洛夫一封信，叙述了顺利回国，接待很好，工作安排很满意的情况。他也回了信，并说他转到矿务管理局干部处工作。后来我考虑到将来申请解决党籍问题时，又曾给他写信，让他补给我一个在该地几年工作的工作鉴定。他回了信，并寄来了个工作鉴定。以后未再通信了。

恢复党籍的经过

· 回国后有关党籍问题的谈话 在组织部王同志找我谈话时，除其他问题外，我谈了关于我的党籍问题，并把在苏联曾一度解决党籍问题的情况告诉他。他说，先解决工作，再谈党籍。

在1956年初，将离开北京时，在一机部三局干部处和田处长谈到党籍问题，他说，党籍问题的解决，不受我所在工作地点的影响，到富拉尔基后，经过党组织，一样可以解决。

到达富拉尔基后曾和厂负责人谈到党籍问题，答复是，经过一段时间，总是可以解决的。

向中央请求解决党籍的申请书 1956年5月，在我到达工作岗位四个多月以后，我写了一个解决党籍的申请书给中央组织部，并找厂党委书记周宇博谈了情况，说基层党委可能难以处理我的问题，因此请厂党委看一下，研究一下并提出意见，再按组织程序转到上级。在申请书后边，附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自传，其中包括我的家庭，父亲的一生，个人简况，入党前后经过，入党后作了些什么，怎样到莫斯科入东大，后来转入列宁学院，自己犯的错误，受到的处分及参加生产情况，1933年苏共地方组织一度恢复党籍及后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未批准的原因，1935年进入苏联动力学院，1936年末再次被捕及1937年肃反扩大化时被判刑及劳动改

造，在乌拉尔地区工作及第三次无辜被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工作情况，以后苏联给我们平反及申请回国的原因等。

1956年7月初到北京出差并到中央组织部 在出差到三局参加生产准备会议时，我到组织部问了有关我的申请书的事，有个负责人出来向我谈到：申请书转到组织部，已初步研究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以后还得请示领导，将来如何决定，再告诉我。他们提出几个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让我再写点材料。大致是：东大当时的情况，学潮的性质；对中大情况的看法，中大学生内部如何；对当时反对派的看法；对苏共二十次大会的看法。我根据这些问题，在招待所很快又写了一下，再次到组织部交给一位姓陈的同志，他看了后，说基本清楚了，我可以回原工作单位，等待通知。

第二次见董老 在三、四月间，我曾从富拉尔基给董老写过一封信，汇报到达工作岗位的情况，并提出想给中央写信申请解决党籍问题。董老回过我一封信，说初到工作岗位，可能不习惯，要虚心学习，慢慢即可习惯，关于党籍问题，说中央要先研究一下，确定个原则，然后才具体解决问题；但无论如何，自己应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员标准积极工作。这给了我很大鼓励。这是写申请书前的事。七月出差到北京，到组织部第一次谈话后，次日即到最高人民法院去见董老。时间在七月初的一个下午，仍在会客室，没有别人在场。我讲了些情况后，董老说，自己身体还可以，夏天，气管炎不发作，家里情况也好，孩子也大了，最小的也上高小了。

你参加工作后，可以将苏联学到的一些技术知识用上，但作风及工作方法，要逐渐习惯。

关于你过去的历史问题，过去承认过错误。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究竟是历史问题，不再那样就算了。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有所不同，苏联过去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也不合适，中央也知道。

关于党籍问题，如我信中所说，中央要先研究个原则，然后才能具体解决。你要相信是会正确解决的，中国党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有原则的，你要安心等一下。

关于恢复党籍的通知 在1956年10月间接到鲁也参的信，说他已经得到了恢复党籍的通知，并听说恢复党籍还有别的人，目前还不知道是谁，我可能不久会得到通知。我当时很高兴。

十一月间，厂党委组织部长通知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说中央组织部恢复了我的党籍，并给了我通知，以作证明。这个证明是根据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写的。通知说：

“马员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入列宁学院。一九三七年被捕中断了党的关系。现在决定恢复马员生中国共产党党籍。”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56年10月

这个通知是经过黑龙江省委转403厂党委的。

从此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由于党中央对我过去几十年来在苏联受到的错误处理作了结论，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使我卸除掉了背了二十几年的沉重包袱。接到这个通知，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勇气，下了决心，要尽自己的所有力量，为国家为党为人民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以后，我向厂党组织负责人比较详细地谈了在苏联的经历。

国籍问题的解决

加入苏联国籍的原因 我从1927年到莫斯科及以后一段时间，从未提出过国籍问题。1933年，在伊万诺夫工厂做工时，因为苏联政府宣布在国内城市居民中实行护照制以后，我们既不愿和反动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发生关系，以取得中国护照，又不愿作为无国籍人，所以经过地方行政机关办了手续，成为苏联的公民，领了苏联公民护照。从此一直作为苏联公民在那里。

在中国大使馆的谈话 1955年夏，办理回国手续时，我们还是以苏联公民出国的形式。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时，大使馆负责工作人员王同志说，回国手续是经过大使馆和苏联政府交涉的，如果要求我们转国籍，则得推迟两年，因为需要经过两国的最高政权机关批准，要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太麻烦了，所以，还是先回国，然后再谈国籍问题。我回国后，中央一样地接待、安排工作，不受任何国籍问题的限制。因此，我们是以苏联公民出国的形式，回到国内的。

回国后的国籍问题 回北京后，和组织部谈话时，他们说，转国籍的问题，组织部不管，转不转国籍，按个人自愿，这只是一种形式，对工作没有关系。但我在公安局登记办理户口时，他们也采取形式主义，硬将我登记为“外侨”，

虽然我们回国后，我从未到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去报到或有什么联系，而在形式上应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到了富拉尔基，安排好工作以后，我就想试一下，申请退出苏联国籍，以了结这个形式上的手续。

申请退出苏联国籍 我在1958年写了一份退出苏联国籍的申请书。说明了到达苏联的情况，为什么没有中国护照，在莫斯科学习及有一段没有国籍问题，以后加入苏联国籍及其原因和背景，回国的前后经过，现在申请退出苏联国籍的原因等等，特提出请求批准。

申请书是写给苏联的政权机关最高苏维埃的，用俄文书写的，信寄给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转。当时写好之后，精神上颇感自慰，但也不知会有结果，还是“泥牛入海”？

关于批准退出苏联国籍的通知 1960年春，厂内还有苏联专家的时候，驻厂专家组长达拉索夫告诉我，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让他通知我，我退出苏联国籍的申请已获批准，让我带着苏联外交部发给我的护照，到哈尔滨领事馆换取退出苏联国籍的证明。这对我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两年之后，居然有了回答。我很忙，写了一个委托书，让一个跟专家的翻译，带到哈尔滨并附上苏联护照。几天后，他带来了一份用俄文打印的证明。上面写着：

本证明给予毕托贺夫·彼得·彼得罗·维奇（马员生），他申请退出苏联国籍，和他的儿子，1952年生，弗拉基米尔在一起，已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M128/38 号文，于1959年10月24日批准。

总领事馆秘书签字（巴瑞宁）

1960年2月12日

这样，算是结束了苏联国籍问题。

代 跋

按照一般惯例，也写几句来收尾，作为自我总结，虽然尚不能作为“盖棺论定”。

(一)

我生于清末，还是封建时代。少年时代，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后来，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开始阶段，走上了觉悟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党还是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的党。”我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当然更幼稚了。虽然多少有点自觉，但还是以民主革命思想为主，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只有一个向往的理想。在国内二年多的地下党工作期间，究竟还是满腔热忱，不怕困难，不怕死，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利益的。后来出国到革命圣地，一心想作一个职业革命家。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二)

在莫斯科阶段的第一期是东大，只一年多一点。由于革命的天真热忱，看不惯东大中国领导人的作风，和其他一些人参加了所谓学潮，后来离开东大。当时估计可能会受处分，而有可能回国，但由于客观原因，都未实现，而结果到了列宁学院。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关键。

(三)

在列宁学院时期，好的方面是学习，知识大有提高，坏的方面是接受了反对派的政治观点，最后受到处分，流落到苏联，几乎达三十年之久，消耗掉了一生中的精华时间。这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三个，而且是最大的关键。

接受反对派政治观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根源方面，有社会的、历史的及思想的。在此，不准备分析。但那时也有个大矛盾，即政治观点上基本同意，而对派别活动却一直抱着怀疑、不同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组织方面基本未介入，对派别活动也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但不论在当时及以后的较长时期内，作为一个党，怎样消除派别斗争，或至少限制派别斗争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使其转为敌我性质，却是始终未能得出答案的。

(四)

当时我以及和我持同样观点的或基本上持同样观点的人，是犯了错误了。虽然对错误的看法、性质、原因，各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这不是错误人人有份，而是为了吸取教训，也该指出。我想，可以引用两段话来说明：

在1930年，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得出结论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说：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

整个三十年代，随着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是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又说：“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说：“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

我当时错了，对我的处理也错了，这个错中错，就成为我的历史问题的原因。

(五)

1933年我一度由苏共地方党组织恢复党籍，而未被共产国际监委批准，以后又说在联共清党后可解决党籍问题。这是直接由中国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造成的。1930年的对中大学生问题那样的处理，也是由于王明的宗派主义造成的。这次是第二次遭到王明的压制。如果那时能恢复党籍，并很快回国，可能不受到以后苏联1937年的大清洗的影响。但如不能回国，则即令恢复了党籍，也难免受到大清洗的压制。另一方面，我未恢复党籍，一直是个平民，只受到了一般打击，不象有些原派别头头如周达民、俞秀松那样遭到致命的打击。真是，很难说一个人的生命的命运究竟取决于哪一刻的遭遇。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在国内造成的恶果，更不必说了。

(六)

1937—1938年在苏联的大清洗，不只是我或某个人的不

幸、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公开受审、判刑的、已发表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未公开的更无从得知，规模多大、人数多少，多少是真的，多少是错的，也无从得知。使用的方法，也很值得怀疑。(1) 无群众路线，只是少数人干；(2) 大清洗不经过党组织；(3) 用肉刑；(4) 缺席判决；(5) 无具体罪行而用各种“名词”定罪。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在她写的小册子《斯大林时代》中正面估价了斯大林的功绩，但却对1937—1938年的大清洗，作了惊心的介绍。中共中央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中说：“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196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说：“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人。在1937——1938年中，曾经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1939年三月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承认“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所犯的错误比原来意料的还多。”另外，苏共当时进行清洗时，言行也有很大矛盾。1937年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过去，七八年的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之一”，但在清洗中却将一切过去的反对派，同情者，有嫌疑的甚至无关的人，都以反革命罪行判罪。而且以后在1949年又进行了一次。

(七)

关于干部政策，干部处理，甄别，平反及路线问题，毛主席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部分

错了的，都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苏联在这方面长期未这样做，在那里完全是另一回事。

(八)

回国后工作了十多年，在简记中未列入，因为是比较稳定地在一个厂工作，涉及到一个技术干部的各种政治、人事、业务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然也经过肃反、整风、审干、三反、社教运动，但也是和一般干部一样地经过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认真地工作，尽自己的力量，虽然开始有些不习惯，有时有些急躁情绪，作风上也有些主观主义，也干了一些错事，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总的说来，在政治、技术水平及对人处事各方面，还有些进步和提高。群众关系上还是比较好的。努力争取回国的愿望实现了，并证实是应该的。

(九)

“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考验，而且几乎倒下去。思想反复继续了几年，有时简直想不通，几次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但终于恢复了积极的想法。写点东西，胡诌些歪诗滥词，看了一些旧诗词、小说、历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

读了一些外文技术杂志，分点心，吸引些注意力，多少有助于改善我的精神状态。这样也就达到了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写时，虽然尽量地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有时也有点气，至于是否流露在文字上，待以后心安气平时再复查吧。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我的所谓由敌我矛盾转为审干问题，快要结束了。也许还得工作几年。人虽然老了，快到“古来稀”的年龄了，身体还争气，允许再干几年。看到周围的情况，也确实有点心里不安，总不能“油瓶倒了也不扶”，这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吧！重新工作时，也要改正过去的一些缺点。为此，用前诗厚韵，写了一首《自勉》，并作为代跋的结束语：

年近人生稀有时，齿落毛脱霜鬓丝。
栉风沐雨见世面，别枥备鞍负战旗。
欣陪诸君齐努力，续写篇章共赋诗。
甘为公仆不为官，俯首倾耳着工农。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